

目 录

鸦片战争前禁烟档案史料补辑（下）

..... 萧致治 李少军整理（1）

张之洞手札一束..... 来新夏整理（23）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

——第三次日俄协约和第四次日俄密约

..... 陈春华译（29）

1920至1921年的中苏关系

.....[苏]贾丕才著 黄纪莲译 刘存宽校（54）

周学熙家语（卷下）..... 郝庆元 林纯业整理（74）

福建陈国辉纪实..... 杨汝岛整理（112）

抗战初期武汉文艺刊物述略..... 阳海清（142）

· 史料发凡 ·

搜集近代史资料发凡..... 祁龙威（193）

· 史料研讯 ·

校本《贼情汇纂》补正..... 朱树谦（203）

徐抚辰与《筹笔偶存》手稿..... 李吉奎（210）

东 访书录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未刊《田中家文书》

..... 娄向哲（214）

· 作者 · 读者 · 编者 ·

一个读者的企望..... 姚继灏（222）

鸦片战争前禁烟档案史料补辑（下）

萧致治 李少军 整理

16. 陕甘总督瑚松额奏报查拿鸦片情形折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发

陕甘总督臣瑚松额跪奏：为甘肃省查拿鸦片烟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部咨：钦奉谕旨，飭令各抒所见，妥议严禁鸦片烟章程。当经臣就甘省情形并管见所及，恭折复奏在案。

臣伏思鸦片烟之害，流毒日久，甘省民情淳朴，吸食兴贩之人虽较他省为少，然游荡无赖甘蹈邪僻，及嗜利奸商乘间私售者，近亦所在多有。况现在各省查禁正严，此拿彼窜，更所难免。甘省东南毗连川陕，山林邃密，路径丛歧，诚恐积惯兴贩之徒，窜入甘境，匿迹潜销；而西路为新疆门户，尤虑往来商贾夹带出关。臣屡经谆嘱藩臬两司及各道府州，令其督率所属，在于城乡市镇、关津要隘，一体设法查拿。并刊发断瘾药方，广为散布，剴切晓谕，惩劝兼施，期收实效去后。兹据凉州府知府兆那苏图、武威县知县黄曾福等，盘获私带烟土之四川客民苟成明等，搜出烟土三千余两。又据署皋兰县知县郑元吉及代理【知】县李怀庚等，先后拿获吸烟贩土之王汰来、尤新顺等，起出烟土烟膏一千三百余两，并搜获枪灯等具，前后禀报到臣。当经批交臬司陶廷杰，分别提讯确供，照例从严惩办。并令各将搜获烟土等物解验明确，渗油烧毁，投弃河内。仍再严飭各属，无分畛域，实力访拿究办。而民间平日吸食兴贩之徒，因闻查拿严紧，

咸各赴官投首，呈缴烟土烟具，求免治罪。臣屡据详报，均批司分飭查讯果否真心改悔，并所缴有无不实不尽，分别记档，取结办【理】。统俟查办完竣，核明起数，另为奏报外，臣查甘省系瘠苦之区，小民生计本非饶裕，岂堪受此流毒，耗其衣食之资，致成颓靡之习。当兹渐染未深，正宜及早湔除，力加整顿。臣惟有督率所属，随地随时留心访察，如有兴贩吸食及透漏窝庇者，立即飭拿严办，一力坚持，弗稍松劲，总期根株尽绝，俾免枝引蔓延，以冀仰副圣主化民正俗、返朴还淳之至意。所有现在查办情形，理合恭呈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初九日奉硃批：一力严行查缉，不准疏懈。欽此。

17. 江西道监察御史许汝恪奏请严查在官人役售烟等折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发

江西道监察御史臣许汝恪跪奏：为剔除流弊，严净根株，请旨通飭查究，仰祈圣鉴事。

窃维鸦片流毒，贵贱贫富罔不习染。自去岁查办以来，破案者千百余起，其间职官以及庶民与夫肩挑负贩，无不悉备，查拿可谓尽力矣！而独在官人役从未有一人犯案者，岂此辈守法爱身转胜职官缙绅乎？似无是理。臣思其故，盖拿烟者此辈也，而此辈之外，则更无拿烟者也。其藏身甚固，其党卫甚周，同恶相济，谁得过而问者？此所以难于破案也，而流弊遂由此滋矣。夫舞弊营私，此辈长技，一遇烟案，得财或故纵，得土或分肥，皆恐不免。臣风闻现在售烟者多有在官人役，试思查拿如此严紧，此辈烟从何来？则平日查拿之际，其多吞赃入己可知。如不严行究治，则既可恣其吸食，又可任其卖买，是上欲除鸦片之害，而下反专鸦片之利，流弊何以清？根株何以净？应请敕下各省大吏及在京各衙门，令各严飭所属，设法搜剔，明定章程，以

仰副我皇上除恶务尽之至意。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明训示。谨奏。

18. 广州将军德克金布等奏报查禁广州旗营鸦片情形折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发

奴才德克金布、奴才奕湘、奴才英隆跪奏：为谨将查办广州驻防旗营戒断鸦片烟实在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荷蒙天恩，调任广州将军、副都统，于道光十七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到任。因思粤东为夷船贸易之区，夹带鸦片，流毒已久，驻防旗人生长于兹，难保不沾染恶习，且叠奉谕旨严禁查办。奴才等年余以来，每于操演挑选之时，留心观其气色，察其形迹，时以吸烟犯禁之言告诫，使知惜身练技，以资报效。并飭令各协领等随时严密访查。虽经结报吸食者均已戒断，现无吸食之人，奴才等实不敢遽信。复飭暗为密访，见有可疑者立即拿究重惩。续据该协领等查有旗人吸食者，又有旗地居住之民人犯者，节经移送督臣邓廷桢讯办在案。务期鸦片流毒消灭净尽，以副圣主垂谕谆谆之至意。

本年正月二十五日，钦差臣林则徐抵粤，即谕令兴贩烟土、吸食鸦片之人，以至言劝化，限期令其戒断，呈缴烟膏烟具，免其治罪。并断烟药方，告示条款，咨送到营，甚属详明。奴才等当即飭交各协领等分布悬示。尚恐愚顽兵丁心怀疑畏，不敢交出，奴才等又作粗浅告示，谨以皇上禁绝鸦片原为天下军民惜命惜财、成全人材之至意，多方开导，给限缴出，以免置之重典，尔等若不及早醒悟，一至限满后被人首告，或别经发觉，定当从严治罪等语，发交协领等分散兵丁，各给一张，再加剴切开导飭行去后。旋据各该协领禀报：各旗兵丁自晓谕以来，咸知畏法自新，前次查禁时即已戒断，今将所有烟具等项，竟不敢存留，已于黑夜暗掷于各该旗公所，或管上司衙门。满洲汉军八旗及水

师旗营，计共收有烟枪二百零三枝，烟具二百五十五件。奴才等诚恐尚有不实不尽，随询该兵等敢出五人连名互保，一人犯法四人同罪甘结否？该兵等竟无疑惧，随出连名保结，似无隐匿之弊。且前经督臣邓廷桢、抚臣怡良等密访严拿，现在省城一带已无窑口、烟馆、兴贩烟土之处，八旗兵丁亦均知悔惧。奴才等仍不时留心查察，不使日久萌生。从此一气严禁，即可永绝根株，以慰圣廑。

除将收到烟枪、烟具照数移交督臣邓廷桢销毁外，谨将奴才等查禁广州旗营地面鸦片情形据实恭折奏闻，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奉硃批：所办尚好。仍当随时留心稽查，断不可仍然置于度外也。钦此。

19. 宗人府敬敏等奏报申明奕莲等吸食鸦片折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发

宗人府宗令 和硕肃亲王臣敬敏等谨奏：为遵旨会同申明售卖鸦片烟土各犯案内，有镇国将军买烟吸食各情，分别定拟具奏事。

先据步军统领衙门具奏，拿获售卖鸦片烟土人犯，供出系贝勒府内令人转买等情一案。道光十九年三月初十日奉旨：“于五、刘文祥、商二、雷四，并起获烟土等物，著交刑部审讯。袁刘氏取保听传。袁全幅、袁文儿著贝勒绵誉迅即交出，归案质审，毋许饰词藏匿。其所供之人，是否即系绵誉长子奕莲，著该部确切根究，务得确情。在逃之傅大，仍飭严拿务获，送部究办，钦此。”旋据该衙门将于五等并起获烟土等物，咨送到部。

臣等随卷查于五、刘文祥，均经臣部另案拟结之吸烟人犯金二等供出，经臣部行文缉拿在案。当提犯研讯，据于五、刘文祥供称：伊等售卖鸦片烟，曾有在贝勒绵誉府内服役之傅大向买，据称系伊主麻大爷所用等语。臣等随一面飭拿傅大，一面行文该贝

勒门上，飭令遵旨将袁全幅等交出去后。旋据该贝勒将袁全幅、袁文儿送案，并查明长子奕蘧实有吸食鸦片烟情事，具奏。三月十四日奉旨：“前据步军统领衙门拿获售卖鸦片烟土之于五等，当有旨交刑部审讯。兹据绵誉查明，于五所供之人即系伊子奕蘧，并将案犯袁全幅、袁文儿交出，著刑部会同宗人府，严行审讯。其绵誉自请严加议处之处，著俟定案时再降谕旨。钦此。”臣等正在审讯间，复据该贝勒派人将代奕蘧买烟之傅大拿获，押解送部。臣等随督飭司员，会同逐加严讯。缘于五、刘文祥即刘二，俱籍隶直隶县^①，傅大籍枣强县。于五早年来京赶车营生，刘文祥卖鼻烟生理，傅大在镇国将军奕蘧家佣工。奕蘧系贝勒绵誉长子。于五素吸鸦片烟，系向已获拟结之尚二、杜二购买，曾经已获拟结之金二、李顺向伊转买吸食。刘文祥亦曾向已获拟结之伊戚于长春买得鸦片烟土，卖与金二、李顺数次。镇国将军奕蘧封职后，在该贝勒府内西首另院居住，道光十七年八月间，奕蘧因患胃病病症，闻知吸食鸦片烟可治，随令傅大代向于五购得烟膏、烟具吸食。是年冬间暨上年十二月内，奕蘧又令傅大向于五买过烟土二次，即嘱于五煎熬成膏，携回吸食。傅大于每次买烟，私自赚用钱一二百文不等。维时于长春因卖烟破案送部，剩有烟土数两，经刘文祥收存。本年二月间，奕蘧闻查拿鸦片烟产紧，恐将来病发无处买烟，随用京钱十七吊，令傅大向于五购买。于五即用京钱十五吊转向刘文祥买得烟土熬膏，交傅大携回，余钱于五与傅大分用。是月金二、李顺因吸烟犯案，将于五、刘文祥供出，经官人带同与于五素识之商二将于五等拿获，搜出烟土钱票等物，解送步军统领衙门，究出傅大代贝勒府内买烟各情。奕蘧即将烟膏烟具毁弃，傅大亦闻风逃逸。其时于五因挟商二作线指拿之嫌，即供称伊卖与傅大之烟系向商二买得。经该衙门讯有府内之包衣人袁全幅、袁文儿父子，及民人雷四，曾

^① “直隶”下疑有脱字。

与傅大认识，飭传袁全幅父子未到，将于五、刘文祥、商二、雷四并袁文儿之妻袁刘氏，一并奏送到部。经贝勒绵誉讯出奕莲买食鸦片烟各情，遵旨将袁全幅、袁文儿交出，并将傅大拿获送部。钦奉谕旨，交臣等会同审讯。据各供悉前情，复飭令奕莲将所毁烟斗呈缴到府。诘据奕莲供称：伊父贝勒绵誉因患腿疾，不能转动，且系另院居住。伊因病令傅大买食鸦片烟，委不敢令伊父知觉，只求将伊从重治罪等语。案内各犯证，均经复诘不移，检查于五、刘文祥犯事各原案，核与所供相符，应即拟结。

查例载：内地奸民煎熬鸦片烟售卖图利者，发边远充军。又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职官加一等治罪。查宗人府例载：凡宗室初次犯罪者，徒一年，折圈半年加责二十五板。又例载：犯杖六十罪者，审系不安本分，按其应得罪名，照数实行责打各等语。此案于五吸食鸦片烟，复买土煎熬，售卖图利，实属不法，自应按例问拟。于五除吸食鸦片烟轻罪不议外，合依煎熬鸦片烟售卖图利者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刘文祥兴贩烟土售卖，亦应按例问拟。刘文祥即刘二合依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发近边充军。枷号满日，与于五分别咨送兵部，定地转发，到配杖一百，折责安置。傅大于奕莲令伊购买鸦片烟并不劝阻，辄叠次代为购买，藉图分润，即与兴贩为从无异。傅大应比依兴贩鸦片烟，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札交顺天府定地至配，折责拘役。于五据供亲老丁单，应不准查办留养。镇国将军奕莲，因病买食鸦片烟，卖烟之人业已获案，亦应按例问拟，应请旨革退镇国将军，依买食鸦片烟杖一百枷号两个月，职官加一等例，应杖六十徒一年。系宗室应照宗人府例，其犯徒一年罪名，照例折圈半年，加责二十五板；其犯杖六十罪名，照数实行责打。惟系头品宗室世职，其可否照刑律折圈之处，仍恭候钦定。袁全幅、袁文儿讯无代奕莲买烟情事，应

与作线指拿之商二并讯系无干之雷四、袁刘氏等，均毋庸议。起获烟土等物，案结销毁；卖烟钱文入官。

再，此案系刑部主稿，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会同审明定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宗人府宗令和硕肃亲王臣敬敏 左宗正和硕睿亲王臣仁寿 右宗正和硕郑亲王臣乌尔恭阿差 左宗人罗多贝勒臣绵德 右宗人固山贝子臣绵岫差 太子少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臣王鼎 尚书臣隆文差 署尚书理藩院尚书臣赛尚阿 太子少保尚书臣祁埏 左侍郎臣麟魁 左侍郎署户部左侍郎臣吴文 鎔差 右侍郎臣阿勒清阿 右侍郎臣赵盛魁留署

20. 福建道监察御史寻步月奏请吸食鸦片罪名限外必应加重限内无庸议增折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发

掌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寻步月跪奏：为吸食鸦片罪名限外必应加重，限内无庸议增，以归简易而收实效，仰祈圣鉴事。

窃惟鸦片烟流毒蔓延，急宜整顿，以绝根株。自上年升任大理寺卿黄爵滋奏请定限论死，仰蒙飭谕中外臣工妥议章程具奏。今虽部议未上，而自论死之议一倡，人情悚惧，改悔湔除，现已大著成效。若稍为松懈，窃恐人心一放，旧染复生，仍归不可收拾。是重拟死刑，非欲杀人也，正所以维法制于不敝，持人心于不衰，而使之生也。惟是积重之余，骤难返正，善俗之道，惟以渐成。若遽尔从严，则犯罪必多，伤生太甚，亦非所以矜愚民而广皇仁，故不可不宽予以期限也。夫议罪而必予以限者，原欲开人以自新之路，而使犯法者少耳。若增罪于限内，是不予以自新之路，而操之太蹙，亦何庸予限为耶。既已予限自新，则限内

有犯，自应照旧惩办。其法简而易行，其理显而易明，人所共晓。而议者或谓：罪无骤加至论死之律，必由渐次而增，乃于情理始为允协。此亦未始非悉心筹度之处。独惜其增之限内，遂多窒碍难行耳。方今吸烟之风较前虽觉减息，而以天下计之，当不下亿万。若新定章程后，限内吸烟者骤增流罪，则天下应流者自亦不下亿万。囹圄之地，既恐难容；安插之方，亦嫌多匪。且查各直省州县，办理流犯必须招解院司乃能定案，不比京师直送刑部，可以计时而至。其中有距省数百里至千余里者，闻其拨役管押，坐省守候，盘缠食用一切等费，每名总需银数十两或百余两不等。此项例无开销，皆州县所自赔者。若办至十名以上，则需银千余两矣。至二三十名以上，则需银数千余两矣。今计直省各州县内此等吸烟之犯尚复不少，势必顾惜私费，不肯认真查办。且新例一颁，旧例遂废，虽欲求为枷杖之治，而有所未便。愚民去朝廷远，去州县近，亲见其瞻顾弥缝之状，以为限内之流罪既因犯者多而难办，将来限外之极刑亦必因犯者多而不办矣。于是玩泄日生，复蹈故习，转不如限内仍循旧例者，尚有枷杖之可畏。是限内徒有增罪之虚名，反贻限外以玩法之实害也。夫烟犯久有例禁，其滔滔至于此极者，总由地方官查办不实，大吏督办不力之故，非恶习真不可除也，非旧例不足以除恶也。近因叠奉严旨，飭谕各省认真查办，积年痼习，业已立见革除。总之，立法必求其无弊，奉法在责其能行。可否请旨定夺，限内吸烟者仍照旧例办理，无容议增，以归简易而便查拿。其限外如有犯法者，再行拟加死罪，揆诸情理，似较允协。如此则天下咸晓然于圣恩之宽大，复憬然于圣意之严明，则仁育义正，并行不悖，海口来源又能断绝，不数年间而根株可净尽矣。

现在烟犯罪名将及具奏，在廷诸臣身受重恩，自必仰体圣怀，竭虑殚精，以期于妥善无弊，臣何庸复参末议。惟臣忝司言职，管见所及，不敢缄默，用是恭折具陈，以效刍蕘之一献。是

否有当，伏乞圣裁。谨奏。

21. 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报续获 烟土烟膏全行销毁片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再，臣节次搜获鸦片烟土烟膏十六万七千一百余两，烟具一千六百二十余件，均已全行销毁，附片奏明在案。

兹续据各属先后拿获烟土烟膏二千八百三十余两，烟具一千四十余件，逐一提解来省。臣即于本月二十八日在西关外广阔地面，亲督司道府县暨中军副将，照依前式，验明全数销毁，实无存留流弊。现仍不遗余力，督饬严拿，务期净绝根株，断不任日久生懈，合并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三日奉硃批：好。钦此。

22. 裕诚奏报胞弟裕安吸食鸦片自请议处折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四日发

奴才裕诚跪奏：为请旨交部议处事。

五月初二日奉旨：“乔大即乔维高，顾三即顾得，霍四即霍盛，霍大即霍俊，俱著交刑部严行审讯。前任御史裕安，已革笔帖式长姓即长七哥，著刑部传讯。其未获之祁四即齐成远、金錫子、王三著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务获送部。至案内供出卖鸦片烟之候选道周定邦，现赴山东，著经额布查明行抵何处，即委员押送来京，归案质讯。钦此。”奴才恭阅之下，不胜悚惕。案内前任御史裕安，系奴才之胞弟，是由奴才平日管束不严之所至，咎实难辞。理合请旨将奴才裕诚交部议处，以示惩戒。为此谨奏。

23. 闽浙总督钟祥奏报续获烟土烟犯情形片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发

再，鸦片一项，来自外夷，每由内地奸民勾引兴贩，开馆卖食，以致奸夷得售禁物。是欲绝其来源，必先戢其接济。臣节经会同前抚臣魏元烺督飭文武，并派委员弁驰赴漳、泉等府，先后访获勾引兴贩之施猴、林即、张潘、杨阿万、褚克驰、白弟三等三百二十四名，起获收缴烟土烟膏十二万五千四百余两，并烟枪等件解省。先将施猴等一百七十一名先后审明具奏，并将拿办出力之福州府戴克毅等奏请奖励在案。

兹复据泉州、漳州、建宁、龙岩等府州，厦防、惠安等厅县，会同营员及在事委员，续获烟犯王资等三十九名，起缴烟土烟膏十一万五千七百余两。现将烟土烟膏提省销毁，王资等五十六名审明奏办。其未结各犯，催提解审。以上现获连前获拟结共获犯三百六十三名，起缴烟土烟膏二十四万一千一百余两。各员办理尚俱得力。现奉谕旨，颁发新例，法令綦严，当经行司转飭各属刊刷告示，俾家喻户晓，各知儆畏。仍督飭所属文武，不遗余力，严密搜拿，总期有犯必获，杜绝来源。其在事出力人员果能始终勤奋，复有访获大伙烟犯，再当核实具奏办理；倘拿办不力，亦即揭参，以示激劝。合将现在拿办缘由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三十日硃批：知道了。钦此。

24. 山东道监察御史汪于泗奏请诘查究看

押烟犯兵役等得赃卖烟情弊等折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发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汪于泗跪奏：为风闻看押烟犯之兵役有得赃卖烟情弊，请旨飭查严究事。

窃查京师内城、外城拿获吸烟人犯不下百十起，一经到案，不能不派兵役看押。乃臣闻烟犯到案，兵役等即视为奇货可居，暗中为之传递烟枪烟具，索钱数十至百余千不等，并重价卖给烟膏，一任在狱烟犯照常吸食。此等弊窦，营兵、坊役在在不免，而刑部之隶役为尤甚。窃思在官人役有查拿鸦片之责，乃查拿鸦片之人即为私卖鸦片之人；且民间卖烟，兵役得而查拿之；而兵役卖烟，更无人从而查拿之。若不严行究办，何由净绝根株。相应请旨，飭下刑部堂官并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严飭所属密行查访，如有烟犯在狱吸烟，即将看押之兵役严行究办，并讯明烟膏买自何人，一体严拿究办，庶可湔除积弊而净根株。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①

25. 护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报续获

贩烟吸烟人犯折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发

护理河南巡抚、布政使臣鄂顺安跪奏：为续获兴贩烟土及吸食鸦片人犯，现在按例拟办，恭折奏闻事。

窃豫省前次拿获烟贩三十六名，并起获烟土烟膏等件，经升任抚臣桂良缮折奏报，钦奉谕旨：“加意严拿，认真查究等因。钦此。”臣蒙恩护理抚篆，节经谆飭各属实力调拿，务令有犯必惩，以冀翦除恶习。据汲县拿获兴贩鸦片烟土人犯余庆一名，起获烟土四两；又据淮宁县拿获贩土人犯宋心之、谢玉兰、张占鳌、张王氏四名，起获烟土二十四两零；又据商水县拿获听从卖土人犯毛泳祥一名；又据陕州拿获贩土人犯余崇善一名，起获烟土五两；又据商丘县拿获贩土人犯林仁祐一名，起获烟土七两；又据祥符县拿获贩土人犯邱德修、赖振二名，起获烟土三十二两；又据唐县拿获贩土人犯戴五即戴云陇一名，起获烟土四两；又据光

^①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642页刊有据汪奏发布的上谕。

州拿获贩土人犯贾万兴一名，起获烟土四十两；又据叶县拿获贩土人犯王大通、赵山二名，起获烟土七两；并据各属报获吸烟人犯管启瑞、张九海、张玉池、李幅、刘泳禄、任大海、金友、白连子、刘五子、姜昌、陈坤、王升、苗兴魁、鲁接贵、齐义、吴老闷、卫林章、丁云秀等十八名，收缴烟土一千七百三十五两。臣已飭令将现获各犯分案按例拟办，并将获到烟土解省验明销毁。除仍督属加意查拿，勿使稍有松劲外，所有续获贩土吸烟人犯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六日硃批：所办尚好。一力查拿，不可疏懈。钦此。

26. 广西巡抚梁章钜遵旨议立查禁

栽种罌粟章程等折

道光十九年七月初五日发

广西巡抚臣梁章钜跪奏：为查除罌粟花净尽，议立每年查禁章程，并续获洋烟成数，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经遵旨委员分赴各府属查拿栽种罌粟匪徒，请将从前具报不实各员议处一折，钦奉上谕：“前因内地栽种罌粟，熬炼成土，降旨令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各督抚派员清查。兹据梁章钜飭属查明，将所种罌粟全行铲毁，并拿获违例栽种各犯。所有上年并未确查具报之左江道卞斌、护右江道镇安府知府恒梧、庆远府知府文辉、思恩府知府王文凤、署镇安府知府周三锡、署泗城府知府李闲，俱著交部议处。梁章钜失于觉察，亦着交部议处。经此次清查之后，该抚必当严飭所属，认真查办，务将所种罌粟拔毁净尽，栽种匪徒严拿切究，断不可再事因循，长奸贻患。凛之！勉之！钦此。”当经臣通飭各属文武一体钦遵，实力搜查，务期尽绝根株，不使稍留余孽。

兹据右江道林绂禀报：督同庆远府文辉在东兰州所辖之那

地、凤山等土州地方，查获栽种罌粟十八起，并获栽种匪徒十六名。又在南丹土州之野猪河等处，查获罌粟四起，并获栽种匪徒五名。均经该道府亲往会营督率，将所种罌粟拔毁净尽。又据左江道卞斌驰赴南宁、太平、镇安三府属查办，将宣化县、永淳县、横州、小镇安厅天保县、归顺州各属荒僻处所零星栽种之花拔弃净尽，并获栽种匪徒黄付言一名，余犯逃逸。又据镇安府恒梧亲赴泗城府属，查获凌云县村民杨三等栽种罌粟四万六千六百余株，罌粟烟膏二百余两，带壳罌粟子二筒。又查获西林县罌粟四千八百余株，人犯二名，并客民滕亚贵等首缴栽种罌粟三千二百余株。又查获西隆州村民首缴栽种罌粟七万四千九百余株，查获罌粟子十四两，人犯一名。又据思恩府知府王文凤禀报：查获所属栽种不成片段罌粟花四起，犯已逃逸。此次所委两道两府周历巡查，镇安府恒梧所获最多。通计各属已获栽种罌粟二十二起，拔毁罌粟一十二万九千五百余株。其余所属并各土司地方，俱查无栽种之事，各取具切结禀报，事尚可信。现飭将栽种各犯讯明，照例究办。其逃逸匪徒，严拿务获，并将所种之地分别入官。查现获栽种奸民多起，俱系土司境内，各该土司是否失察，抑系徇庇，俟定案时查明参办。

臣伏思栽种罌粟，现虽拿获惩办，但奸民惟利是视，难免将来复种，必须议定每年查禁章程。查罌粟每年可以两次栽种，约在二、八月长苗开花，三、九月结苞刮浆，果能于扬花结子之时实力稽查，何难立除积弊。应请嗣后每年冬初先由道府颁发严禁告示，并令各府厅州县仿照保甲按户编查，给予门牌，注明并无栽种罌粟煎熬贩卖之人，取具十家连环保结，责成保邻墟长随时稽查。如十家内有违例私种，或将田地租与客民栽种，准其首告，给予花红奖赏；倘知情不首，即将九家并地保、墟长一并究治。每年限二月、八月查办两次，由该厅州县加具印结，咨送府道。该管府道或亲身巡查，或委员抽查，加具总结申报。倘有查

办不实，即分别严揭特参。获犯从重惩办，庶各奸咸知查禁甚严，有犯必获，自不致仍蹈法网，可期永杜弊源。

至外来烟土烟膏，自本年三月奏报后，又据各属续获二万七千零三十两，烟犯二十四名，一俟解到验明，即当督同文武分起烧毁。

除再严飭各属上紧查拿，不使存一松劲之心，断不敢稍事因循，以致长奸贻害。所有查获栽种罌粟净尽，议立查禁章程并续获洋烟成数，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三日硃批：钦此。

27. 署理闽浙总督魏元烺等 奏报审拟职官吸烟折

道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发

署理闽浙总督臣魏元烺、福建巡抚臣吴文镕跪奏：为申明职官吸食鸦片，按照新例分别治罪勒休，以肃功令，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查禁鸦片情形，及拿办贩烟人犯，叠经臣等奏明在案。因思所属文武各官，职分较大者，或尚各知自爱，其微员末弁，恐不免有沾染恶习之人，与在省司道随时留心体察，并密飭各属确切详查，有犯必惩，如无亦令该管上司出具印结，以杜瞻徇而昭核实。

兹访得盐大使查鼎、潘铤，把总郑胜恩、冯开春，外委方长安、曾国定、杨国标、李梦熊、李应福九员弁，均有吸食情事，并由司道府协营先后稟揭，当飭撤任提审。据福建藩司吴荣光、臬司常烜昌、盐法道王耀辰督同福州府知府戴嘉毅等熬验审拟，详解前来，臣等随提集审讯。外委方长安、曾国定二弁，俱供认因拔补后患病，恐误差操，吸食上瘾，其烟土系各自私向已获办结之杨阿万及杨蔴九所买，嗣已畏法渐戒，今尚不能断除，不敢狡赖。其盐大使查鼎、潘铤，把总郑胜恩、冯开春，外委杨国

标、李梦熊、李应福等七员弁，金供系得缺后曾经吸食，实在早已戒绝，旧存烟具、烟灰亦俱毁弃。经臣等察看，形色如常，案无遁饰。查奉颁新例内载：吸食鸦片烟人犯，各直省以奉到部文为始，予限一年六个月，平民在限内犯案者，杖一百流二千里，不能供出贩卖之人加一等。职官加平民一等治罪，从重发往新疆地方，充当苦差，永不叙用，不准该城大臣因事保奏。又鸦片烟案内问拟流罪以上人犯，有告称留养者，概不查办。又现任各员，如有曾经吸食者，该上司即行揭参，勒令休致。又属员保举后始经吸食，原保官免其议处各等语。福建省系于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奉到部行新例，此案事犯在奉行新例一年六个月限内，该督标右营外委方长安、督标水师营外委曾国定二弁，俱各供认吸烟成瘾，尚未戒除，并已供出卖烟之人，应照新例，各革去外委，从重发新疆地方充当苦差，永不叙用，亦不准因事保举。其浦下验掣关盐大使查鼎、署江阴场事试用盐大使潘铎、福州城守营左军把总郑胜恩、督标左营把总冯开春、督标中营外委杨国标、督标水师营外委李梦熊、抚标左营外委李应福等七员弁，均系先吸后戒，熬验无瘾，旧存烟灰供已毁弃，应照新例勒令休致，以儆官邪。各员弁讯系得缺后吸食鸦片，且俱由各该管上司查出揭参，所有各原保官及各该上司职名，应请免于查开议处。除盐大使潘铎系试用人员外，至现任盐大使查鼎所遗浦下验掣关，系在外调补之缺，容俟另行拣员调补。其各把总外委弁缺，照例遴拔补用。仍再密访严查，如尚有职官吸食者，按其官阶之大小，犯罪之重轻，随时分别奏参咨革，照例办理。

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硃批：查办甚好。该部议奏。钦此。

28. 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奏报

夷商呈缴烟土并拿获贩烟人犯折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发

奴才恩特亨额跪奏：为晓示夷商首缴鸦片烟土，并拿获叶尔羌兴贩烟土人犯，谨将查讯大概供情先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鸦片烟流毒日深，无知愚民鲜不受其害者。新疆重地，逼近外夷，近来边卡静谧，贸易商民日众，且换防兵弁素称劲旅，一染恶习，深为可虑。奴才于到任后叠次晓谕军民夷回人等，一面督飭文武员弁拿获吸食兴贩之民人李厚泳等数起，又究出卖烟之回子，一并分别治罪，咨部在案。并行知各城大臣，凡属军民人等，倘有吸食鸦片烟及兴贩烟土暨栽种罌粟花之犯，一体查拿究办。旋据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喀什噶尔等城咨称：业将吸食、兴贩烟土以及栽种罌粟花之犯，均由各该城大臣查拿办理，分别奏咨亦在案。

奴才恩特亨额于九月间自喀什噶尔回任后，会同奴才图明克正在拿获吸食人犯及卖烟回子审办间，适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来署面禀：风闻克什米尔、巴达克山、音底等部落，今年忽来鸦片烟土甚多，不敢隐瞒等语。奴才等即派五品伯克、四品顶戴乌舒尔、六品伯克、五品顶戴阿皮斯，随同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严密搜查去后。该呼岱达即带同夷人呢割等往见阿奇木伯克云称：

“我们来叶尔羌贸易多年，向不敢带违禁之物，实因去年有些中原人向我们说如今鸦片烟内地价值甚贵，叫我们多带烟土，替我们销卖，可获重利。我们实不知道是犯禁之物。今闻参赞大人查禁，情愿将烟土全数呈缴，听候销毁。我们以后照常贩卖别的货物，再不敢贩卖烟土，只求免罪”等语。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即向夷馆内搜查。据克什米尔夷商呢割等九名呈出烟土五万二千七百一十一两，巴达克山夷商迈买底敏呈出烟土一千四百二十四

两，音底夷商呢克尔等十一名呈出烟土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四两，共计烟土六万六千一百余两。该阿奇木即带同各夷人来署，当堂呈缴。奴才等眼同阿奇木及各夷人查验，实系鸦片烟土，当即【加】封贮库，俟续有搜查之烟土，于定案后再行一并如法销毁。奴才等讯据各夷人供称：“我们自从受大皇帝天恩免税之后，货物进卡从不查验，我们向与中原人交易，均是皮张杂货，并不卖烟土。去年中原人叫我们多带烟来，替我们销卖，可得重利，我们一时贪利才带来的。今知查禁，情愿尽数呈缴，不敢再卖。”并讯究令带烟土之中原人是何名姓？据称：“我们向不问人名姓，实在指不出来。”并究其烟土自何处贩来？供称：“我们克什米尔、音底向来吸食，又卡外向不通商之堆依博特地方出产烟土，我们由彼处买来的”等语。当飭呼岱达带去妥为【安】置，令其照料买卖；并飭阿奇木伯克再行派委明干伯克，于各回庄逐细严查，尽数搜出，不准丝毫隐匿，如续有查出，另行分别办理。

伏思所缴烟土已及数万两，若无销售之处，该夷人何肯带如许多？自系奸商渔利之徒，闯关内烟禁甚严，必腾贵，勾引夷人乘此图利。是根株未净于内地，而萌蘖反生于边陲。兹夷人所供中原人嘱其带来一语，未为无因，尤堪痛恨，当飭章京、委员等设法查拿。即拿获在叶尔羌开设全泰祥号之迪化州民人马德贵，供称：“去年曾买烟土五千五百两，赴迪化州陆续卖与遣犯，今年十月才回来。”又拿获开设全和祥号之陕西民人冯毓财，供称：“去年买过烟土八百余两，带赴吐鲁番零星卖与不识姓名人。”严加究诘此外有无贩卖烟土及同伙人犯，据供：“有积年贩卖烟土之荣吉祥、冯毓秀二名，均系陕西人。荣吉祥于七月间买烟土六千余两，带往迪化州去卖，尚未回来。冯毓秀赴陕西原籍去了，亦未回来”等供。当将该二犯收禁。一面飞咨乌鲁木齐都统及东路各城大臣拿获该二犯起解，勿使闻风远颺。一俟到

日，归案审办。奴才等仍飭该章京暨城守营再行认真查拿，勿少松懈。

伏查口外幅员虽属辽阔，而商民均聚集在城，非比内地人烟杂处，耳目难周。各城军民近在目前，尚易于稽。惟有严飭该管各官乘此功令禁严之际，逐处搜查，有犯必惩。该管各官核其功过，不数日间，即可净绝根株。其远处回庄，商民本少，飭令阿奇木伯克亦逐细严查，如有商民偷向各夷人私买烟土之事，立即来城密禀，以凭派员拿究。该伯克亦定加劝惩。并飭阿奇木伯克传谕呼岱达告知各夷人：只许别货通商，不准再带烟土售卖。令阿奇木伯克出具印结，按月呈送奴才等衙门查核。如有贩卖烟土之事，将呼岱达按例治罪，并治阿奇木伯克以失察之咎，严行参办。如此层层维制，庶可塞其源而其流自竭矣。奴才等仍当随时访察，妥为办理，断不敢稍滋弊端，以仰副圣主慎重边防之至意。

容俟奴才等将兴贩烟土人犯审明，按律定拟，并会同八城大臣妥议章程另行具奏外，谨将讯取人犯供词并外夷呈缴烟土情形，先行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硃批：钦此。

29. 阿克苏办事大臣璧昌奏报查禁鸦片烟折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

奴才璧昌跪奏：为钦遵谕旨查禁鸦片烟流毒，力挽颓风，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本年十月初三日，接准兵部来文：“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内阁抄出：奉上谕，前因鸦片烟流毒日甚，特命廷臣妥议章程，颁发各将军督抚、府尹等一体抵遵，严行查禁。因思新疆西南北各城，地处边陲，幅员辽阔，外与外夷接壤，难保无夷人入卡贸易，夹带烟土，辗转售卖之事，自应一律严禁，以挽颓风。著各

该衙门即将新定科条颁发各该处将军、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等，严飭所属地方员弁切实查拿，将兴贩、吸食各犯按律惩办，无许容隐。至新疆与内地情形不同，新定章程如有格碍难行应酌量变通之处，著各该将军、都统、大臣等悉心体察，妥议具奏。钦此钦遵”等因前来。奴才跪读圣谕，仰见皇上恫瘝在抱，烛照万里，钦悚难名。

伏思阿克苏地方为各外夷与内地商民交易之区，贩货到此而止，难保不知禁例，夹带烟土，希图渔利，应如何禁绝之处，必须画一办理。奴才已咨商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拟定章程，会衔具奏在案。至阿克苏本处情形，奴才自去年接见邸钞，迭奉谕旨查禁内省鸦片烟流毒一事，因闻回疆军民亦有染此恶习，亟应各清地界，仰体皇上好生之德，共挽颓风。奴才一面剴切出示，明白劝谕军民，并译缮回文告示，谕知各夷回一体凛遵；一面飭知城守营参将、阿奇木伯克爱玛特访查去后。兹据爱玛特呈报：拿获贩卖鸦片烟土烟膏克什米尔、安集延等处回子五起，共起获烟土烟膏一千五百余两。奴才将起获本地回子烟土当堂销毁，分别枷责示警；起获安集延等处外夷烟土烟膏，妥为封固，将该夷人等一并解送叶尔羌，听候参赞大臣酌核办理。又据城守营参将赵焯曾呈报：拿获贩卖、吸食鸦片烟人犯数名。奴才当堂讯明，遵照新例，限内分别治罪，咨部在案。所有军民人等，见展示严拿，各知畏法，自首改悔，交出烟具共一百四十五件，均经奴才验明销毁。诚如圣谕，此时限内多获一人，将来限外多贷一命。当此例禁森严之际，若不认真查办，于流毒遗害滋弊，仍属有名无实。奴才复又恭录谕旨，出以回汉字示，劝谕军民夷回人等，若限外不知改悔，即为顽梗，照例加重治罪，亦不足惜。并飭知阿奇木伯克爱玛特选派妥靠伯克，在于城南四十里浑巴什河渡口地方驻守，遇有喀什噶尔前来阿克苏贸易，安集延、克什米尔各外夷行至该处过河卸驮，逐包详细搜检，如有偷

带鸦片烟土者，立即押送来城，由奴才讯明，听候叶尔羌参赞大臣议定章程，酌核办理。并谕知城守营官弁，凡有喀什噶尔等处前来阿克苏商民，到城之日，会同乡约铺户人等查验，如有偷带烟土者，立即呈明，照例究办；如无偷带者，责成店保出具连环切结存案；倘有隐飭贿纵情弊，别经发觉，一并加等治罪。如此互相稽查，咸知畏法，庶偷贩之弊可除，则吸食者不待禁而自断矣。

再，查阿克苏并所属赛里木、拜城三处，地方辽阔，更恐无业流民潜藏山僻回庄，偷种罌粟，制造烟膏等事，当即谕知三城阿奇木伯克详细访查。兹据禀报，金称本地回子向无吸食鸦片烟之习，各回庄亦无民人种地，近城外只有种菜民人数名，并无栽种罌粟花之处，加具印结，呈报前来。奴才复查属实，除严飭实力查禁，毋稍松懈外，奴才仍不时密加访查，照例严办，务期永绝根株，共挽颓风，以冀仰副皇上还淳返朴、除恶务尽之至意。谨将奴才钦遵谕旨严禁偷贩、吸食鸦片烟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廿五日硃批：常川一力严查，认真惩办。钦此。

30. 安徽巡抚程懋采奏请将查烟不力各员议处折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发

安徽巡抚臣程懋采跪奏：为续获鸦片烟犯办理情形，并将不能得力之员请旨分别惩处，以资整饬，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流毒日深，自钦奉谕旨查禁后，节经前抚臣色卜星额督同臣及臬司徐宝森严飭所属，实力查办，并设立比较之法，使属吏无可欺蒙。旋据各属先后报获人犯七百二十余名口，起得烟土烟膏二万三千余两，历次奏明，并将办理玩延之和州知州善贵撤任在案。复以地方既分繁简，民俗亦别淳浇，诚如圣明指示，乡僻州县民风较淳，尚未沾染恶习，未便与通都大邑一律

搜查。因而随时随地宽严并用，以期事归核实，不致扰及闾阎。数月以来，续据报获僧人世戒等二百七十余名口，起获烟土烟具，飭令解府验销。其中有烟枪无从购买，而用磁瓶打眼，镶入竹筒，以为吸具者；有烟土无从购买，而搜求旧存烟灰重熬过瘾者。是畏法良民，早经改过迁善；而奸徒怙恶，所在犹多。即如窝留贩卖及恣意吸食之僧、道、生、监、军、遣、流、徒邵道然等犯，甫经奏获，现又获有贩卖吸食之僧人世戒、喜和，道士张凤鸣，武生余廷迳、范文奎，武举人季斌，监生徐荣沂、倪仁珣、常应奎、李凝瑞，捐职夏士明，军犯德楞额，流犯冉步云，及逃军阙启升，释回流犯姚十等多名。又如贩卖吸食之妇女周王氏等犯甫经奏获，现又获有柯陈氏、邵朱氏、李李氏、许王氏、陈刘氏、周陈氏、黄王氏等口，亦系贩卖吸食之犯；更有张徐氏者，其夫张善玉业因吸烟被获，而该氏尚惑于烟可治病之说，复又买食，现亦拿获。至于在官人役狼狈为奸，同恶相济，破案更难。臣前在藩司任内，访有本署贴写蒋印华曾吸禁烟，札飭安庆府拘拿究办。现又据各属报获县书查光玺、代书张文彬、清书夏先，差役巩彩、章恒、章兰、王勤、管荣、张沅、徐发、郑洪、周立、黄政、陈盛，地保高日升等犯，恐漏网者尚复不少。若查拿稍懈，必致余孽潜滋。又据颍州府徐思庄督县报获徐海一犯，因烟禁甚严，图获重利，逞其鬼蜮伎俩，将烟土熬烧，合成丸药售卖，冀可掩人耳目，尤为可恶。以上各犯，现经从严究审，分别题咨办理。所有应计功过各员，亦由臣记档核办。

查鸦片烟禁，仰赖圣谟内断，实为风会一大转关，亟应实力奉行，不使稍留余患。安徽所属数县，初犹观望迁延，经前抚臣两次撤参，方知警惧。如宿州知州杨斯熙获犯十五起，繁昌县知县黄凤楼获犯十起，均未及时稟报。黄凤楼并不解验烟具。虽飭据该府查无捏饰等情，然当法令初行，不得不从严惩处，候部臣次

第议结。现在烟徒渐少，买土尤难，究恐未净根株，查缉断不容松懈。前此撤参之和州知州善贵，仅据报获犯二名，未便以该州地非冲要，现今烟犯亦稀，于该牧稍为宽恕。再黔县虽系山陟僻处，然与休邑接壤，习染易滋，该署县刘东书到任半年，未获一犯，查办不能得力，咎亦难辞。相应请旨，将撤任和州直隶州知州善贵交部察例议处；署黔县事试用知县刘东书摘去顶戴，以观后效。其余偏僻小县，或因值交卸之期，或调办文闱差事，未经获犯，情尚可原，容臣分别存记，另行察办。

臣仰荷天恩高厚，畀以封疆重任，惟有遵照谕旨，严督各属实心整顿，俾旧染概就湔除，冀仰副圣主慈爱黎元、除恶务尽之至意。兹据该管府道由司具详前来，谨将获犯办理情形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①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硃批：钦此。

31. 湖北巡抚伍长华奏报申办烟犯情形片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

再，湖北省拿获烟犯，节经臣等奏明，一面严飭各属暨派出标弁实力查拿去后。续据汉阳、当阳、江夏、归州、东湖、云梦、宣恩、襄阳、黄梅、郧县、咸丰等州县，并督抚两标营弁禀报：先后拿获兴贩吸食之兵役唐升等、民人王彩等五十一名口。又据房县禀报：有民人车玉松等种植罌粟花，卖与马宗幅、张怡盛等，刮浆熬烟，将各犯一并拿获。均经批飭严审究办。计自上年五月查办起，截至本年十二月止，共获烟案一百三十九起，人犯四百二十四名口，已经审拟题咨完结者六十四起，现在申办者七十五起。除仍飭各属严密搜拿，毋许稍有松懈外，谨合词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初十日硃批：知道了。钦此。

^①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783页载有因此奏发布的上谕。

张之洞手札一束

来新夏 整理

说明：三十年前，在友人张公骥兄寓所见到清人手札多件，检读之后，大部分为应酬之作，唯有张之洞致张之万函六件及张之万所收函二件，内容颇有可资参证者，遂随手钞录，归而藏诸书篋。历经文革，藏札散佚殆尽，此数函不复记忆。今秋整理藏书，得见旧稿纸近十页，视之乃张之洞手札，爰公之于世，或可备近代史事之研讨。誊录之际，忆及当年与公骥兄谈史论文之欢，今公骥兄已谢世多年，“平生知己半为鬼”，不禁法然。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记

（一）张之洞对崇厚所订伊犁条约之异议^①

俄约已定，画押讫，要义（旁注：最要者即此六事）争回六条：

一、伊犁南境帖克斯川一带仍让还（原注：此为通回部南八城之道，如此则伊犁方有出路也）。

一、陆路入关，由西安汉中至汉口通商一条删去。

一、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一条删去。

一、关外只设领事一处（原注：崇约原定六处）。

一、塔、喀两城边界仍照同治间明绪原议，不内侵。

一、天山南北贸易免纳税一节，商务渐旺时仍议纳税。

其余小节目亦多驳正。

^① 此件系一信函之附件，一单页，原函未见。

(二) 张之洞论湖北洋务

恭请五兄大人安。敬启者：近来因公事棘手，心境烦杂，故未得时时作书。比惟福履爽健，定如远颂。前世已揭晓，诸件均见邸钞，言者尽气竭力，大有必欲得而甘心之势。乃蒙圣恩高厚，仍责后效，惟有感激涕零而已。弟乃一迂疏无用而又不合时宜之人，本不当久点疆寄，自在岭南三次奏请开缺，何日不思引退，徒以到鄂复为敕办数事所羈，不得已耳！岂与时流争荣利哉，只待数事粗有端倪，立即草疏乞罢，有如曝日。布局已成，机势甚顺，下半年即有成效可观。明年必大畅旺矣。铁局虽较迟缓，然终殚精竭力为之，以必成为度。铁厂工所差有限。现在所亟亟者，煤井之工耳。不自开煤则煤杂且贵，钢既不佳，成本又太贵，不便行销，故开煤为炼铁之根也。前月日本总领事已函询鄂厂，钢铁将来不患无销路，所难者目前耳。手肃。敬贺午厘，并问合家安好。弟之洞谨启。

(三) 张之洞论修铁路^①

再启者：铁路一事，去年弟复奏一疏内，大意已备，不外炼铁宜急，勘路宜缓等语，非有意从缓，实不能不缓也。此时无铁无银，路字从何说起，俟铁已炼成，款已筹足，彼时详勘地势，确估工费，体察民情，再当请旨办理。弟固不敢推诿，然亦断不敢冒昧从事也。总之，弟两次奏疏之意，无非为开利源、销土货、塞漏卮起见，尚不仅为转漕调兵，原奏当可复按。煤铁即利源土货之大宗，亦即漏卮之巨款。煤铁办成，无论修路与否，总于国计民生有益，决不令虚糜巨款。大指为此，知蒙垂注，并以附陈。弟再上。

^① 此为前函之附件。

(四) 张之洞论汉阳铁厂拟招商接办

恭请五兄大人安。敬启者：去冬两奉手书，仰劳慰问，注念殷拳，良深感谢。邸报屡见兄请假，深为驰系。近想春日融暖，安和如常矣，念念。弟自江还楚，惟在舟中稍得休息旬余，到鄂复劳顿如故。铁厂事竟是大累。全工久已告成，钢轨久已制成，似乎已有成效。然经费久罄，司农定见不发。款如何措手，现在议招商接办之法，但不知能有成否，若有商办则弟从此得解脱法矣。然招商之能谐与否，其枢纽仍在政府，尚不知如何耳。时事日棘，想我兄亦必蹙额，以后事变真恐有不可思议者也。手肃并问闾宅安好。弟之洞谨启。

(五) 张之洞论两湖民情

沿江教堂多事，武穴致成重案^①。处处民心嚣然不靖，将来事变殊难预料也。武汉人杂言咙，尤费防卫。旬月来极力抚绥弹压，幸未生事。然目前尚未敢稍弛备也。此事可厌已极而又无可如何，其中是非曲直各省有之。匪徒藉端鼓煽，与民间积愤不平相合而成。我用我法，滋事者固不能不加惩创；然若迁就太过，自损太甚^②，将来民怨愈深，敌焰愈张，得步进步，恐两者俱难措手矣。忧焦之甚，如何如何！楚中颇旱，麦收尚好而秧水未足。尤可虑者，湘中伏莽尤多，不问不可，深问又不能，真是难题也。手肃数行代面，敬贺午厘，并问闾家安好。弟之洞谨启。

(六) 张之洞论甲午战争时两江善后策

恭请五兄大人安。敬启者：久未奉书，时殷驰念。每见都下人来，询悉福履康疆，深慰远想。昨彬姪来函寄到，尊赐伯昂

① 指光绪十七年武穴教案。

② 指迁就侵略者，镇压民气。

太夫子书赠先太仆楹联一副，惊喜感激，莫可名言，谨叩首上谢。弟自去冬摄篆两江^①以来，时值海氛肆恣，南防北援，危迫异常，筹兵筹饷，筹械筹船，无一不急，无一不难。缘所有勇营军火皆为新宁^②先后调派北上，此间须另起炉灶，一一安排，百计搜索。今年正、二月间，辽事破坏而海州已见倭船游驶月余。淮上正在戒严，又须筹运济北路军火饷需，左右揜柱，艰苦已极。至夏间兵事已定而江南仍须供支北饷，资遣北路及本省裁撤诸营。至今南下诸军纷纭未已。计此一年中，昼夜无暇，不惟不遑寝食，几乎不遑喘息矣（自到江南与权儿及彬姪未通一字，其忙迫可想）。数月来，又须料理租界通商及赶筹善后各事。时局遂已至此，忧愤不可言。夏间陈善后要政九条，至今未见明文，不知有蒙采择施行者否？现就江南事势物力筹办者约有数端：一用西法练兵一万人；一上海造马路、工厂，振兴华民工务、商务；一吴淞至苏杭、金陵设洋务学堂（内分四种：一约法、二农政、三工艺、四商务）；一派文武员弁赴外洋游历；一派学生赴外洋学习工商、水师、陆军；一中国请设邮政局，现已陆续具奏。以上诸事，不过尽其心力之所能为，至以后有无更变，能否一一作成，自有天焉，非所敢知也。颐儿年来颇好读书，悟性亦甚好，忽然不禄，殊难为怀，想京中必早闻知，国事阽危至此，家运之否塞不足道矣。近购得磁州张朴园侍郎（榕端）朴园图手卷一件，内皆康熙间名流题咏，有乡先生数人。窃思朴园墨迹，乡祠中尚无之，拟即寄京存祠内，并闻。手肃并叩问阖家安好。弟之洞谨启。

① 光绪二十年十月五日张之洞由湖广调署两江。次年十一月十八日回任湖广总督。

② 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光绪十六年十月接任江督，次年三月到任，光绪二十年十月五日召京，由张之洞接署。函中以籍贯指代。

附 件

(一) 逢春稟陈张之万：石达开军至黔

敬再稟者：逢春交卸去沙府篆后，旋丁内艰，因经手事件一时未能完结，故迟延至今，尚未旋里。目下料理渐次清楚，约腊底新正可以起程，路过中州再行敬谒节署^①，面领训诲。湖南境内尚属静谧，惟石逆达开股匪扰至贵州遵义一带，辰沅防堵为不可缓。现调总兵赵福元带勇四千，驻扎镇筴，相机防剿，此支兵勇，尚属得力，似可无虞窜越。中州为捻匪、长发往来之地，经夫子大人筹画调度，自必日见肃清，屈指荡平矣。逢春自到湘南十有三载，所署省外安化、安仁、宜章等县，均值贼匪逼境围城，办理防剿。当时均称湖南兵勇甲于天下；但刻下湘乡、新宁等县均已应募，即种田者所余无几，惟郴、桂、宜、临尚有劲旅耳。载请钧安，伏乞慈鉴。受业逢春谨再稟。

(二) 沈桂芬等函张之万论户部库存支绌

揖送星轺，响更月珥，辰维子青^{大兄年}老夫子^{大人}勋祺。纳祐萃祉延厘。树牙纛之新猷，听口碑之满道。引詹卿裔，曷罄饔轩。豫省漕务经台端特建宏谟，力除中饱，敝部遵旨速议，业经核准具奏，咨达冰案施行。目今部库十分支绌，久在洞鉴之中，刻下情形尤为紧急。查库款截至本月初十日，止存银十六万余两。十一日开放米折七万余金，仅存八万余金。十二、十六两日仍须开放兵丁马乾及五营兵饷四万余金。核计连漕折及旧存租定只得三万余金。计本月下旬即属无银可放。腊月初三、初四大饷，更属一无可筹。现虽严催各省解款，深恐缓不济急，兵丁待哺嗷嗷，际此天寒景迫，稍有迟误，都中大局，关系匪轻。弟等忝任度支，目击时艰，万分焦急，正在无可筹画，接到阁下奏请折漕一

^① 张之万同治元年十一月署豫抚，次年正月实授，四年四月改署东河。

折，可得银三十五、六万金，于年内扫数解部。值心尽计穷之时，遇绝处逢生之幸，弟等捧读之下，不胜欣忭。年内有此钜款，盼望尤殷。台端新承宠命，自必雷厉风行，力加整顿。惟是不情之请，寔属无可如何。所幸豫省距京不远，起解尚可迅速。所有此项漕折银两务望赶紧催齐，于本月内全数解京，俾得腊月初旬，兵饷足资开放。倘或月内未能全到，总恳于腊月以前解到一半，以济眉急。维持大局，全赖芻筹，不胜迫切翘盼之至。专此佈息，敬请勋安，诸惟朗鉴不备。

年愚弟	沈桂芬	
	早保	
	宝璠	
愚弟	倭仁	全顿首
晚	罗惇衍	
愚弟	崇纶	
	董恂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

——第三次日俄协约和第四次日俄密约

陈春华 译

编者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结束，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并将旅大租借权、南满铁路及支线，以及附属的权利、特权转让与日本。但双方在中国东北、蒙古及朝鲜的争夺并未终止，然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既斗争又相互勾结。1907年至1916年的十年中，日俄先后进行四次协商，缔结了三个公开协约、四个秘密协约，表面上承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暗中划分在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势力范围，行瓜分中国之实。本篇选译了《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中有关1916年日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和第四次密约的有关文件，共十八通。其中包括俄驻日大使致外交大臣的密电、报告，俄国破译的日本驻俄大使与外务大臣的来往密电等，反映了双方既斗争又勾结的侵华内幕。

本篇各件文后注为原编者注，脚注为译者注。

1. 石井致本野电^① ①

7.②

1916年2月1日〔14日〕③

秘 密

俄国外交部通过科扎科夫所表达之看法^②如下：第一，倘帝

① 译自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以下简称《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203号文件。石井，日本外交大臣；本野，日驻俄大使。

② 该符号为沙皇批阅文件时所画，凡画该符号的文件，均表明业经沙皇批阅。

③ 方括号外的日期为俄历，系原件所有。方括号内的日期为公历，系原编者所加。

国政府在军用物资问题上态度特别殷勤，则俄国似乎打算将东省铁路支线出售给我们；第二，俄国业已得悉关于德国攫取从土耳其、波斯到中国这一整个地区之计划，因此，……^①使俄国感到担心。

我的第56号电发出后，帝国政府考虑到俄国政府就俄日两国交好提出之建议，对战后日本之政策进行了研讨，这为讨论上述两点看法奠定了基础。

1. 倘若俄国要求将长春——哈尔滨铁路转让日本，日本得付最高酬金，则帝国政府亦可答应俄国通过大公殿下提出的关于提供武器及……之要求。

2. 关于俄日两国未来政策问题，应当指出，两国之利益和安宁不允许中国受德国控制，为防止此种危险发生，签署公开协约，表明俄日两国特别友好之问题刻下已经成熟。

我打算在2月15日接到天皇批准后，再将此事电告您，届时您可得悉详细情况。

请注意：在出售东省铁路问题上，给人留下因我们提出请求才作出此种决定之印象，这并非所愿。因此，倘在我们提出请求之前，俄国主动提出建议，则会进一步加强日本社会舆论之友好感情，这样一来，由我们军事当局提供武器之问题便易于解决。请想方设法尽可能让俄国提出这一建议。

① 此电由俄国外交部破译，并据日文译成俄文。

② 见第245号文件（即本选译第7号文件——译者）。

2. 石井致本野电^② ①

1916年2月3日〔16日〕

续我第91号电。 ②

① 行文中点删节号……之处，表示电文脱漏，下同。

②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211号文件。

谈到战后两国交好问题，俄国当局……已就此进行秘密谈判，关于出售我国军队所必须之武器一事，如前所述，帝国政府已毫不犹豫地作了如此异常之决定。此刻，当我们欲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时，我们不应回避同俄国缔结新的协约，但我们坚信，此事亦没有必要等到战争结束再进行。

帝国政府认为，必须就缔结公开协约（参见我的第92号电）及秘密协约（参见我的第93号电^②）达成协议，但考虑到行将举行的谈判之性质，您把上述协约草案通知俄国外交大臣时，最好作为您个人的，且经帝国政府批准的草案，并使其成为交换意见之基础。

倘您对协约草案有怀疑或有不同看法，请您在谈判开始以前电告我。至于所有其他问题，除协约问题外，没有必要与协约问题一并提出，亦不必阻止对所有其他问题全面开议。

虽然此等问题出自促进日俄两国交好之愿望，但鉴于此等问题性质不同，应当彼此加以区别，故当讨论上述其他问题时，您可以秘密通知俄国人：此外，您已接到关于结盟问题之秘密训令，并说明两个问题彼此密切相关。

- ① 此电由俄国外交部破译并译成俄文。
- ② 见第203号文件（即本选译第1号文件——译者）。
- ③ 这些电报用弄不清楚的日文—法文密码排印。

3. 马列夫斯基致沙查诺夫电^①

/.第68号电^①1916年2月4日〔17日〕

请您转告皇帝陛下，我对皇上之恩赐表示一个忠君者由衷之感谢^②。并请您报告陛下如下情况：我担心我突然被召回被日本误解为帝国政府近八年来按皇上旨意所致力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之政策已发生改变。为避免得出这种错误结论，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215号文件。马列夫斯基，俄国驻日本大使；沙查诺夫，俄国外交大臣。

冒昧奉陈，最好在某一时候使日本社会舆论对我离任一事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我离任是我将奉调高等立法机关供职，最好使此间明白皇帝陛下对我努力贯彻皇上旨意表示赞许^②，还请您务必报告皇帝陛下，到本月我已为沙皇和祖国效命三十五个春秋，我担任过十一年参议员，八年陛下驻日本代表。我奉调国务会议是皇上对我在日本活动之最高奖赏。当年我抵达日本时，俄日两国关系十分紧张，近年来已变得如此友好，目下即将结盟。

我个人对您的襄助及打算为我请功授勋，谨表深深的谢意^①。

马列夫斯基

① 此电据电报纸刊印。

② 2月2日〔15日〕沙查诺夫以第601号电通知马列夫斯基，最近他将从日本召回，但保留其皇室侍从长及参议员职务。

③ 2月8日〔21日〕本野打电报（该电为俄国外交部破译，并据日文译成俄文）通知石井：“俄国驻东京大使同俄国外交大臣之意见分歧已成为俄国政府之议题。据外交大臣所言判断，召回大使主要原因是，他近来未执行外交大臣之指示。”

④ 2月2日〔15日〕沙查诺夫以第597号电通知库朋斯齐，他最近被任命为驻东京大使。2月25日〔3月9日〕沙查诺夫以第964号电通知大本营外事办公室主任库达摄夫，前一天他已被任命为驻北京公使。

4. 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馆致

沙查诺夫备忘录^①

1916年2月5日〔18日〕

自欧战爆发以来，帝国政府已不止一次表明其对俄国怀有真诚之同情：1、帝国政府在保障俄国远东领土安全之同时，让俄国政府在亚洲之边界不设防并将全部兵力集中在亚洲；2、即使削弱国家防御力量，帝国政府亦把武器弹药售给俄国；3、帝国政府同意发行俄国国库债券^①，这在日本财界并无先例，且有损于日本自身利益。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217号文件。原件系用法文写成，这里据俄译文译出。

平心而论，基于上述情形，日本政府可对俄国之真诚友好态度抱以希望。但俄国在关税方面之若干措施及在涉及日本在俄国海域捕鱼权利之规章方面若干限制性新措施，已使日本商人及渔业主遭受重大损失。俄国这种不符合日本情感之措施，使帝国政府极为不安，且已激起日本社会舆论不满。

俄国皇帝陛下的代表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殿下之出访是最荣幸之事件，结果使全体日本人对日俄两国之未来关系恢复了信任和希望。既然两国友好关系之确立应以双方真诚友好之感情为基础，帝国政府则希望俄国政府顺应情势，对日本表现出友好之感情。

鉴于上述情由，已授命日本大使，坦率地向俄国外交大臣阁下阐述，帝国政府对科扎科夫先生以沙查诺夫先生阁下名义表达如此友好感情之看法。

帝国政府认为，它首先应该请求俄国政府在海关税率及在俄国海域捕鱼权利这两个问题方面能某种程度上满足日本之利益。

在同石井男爵会谈时，科扎科夫先生对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讨论出售哈尔滨—长春铁路支线问题抱有希望。将上述铁路支线留在东清铁路公司内是谈判出售南满铁路时决定的，当然这不合常规，此种情况迟早要改变，因为这条支线大部分在日本势力范围内。因此，倘俄国政府能在适当条件下将铁路出售给日本，则帝国政府将会看到俄国政府对帝国政府所表达之友好感情及迄今不断给予俄国帮助所作赞许的明证。日本外务大臣确信，该问题若能圆满解决，日本人民对俄国之不信任则会完全消除。国会再也没有理由谴责日本政府对俄国之立场，军事当局亦会在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殿下逗留期间重新提出的向俄国提供武器问题方面，设法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俄国之愿望。●

俄国政府若能答应上述请求，日本帝国政府十分愿意同俄国

讨论并缔结同盟条约，俄国政府亦经常提及这一意思。

日本政府已授权日本大使就上述问题同俄国政府进行谈判，外交大臣阁下如能向本野男爵介绍俄国政府对该问题之看法，他将不胜感谢。

① 马列夫斯基于1月15日〔28日〕以第25号电通知沙查诺夫，近来同日本银行家之谈判表明：“在国家银行协助下，财团同意于公历2月5日签订五千万贷款合同，并办完签字手续，于2月10日前分摊完毕”。马列夫斯基继而指出，银行家断然拒绝增加借款数额，并补充说，他们“于6月将根据当时情况着手讨论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新贷款”。马列夫斯基于1月25日〔2月7日〕以第48号电通知称，是日签署了合同，“正金银行”代表日本财团签了字。巴尔克在1月27日〔2月9日〕致财政委员之报告中称，起初银行家坚持交付日本三千万日元的黄金，但遭到俄国财政部方面断然拒绝，银行家已同意取消这个条件。

② 石井在2月4日〔17日〕电（该电被俄国外交部破译，并由日文译成俄文）中告知本野下述情况：“倘若俄国确实会答应出售长春—哈尔滨铁路，则除不久前向大公表示同意提供的二千万发子弹外，我们军事当局还准备由武库提供十二万支步枪……及六千万发子弹……在俄国答应出售铁路之后，您可以向俄国当局宣布上述帝国政府关于出售军事物资之决定。”

5. 俄国外交部日志①②

1916年2月5日〔18日〕

日本大使拜会了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并向他递交了一份照会，日本政府在照会中表示同意就与俄国结盟一事进行谈判②。

① 原载《红档》杂志第32期，第9页。

② 见第217号文件（即本选译第4号文件——译者）。

6. 本野致石井电①②

1916年2月8日〔21日〕

秘 密

根据您第91号电②最后一部分所提请求，谨阐述下述意见。我认为，我们缔结日俄同盟条约之主要宗旨是：日后巩固日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218号文件。

②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232号文件。

本地位，维护远东和平，并保障俄日两国在华权利及利益。

依我之见，我们欲向俄国政府提出的同盟条约草案不仅应涉及对德政策，而且应成为真正的同盟条约，因为有必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两国之关系，应该像英日同盟条约那样，正式予以公布。至于俄日两国共同行动反对德国侵略计划问题，则应在上述条约秘密条款中予以阐述。

您寄给我的草案谈到第三国，而我认为应在秘密条款中明确指出为德国。因为，无论如何必须把条约内容通知英法两国政府，如不指明为德国，则可能产生怀疑。此外，在秘密条约中往往都指出第三国（如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第一条）。因此我建议正式条约按我第116号电^②所述行文，并且增加第四款，其目的是，倘英俄两国发生冲突，则……我建议秘密条款按我第117号电^①行文。

我希望向俄国外交大臣出示本电报，是作为我个人提出的草案。您是否有不同意见，请尽快回复。

① 该电为俄国外交部破译，并据日文译成俄文。

② 参见第211号文件（即本选译第2号文件——译者）。

③ 这些文件用弄不清楚的日文—法文密码排印。

④ 石井在2月10日〔23日〕复电（该电为俄国外交部破译，并据日文译成俄文）中通知如下：“您的草案与我们的草案，精神实质根本不同。您的草案使帝国政府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我们的草案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经过内阁讨论，并在元老会议之后得到了天皇批准。因此，草案的全部内容不可能再作改动。鉴于上述情形，我请求根据我们的草案同对方开始谈判。”

7. 第四政治司高级文官科

扎科夫的呈文^{①①}

1916年2月10日〔23日〕

我作为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随员^②动身赴日本时，外交大臣授命我向日本要人介绍他对俄日两国未来之关系及俄日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245号文件。

两国必须共同行动，反对德国巩固在华势力之看法。

我们在朝鲜边界的安东会见了委派为大公服务的寺内将军及驻墨西哥公使安立。我在日本担任秘书期间与安立过从甚密，而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寺内伯爵也公开向我表示过好感，他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他坚信这对俄日两国友谊有好处。从我与安立先生最初几次谈话中得到一种印象：人们认为我前来日本负有政治使命。因此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赋予我的任务。在第二次会见时，安立先生告诉我，他已把我的话转告寺内伯爵，他对我的话亦深有同感，并表示情愿支持我们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希望。我根据此知安立先生及陪同大公的日本中嶋将军之建议，在从神户到东京的列车上同寺内伯爵作了单独交谈，我对他讲了下述情况：

无论如何，当前这场战争终将结束，欧洲将长时间分作两个阵营：一个是日尔曼国家，另一个是欧洲其他大国。我们希望看到日本站在我们阵营一边，我想这对日本有利，因为德国在华已对日本构成威胁。我提醒寺内伯爵，在波罗的斯克港会晤时，威廉皇帝对沙查诺夫说过，日本是俄国的敌人，并劝告俄国政府与德国共同使中国发展、强大起来，以便与日本相抗衡。我同时指出，我们熟悉的利别尔曼先生曾直言不讳地向亚美尼亚人指出，德国政府在远东追求之目的，是将中国变成德国政策之工具。日本同俄国一样亦必须抵制此等阴谋，为此目的，两国应将自己之力量联合起来。俄日两国作为盟国，当然可以期望互相给予一些帮助。俄国政府希望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我国军队所必需之武器。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出售给我们的武器或已过时，或被淘汰，并未动用动员日本军队所必需之储备。日本政府可将装备日军之武器提供给俄国，因把武器出售给我国而失去武器，与在战场上对付共同敌人而消耗武器，其意义是相同的。谈到日本政府，虽说区区小利问题与政治大计实已混杂一起，但为避免谴责日本未从与俄国交好中得到相应之好处，日本政府可能要求我们

给予什么补偿，比如，将在日本势力范围内的东省铁路支线出售给日本政府，或在其他不侵犯俄国主权及领土权利方面给予补偿。

寺内伯爵对我阐述之观点表示完全赞同，但指出，在日本有英国之追随者，他们担心与俄国交好。我对此表示异议说，此种担心我不能理解。俄日交好只能加强英日同盟，因为若俄国成为英日两国之盟国，则此等国家应互相支持，并寻求他们在中国发生利益冲突之地方划分势力范围。我们继而谈及日本对华政策，寺内伯爵就本国政府对整个中国及袁世凯个人所持尖刻态度进行了指责。据他说，石井男爵刚从欧洲回来，尚不了解对华政策，他干涉袁世凯称帝问题显然是错误的。在东京期间寺内伯爵还同大隈伯爵谈及这一问题，看来，他已说服大隈伯爵对中国政府及其元首之态度不要那么僵硬。寺内伯爵完全赞同我们把德国人逐出中国之主张，并且认为日中两国政府之间需要预先建立相互更加信赖之关系。最后，寺内伯爵劝我既不要同大隈伯爵，亦不要同日本其他要人（元老）谈及我们的话题，要谈只能同石井男爵谈。无论在元老面前，还是在内阁面前，他答应我将给予最坚决的支持。

根据这一劝告，我抵达东京后，立刻会见了石井男爵，向他阐述了与寺内伯爵交谈时所讲述之思想。我还补充说，我是奉沙查诺夫之命讲这番话的，我并重申了俄国外交大臣屡次向日本大使讲的话。石井男爵答称，他赞同沙查诺夫之主张，并尽力在我离开东京之前给我答复。数日后常与我会面的安立先生希望确切说明俄国政府同意出售给日本之铁路，是东省铁路整个南段支线，还只是位于日本势力范围内之一部分支线。我答称，在同本野男爵会晤时当然只谈及松花江以南这段支线之一部分。这部分支线在日本势力范围内，对日本人有些不便。

我离东京前夕，石井男爵召见了，并向我作了答复，该答

复我已电告。关于德国可能巩固其在华势力一事，他表示：“我们不能允许这样作”，但认为没有必要把反对这种巩固势力之相互承诺写在文件里。关于将德国人逐出中国一事，他的意思与同马列夫斯基交谈时所讲述的一样。还在离开东京之前我已将此等答复告知寺内伯爵，他指出，石井男爵对我如此转弯抹角亦徒劳无益。

我同寺内伯爵最后一次谈及这个问题是在汉城。他本人希望同我交谈，并通过安立先生进行了交谈。寺内伯爵告诉我，他在东京为我们的事业作了许多工作，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离开东京以后，他仍留在那里；我们的主张在皇宫举行的元老会议上得到赞许，无论日本内阁如何更迭，均不会妨碍日本政府将按我们希望的那样继续奉行其政策。随后我们的话题转到可以指望售给我们多少日军储备之武器。

科扎科夫

① 此件已随沙查诺夫 2 月 13 日〔26 日〕奏折附呈尼古拉二世。

② 12 月 8 日〔16 日〕日志记载：沙查诺夫与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交涉的结果决定，出访期间暂派远东司司长科扎科夫在大公身边工作，在必要情况下，科扎科夫可以进行政治谈判，“但不要赋予过强的官方性质”。

8. 俄国外交部致本野备忘录①

7. 第 153 号 1916 年 2 月 12 日〔25 日〕

俄国外交大臣接到日本大使 阁下本月 5 日〔18 日〕照会①后，立即作了悉心研究，并认为应对友好地阐述日本政府之意图深表谢意。

沙查诺夫先生认为首先必须指出，倘若日本政府把在俄国远东边境实行新海关税则及公布太平洋捕鱼新条例，说成旨在反对日本臣民利益，则错了。采取此等措施一方面是国库之意见，因为俄国政府认为必须利用所有财源抵补目前这场战争之巨额开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 10 卷，第 245 号文件。原件系法文，据俄译文译出。

支，另一方面，必须详细规定太平洋捕鱼地段之利用办法，因为过分捕捞对保护鱼群有害。鉴于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在纯属内部制度这类问题上，应为两国政府保留行动自由，这不会影响两国友好关系。不过，倘若这里系指帮助日本以抵补日本帮助俄国而所遭受之损失，则我国政府考虑到日本利益，将毫不犹豫地修改在这两个问题上之法令。

沙查诺夫先生借此机会再次向日本政府保证，日本政府给予俄国之帮助将受到俄国政府和人民高度珍视。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殿下之使命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石井男爵对科扎科夫所言及本野男爵本月5日〔18日〕照会中，俄国政府特别满意地得悉，日本政府赞同俄国政府关于德国政府在中国之危险活动及力图在中国扮演主角之看法^②。正是为消除此种危险，俄国政府才竭力把俄日两国力量联合起来。一旦结为同盟，结果即将显示出来。此刻，正当德国在欧洲处境孤立，且与远东失去联系之时，在中国领土上打击德国特别有利，这将阻止德国在战时把中国领土变成实施阴谋之据点，并将阻止德国在缔结和约之后确立其在中国之影响。应当吁请中国政府与日尔曼国家断交，并彻底站在协约国一边。俄国政府可以向日本政府保证，俄国提出此种行动方式，决无鼓励中国人要求目前这场战争交战国之权利及和谈时发言权之意。俄国政府意识到俄日两国政府此种要求可能产生不良后果。俄国作为日本之忠实盟国，不会卖力于危害日本在华利益之活动，亦不会阻止日本政府在俄国政府承认属日本特殊利益范围之中国地区内巩固其地位。

俄罗斯帝国政府方面，与日本结盟之目的，是阻止德国之活动，并希望对德作战中能得到日本更有效之支持。为此目的，日本政府可向俄国出售武器弹药，其出售武器弹药之数量可与日军消耗量相当，如果日军亦积极参加对我们共同敌人作战的话，俄国政府方面可以给予日本政府相应帮助，比如，东省铁路

南段支线，即位于满洲日本势力范围内之宽城子—松花江一段支线，可按规定价格出售给日本政府。俄国这段铁路因在日本地区内所带来种种困难便可消除，日本向俄国出售武器亦可得到补偿。

沙查诺夫先生在阐述本国政府观点时，特别希望消除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可能产生之一切误解，并想询问日本政府是否亦想如此分析问题。

① 见第217号文件（即本选译第4号文件——译者）。

② 见第203号及第245号文件（即本选译第1号及第7号文件——译者）。

9. 本野致石井电① ②

1916年2月13日〔26日〕

秘 密

关于俄国政府答复事。

1. 根据外交大臣对关税及捕鱼问题所作答复②，我们之部分要求已被接受，此外，尚有达成进一步妥协之可能性。

2. 关于俄日结盟对付德国一事，两国观点并无不同之处，但帝国政府认为缔结条约预先防止可能产生之危害已足够了，倘若中国站于德国一边，则俄国政府在缔结条约之同时希望迫使中国人站在协约国一边，俄日两国在这方面有重大分歧。倘若俄国政府在该问题上不降低要求，帝国政府不可能缔结同盟条约，我认为，俄国外交大臣依然固执己见。特此报闻。

3. 至于出售铁路支线一事，我认为，俄国外交大臣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出售蔡家沟以北一段支线。不过我认为，可以请求俄国政府委托日本人管理蔡家沟以北至哈尔滨一段铁路，因为……在蔡家沟经营铁路十分不便。

至于我方出售武器问题，当然，不可能答应俄国政府全部要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264号文件。

求，但依我之见，有谈判之可能性……无论如何，俄国政府之答复……但问题既已提出，必须尽快予以解决。

请训示。

- ① 该电为俄国外交部破译，并据日文译成俄文。
- ② 见第254号文件（即本选译第8号文件——译者）。

10. 本野致石井电^① ①

秘 密

2月26日外交大臣请我到彼处，我们就他对条约问题所作答复举行了会谈，我们会谈内容如下：

1. 关于出售武器问题，正如所料，外交大臣所作答复并未涉及细节，显然他实际上依然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若需要多少武器，日本便提供多少武器，方能满意。我认为关于提供之数量可以商妥。

2. 在出售铁路问题上，我在第134号电中业已报告，他们依然坚持下述观点：长春至蔡家沟一段支线可以出售，但蔡家沟以北一段支线决不出售^②。我当时指出，帝国政府从阁下与科扎科夫先生谈话中得出一种信念，即俄国政府并不反对出售到哈尔滨的这段支线，外交大臣断然表示，这完全是误解^③。我认为根本不可能出售俄国势力范围内之铁路。

3. 在使中国参战问题上，外交大臣一再坚持自己之观点，并且表示：倘在目前这场战争中不给予德国尽可能强有力之打击，则日后将给日俄两国带来巨大危害；而要消除这种危险性，没有比战争时期更好的机会了。德国在工商业方面拥有实力，必须给予德国工商业相当强有力之打击。正是为此目的，俄国政府与英法两国【政府】打算采取经济措施对付德国。据最近报道，德国经济处境非常困难，倘若此种处境继续下去，勿庸置疑，这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275号文件。

将成为尽快媾和之原因。因为德国把中国视为附庸，削弱德国在华势力对德国将是强有力之打击。因此，俄国政府同英法两国政府一样，希望一定借目前时机清除德国在华经济势力。日本政府亦十分清楚日后德国有何等危险，因此最好俄日两国结为同盟以对付此种危险，而立即采取措施清除德国在华势力更为至关重要。

我对此表示，帝国政府业已阐述对使中国参战问题之态度，且已知照英法俄政府，我认为改变这个决定十分困难。我个人认为最好将这个问题与结盟问题分开。

外交大臣表示，他并无反对就上述两个问题分别进行谈判之意，但最好俄日两国对这个问题一旦达成协议，即行结盟。

总之，虽说在结盟问题解决之前，他们不想解决使中国参战问题，但仍认为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请求对此予以严重注意。我从外交大臣所言中已经看出，俄国政府似乎亦难于弄清楚，为何日本政府对目前清除德国在华经济势力不表示同意^①。

① 该电为俄国外交部破译，并据日文译成俄文。

② 见第264号文件（即本选译第9号文件——译者）。

③ 科扎科夫在2月26日〔3月10日〕函中，请求安立帮助解除在向日本政府出售东省铁路南段支线问题上的一个“小误会”：本野根据所接训令认为，科扎科夫与安立谈判期间业已谈及出售哈尔滨至宽城子全部支线，但实际上，他当时只谈及位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那段支线，即宽城子至松花江那段支线。

④ 石井在2月20日〔3月4日〕电中（该电为俄国外交部破译，并据日文译成俄文）称，俄国政府2月12日〔25日〕答复使他感到有些失望，遂请本野向沙皇诺夫作下述“必要的”解释：“帝国政府关于使中国参战问题之观点，于去年11月中旬业已知照有关各国政府，自那时起，帝国政府之观点并未改变，正如您所知，中国之情况愈来愈坏，目前愈来愈难于使中国站于协约国军队一边。随后谈及出售武器问题，帝国政府关于供给俄国武器，主要是出于对俄国之友情，我们决不认为这是出于同盟。”

石井在2月26日〔3月10日〕电中（该电为俄国外交部破译，并据日文译成俄文）告知本野，出售蔡家沟至长春一段支线“不符合帝国政府之观点，帝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哈尔滨至长春这段铁路是特殊支线，此外，我们担心，这样一来，不能使我国社会舆论感到满意”。石井指示本野将此事告知沙查诺夫，并请他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11. 沙查诺夫致本肯多夫电^①

第992号 1916年2月26日〔3月10日〕

我从十分秘密而可靠之来源得悉，日本政府已拟定出下述对华政策纲要。

因对华政策之目的是确立日本在华优势地位，而袁世凯本人是确立此种地位之障碍，故认为必须将袁氏除掉，为此可利用中国人民反袁运动。故决定向南方中国革命党人秘密提供武器和金钱，并于适当时候承认南中国革命党人为交战一方。

请将此等情报秘密告知格雷爵士，要他严守秘密，并请他就英国政府如何对待日本政府上述政策纲要一事发表意见。由于我们与日本政府正在谈判同盟条约，尽快得到格雷爵士答复对我至关重要。

沙查诺夫

12. 本野致石井电^② ③

1916年2月29日〔3月13日〕

秘 密

3月13日我拜会了外交大臣，并根据您的指示（第147号电^②）将作为谈判缔结同盟条约基础的我国草案通知给他。外交大臣答称，他浏览一遍草案后，觉得日本政府草案可以接受，但因该问题至关重要，他在认真研究之后方能将其意见告诉我。

关于出售蔡家沟以北一段铁路问题，我一再重申您第147号电之内容，并向他说明帝国政府之立场。不过外交大臣表示：在按照第一次俄日协约划分两国势力范围以后，该协约已成为俄日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339号文件。本肯多夫，俄国驻英国大使。

②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360号文件。

两国友好关系之基础。由于希望执行该协约所作规定，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俄国当然不会反对出售在日本势力范围内之俄国铁路，但因担心将在俄国势力范围内之铁路出售给日本，可能动摇俄日两国友好之基础，故俄国政府决不会同意出售这段铁路。

我坚信，俄国政府决不会同意出售这段铁路，故我劝告帝国政府以上述为基础重新研究这一问题。

① 该电为俄国外交部破译，并据日文译成俄文。

② 该电显然是指2月20日〔3月4日〕石井致本野电。

13. 本肯多夫致沙查诺夫电^①

第116号 1916年3月4日〔17日〕

尊电第99号^①敬悉。

格雷告诉我，他尚未得到能证明您的情报是完全正确的情报。他把您的情报同日本政府历次声明作了对照，并把日本政府声明概括如下：1、日本并无在中国恢复帝制之意，其理由是恢复帝制可能导致动乱发生；2、日本不想让中国加入协约国，可能是日本不愿把中国与协约国置于同等地位；3、日本迄今未对中国提出霸权。关于这后一问题，格雷向我指出，很可能日本于适当时候觊觎对华经济贸易特权。格雷从英国之观点出发，意识到该问题之困难。他认为，该问题给英法两国造成之困难甚至比俄国更多。但他认为应当认真注意日本之特殊地位及扩张要求，美洲、英国殖民地及整个西方之大门已对日本关闭，因而只剩下中国了。格雷最后说，同日本谈判时切勿再坚持意见，甚至不要再谈使中国加入协约问题，而应该只谈我们共同努力求得日本合作，反对对华阴谋及德国在华利益。格雷并不把这一情报视为俄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378号文件。原文系法文，据俄译文译出。

日两国谈判进程发生变化之根据。

本肯多夫

① 见第339号文件（即本选译第11号文件——译者）。

14. 俄国外交部致本野备忘录①

1916年3月5日〔18日〕

秘 密

倘若德国同俄日两国发生武装冲突，则俄日两国势必在并无协约国军事援助之情况下坚持过于艰苦之斗争。故拟定俄日同盟方针时，使俄日两国接近以现行条约为基础之政治体系，并考虑因目前这场战争而形成之国家集团是完全必要的。无论俄法协约，或是英俄协约，均未把同第三国追求对华政治控制之斗争视作履约要件。故在协约国保证给予军事援助之情况下，要俄日两国政府完全承担彼此给予军事协助之义务须更加审慎。

出于上述考虑，俄日密约期限应与英日同盟期限相同。为防备违反或废止密约，缔约国应保留要求修改两国所订密约，使密约有与因结同盟而形成之政治新形势一致之权。

按日本政府之意，所拟公开协约应直言不讳地提及俄日两国在相互协助、保护领土权利及特殊利益之情况下，所采取手段之和平性质。在此种情况下，俄日两国将来在捍卫对华政策方面可能给予军事协助一事在外交上是并无先例的。这可能博得那些有仇视俄日两国、蔑视俄日两国在华利益倾向之国家的好感，并为和平实现两国拟通过签订密约所达到之目的造成危险。为防止此种危险，最好将“两国运用一切和平手段”一语载入条文，并使该款成为密约之一款。

倘若秘密协约中未提及不测事件，则秘密协约之结果最好能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380号文件。本件及附件原文均系法文，据俄译文译出。

有保障。故让俄日两国政府相互通告其拟就在华特殊利益缔结之国际协约，有关中国本部之国际协约只有预先征得同意再缔结，才是适宜的。有关条款可以列入公开协约^①及秘密协约^②。

1907年、1910年及1912年秘密协约，已成为俄日两国最友好关系之基础，显然应当继续有效。为避免在这方面发生任何误解，在秘密协约之某一款中提及此事实为有益。

维护远东和平对在世界这一地区拥有领地之国家具有非常重大之意义。看来，须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切勿落入任何外国控制之下。在公开协约中公开宣布这一原则尤其有益。这可减轻俄日同盟在中国及欧美国家可能引起之不安。公开协约前言部分可以包括确认缔约双方决定尊重中国独立及保持外国对中国政府影响均势一语。

附件1

秘 密

公 开 协 约 草 案^③

俄国政府及日本政府决心协力维持远东永久和平，认为，为此目的必须尊重中国独立，任何国家不得力图利用在华占优势政治影响，兹协定以下条款：

1、俄国将不加入对抗日本之任何协约或政治联合。

日本将不加入对抗俄国之任何协约或政治联合。

2、缔约国之一方在远东之领土权利或特殊利益，为另一方所承认者，若遇危害时，俄日两国将协商应采取之办法，相互支援或协助，以保护彼此之权利与利益。

3、缔约双方允诺，在通知另一方之先，不同第三国就上述条款所规定之问题进行任何协商。

附件2

秘密

秘密协约草案^①

俄国政府及日本政府协定下列各条款：

1. 两缔约国认为双方重要利益需要中国勿落入对俄国或日本怀有敌意之任何第三国政治控制之下，倘该第三国在中国军事、行政及财政机构中取得优势地位，则上述情势必将发生，每当需要时，须开诚交换意见，并协定须采取之办法，以阻止上述情势进一步发展。

2. 若因上条所举共同协定之办法，缔约国之一方与上条所指第三国宣战时，则另一方应自己盟国之请求，即须给予援助，在此种情形下，两缔约国允诺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单独媾和。

3. 上条所规定缔约任何一方给予另一方军事援助之条件及方法，应由缔约双方主管官员制定之。

4. 但应明确规定，两缔约国之一若不能获得自己之盟国予以与危险冲突之严重性相应之援助，则无须给另一缔约国本约第二条所规定之军事援助。

同时规定，两缔约国之一无须给另一缔约国公开协约第二条所规定之另一种方式，即和平方式之支持及协助。

5. 两缔约国之一未得另一缔约国同意之先，不得与第三国就中国本部缔约条约、协约或政治协约。

6. 1907年7月16日〔30日〕、1910年6月21日〔7月4日〕及1912年6月25日〔7月8日〕各密约继续有效。

7. 本约自签字日起发生效力，继续至1921年7月1日〔7月14日〕为止。如缔约国之任何一方，在本约期满前之十二个月，未以不愿续约之意思通知对方，则本约继续有效，直至缔约

国之任何一方通知废止协约之日起满一年为止。

8. 两缔约国须严守本约之秘密。

- ① 见附件 1。
- ② 见附件 2。
- ③ 原件注明：“于1916年3月8日〔21日〕交与日本大使”。
- ④ 原件注明：“于1916年3月8日〔21日〕交与日本大使”。

15. 本野致沙查诺夫备忘录^① ①

1916年3月20日〔4月2日〕

秘 密

帝国政府对俄罗斯帝国政府未能同意其关于出售长春至哈尔滨一段铁路之建议感到无比遗憾。不过日本政府仍希望圆满解决两政府间这一问题，考虑到俄国政府之愿望，欲将下述建议提供俄国政府研究：

1. 出售长春至松花江（即至陶来赖昭）一段铁路。
2. 为保障货物搬运起见，以适当条件将松花江至哈尔滨一段铁路让日本政府经营管理。
3. 俄国政府承认日本船只在松花江之航行权。该问题已不止一次成为俄日两国政府谈判之主题。

日本大使期望上述建议将受到俄国政府赞许，并荣幸地请求外交大臣阁下务必将俄国政府对该问题之答复尽快通知他。

- ① 此件据打字件刊印。

16. 沙查诺夫致本野备忘录^②

1916年3月23日〔4月5日〕

秘 密

-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450号文件。原件系法文，据俄译文译出。
- ②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460号文件。原件系法文，据俄译文译出。

俄国政府开始与日本政府谈判同盟条约时，已预见到互相帮助之可能性，盟国认为互相帮助是可能的。从一开始，俄国政府就表示希望得到日本军队提供的大批武器弹药。现在，日本大使馆在3月20日〔4月2日〕备忘录^①中业已表示日本政府之下述愿望：1. 俄国政府出售长春至松花江一段铁路；2. 松花江至哈尔滨一段铁路让日本政府经营管理；3. 俄国政府承认日本船只在松花江之航行权。根据互惠原则，日本政府欲出售给俄国武器弹药之数量根本未提及。

俄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即刻表明自己之看法，在讨论此等相互让与问题时，应当遵循1907年及1910年俄日协约所定原则。根据前一协约，日本允诺不在满洲俄国势力范围内之铁路地区谋求任何让与权。以松花江作为俄日两国势力范围之分界线，将哈尔滨至松花江一段铁路让日本政府经营管理与该条精神与字义并不矛盾。

日本在1910年公开协约中允诺尊重北满现状，这是俄国与日中两国缔结之全部条约、专约及其他协约所规定的。确定俄国在该区地位之文件，其中包括1858年及1881年俄中条约，业已知照日本政府。根据此等协约，宣布松花江仅对俄中两国航船开放，而其他国家不在此列。因此俄国取得了松花江航行权，而与中国缔约之其他国家并未享有此一特权。

1910年密约之内容包括日本政府允诺尊重俄国在满洲势力范围之特殊利益，不阻止此等特殊利益之巩固与发展，不在俄国势力范围内谋求能给俄国特殊利益带来损害之任何特权、让与权，并尊重俄国根据业已通知日本政府之条约、密约及其他协约在其势力范围内所取得之一切权利。在签订本协约时，日本已承认俄国在松花江之航行特权，并允诺尊重此种权利和不反对发展此种权利。因此日本在松花江航行问题不再是1910年谈判之主题。该

问题已为是年6月21日〔7月4日〕所签协约中更全面之规定所解决。

日本政府在提出这一问题和要求将俄国势力范围内之铁路经营管理让与【日本】时，回避了谈判1907年及1910年协约时所遵循之原则。

此等原则已成为俄日两国友好关系之坚实基础。俄日两国政府相互尊重彼此获得之权利，在遇到削弱此等权利之危险情况下，彼此给予忠实之支持，才能顺利得到迄今为止他们只能感到满意之结果。俄日两国实现拟议之结盟之后，必定受到此种思想之鼓舞。

为证明对1907年及1910年协约所宣布原则之忠诚，帝国政府声明愿于必要时在应予规定之条件下，将东省铁路长春至松花江一段出售给日本政府，愿放弃俄国航船在松花江流经日本势力范围内那一段之航行，倘中国政府拒不准许日本船只在这一段松花江航行，将不支持中国政府。俄国政府认为，它在迄今所走过之道路上，即更全面划分俄日两国利益范围之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俄国政府坚信，这里有一条使俄日两国达到完全一致的最正确之道路。

① 见第450号文件（即本选译第15号文件——译者）。

17. 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

致沙查诺夫紧急报告①

№. 第22号 1916年8月23日〔4月5日〕

秘 密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先生：

日本当前政治形势比战前有颇大发展。在过去十八个月里国际情势发生如此大变化，以致现在不得不承认日本不仅是远东大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463号文件。

国，而且是世界大国了。使欧洲国家遭受巨大损失之战争对日本财政及贸易产生了非常有利之影响。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不过是虚名而已，日本在青岛轻易取胜之后，在对德国斗争中再未流过一滴血，未花过一个日元。反之，在此期间日本黄金储备却几乎增加了一倍，商船运输繁忙，对外贸易活跃，在太阳升起之国家进入文明社会整个时期，出口已打破记录；武器、弹药、军事装备及给养之出口，不仅使日本国库，而且使当地工业发了洋财。

但日本政府从欧战中获得更多者，是政治上之好处。如果战前日本在远东可以算做最有影响之力量，则现在日本已经成为远东局势之主宰。无论俄国，无论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在远东均不拥有陆海军，即没有能力阻挠日本达到其目的。日本人完全意识到他们处于得天独厚之环境是因为爆发战争，毫无疑问，他们在竭力利用对自己有利之环境，我们和英国对此种形势不能不有所考虑，何况，日本在远东之优势影响战后将长期保持下去。大战中当欧洲国家在物质上、精神上消耗殆尽时，日本却日益强大、富有，并为将来积蓄力量。这是因为日本拒不接收积极把它拉入欧洲战争，出兵西线之一切企图。日本政府十分清楚，同向我们出售储备之枪支削弱原有动员条件一样，减少日军在远东之编制将推迟日本之军事准备。日本根本不关心德国覆灭与否，正在利用目前战争积蓄财政力量及军事力量，准备迎接战争开始结束及列强开始奔向彼此政治需要之新目标的时刻。

日本政策之主要目标是中国，日本之最终目标亦是中国，日本是否只限于去年向中国提出的第五号要求，或是借机实现其在长江谷地及福建省之欲望，目前尚难预料，因为许多事情取决于中国国内情势。中国愈受内乱之苦，中国中央政权愈削弱，日本愈容易实现其愿望。预见到此种情形，日本人毫无顾及地表现出对袁氏并无好感，并对可以巩固袁氏个人地位的一切均坚决反对。

这说明他们对中国恢复帝制持否定态度。在政治上加强中国，并促使中国统一根本不符合日本之政治利益。反之，中国目前之混乱状态，中国统治者摇摇欲坠则对日本有利。

这说明日本政府不赞同拉中国与德奥绝交。中国加入协约国，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及强霸势力，可能使中国在其他国家中得到有利地位，提高中国之威信，除财政援助外，还可保证中国在将来的和会上独立、平等之地位。日本未必能容忍将中国拉入协约国之“音乐会”，在欧洲国家帮助及直接支持中国，而公开削弱日本影响之情况下，亦不大可能期望日本容许把中国提高到大国之地位。

协约国政府几次从别的角度提出拟将德奥两国臣民大批逐出中国之计划。倘此项计划付诸实施，则可望给日本人带来巨大好处，显然日本人将把德国对华贸易的四分之三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日本人担心加强北京中央政府之权力，不愿把这类任务交中国当局完成；日本人答应亲自对中国领土上之德国人进行政治监视，并将德国租界与周围分割开来，亲自实施此项计划。同轻易延期和姑息的中国当局下令驱逐德国人相比，实施上述计划或许能取得更大效果，但归根结底这与在第五号要求所载明之条件下准许日本警察进入中国之结果相同。

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拉中国同德奥两国公开交战，无论如何粉碎德国银行、商行、报界及德国驻北京官方代表所支持的德国对华阴谋至关重要。但仍有个最重要之问题：日本协助实施此项计划将要求什么补偿？未征得日本同意，便去实施此项计划，把日本置于既成事实面前，意味着要冒与日本发生小争执，激起日本反对我们之危险，而中国不征得东京赞同，亦未必敢迈出这一步。

谈到补偿，我有责任指出，根据我方所提第一点，日本很可能提出给日本渔业主带来巨大好处的1907年捕鱼协定期限之恢复

问题，并请求准许在松花江航行之问题。但对北萨哈林或长春至哈尔滨一段铁路提出要求，就是死气白赖地要求修改朴次茅斯条约。如此修改俄日两国基本协约，意味着不仅削弱俄国之强大影响，而且给我国远东边区及俄国在北满之事业带来无可挽回之损失，即使与日本正式结盟亦无法抵补我方所作出之让步。

致诚挚敬意

马列夫斯基—马列维奇

18. 世清致沙查诺夫电^①

第158号 1916年3月31日〔4月13日〕

第1414号电敬悉。●

今天石井男爵接见了，我同他就阁下来电之内容进行了交谈，我阐述了在缔结日本新贷款合同方面日本政府给予我国支持对双方均有好处之理由。

外务大臣告诉我，内阁根据本野电报对我们所提问题作了研究，倘问题在于在日本同时发行三亿一千五百万日元公债，则与此间市场情况实难以实现。不过，倘我方所提办法更符合国家财政力量，则日本政府愿给予我们力所能及之协助。

我对这一许诺称谢之后回答说，我将请求详细指示。

关于我对具体安排此事之可能性之意见，容另电具报。

世清

● 沙查诺夫在3月25日〔4月7日〕第1414号电中通知马列夫斯基：俄国政府打算再次向日本借款3亿1千5百万日元，并且指出，俄国在日本并没有足够的现款偿付这笔借款。沙查诺夫继称：“倘若日本政府协助我们，使上述借款以三年为期的俄国国库券偿付，且视需要将俄国国库券投放不受约束的日本市场，我们将不胜感谢”。鉴于马列夫斯基即将起程，沙查诺夫请他责成世清向日本外务大臣说明此意。

① 译自《国际关系》第三辑，第10卷，第508号文件。世清，俄国驻东京代办。

1920—1921年的中苏关系

[苏]贾丕才 著 黄纪莲 译 刘存宽 校

说明: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入中国后的1920年秋,莫斯科接待了中国政府的第一位赴苏使节张斯馨将军率领的“非正式军事考察团”。北京则接纳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团——“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派来的优林使团;随后,北京政府宣布不再承认旧俄使领,彻底断绝了中俄外交,从而扫除了中苏外交的一大障碍;1921年春,中国政府又正式答复了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两国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早期中苏关系史中重要的一段历史。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卡皮察(贾丕才)教授在其专著《苏中关系》一书中对此作了叙述,现将有关章节译出,供史学界参考。题目为译者所加。

远东共和国与中国的初期交涉

远东共和国于1920年4月6日创立。远东共和国的领土包括: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堪察加半岛、萨哈林岛北部和中东铁路路界。远东共和国是一个临时的国家机构。在受到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于远东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希望在远东战线获得长时期的喘息,以便集聚力量粉碎协约国准备好的第三次进攻。

北京政府对远东共和国很感兴趣。以路邦道为首的中国满洲当局和外蒙当局的代表团在4月份就访问了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与使团成员就中东路、贸易和建立外交关系等问

题交换了意见。^①但代表团的权能仅限于查明居住在远东共和国和苏俄的中国侨民的情况，因而没有达成任何重要协议。

为了熟悉情况，北京政府的一个顾问团于6月份来到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会见了远东共和国政府的首脑人物，还收到一份备忘录，其中指出远东共和国愿以平等互惠的精神修订俄中旧约，不要求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之类的特权。远东共和国政府建议立即由中国、远东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三方面开始会谈。^②

使团顾问们回到北京后，于1920年7月1日向北京政府递交了一份冗长的报告。报告称：西伯利亚的反动政党（白卫军—原注）已经没有实力，正在瓦解，日本军队也已撤出。“西伯利亚的所有俄国人—男人、妇女、儿童都那样地仇视日本人。使团深信：很难预言今冬会发生同日本人的战争”。使团驳斥了那些所谓日本已和苏俄达成协议的谣传，似乎根据该项协议苏维埃政府已同意日本在远东共和国占据优势。^③

使团指出：尽管远东共和国是一个临时组织机构，但是对远东共和国的创立，“中国应当视之为持久性的政治举动”。^④使团还报告说，鉴于有必要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巩固的友好关系，远东共和国政府希望予以承认。^⑤

1920年4月，北京政府决定派出以张斯麐陆军中将为首的军事外交使团前往苏俄。^⑥代表团于5月20日越过前线，到达上乌

① 见《远东共和国报》，1920年4月29日。（此为原书第46页注②，现由选译者重新编号。）

②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492，卷夹1，案卷1，第7张。

③ 同上，第4—5张。

④ 同上，第6张。

⑤ 同上。

⑥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4C，卷夹151，案卷51392，第16张。有趣的是，参加共产国际第3次大会工作的张永奎被列为使团成员，任使团秘书。

金斯克。①张斯磨通知远东共和国外交部：中国政府建议使团和远东共和国政府进行接触，并查明该政府的情况，因为这是为建立外交贸易关系、巩固中国和远东共和国两国政府友好所要求的。②

远东共和国这时正在组建时期，它必须经常注意前线的情况，因此，使团没能立即与远东共和国政府会见。张斯磨在6月7日致远东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长的信中抱怨远东共和国政府还没有和他进行谈判。③

张斯磨使团受到了远东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长和其他政府成员的接见，使团对于远东共和国的政治纲领、政府计划以及它和苏俄的关系很感兴趣，双方就建立领事关系、华工回国和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两国之间日后的关系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决定。使团仅限于了解远东共和国的现状。

1920年8月24日使团抵伊尔库次克，向莫斯科进发。

还在远东共和国建立之前，同中国交界的一些苏维埃地区的地方政权就开始与中国当局有了接触。

1920年3月20日，由共产党人起领导作用的滨海地区临时政府向中国政府驻海参崴的代表递送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宣布临时政府对中国人民怀有好感，希望为了俄中两大友好民族的进步和繁荣，加强事务性的联系。临时政府强调指出：它承认中国在划归中东铁路路界的主权。但同时它也注意到中东铁路路界业已形成的严峻局势：谢米诺夫白卫军欺压俄国侨民，俄罗斯珍贵的国家财物在中国当局的协助下被运走了，从赤塔和其他地方逃出的武装逃犯的数量在继续增加，并组成了许多白卫军。滨海地区政府宣布它支持中东路地区爆发的抗议霍尔瓦特活动的罢工。备忘录指

①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490，卷夹15，案卷29，第110张。

② 同上，第139张。

③ 同上，第140张。

出：罢工运动具有和平性质，中国当局应当持中立态度。

滨海当局要求为改善中东铁路的状况而采取有力措施，它认为改善中东铁路的危急状况，只能解除霍尔瓦特的职务，并由滨海临时政府任命新的铁路主管人。^①

1920年5月滨海政府向中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共产党人A·Φ·阿格辽夫，他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中国外交长对滨海地区的情况很感兴趣。A·Φ·阿格辽夫宣称：滨海永远不会落入日本人之手。关于北京政府对旧俄驻华公使库达摄夫的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A·Φ·阿格辽夫坚持要北京政府同他断绝关系。A·Φ·阿格辽夫的印象是，北京当局倾向于和旧俄代表决裂。^②

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远东共和国政府的主要外交任务之一。发展两国间的紧密关系最终意味着苏俄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苏俄政府也正为此进行努力。

远东共和国于1920年5月向北京政府发出一份照会。照会指出，两国国民的利益要求尽快地建立互惠关系，建议召集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三方会议，以根据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宣言，解决所有最紧迫的问题。^③1920年6月，远东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派出了以И·Л·优林为首的旨在（与中国）建立经济、外交关系的使团。

美国国务卿立即警告北京说，一旦中国政府和上乌金斯克政府发生事务性联系，它就会碰上麻烦。^④法国公使和日本公使则“劝告”北京当权者不要和远东共和国进行谈判。

使团到达边境城镇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⑤后，向买卖城的中

① 同上，第269—271张。

② 同上，卷夹22，案卷28，第254张。

③ 同上，卷夹15，案卷29，第207张。

④ 《美国外交文书：中国》，第一卷，华盛顿1920年版，第769页。

⑤ 恰克图北。——译者

国当局要求予以签证。中国当局给使团安排了礼仪性接待，举杯祝酒，但却不准许代表团去北京。原来北京政府已下令阻止代表团。北京政府决定派代表到买卖城与远东共和国使团在边境举行谈判。^①

有鉴于此，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和И·П·优林使团向北京提出了有关的质询：北京政府为何不让代表团进入中国境内，而与此同时，苏俄并未给中国代表设置障碍。^②远东共和国外交部请求张斯霭予以协助，以便使团前往北京。^③

此时，中国正爆发一场新的军阀战争。直系军阀利用英美的支持开始了反对安福系集团的斗争。段祺瑞集团因“五四”运动中广大民众反对他而被严重地削弱了。这个集团因为和日本人的联系而损害了自己的名声，连各反动集团的支持也丧失了，就连日本也不敢冒险帮助它了。为了扭转局势，日本打出了另一个傀儡——张作霖这张牌。张参加了倒段运动。安福系战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上台执政。这个政府同样是封建军阀的一个工具。美英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加强了，日本的影响削弱了。

新政府应予解决的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是否继续参加武装干涉苏俄。

远东共和国的人民革命军部队和游击队已越来越迅速地向东方推进。美、英、法面临干涉的彻底失败，为了免于自己军队的全面溃败，被迫将部队撤出了西伯利亚和远东。日军则急速向东撤退。

中国出兵参加干涉给中国军阀招来了许多麻烦。国内居民日益坚决要求停止武装干涉苏俄并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派往俄国的中国士兵也厌恶武装干涉。他们受到革命化的影响，变得

①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490，卷夹22，案卷28，第207张。

② 同上，第214张。

③ 同上，第206张。

“不可靠”了。例如，中国炮舰在日军进攻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特里亚皮岑部队时不予援助。日本人甚至断言，好象中国炮手向日本街区开了炮，从而帮了特里亚皮岑部队的忙。日本政府因此而于1920年7月31日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协同日本官员仔细调查该事。^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阀便决定从苏维埃远东撤回自己的军队。1920年8月，北京政府宣布退出它与日本签定的反对苏俄的《共同防敌协定》。^②

此后，北京政府便表示同意接纳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但又非正式地向法国公使保证：政治问题将不是谈判的主题。^③

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于1920年8月21日^④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中包括有A·Φ·阿格辽夫，任И·Л·优林的副手。阿格辽夫虽然已经在中国三个月了，但就是没能与中国当局着手谈判。

优林代表团坚持要北京政府与已不能代表俄国政府和人民的旧俄使领断绝关系。这一次北京政府认真地对待了这项要求，因为它也开始明白，资产阶级政府在俄国重掌政权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尚未拿定主意承认苏俄和远东共和国。

远东共和国代表团提交了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全权证书。北京当局要海参崴、阿穆尔、外贝加尔各政府的全权证书。为此，交涉一直进行到11月份。

中国军事外交使团赴苏俄

张斯麐军事外交使团9月5日抵达莫斯科，同时开始了谈判。当使团还在途中时，外交团并没有忘记警告北京政府，反对

① 见《外交人民委员部公告》1920年第33号第46页。

② 见《消息报》1920年8月22日。

③ 亨利·诺顿，《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伦敦1923年版，第148页。

④ 应为28日。——译者

它与苏俄达成协议。驻京的白俄使团在致中国外交部的节略中，^①提请中国不要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报道。它指出，苏维埃政府目前尚未为全俄国所承认，似乎无权废除旧约。法国使馆也向北京政府做了类似的声明。

至今历史文献中还流行一种说法，似乎张斯麐使团曾奉派与苏俄签订一项协定，但列强的干涉阻挠了这项签订。

张斯麐未得到本国政府授权缔结关于苏中两国正式关系的协定，这在给他的指示中已清楚阐明。段祺瑞在张斯麐从中国动身前向他发出的电报中指出，只有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外获得充分信任”时，才能同苏俄发生正式关系。

张斯麐奉派了解苏俄的情况和以1919年苏俄宣言为基础进行非正式谈判的途径，弄清苏俄政府的真实意图，从而为未来的谈判打下基础。^②1920年7月23日张斯麐接到北京来电，电中指出，鉴于中俄之间密切接触的意义重大，又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地位已经巩固，必须尽快熟悉（苏俄的）情况。建议使团着手与苏维埃政府就与两国愿望有关的问题进行交涉。^③然而，即使这份电报也没有关于缔结正式协定的指示。

由于未下决心不经列强同意而与苏俄开始关系正常化，那时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关系的北京政府，不了解苏俄带来的那种新的关系，担心苏维埃政府不会重新考虑和放弃他们曾向中国提出的那些建议。同时，中国政府也想顺便查验一下列强究竟对中苏谈判持何种态度。

当莫斯科得知前往莫斯科的中国军事外交使团已抵达上乌金斯克时，Г·В·契切林于6月8日询问中国外交部，张斯麐使团是否真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团。契切林宣称，苏俄政府将高

^①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4c，卷夹151，案卷51392，第16张。

^② 同上，第14张。

兴地接待使团，并准备同样派遣相应的使团前往北京。^①

尽管没有收到北京的答复，张斯麐使团在莫斯科还是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莫斯科为使团创造了一切条件，以使它能充分了解苏俄的情况。给使团配有仪仗队、由31人组成的警卫队，还有一些临时派去协助工作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员。给使团提供了一所专用的房子，并发给了去克里姆林宫的长期通行证。当使团需要两辆汽车而外交人民委员部又没有时，外交人民委员部就请求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使团拨汽车。给张斯麐的汽车发给了他享有治外法权的证明书。

张斯麐受到了苏维埃政府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接见。使团首领对苏俄人民的生活、苏维埃国家机构和苏俄政府的政策表示了巨大的兴趣。他表现出朴实和善意。

使团去了一次彼得格勒，一名使团成员李祖羲^②还去了乌克兰。

还向使团成员馈赠了装订华美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家的选集。^③

给予使团如此热情的接待，表现了苏维埃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敬意和好感，以及愿与中国人民建立起友好的兄弟关系的渴望。

远东共和国使团在北京的交涉和张斯麐使团在莫斯科的交涉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北京政府停止承认沙皇政府的使领。1920年9月18日，北京政府曾建议沙俄使领停止活动。沙皇外交官们拒绝服从。

1920年9月23日，中国大总统颁布命令说，近年来，俄国战团林立，统一民意之政府似乎迄未组成，因此目前恢复中俄之间

① 同上，第10张。

② 音译。——译者

③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a，卷夹2，案卷5，第1—67张。

的正常外交关系尚属困难。大总统令指出，前由俄国派来中国的使领等官，已无由继续履行负责之任务。大总统令宣布停止承认旧俄使领。大总统令还强调指出，中国希望对俄国内部政争保持中立，中国政府念及中俄两国地理接近，睦谊久远，将继续友好地对待俄国人民，一如既往。^①

9月24日，中国当局将所有沙皇政府的租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俄国在华事务由一个专门成立的俄事特别委员会承办。俄国人的治外法权被废除了，旧俄的边区法庭被解散了，所有俄国案件均由中国法庭审理。

白党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府的决定极端仇视。列强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一步骤威胁了它们的在华特权。

库达摄夫9月24日向中国外交部递送一份抗议照会。他要求依据事实上完全有效的现行俄中条约，保护俄国在华公民及其财产。库达摄夫将照会副本送交外交使团首领。^②

所谓弗兰格尔政府也表示了抗议。它宣称自己是俄国临时政府、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政府和邓尼金将军政府的继承者，其使领迄今在中国仍被认为是俄国利益的唯一代表，并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故足以使中国政府改变立场。

列强在华代表也叫嚷起来。《字林西报》写道：“无论是外交部的郑重声明，还是甜言蜜语的总统命令书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任何外国人都没有处于中国官员及其同胞的‘保护’之下。这种保护不仅不合乎治外法权，而且还是对这些权利的粗暴侵犯。如果不迅速击退对在华俄人的这种攻击，不充分保障他们的治外法权，其他列强很快就会为其目光短浅而惋惜。如果对中方的这种侵犯行为不予置答，那么什么条约都不能得到保全。”^③

① 《中国年鉴1921—1922》，第626页。

② 同上，第626—627页。

③ 魏良声，《俄中外交关系》，上海1928年版，第263—264页。

外交使团和各外国机构的抗议纷纷飞向中国外交部。美国代表提出了国际共管俄国租界的建议。中国外交部援引中国必要时将收回这些租界来予以反驳。^①

美国总统威尔逊警告北京政府说，停止承认沙俄外交官可能失去列强的对华友谊。他对这一措施提出警告。^②

1920年10月11日，外交使团要求证实，中国政府的措施不是要永远取消俄人按约在中国所享之地位，应当视之为临时的措施，并应得到今后经正式承认的俄国政府的同意。外交使团建议，中国政府与外交使团商定一项管理俄人在华利益的办法。^③

中国外交部在1920年10月22日的照会中宣称，9月23日的大总统令丝毫也不意味着搅乱中俄条约关系。照会强调，俄国公民仍可享受由条约所赋予的权利，但是中国政府要暂时承担管理行政事务的责任。照会进一步指出，俄国政府的财产也将由中国当局照管，至可承认俄政府之时而止。沙俄各领事馆不能再行使裁判权，但如中国法庭审理俄国人案件时，可以引用俄律，以不与中国法律相抵触为度。^④

驻北京的外交使团首领们认为这一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要求在俄国租界内保留俄国警察；由原先的法庭审理俄国人的案件，俄人、华人之间的冲突由混合法庭审理；在有大量俄国人侨居之各地方，于中国外交交涉员公署内设置俄国顾问，实施行政职能；最后，要求在中国外交部内设立由俄国顾问组成的专门的俄务总局。^⑤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冗长的照会中，客气地谢绝了所有这些建

① 《字林西报》，1920年9月30日。

② K·M·潘尼迦，《亚洲和西方的统治势力》，伦敦1954年版，第252页。

③ 《中国年鉴1921—1922》，第629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631页。

议。①

这样，虽然苏维埃政府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北京政府还是没有采纳苏俄的建议，而且还不得不向外交使团解释他们所采取的那些措施，该等措施不仅从它的方面说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仅仅是畏怯地企图得到中国完全应得到的权利。

北京政府与旧俄使领关系的断绝，排除了通向苏中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

苏俄政府力求尽量利用停留在莫斯科的中国使团，以便阐明苏俄对华政策和达成建立两国间友好关系的协议。9月27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将一份照会托交给张斯馨，其中列举了过去几次会谈过程中苏维埃政府所表示的关于对华关系正常化途径的想法。

照会指出，苏俄政府获悉中国政府已经接到1919年7月25日的宣言，中国国民各个不同的阶层和团体皆表示，真诚希望政府开始就建立中国和苏俄之间的友好关系之事进行磋商。苏俄政府表示，对由张斯馨将军率领的中国使团来到莫斯科甚为高兴，并希望通过与代表直接磋商以互相了解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苏维埃政府深信，俄中两国人民为谋求其共同利益，并不存在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照会说：“俄中人民的仇敌现正竭力阻碍我们友好和亲近。他们知道，如若我两大国民友好互助，将使中国强盛起来，那时任何外国人都不能再象今天这样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

张斯馨使团已能确信苏俄政府对中国的真诚友好态度，但是该代表团至今尚未得有使两国人民正式结成友好关系的适当训令，照会对此表示遗憾。由于两国的接近迟迟不前，致使双方政治上和贸易上的重要利益不能得到实现。

外交人民委员部声明：苏维埃政府将坚决遵守1919年7月25

① 同上，第632—635页。

日宣言所阐明的各项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缔结中俄友好协定。

为了发展1919年7月25日宣言，苏维埃政府提议，根据下列条件缔结苏中协定：

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凶恶地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2. 两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即建立经常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双方并遵照最惠国的原则，另行缔结有关这方面的专门条约。

如果注意到中国的关税掌握在列强手中的话，这一款的重要性就不难理解了。根据不平等条约，运入中国的外国货物只课以极少的关税，没有列强的同意，中国不能变换关税税率。苏俄政府所提贸易条件的出发点是承认完全平等和尊重中国的主权。

3. 中国政府担保不给俄国反革命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以任何支持，不准他们在中国境内活动；对留在中国境内的反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其盟国的军队和组织解除武装，加以拘留，并引渡给苏俄政府。

苏俄政府认为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不但会加强苏俄的安全，也将巩固中国的安全。

苏俄政府对于那些对中华民国进行叛乱斗争的个人和组织，亦承担同样的义务。

4. 凡居住在中国的苏俄公民均应服从中国的法律，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权。居住在俄国的中国公民均应服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现行的一切法律和规定。

可见，苏俄政府再次强调了愿在充分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意向。

5. 中国政府应立即与过去沙皇的外交代表和领事代表断绝

往来，把他们驱逐出中国国境；并且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的使领馆舍及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①

6. 苏俄政府放弃“义和团”赔款，条件是中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将此款付给非法提出此项要求的旧俄领事或任何其他个人和团体。

所以不得不提出这一条件，是因为赔款的颇大部分已被北京政府付给白匪，也就是说这部分赔款已被用以援助反苏活动。

7. 两国签订条约以后，立即办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

正常外交关系的建立将结束那种具有1万公里长共同边界的两个大国不建立正常关系的反常状态。互设使领馆会使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易于解决，也将建立一个渠道，以开展互利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8. 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参加。

照会还指出，两国代表还应当在专门协定中调整贸易、边界、铁路、关税和其他问题上的关系。苏维埃政府再次声明，将采取一切措施以建立两国之间最亲密和最诚挚的友谊，希望中国政府也具有同样的诚意，并立即提出对案，以便尽快缔结友好条约。^②

苏维埃政府在提议缔结此条约的同时还想建立苏中友好同盟。这一思想在1920年9月2日照会的附函中尤为明确。附函中表示，希望张斯麐设法尽快实现我们的主要任务——订立两大共

^① 虽然北京政府已同旧俄使领馆断绝了关系，但库达摄夫和其他沙俄外交官仍滞留中国，从事反苏活动。外交团也插手干预折旧使馆的财产。

^②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卷夹1，案卷9，第3—5张。

和国亲密同盟。^①

关于苏中结盟问题早在革命后的初年就已直接提出，这是苏维埃政府政治原则性的一个明显的实例，是对华政策一贯性的例证。

缔结平等协定，尤其是建立苏俄与中国的同盟，就会给整个不平等条约制度以严重的打击，会促进中国的解放。中国人民会由此获取重要利益。同中国建立关系也就扩大了苏俄的对外关系，加强了苏俄的国际地位。苏俄也会由此获得许多利益。这两者都是帝国主义列强所不希望的，它们还害怕由此可能建立起反帝战线。它们视苏俄的对华政策是直接的挑战。^②

北京政府对苏俄的提议是感兴趣的，但它没有勇气走在列强之前同苏俄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9月28日张斯馨收到北京要他归国的命令。10月1日他给外交人民委员部送来一封信。信中指出，使团已充分了解苏俄的政治、经济情况。它应当说服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要相信外国报刊在中国使劲坚持的挑拨性传闻。张斯馨强调指出，使团返回祖国即是为此。^③

北京政府的不一贯性及其依赖性尤其表现于：它一方面同苏维埃政府谈判，同时，又与帝国主义作新的反苏交易。

1920年，由于美、英、法从西伯利亚撤军，中东路正式转入中国当局控制之下。中国总统发布命令说，中东铁路接归自己负责，并将实现对铁路管理局的控制。^④俄亚银行反对这一决定。因此，中国政府于1920年10月2日同俄亚银行签订了所谓续订合同，法国政府企图利用俄亚银行使自己对中东铁路的要求合法

① 同上，第6张。

② 《1917年以来的美国对俄政策》，纽约1928年版，第271页。

③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4C，卷夹151，案卷51392，第34—35张。

④ 《远东评论》，1920年第11期，第605页。

化。①该合同是敌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行为。因为中东铁路是属于俄国而不是属于俄亚银行，中东铁路协定只能由苏维埃政府或以它的名义才能签订。

无论怎样反常，北京政府毕竟签订了这个协定，给与它的中东铁路的那部分权利大成问题，这时，苏俄政府已表示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和建立对铁路的共同管理。连北京政府的前外交官吴鹰宸都注意到了这一情况的反常。他承认，北京政府没有按苏俄政府的建议处理中东铁路的事，反而先让该路落入国际组织手中，更可笑的是，竟与第三方——俄亚银行签订了协定。②

因为张斯摩不急着离开莫斯科，帝国主义列强怕他还会同苏俄政府签订协定，便对北京当局施加压力，以早些从苏俄召回使团。如美国在十月份向北京政府数致恫嚇信，要求从莫斯科召回中国使团。法国驻京公使提醒道：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保护关税税率的保护之下，“为了中国的利益”，他建议停止谈判。

1920年10月18日北京政府通过苏俄驻伦敦代表И·Б·克拉辛转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它要召回张斯摩，因为他没有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全权。

10月31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们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Г·Б·契切林表示，虽然俄国和中国的道路现在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即摆脱外来势力对两国人民内外事务的干预。张斯摩指出，关于中俄亲近的口号日益获得巨大胜利。

① 在续订合同的开头部分，中国政府通知俄亚银行，声明中国政府决定暂时代替俄国政府执行上述铁路合同及现行章程之所有各项职权，并享用那些特权和社会利益，此项代执行之期限到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俄国政府并商定该路办法后为止。

根据合同第1款，中东铁路公司应向中国政府付清铁路之债券，其数等于公司总债务。第2、3、4、5款详细审核了铁路的管理问题。根据第6款，北京政府有权随时向公司发布命令，采取措施限制公司的活动。

所有1896年合同的条款及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凡与1920年10月2日合同不相抵触者，均为有效。（魏良声，前引书，第238页。）

② K·吴鹰宸：《中国与苏联》，伦敦1950年版，第137页。

他相信，苏维埃政权所宣布的真理和正义的原则不会消失，迟早会取得胜利的。^①

在离开莫斯科前，1920年11月2日，张斯麐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列宁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是认识和亲近苏维埃共和国的步骤。他深信，这一联系将得到巩固，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团结一致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行斗争。^②

为使张斯麐使团能方便地回归中国，给使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使团派了一辆专列，车厢里都有防寒设备。使团成员们还得到了防寒的衣服。И·М·伊热夫斯基医生一路护送使团。^③

11月29日张斯麐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拍了一份电报，转达了诚挚的祝愿，对苏俄的殷勤接待表示深深的感谢。^④

1920年12月13日，张斯麐在到达满洲里车站的那天同瞿秋白的谈话中，对他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受到的接待作了热情洋溢的反应。他说，恢复中俄邦交大有希望，但北京政府害怕这样做。张斯麐说：“莫斯科俄政府极意要和中国联络，早已宣言废弃旧约，归还一切权利，但政府不授我全权，因此我没有能把事情进行到底”。^⑤

张斯麐回到北京后遭到了帝国主义报刊的攻击。日本《日日新闻》断言俄中已缔结了秘密条约，根据条约，苏俄似乎获得了在中国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自由。

这是粗暴的捏造。张斯麐在莫斯科没有订立任何一个协定。但也应当看到，军事外交使团来莫斯科一趟不是没有成效。

① 见《消息报》1920年11月9日。

② 同上。

③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а，目录4，卷夹2，案卷5，第35、38、40张。

④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4C，卷夹151，案卷51392，第40张。

⑤ 《瞿秋白文选》，第1卷，北京1954年版，第56页。

还在同使团谈判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就表示，希望在莫斯科有中国的常驻代表。10月12日张斯麐知照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将向莫斯科、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派驻总领事。^①在张斯麐离开之后不久，陈广平以总领事的身份到达莫斯科，朱绍阳被派任驻伊尔库次克领事，驻鄂木斯克的是范其光。

外交人民委员部在10月16日致张斯麐的信中，对中国派驻常任代表表示真诚满意，并强调指出，他们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逗留有利于两国人民间友谊的建立，有益于两个共和国之间政治、经济和商业的相互联系。同时苏维埃政府也表示，要求以相互权利的原则向北京派驻外交代表，向天津、上海、广州派驻领事。^②

张斯麐将这一愿望通报了北京政府。

由于北京未予回复，外交人民委员部1920年10月27日致电中国外交部，通报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打算派遣代表的决定。^③1920年11月外交部通知，在中国未承认苏维埃政府以前，它不能接受委任驻华的领事代表为这样的官方人士。^④

1921年2月3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陈广平声明，只有在相互方式的情况下才能承认他的总领事身份。^⑤

虽然北京政府尚未决定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正式关系，但两国间事实上的关系已经开始。

远东共和国与中国谈判的拖延

苏维埃政府并未停止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认为这件

①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a，卷夹1，案卷9，第7张。

② 同上，第8张。

③ 同上，第11张。

④ 同上，第12张。

⑤ 同上，第17张。

事意义很大，寄希望于在北京继续进行的远东共和国与中国的谈判的顺利结束。

远东共和国代表团提议缔结通商条约并提出了草案。草案包括这些重要的条款：如废除俄国特权，相互承认，互相尊重主权，互惠平等，建立使领关系等等。^①

И·Л·优林同外交总长颜惠庆和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中东铁路的会谈，提议根据1919年和1920年苏俄宣言解决中东路问题。他说，中东路问题只涉及俄国人和中国人，因此，应该反对外人的影响，不管其来自某大国或是某个银行团。И·Л·优林声称，中东路问题可以根据共同占有的原则解决，或者在中国给以某些保证的条件下转交给中国，北京当局承认中东铁路是用俄国人民的经费建造的，但却冷淡地对待俄方关于共同使用铁路的提议。^②

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于1920年11月照会北京政府，通报了西伯利亚的顺利解放，并使之确信苏俄想同中国以公正的方式建立联系。北京政府提出了就缔结通商协定进行谈判的四项先决条件：^③①代表团不应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②远东共和国应当赔偿中国商人因俄国革命而遭受的损失；③远东共和国应当保护侨居俄国的中国公民的权利和取消限制性规定；④应当立刻解决某些事件，并采取措施，使今后不再发生。^④

所提要求看来如同哀的美敦书，但远东共和国代表团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以求尽快建立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1920年11月2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电告华盛顿，其中特别说到：“中国政府大概将开始谈判…颜（外交总长——贾丕才）问美国政府中国应该怎样做”。^④

①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卷夹3，案卷18，第40—41张。

②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卷夹2，案卷11，第6—7张。

③ 诺顿：前引书，第150页。

④ 《美国外交文书：中国》，1920年，第779页。

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美国政府反对中苏谈判。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和驻英公使顾维钧在各自的电报中援引他们派驻国政府的态度，都主张不急于开始谈判。^①

1920年12月3日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递交了一份声明，指出远东共和国力求与所有国家接近，首先是想同中国加强友好联系，中俄的深厚情谊和相互尊敬的紧密关系已逾百年。代表团再次提议从根本上修订俄中之间的条约，以便废除那些带有帝国主义勒索痕迹的东西，不论是与帝国主义暴力有关的也好，还是损害了民族尊严，破坏了不可剥夺的国家特权的也好，概应取消，其中包括废除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条款。代表团认为，必须互设领事馆，签订协定，使双方在中东路的利益、权利和义务于相互公正的原则下得到保证；同时探寻新的水陆路，以活跃商业流通，并解决运输政策、关税政策和税率政策等问题。代表团希望，大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以及远东共和国均对两国之间尽快建立相互关系的问题发生兴趣。^②

北京政府要求远东共和国“证明其诚意”。它提出了一份要求单，要求立即予以满足。^③北京当局竟然放肆地命令警察不许代表团成员进入安排给代表团的住地。^④

然而，远东共和国还是设法成功地解决了一些问题。1921年3月7日，在满洲里签订了远东共和国政府和齐齐哈尔省政府之间关于边界交通和铁路行车办法的协定。协定中包括一条非常重要的条款，中国当局不得协助反对远东共和国现政权之俄人。同一天，即3月7日，还拟定并批准了中东路与赤塔铁路之间通车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6月1日，第238页。（原文如此——译者）。

②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4c，目录1，案卷70，第258—261张。

③ 诺顿：前引书，第150页。

④ 同上。

条款，于3月8日恢复运行。^①

中国当局不想再向前进展下去。它们利用所谓蒙古问题来拖延谈判。

(原载M·C·贾丕才著：《苏中关系》，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社

1958年版，第46—64页。)

谄媚溥仪。

溥仪自赴津后，偕其妻妾蛰居张园，而左右犹百计以媚之。近有天津某西报为推广销路计，举行汽车夺标，在报上刊登选票，使阅者投票，以得票最多者得彩。在津之清室旧臣于是乃大购彼报，剪票书投溥仪之名。问其意并欲尽购报纸，俾不落他人之手，务使溥仪以得此汽车而后已云。

《国闻周报》

^①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卷夹2，案卷10，第1—4张。

周学熙家语卷下

郝庆元 林纯业 整理

编者按：周学熙家语，在本刊总77号已刊出卷上，本文为其续篇。

与七、九弟^①三则

近读师古堂课，卷内附来七弟诤诫子侄书，老成之言，使子侄辈果能领会而切记之，不特进学，亦且惜福，于此可观家运矣。椿侄^②又殁去，可为痛惜。兄近思吾家子弟多习于“傲”与“惰”二字，所以然者，由于门第高、世风恶，而其受病之根，在无名师益友。因忆洪自诚先生语云：“门无国士，家虽大必败；座有嘉宾，家虽微必兴”。故晋公子从游有三贤士，识者必其成霸功；宋寿王门下有三大才，相者必其居帝位。然则缙绅之家、富厚之室，无高人胜士以为入幕之宾，乃徒与宵人媚子相与阿比。吾恐门无桃李之荫，室有蒺藜之殃矣。痛哉言乎！盖门第既高，所往来者皆谄谀而谀之人，所接近者皆颐指气使之辈，老人视之不介意，而子弟习之乃不觉，骄气、惰气潜滋暗长于无形，久而久之，病入膏肓。愚鲁者等于豚犬，聪颖者或更流为梟獍，其贾祸亡身，此而怨世风之恶。然贫寒之家，何以无此患，纵有不肖子弟，不过害人而已，不若世家子弟，未能害人先害自家之祸为烈也。今欲挽救，惟有亟访名师。古人所谓经师、人师者，置之幕席，礼以上宾，使朝夕受薰陶之益，或者能补救一

① 学渊，字立之，生于1877年；学辉，字实之，生于1882年。

② 明椿，字映堂。学辉之四子，1908年生。

二分。不知弟意中曾有此选否？总以笃守程朱而博通经史者为合格，若仅仅词章擅长，非所宜也。再，兄思倘有此人，不特子弟得益，吾兄弟亦得有闻过之处。索居丛过久矣，倘获此益友，亦大乐事。若精力强，而岁月间或商订编辑古书，以资消遣，尤可乐也。吾弟以为何如？〔己巳（1929年）一〕。

前得七弟来书，痛论今日子弟之不可不读书。此徵之古人，不啻千言万语。曾记纪大奎《孙义堂家训》有一段云：“先辈谓人家，读书种子决不可断了。盖礼义从读书中出，若断了书种，便渐渐亡了礼义，成甚人家！故子弟若非十分下愚，总宜努力读书，果能专心努力，何患读书不成”等语。而张文端《聪训斋语》尤反复言之，盖人一日不读书，则语尽无味，面目可憎；子弟一日不读书，则放僻邪侈，日趋下流，一般便辟、善柔、便佞诸损友不招而自来耳。与之亲密陷溺而不觉其非，迨丧身亡家，悔之晚矣。今日世风，道德沦丧，异说争鸣，子弟趋向罔识邪正，往往醉心新潮，自堕坑堑，此宜早为之计，示以方针。昨见聂云台所著《人生指津》一书最为切实，乃其《家庭月刊》中所摘录，洵为意美法良。兹拟师其意，为《师古堂月刊》延品端学粹一人为总编辑，听子弟各认一门或数门，附以奖励章程。目前，各房子弟尚不乏英俊，可以驱〔驱〕之使人正轨，倘及此不图，将日沦于时髦而不可救药矣。惟亟须访得一名师，即可着手，望吾弟速为物色之。北平宿儒曷一访之，须品端而读书多者，勿仅能词章是幸。〔丙子（1936年）二〕。

昨七弟有长函论教育事，仍主张津贴入大学、出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可强同。但非有五十万基金不能作大学之津贴，非有百万之基金不能作出洋之津贴，此犹就少数言之。若支下子孙多，此房入大学、出洋，彼房自必援例，恐此基金尚不能

普及。天下事言之易，行之难。兄近数十年来，枯竭无源，捉襟见肘，连年救灾济贫及种种小公益，皆东挪西凑，勉强支持，至今已无经久之策，不敢再发弘愿。因念风烛残年，所以守先待后之事，祇望子孙能守家风，读遗书，安贫守分而已，不敢望子孙富贵利达，趋时进取。古云：“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故汲汲仅就目前力所能，为之办补习斋，以端蒙养正趋向。即曩日所期自办小学、中学，今因无款亦不敢提议，姑俟之异日，安能再顾及大学、出洋。若谓不妨，姑悬此格，定入章程，以待后日各房之有力者。窃思各房子孙日见蕃衍，生计日见艰难，即求如今日之暖衣饱食已不容易，安有余力捐入祠堂作大众大学、出洋之资？此等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耳。不但此也，支祠既有此章程，将来子孙必有执以责难，或竟议及削减慈善事业及修缮祠墓等费，而为个人大学、出洋之津贴者。此虽过虑，然防微杜渐，不可不慎之于始。未知吾弟以为然否？现兄拟明年在北平试办补习一所，招亲友中子弟，以十名为额，需款无多，兄可勉筹，不必动祠款，亦毋庸立议案。兄在世一日，行一日慈善，此与历年刻书之志愿同一。放赈盖衣穀为身赈，义理为心赈也。至各房子孙教育之事，听各房父兄自为计，非老朽所能代谋矣。〔丙子（1936年）三〕。

谕众子侄十九则

天津地方从前俭朴，人尚诚实，近年风俗趋于奢侈，人心趋于险诈，子孙非可久居。小之则受人欺侮，大之则同罹浩劫，此可依天心人事而预知者也。是宜及早另择人情醇朴地方卜居，使子孙无才尚可守门户，有才亦不为人所忌刻。今环顾宇内，兵戈满地，竟无容足之所，其交通便、秩序安，而人情尚存古道，不

失浑朴气象者，惟有金州^①。虽嗣后潮流所趋，不敢必其不日趋浮薄，然礼乐从先进，究较他处习染稍缓。盖观其四境山峰，皆尊严端正，且稽其历史，代尚节义，殆山川鍾毓使然。不过数千年来，往往战征必经之地，人民不免常受痛苦。然今非昔，一则天地精华积久，今始发洩，必有数十百年之旺运；二则水陆交通，易攻难守，纵经战事，人民趋避较易，不至如从前之坐受涂炭。故再三思量比较，虽不能遽定久远计，而目前安居实无他处可以胜之。至寄居谋生之道，当以农业为本，如果园、稻田、森林，皆为利不薄。商业中除抛空倒把投机之事不做外，凡实在粮石及市房等事，谨慎经营，不贪大利，并无失败；但子孙须守分择交，勿贪勿滥为要。若贪与滥，妄交匪人，则无论居何处、办何事，断无不败者也。我已衰老，百事消极，惟念恇慎公^②支下子孙众多，大半寄居天津，此亦因我从前在津日久，稍有事业所致。然所谓事业者，今已云烟过眼，所存而不能去者，虚声耳，富名耳，徒招一般小人之忌而已。各房子孙若仍以从前之观念，久居天津，不营事业无以为生，稍营事业则适以供奸人之侵轧。而况子弟耳目所习，皆骄奢淫逸之事，门庭所接者，多奸巧诡诈之徒，焉得而不失败。迨时移势落，向之趋承恐后，转瞬即为落井下石矣，将呼吁之无门，欲营救而无路，其不至飘零流落者鲜矣。言念及此，能无寒心？现在祥五、明夔^③已发其端，可为殷鉴。固由自己之贪与滥，而亦由于地方人情风俗之不良，且受久居富名之为累。故一般奸诈之徒群肆包围，子弟胸中无圣贤书理，立身择友无把握，鲜有不堕其术中者。若移居偏僻地方，匿迹销声，力持勤俭，自家无所恃，旁人无所谋，勿贪大利，勿广交游，勿逞豪富，专以闭户读书、课农为业。放翁诗云：“得福常

① 今陕西省安康。其辖境相当今陕西石泉以东、旬阳以西的汉水流域。

② 即周馥的谥号。

③ 祥五是周学熙长兄学海之五子，1896年生；明夔是周学熙之三子，1899年生。

廉祸自轻，坦然无愧亦无惊。”此之谓也。宜速图之。〔丁卯(1927年)一〕。

志成事，论理本无补助之可言。一、祥五系独资，有红账可凭；二、祥五自幼即分家独立，与弟兄、伯叔无干；三、债权人无端诬告亲族，行同敲诈。具以上三因，若言补助未免失情理之平。然有不能不从权者，一、先慈慎公数十年清高门第，不可留此缺点；二、祥五尚青年，破产以后何以见人；三、仙洲^①盛谊，极力顾全我家门第，此情不可拂依。以上三因，若迳推脱不理，人将谓我周氏无人。故权轻重，吃亏在一时，而上顾先人，下顾子孙，不得不忍痛委曲求全。虽如此，巨款本无力可办，而信义所关，只得举债以应，俾得早日了此一段公案。但望祥五痛自悔过，从此安分读书，并望各弟兄均引以为戒，大家谨慎，勿再贪心妄为，庶不负此一番之挫折；否则，门第堕落，人人得而揶揄，事事得而欺轧，恐大家从此无宁日矣。〔戊辰(1928年)二〕。

孔子曰：“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故子以文行忠信设教，而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汉以前，读书、通经、致用，重在明理、敦品，其次亦熟于故事，或擅词令，仍不外乎孔门四科。德性、言语、故事、文学得其一，皆足以命世。而贫者，士之常，要在忍穷安命，其饥而死者未之闻也。文人无行，浮妄而招祸丧生者，有之矣。今日时代，科举既废，科学继兴，虽曰谋生有易于科举，而其流弊亦甚于科举。盖为科举业者，朝夕浸润于经史性理之书，科学乃朝夕浸润于权利竞争之术，非人有夙性、家有厚泽者，鲜不流为匪僻市侩。近年来所见所闻东

^① 龚心湛(1871—1943)，字仙舟，亦作仙洲。安徽合肥人。1919年任财政总长及代国务总理，后任启新经理。

西洋毕业及本国文武专门人才，可谓一时济济，而丧身败家，祸国殃民者不一而足。吾家子弟，幸而入学堂晚，受毒未深，否则，今日民国史上所谓激烈派者，恐亦有厕列其中矣。我思自同光以来，南北学堂注重汉文者，只有福建船政学堂一处，其学生无一不通汉文，且有博通经史者，其洋文亦复优长。数十年来，虽无经天纬地之人物，而犯上作乱、掀天翻地者亦少，未始非汉文书卷稍读之益。今日为子弟计，固不能不入学堂，而惟其要入学堂，更必须于未入学堂之先，将汉文功课加紧，注重性理、文章两门，其先有根底。此种功课须为之选定书籍，拟定教授方法，务令简而要，不在乎泛而博。前次七叔所拟书单，微嫌太多，可加以讨论审择，列入支祠议案，分发各房照行，将来即以此课程之优劣为津贴入堂学费之多寡，其不依祠章功课者，虽贫，不贴学费。至师古堂月课、书课及著书课，皆为附属之事，仅以补助功课，而非为主课也。〔庚午（1930年）三〕。

仲才侄如晤。日前闻尔言：吉如叔祖将妾在草谱写继妻字样。此事将来修正谱时，必须更正。姑无论其妾生子在先，正妻生子在后，兄弟之间名不正、言不顺，必起纠纷，即按以妾为妻，已属乱阶。伏读尚书公^①《负暄闲语》内卷九载：纳妾须明名分、守礼法，若纲纪不正，全家水火，祸且贻于后世，安可以妾夺嫡之名分，此为乱阶，贵之适所以贱之也。煌煌训语，不特本支子孙应遵守，即族中有此等事，亦应根据此训力予纠正。尔当吉如叔祖提议之时，理应来函报告，何得竟含糊附和。此事关系合族家规，岂能听一二人任意变更，此端一开，将来各房子孙效尤，必致骨肉之间祸乱相寻无所底止。兹特明白告尔，即以此信为凭，向族中尊长禀明，务早更正为要。至属，至属。

再，现在新潮流，男女青年有自由结婚者。此事亦应明白规

^① 此系指周馥。

定，虽系自由择配，而曾经禀明父母允许始行结婚者，方准上谱。倘父母过背，亦须先经家长、族长同意方可，否则，个人自由结婚，概不准上谱。泰西各国，虽主张自由择配，而必须父母允许方能结婚，且其结婚必有两家家长为主婚人，致训词，是泰西各国亦无不郑重此事也。尔可禀族长知之。（庚午〔1930年〕四）。

上江学派沿自桐城，其用功之法取迳直，非竭数十年不辍之精力不能有成，而浅尝者往往失之空疏。下江学派沿自阳湖，其用功之法取横贯，得寸则寸，行一日即有一日之效，故初学者往往得以应世。此无他，重古文与重类书之分耳。上江教法，童子入学即孜孜以古文为务，而下江教法，在文法之始必兼重词藻。盖义理可由心通，而词藻必有所本，不可由心杜撰。所以下江童子开笔为文皆有色泽，不似上江之干枯，虽有意而无词以达之也。《幼学琼林》一书，其最便于初学者，是就童子知识所及知之事，而教以所当知之典故、词藻。譬如：日、月、风、云，童子所知也，而告之以阳精、素魄、羊角、丰隆之名；祖、孙、父、子，家庭所习见也，而释之以椿萱、兰桂、乔梓、棣萼之称。此等寻常日用布、帛、菽、粟，若不于类书习之，而俟诸博通经史子集，恐数十年尚有不能尽知者矣。无怪上江学子往往有文气通畅而空疏枯槁，出而问世自渐舛陋。况今日科举既废，读书人应以应世文字为主，岂可貌袭高古而不从事色泽，是自窘之道也。故吾谓今日蒙学须习类书，必自《幼学》始。（壬申〔1932年〕五）。

陆放翁诗云：“日高得米唤儿舂，苦雨园蔬亦阙供。省事家风君看取，半饥半饱过残冬。”又云：“一饭不妨支一日，读书常愧聒比邻。”此如何境界。而生前享大年，身后享大名，无他，勤苦二字而已。放翁祖位至太师，彼岂非世家子耶！须知人不勤苦决难

得年，决难成名，此天理古今不易。其或不然者，倖也。明松月费百元，已为过丰，仍觉不足；栋良有租稻可供食米，又有数元可供薪蔬。此比放翁已富多矣，而读书无多、文理不通，悠悠忽忽终日嬉游，今不知愧奋，乃妄肆于求加增月费，此为无耻、无志。此等子弟决不能姑息。以我辛苦节省之钱，供其游惰挥霍之用，是折其福。揆之天道，恐难永年，更安望其读书明理，学问文章可以传世立名耶。经此番训戒之后，务须力加勤苦，每月用度极力求省，闭户读书，不交一友，避染习气，方不负我之期望也。

〔甲戌（1934年）六〕。

扬州住宅，当日恣慎公手谕归大房^①居住经管。今日之去留，自以大房为决定。北方各房鞭长莫及，难为主张。但我个人有一意见不得不陈者，即恣慎公支下子孙后日久居问题。在南方，岂以上海为安乐窝，即在北方者，亦不能尽以平津为不可移之地。世事率数十年而一变，人事而亦数十年而一更。子孙日见繁衍，将听其萍飘梗泛，一任其各散四方乎？其才命出众者固无处不可，而才懦命乖者，将听其流落无依而飘泊以终乎？故我亟思趁此家运未衰之时，谋一敬宗收族之处，天津祠堂、北平公茔皆为此计。至南方原籍，至德势难归居，此外则安庆、芜湖、南京、苏州、扬州，皆为沿江一水可通之地，若择一可以安居长子孙之所，须以生者可教可养，死者可葬为原则。安庆人情不淳，芜湖太陋，南京当冲。然则江以南惟苏州，江以北惟扬州，以二处农田沃，文风好，山水秀，是于教、养、葬三事皆有可为，宜趁早择定。大凡寄寓一处，必得有二三十年之经营，方能与地方融洽，非可仓卒贸然而去即能安居。究竟苏、扬二处何去何取，此中更颇有研究。主义〔意〕决定之后，然后扬宅之去留可决。至目前扬宅之如何照管，其小焉者也。〔甲戌（1934年）七〕。

① 周学海（1856—1906），周馥之长子。

中国为大陆国，自古重农，三代以上计口授田。战国废阡陌，贫者遂无立锥；而汉魏间，士人读耕并行，渊明、武侯皆躬为之。唐以后，科举取士，以至清末，士人专以词章为职业，以仕进为生计，古意浸失。今日科举已废，仕进又无正轨，故使天下读书人无谋生之路，迫而出于奔走夤缘。聪明之士且激而为犯上作乱，小则丧廉耻，大则灭身家，念之实可寒心。吾支子弟日众，当此百业凋敝，所恃为衣食之源者恐转眼皆空，若不预为之计，将来不堪设想。夫子孙升沈原有数命，然为长上者，不能不与以可守、可进之路。昔邓禹十八子，每人各习一艺，德国皇子，每人必学一枝，此意甚善。今宜师其意，使于读书明理之外，兼习一艺，以为处乱世谋生之备，而农业一途，尤宜注意。华北地土天时最宜棉，而又为东方纺织所必需。可筹办植棉场，并设轧花打包厂，延聘技师，率同子侄分领其事，十年之后必成大宗生计，纵或失败亦无大害，较之经营商业之风险，与夫开设工厂之繁难为稳便多矣。尔等各房宜各量人力、财力，及早筹画，勿待临渴掘井也。〔乙亥(1935年)八〕。

夫人之身乃祖宗之遗传，今日所以视听食息于世间者，皆祖宗之赐也。受其赐，不思所以尊敬之、显扬之，则非人类也。若思所以尊敬之、显扬之，亦惟有祠祭之一事而已。此情理之当为，职分之当尽，无可诿卸。倘虑后日之不能持久，亦惟有妥定规则，视其时其力之所能至而尽心焉耳，安能必其有成无毁。世间万事，成住坏空，佛家所谓时节、因缘，儒家所谓运数，不可避亦不必避。如因其后日之必有废，今日遂一切不为，是不待异日而已先废之矣，是背情理而辜职分矣，于心何安。试思世运盛衰递嬗，天道之常。天不能有夏而无冬，人即不能不夏葛而冬裘，虑裘葛之不能无变易，而一切废弃之，是直禽兽而已。人而为禽兽之行，可乎？况祖宗者，当日之子孙也，子孙者，异日之祖宗

也。祖宗当日只为其当日之所当为，不期有今日而自有今日，则子孙今日只尽其今日之所当尽，亦不必期诸后世而自有后世。天地间有感必有应，不分时节之远近，人不必问其何以应，但问吾何以感，为吾情理之所当为，尽吾职分之所当尽，则感之道得矣。孟子云：“君子创业垂统，可为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强为善而已。若必期于一成而不毁而后为之，则无为之之日。”且试问今日之人，对于祖宗之事率多漠视，而对于本身及其子孙之事，无不汲汲营营为之者，其果能一成而不毁乎？吾见及身而败者，或至子孙不一世而败者多矣，又将何以自解。（丙子（1936年）九）。

值年主祭规则，原定或春、或秋前往一次。叔弢春祭既不能去，可俟秋祭再看，如再不能去，即可派代表前往，此于规则无抵触也。而吾所念念者，仍是南方各房。日前，曾印《祠祭意见书》，分寄美权、仲衡、祥五、仲毅^①，不知彼等有动于中否。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吾见南方每逢清明，苏州、无锡各旅馆皆满住上海洋行做事之人回家上坟，更见乡间虽至愚极贫之人，亦莫不上坟。是此追思祖宗之心，庶民皆有之，君子能独无乎？上海各房不回籍上坟，已二三十年，无他，年长者格于势有不便，年幼者遂习以为然。今各房子弟渐次成立，宜及时规定办法，就沪组织祭扫会，集合各房，拟定规则，筹集基金，每年春秋两季，各房轮值回籍祭扫，即将来在外立有茔墓，亦可一律往祭，便到各处家祠一祭。路程不远，多则十日，小则一星期即可往返，纵有不便，亦可推代表，总胜于无此举也。若照目前情形，各房子弟心中全无此思想，恐一再传后，将不知为谁氏之子孙矣，岂不可叹，数典忘祖，岂不可羞。苏明允《族谱引》云：“分至于途人者，势也。势，吾无如

^① 皆为长房周学海之子。

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无至于忽忘焉，可也。”吾于祭扫会亦云然，故戚戚于怀而不能忘情于南方各房之子弟，更不能不属望于美权为南方各房子孙作一好模样。叔弢其为我转致之。
〔丙子（1936年）十〕。

明松侄：阅前得尔书，请九叔谋赈处事。姑无论其难得，即得亦非尔所能如意。一则，尔身体弱，难胜劳苦，兹事内则执笔握筹，呕心费脑，外则道路跋涉，风雨寒暑，尔自揣能胜之乎？二则，得不偿失。现今风气，各机关皆以交际为生活，薪入有限，苟非营私舞弊，即至公司亏空，尔又能不顾名誉、不顾身家而为之乎？所以，我不以尔出就事为然。尔现有津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果能省俭度日，胜于一般职员多矣。将来但有运气，自有机缘，不必急急。人生食禄，早由命定，顺时安命，纵未得福，亦可免祸。若时时妄想，势必冒险，自投火坑悔已晚矣。我非不以尔生计为念，但我阅历深，看事理透彻，故不愿尔乱动。邯郸学步，未得国能，先失故行。尔能听我言即能有福，若不听我言恐难免祸。至家乡各事，原非定须尔办，但为尔计，此时正好藉此增阅历，养声誉，他日得志，亦有一番把握。是虽退而实进，此中消息尔静思之。〔丙子（1936年）十一〕。

介良订亲，关系老二房家运之兴衰，最为重要。近三十年来，老二房家运中衰，人丁不旺，今幸介良成丁，兼祧两房，为否极泰来之候，必得贤内助以勤俭持家，方可转困为亨。倘娶一浮华女子，则败坏家风，老二房气运难回，后日景象不堪设想矣！愬慎公道德、政治为海内宗仰，青史流光。味西公^①理学名臣，治蜀有声，至今父老犹称颂之。此何等门第，介良应知以笃守家法、谨遵礼教为重，方可仰叨祖宗默佑，家道兴隆，子息蕃

^① 此指学铭，周馥之次子，1859年生。

衍，不难挽老二房之衰运转为鼎盛。此我二十余年所念念不忘于介良之身。今到授室之期，我固留心物色，尔等亦当本我下列所书，加意访求，有合格者先报我知，再加审定。介良此时应专心用功求学，不可沾染习气，与女子交际，荒废正课。须知今日主张自由结婚，转眼离婚，一身受害，全家败落，其不等于绝嗣者几希也。

介良订亲事有三要：一要诗书门第，能守旧礼法人家；二要身体健康，相貌端正，性情温和；三要能知勤俭料理家务，粗通文字。有三忌：一忌时髦人家，有放浪习气；二忌身有暗疾，相貌轻薄，性情浮躁；三忌骄惰奢侈，讲交际，不理家务。〔丙子（1936年）十二〕。

宗子之制今虽不能行，而家长不可无，祠堂所必有，一切收族敬宗之事必有章程。吾乡皖南，风俗近古，各姓多聚族而居，莫不有祠堂，有族长，岁时祭祀，及庆吊吉凶之事，均互相护助，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犹不失古意，此所以老姓皆延长至千数百年者。不似通都大埠，人皆侨寓，势如散沙，各不相问，子孙不久即致流落，不知存亡，良可悯也。昨见嘉良^①《仪礼札记》有宗子一条，感而书此。〔丙子（1936年）十三〕。

今岁丁丑，我年七十有三矣，行将就木，尚有一件耿耿于心，即老三房^②禋祀之事。其中原委甚长，今为大众言之。溯我自幼时，习闻恣慎公谕及，学铭公出继远房本非心愿，只因叶太夫人念其嗣祖父，跪求哀恳，率尔允诺，乃商之吴太夫人，勉顾上人信义，不得已挥泪遣之。其时，学铭公才十余岁，只身南

学熙之孙。

② 此指学涵（1863—1878），周馥之三子，早殇。

去，弱稚零丁，情深恻恻。后又遭学涵公病殇，吴太夫人益切伤痛，谓：“所生四子，二房出继，三房夭折，是只两房矣。”往往言之泪下。幸学铭公早得子，吴太夫人乃商恣慎公同意，将明诒调回，承继三房。一则幸学涵之有后，二则慰学铭之远离，从此，慈怀始得稍舒。不料，明诒授室后，久不得子，吴太夫人在日常以为念，恻恻不乐。今其年已逾五十，尚无一子，且已丧偶，身又多病，势使当日调继之愿全虚。前年，我曾提议，由大房暹^①名下选一子承继明诒。暹已承允，明诒竟昧先人宗祀之重，独以自身奉养为意，要求嗣子即时过门，遂致中止。殊不知今日礼教衰微，不但嗣子难期养老，即亲子亦何曾能养老。所为有子者，不过期于不绝嗣而已。今思此事情形与寻常为个人立继不同，应以继述恣慎公及吴太夫人之志事为重，可由孝友堂支祠大会公议，选定一人为学涵公后，以奉湮祀，即将来明诒继娶得子，亦自无妨并存，但今得早一日使学涵公有后，即早一日得慰恣慎公及吴太夫人在天之灵也。此为孝友堂支下一件重要之事，我不能已于怀，故将原委沥陈，望友祠大会共同讨论，並函明诒尊重考虑，俟下次开会提正式议案决定之。是幸。〔丁丑（1937年）十四〕。

讲课何为而设也？一则，中国五千年文化，自尧、舜以至周孔，道统一脉薪传，皆以伦常性理为宗。汉、唐以后，虽尚辞章，而仍重读经，故至宋有程、朱诸大儒，出而倡明圣学，历元、明、清数百年，所以维持世道，厥功甚伟，此吾儒所当奉为圭臬；二则，吾族祖宗以来，世重诗书，恣慎公尤笃信程朱之学，故崛起建立功业。《负暄闲语》载：“读书以研究道理、身体力行为主。”垂为家教，吾辈孝友堂支下子孙，宜世守之。惟因尔等生在今日，不能不入学堂习新学。其科目太繁，无暇顾及中国经籍，

^① 此为周叔弼，系长房学海之三子。

比如建高楼而不固其基，楼愈高其倾也愈速。故以星期日最短时间，择古圣贤最精要之书，使尔等补习之。马老夫子年高德劭，蓄道德，能文章，惠临讲授，实尔等幸福，务须用心敬听，句句反躬，体帖服膺勿失，庶仰副恇慎公之遗训，而不愧为中国之读书人也。其勿忽诸。〔戊寅（1938年）十五〕。

东坡与兄子明书曰：“老兄嫂围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此语不独见家庭友爱天伦之乐，而且见太平景象人民安乐之愉快。今吾辈生当天下分崩离析之时，四海兵戎扰攘，不特南北道阻，即同居一埠，而市途隔绝，等于拘囚，虽未遭流离颠沛之苦，而风声鹤唳，不知大祸之何时将临，此诚燕巢危幕，后顾茫茫，不堪设想。似宜约各房兄弟子侄，朝夕相见，一则情谊亲而智虑多，二则消息通而见闻广。不必为酒食之会，只于每星期中茶会一次，所费有限，藉清言之玉屑，洗胸中之垒块，亦可抒抑郁而导和平，精神上无形裨益匪浅。可即择定地点，排定日期，规定需费，约定人位，通知后届时惠临，不必临时邀集可也。（己卯〔1939年〕十六）。

今时学校大病在废经。废经则无纲常、蔑礼教，故学生目无尊长，视父兄为路人，甚者，视为仇敌。近年杀父毆兄之事时有所闻，至家庭诉讼，争夺家产更数见不鲜，一若视为当然者；其平日箕帚诟谮之声自不堪问。如此现象，无好家庭，安得有好社会，无好社会，安得有好国家。推原祸始，教育不良为之阶也。吾家仰承祖宗余荫，目前尚无时髦恶习，而子弟渐长，不得不入学堂，深恐幼年根底不深，易随潮流变化，兹特拟订家塾分年课程，使七岁至十五岁未入学堂以前，稍读经书、讲明义理，以为根底，然后入学堂，不致过于走作。庶几常保家风，不忘祖

训，可免将来家庭之祸，此我数年来所念念于怀而不能忽然者也。今将所订章程、课程油印，分寄各房，深望加意采纳为盼。盖其事简而易行，只期依所订课程，得师讲授，家长时加考察而已。虽其功甚微，而子弟青年得知纲常，守礼教，实于此基之，将来受益不浅也。

再，为学之道，择师为要，尊师尤要。为子弟择师，须择敦品行，不特文词可观，而且语言、举动皆足为坊表，使学生亲之、敬之、畏之，而后可以受益，否则，学生视师为平等，纵有名师，亦无从得益。而欲子弟知敬畏师长，必须父兄先尊敬师长，一切礼貌必须加以隆重，勿视今世学堂教员为雇佣性质，使子弟轻视，古所谓尊师重道，有深意也。家运之兴衰，系乎子弟之贤否，其源系乎教育之得失，其见端系乎师道之高下，防微杜渐必自尊师始，此不可不早虑之。吾家自唐咸通中，繇、繁二公以孝友传家，潜德幽光千三百年矣。至恣慎公，又恪守程朱学术，建功立业，显荣光大，为海内所推崇。为子孙者，宜念创业之艰、余荫之厚，谨守家风，勿随潮流为转移，而堕落于恶社会中，玷辱先人，此则吾辈之责也。愿与各房子侄共勉之。〔庚辰（1940年）十七〕。

天津支祠原拟自办中学，今因时势不便，经费不足，无从着手，而各房子弟率入各处学堂，其聪颖者，得搏一文凭，为谋生计；其体弱姿钝者，往往退学在家，一无事事，饱食终日，成为废人，或更养成骄惰，流为匪类。今思所以补救之法，惟有先设国学专院，仿书院办法，聘名师讲授经史、古文、性理诸书，子弟不能入学堂者，在此肄业，不拘年限，以造成读书子弟，居则穷经，出则可资笔墨为生。再附设译学馆，教英文、日文，子弟之聪颖而程度不合入学堂者，于此令习一国文字语言，亦可有谋生之具，此为目前支祠当急之务，事体简单，经费不过巨，宜

速图之。

再，目前子弟已有不能入学堂者，或因体弱不能随校课，或因事阻不能出外就学，今若支祠开办国学专院，子弟各随其性之所近，习一经及古文、性理，再或兼习一外国文字，既可习勤，不至养成骄惰，又可有谋生之路。及今不图，则子弟转眼生齿日繁，年岁日增，老大徒伤，悲叹何及！是则，今日主持支祠者不能无疚心也。再思吾家子弟各自为政，其勤敏者固知发愤，而好逸者无人鞭策，遂不免因循怠惰。大抵青年须有所畏、有所愧，方可成材，不然，则悠悠忽忽，岁月易逝，时过后学，勤苦难成矣。欲救此弊，惟有本支设教育会，举会长专司考校子弟功课成绩，月有校、季有核、岁有奖惩，如此则有所畏、有所愧，中才以下者亦可奋勉，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若麻自麻、蓬自蓬，则不可救药矣。〔庚辰（1940年）十八〕。

中国文学欲其成功，非二三十年功夫不可，然入手须端其趋向，有三五年亦可窥其门径，不致流为浅俗一派。兹举其纲要不可不读之书如下：

- 一、厚其根本，则为《学》、《庸》、《论》、《孟》、《易》、《书》、《诗》、《礼》；
- 二、充其义理，则为《荀》、《管》、《庄》、《老》及宋《五子书》；
- 三、精其义法，则为《左传》、《史记》、《前汉》；
- 四、畅其机势，则为唐宋八家，昌黎、东坡为最；
- 五、富其词藻，则为《昭明文选》。

果得名师讲授，约守而熟读，博观而精思，三年不懈，基础稳固，则以后进功势如破竹矣。（辛巳〔1941年〕十九）。

天津支祠规约五则

一、祀位：

本祠为恇慎公孝友堂支下所公立，南向三龕，正中一龕祠恇慎公暨吴太夫人神位，並追祀秋浦始迁之祖访公，示不忘本也。祀繇公、繁公、泰星公，著文武忠孝之源也。祀文元公、礼俗公、乐鸣公、光德公，明本支之所自也。位皆考妣合主，世代仍沿秋浦宗祀排写，以昭统系。

东西两龕为左昭右穆，分祀支下亡故子侄，其南方不入祀者听。学铭公虽出嗣近支，而遵恇慎公遗训，仍与本支一体。

东序西向一龕，祀支下未婚男殇之十五岁以上者。西序东向一龕，祀支下未嫁女殇之十五岁以上者及支下妾庶之有女者。凡妻妾之不明者、再醮者、离异者、被出者、出身娼优者，即生有子女，亦概不得入祀。凡私生子女、置子女、抱养异姓子女，概不得入祀。其外甥承嗣母舅者，不在此限。

二、祭事：

每岁夏历正月十五日、清明日、冬至日、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上各期，举行同族公祭，凡在津者，少长成集，按辈行序拜位，推辈长齿尊者三人，分三龕主祭，上香、率众行三献，各一跪三叩礼。

祭品：正中三龕，每龕鱼翅全席一桌，酒、茶、饭各三。东西序，每龕菜十碗，酒、茶、饭各三。香烛、楮帛，每龕一份。

祭时，鸣钟鼓、击磬，不作乐，不放鞭爆。

平时朔望及元旦、端午、中秋、除夕，均由值年上茶果供，行一跪三叩礼。

各忌日，由各房子孙自祭，不在此例。

三、掌手：

支下公推支祠事务长一人，支祠董事八人，由祠董中，每年推正、副值年各一人，次年以副为正，接推一副，如此轮流递换。所有祠内平常事件，由值年商承祠长办理；特别重大事件，全体董事公决。每年夏历正月十五日，为闾〔閭〕族大会之期，凡十六岁以上者，均得到会，推齿德俱尊者一人，为临时会长，共同核阅上年帐目，並核议本年预算，正、副值年即日当众交接，如有参差，公同评议，由会长判断之。本祠所有产业，非经大会公决，不得变更。如有特别意外紧急之事，可由祠长召集全体董事，或闾族会议公决之。倘不经议决而擅行，其损失惟祠长与值年负责补偿。

支下每年丁口之生歿、男女之婚嫁及葬地，均报告祠董，每年正月常会当众登录草谱二份，俟秋浦总祠修谱时，以一份赍往，汇入宗谱。

祠内设司事一人，办理会计、信帐、杂务等事；练习生一人，供抄写、收放等事；设夫役二人，供洒扫、奔走等事，均由值年负责商承祠长选用。

祠中所存谱牒、影像、书籍、墨迹、碑版及遗念品、祭器、家具並一切产业要据，均立簿册，分库保存，每库双锁、双钥，祠长与正值年分掌，每年交接时，须当众点验一次。

本祠兼管天津、济南、金陵、安庆、秋浦五处恣慎公专祠修守等事，其章程另订之。

四、教养：

支下子孙，无论贫富，必须读书，谨守恣慎公《负暄闲语》为家法。

祠内附设藏书楼，储存经、史、子集，多为恣慎公批点，益以近时新书之切于实用者。子孙有志，不患无书可读，取阅具有定章，毋得散失。

祠外设义塾，由小学至中学，均以性理、文章、书算三项为

主课，其余辅课，因时制宜。支下子孙八岁以上，皆须就学，有不便就学者，可按其年龄、程度，酌予学费。並附设讲课文课，按月定期会课，以资观摩鼓励。其细则另定之。

支下子孙婚嫁、丧葬贫无力者，由祠酌予津帖。支下子孙节妇、孤老残废无生计者，由祠酌予养贍。

祠外附设公茔，仿上海万国公墓办法，画地为格，坟做洋灰宝顶，不堆土塚，凡无力归葬者，得于此葬之。每年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由祠祭扫。其有自立茔地愿归祠代为照料者，另议条件。

秋浦本支坟墓，每年应轮举二人回籍祭扫，由祠酌发川资，有应修理者，报告开会，公议拨款办法。其自置祭产另有专章者不在此例。

以上诸事之丰啬，每年视款项之盈绌，正月常会时议定之。

五、经费：

本祠产业现不宽裕，每年所入，供给祭祀、修理及值年、员役、夫马、薪火、杂支等项並教养等费，务须节省。每年正月编制预算，由常会公同议决，至少须存十分之三，以备特别之需。

本祠现款，须经董事公议，指定殷实行号，往来存放、支付，均须祠长、值年公同签字。

本祠进出款项，均依夏历登记，有月结，每月由值年呈祠长核阅；有年总，于正月常会时阖族核阅。

支下子孙，嗣后仍须随时捐助，以维久远。每年正月十六日常会时公议，量力照缴，其有愿特别捐助者不在此例。〔乙丑（1925年）〕。

恇慎精舍稿三则

学规：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古来贤圣千言万语，不外淑身淑世，

使无负天，所以生人之义而已。今揭要领列为学规：一、立志；二、居敬；三、穷理；四、克己；五、亲贤；六、爱物。左六事为本舍教人之大纲，其节目则往籍具载，不遑缕举。凡来学者，自青年以至皓首，由韦布以跻显达，能守此训，则为成人，其或背焉，则为不肖，勉哉毋忽。〔丙寅（1926年）一〕。

绪论：

一、本精舍与普通学校性质不同。盖普通学校有定课教授，至本舍则专重自修，不过为牖启、辅助、考核之用，且不限定科目，各随性之所近。故子弟幼者，或入私塾，或入学校；长者，或就职业，入仕途，既不废学问，均可收本舍之益，所利者溥，无偏枯齟齬之病。

二、本精舍与科举时代之书院性质不同。盖官立书院专以文字为主，且只为寒士膏火之计。本舍以实学为主，重在学课、讲课，即文课亦以发挥所学为尚。

三、本精舍须具宋明大儒书院、学会之精神，以尊德性为主。凡肄业诸生，应谨守本舍学规，平日既操存有素，将来涉世，常如安定，门人一望可知。且以是蒸为风气，播为俗尚，庶可以救世道人心之厄。

四、本精舍虽聘掌教主持教务，而尤重在舍生彼此观摩、砥砺、劝善、规恶、质疑、辩难，如先贤学会之意，养成顽廉懦立之性质。

五、古今书籍浩如渊海，本精舍教学既有宗旨，谨择其切近实用者，列为书目举隅，聊以指明趋向，使肄业有所准绳。至高才之士博极群书，是又不以此目为限。

六、曾文正公尝取朱子读书法，“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二语为最要。读古书须深知古人之情，读今书须深知切己之用，则读一句得一句之益，于性理、书史得力尤速。又读古书须将字义、

语气审得的确，故文章训诂之学为入门功夫，必得精熟一书，以为根本也。

七、《礼》曰：“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曰：“拔茅连茹。”故讲学辅仁，非友不就，莅官行事，亦非友不成。本精舍讲课有旁听生，凡以向学而来，在所不拒，其文课、学课亦得兼收本族以外之人。但讲课旁听者，不必认为本舍生，与其进不与其退，若人文课学课，则均属本舍生，宜守本舍学规，以德性、道义相切磋，庶如阳明客座私祝所言，可为讲学论道之友，倘或轶出正轨，行为有亏，宜除名退学，以去害马，勿存姑息。〔丙寅（1926年）二〕。

书日举隅：

此目仅备经史性理，以宗旨纯正、体用兼该者为主，其法律、商学、算学，宜随时选取近著，毋庸固定。

熟读书：《四书》（朱注本）、《五经》（相台本）、《孝经》、《周礼》、《小学》、《古诗源》、《唐诗三百首》、《文选》、《鸣原堂论文》、《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简编》、《史记菁华》。

熟看书：《近思录》、《颜氏家训》、《困学纪闻》、《聪训斋语》、《庭训格言》、《曾文正公家书》、《负暄闲语》、《读史——镜古篇》、《名臣言行录》、《阳明辑要》、《吕语集粹》。

熟讲书：《四书汇参》、《段注说文》、《五种遗规》、《朱子纲目》、《国朝先正事略》、《历代史志》。

熟查书：《子史精华》、《四库提要》、《渊鉴类函》、《佩文韵府》。

凡古今可列专科各书，另列目于后，以正趋向。

古书：一、《四书》；二、《易经》（以下用《七经精义》本为主，参与马通伯、姚仲实所著）；三、《书经》（张文端所著《书经衷论》可参看）；四、《诗经》；五、《三礼》；六、《三传》；七、《尔雅说文广疋》；八、《文选》；九、《史记》；十、《汉书》；十一、《三国志》；十二、《资治通

鉴》、《通鉴辑览》；十三、韩文、三苏文；十四、《老子》、《庄子》；十五、《荀子》、《管子》、《晏子》、《孙子》。

今书：一、《读史方輿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二、《五礼通考》；三、《太清会典》；四、《文献通考》、杜氏《通典》；五、正续《大学衍义》；六、正续《经世文编》；七、《朱子全集》；八、《曾文正全集》；九、《钱竹汀全集》；十、《顾亭林全集》；十一、《王怀祖全集》；十二、《姚惜抱全集》；十三、《陈文恭集》；十四、《汪龙庄集》。

所取各书，力除近代汉宋之见，皆本朱子、曾文正公两贤意旨，参以诂经精舍、学海堂大旨办法，专重性理书，以为之体，史学书，以为之用；而词章、考据、典章、经济专门之学，专取近代大家之书，以期循流而溯源。诸生苟能研一家之书，大之可以经世，近之可以淑身。已入学堂诸生，可由此以窥先圣昔贤之绪，未入学堂诸生，苟能终身学其一人，终岁习其一书，亦可名家。而致用务精不务博，务实不务虚名，以希古人择善固执之意。盖以矫学堂专习技不习道之偏，而亦矫时贤考订中学破碎驳杂之弊，固陋诚所不免，然于前贤程端礼《分年日程》、陆桴亭《思办录》所列书目与近世曾文正《圣哲画像记》、龙翰臣《经籍举要》所论善择之道，亦不迳背。盖自汉以后学问，郑氏康成集其大成，朱子足以继之，而尤精博焉。自宋以后，经史学问钱竹汀、王怀祖两公集其大成，曾文正公实足以继之，而尤精深焉。远宗考亭，近宗湘乡，诸生苟能窥测毫末，亦可勉为通今稽古、有体有用之才矣。若夫异等之姿、兼人之智，则非此二千卷之书所敢限。正其纲万事理，诸生其勿忽诸。〔丙寅（1926年）三〕。

各种家规议案稿六则

查扶正之说不见经传，本非先王之礼。春秋葵丘之会合，诸侯之盛典，而勿以妾为妻之文载在盟书。清室定鼎，满礼始有扶

正之说，然必宴聚阖族家众並前妻党及所生诸子，询谋佥同，方克成礼，仪节繁重，决无草率从事之礼。本年十一月十一日，据美权自上海来书称：其妾余氏早经扶正，现在其亡妻所生子女群起反抗，又据其子震良、煦良等来函声辩。父子聚讼实非家庭之福。查美权妾扶正之说，並無宴聚族姍通告各房之事，揆之古礼固无所据，按之习惯亦有未合。天津支祠既本敬宗收族之旨，宜公定家法，垂之久远。

查恣慎公手著《负暄闲语》第九卷《婚娶类》载有：“旗人妻死扶妾为正室者，死后丧葬礼略如正妻，男女服仍遵庶母例，不视为继妻，此亦非礼之礼。”末云：“安可以妾夺嫡之名分，此为乱阶，贵之适所以贱之也”等语，义正词严，永宜遵守。至美权方面，即由叔弢去函劝告，不可以妾为妻，致乱名分。其子震良、煦良方面，並由叔弢去函诤诫，不可以子犯父，致违孝道。並將以妾夺嫡之事著之本祠支下子孙，永垂厉禁。此议。〔丙寅（1926年）一〕。

古者，士农工商守其业，本祠子孙愿以士农为本，工商为末，无论智愚必读经书，无论穷达，必须略有田产，此不独免冻馁，且使知礼义，知稼穡艰难。嗣后，本祠即以此定为资格，凡不读经书、无田产者，不得举董事。至商业为人伙纪、不负盈亏责任者，可勿论其独力经营，或与人合资，总以商律有限公司为主，断不准办无限公司及做投机事业，此种纵偶尔得意，终必至倾家破产。今年，云^①所开志成银号倒闭，大家受累，可为殷鉴。兹特公议定明，嗣后各子孙：一、不准做投机及无限事业；二、不准以堂名与人营业或借贷；三、不准为人作中、作保。违者以不肖论，取消资格。

凡经营工商业时，须先向本祠报告：系用何人名字及有限或

① 即前注祥五。

无限，独资或合资，倘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别经察觉，即取消其资格，並公布声明，与本祠脱离关系，以杜事败攀诬，枉受牵累。

再，子孙凡有个人负债超过其所有资产时，亦与做无限事业同论，即取消其资格。

凡取消资格者，永不准充董事，不准与闻祠事，不得享支祠规约中所定一切权利。此为防微杜渐、消弭祸端起见，不得不严，愿各房子孙永共守之。此议。〔丁卯（1927年）二〕。

查，吾家凡男女小孩订亲、许字后，未成婚、过门而夭殇者，例将庚帖、聘礼退回，其婚姻系联即完全断绝，此吾家祖制也。

学熙之子明谦，不幸十六岁于壬戌年夭殇，此时即将所订九江刘稚樵家亲事庚帖及回盘礼物交去，並承刘府将原过聘礼、庚帖完全送回，是与刘府已经断绝婚姻关系，如同路人矣。事隔数年，刘府忽托李子贞来言：伊女不愿适人，仍欲我家认为未婚之妇，实属唐突，当时即为峻拒去后。乃今年刘聘卿又代稚樵来提前说，此断断不能允行之事。第一、祖制不可自我而变更；第二、庚帖、聘礼已退多年，婚姻名义已断，何能又发生关系；第三、刘府之女如明事理，当遵古训，在家从父，父已退回庚帖、聘礼，彼何得异议。今果不嫁，若照俗间处女终养父母之人，作刘氏之贞女，则可听彼家自便，若欲以无庚帖、无聘礼之人，仍作周家之节妇，是强迫外人顺从己意，则绝对无此情理；第四、吾家子弟未成丁者，向不立嗣，昔年学涵公立明诒为嗣，至今不旺，恣慎公与吴太夫人在日，谈及常以为憾，諄属以后除孤子夭折父母可立嗣孙外，其众子夭折不可以明诒为例。今若允刘氏为吾家节妇，将来难保无要求立嗣之日，是更开家庭争端。总之，天下事名不正，言不顺，炳炳圣言垂训千古，防微杜渐必以名义

为首。刘氏女自庚帖、聘礼退回之日，即不能再有周家之名义，此如已出之妻，不能再回本宗同一，名义所关，断断不可含糊迁就者也。兹特着为议案，永远遵守。此议。（戊辰〔1928年〕三）。

查，家族主义乃吾国数千年礼教根本。《尧典》开篇即说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然后协合万邦。《周礼》为致太平之书，司徒乡三物，以孝友、睦婣、任恤教万民。今日欧化，乃欲废家族而言社会，殊不知中外礼俗绝不能强同，其所以不同，各有根原。外国开化晚、生齿稀，无族姓之可言，故以社会为单位，一切组织完备，所以补家庭之不及，然后国家有可统率。中国开化早、生齿繁，素重族姓，故以收族敬宗为重，其种种行为亦隐然一小社会之模样，是名义广狭虽殊，而实际用意未尝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舍天然团结之家族而强合毫无联属之社会，势必诈伪相循，是大乱之道也。

吾家原籍江南，本聚族而居，每逢年节，阖族到宗祠敬祖后，大众团拜，然后挨家一过，用茶点，其事甚便，其情甚洽。今孝友堂支下侨居平津，率皆分居，有终年足不履门者，其孩童及仆从往往不识本家尊长之面，循是以往，几何不视若路人？子弟幼时如此，安望其长而知敬尊长耶！甚非仰体恣慎公以孝友命名之深义矣。兹特定年节礼宜五条，凡我支下，永宜遵守，以昭睦谊。此议。

一、凡同居者，除夕及元旦，卑幼向尊长辞岁、拜年，均行跪拜礼，弟之于兄亦然。

二、凡不同居者，除夕及元旦，卑幼须往尊长家辞岁、拜年，亦同前礼。其卑幼者应即请尊长示定何日、何时到卑幼家吃茶。届时，卑幼家预备莲子茶果盒，尊长到门，卑幼在院迎接入室，男女卑幼以次行跪拜礼毕，仆从继之。其卑幼已在他处先见行过大礼者，只行双揖礼。

三、凡不同居之嫡堂、从堂弟兄家，其祖宗不同祀者，如其祖或曾祖弟兄，其考妣为自家所不祀，不论尊长或卑幼，元旦入门，须先向祖宗拜年，行一跪三叩礼，然后序辈行行礼。

四、凡已完婚自立家庭者，卑幼对于尊长年节送礼，应照家乡习俗，以菜粢、糖糕、茶鸡蛋、十香果四小盘为限，均须家中自做，方昭诚敬，不必多用市品，徒增虚费。平辈者免送。凡未成年完婚者，虽对尊长亦免送礼。

五、前条所谓不同居之家拜年、送礼，各以本地为限，如北平、天津相距既远，不必互相往来，仆仆道途，废时耗财，但对尊长，须具贺柬寄邮，以表敬意。〔乙亥（1935年）四〕。

查，吾家自恣慎公始，宦游南北，旅居各省，每逢朔望及岁时各节、忌日，无不在堂中书祖先神位，上香，行三跪九叩礼，数十年来未尝或辍。今见异乡人士，往往废此不讲，殊失木本水源之义。全家老少安居终岁，不知祖宗为何事，试思此身从何而来。祖宗虽远，血统攸关，一身温饱，而忘其所自，于心安乎！兹特议定，本支子孙嗣后无论旅居何处，凡非独身寄人宇下者，一有家室，即应遵照家规，在堂中设祖先神位，每逢朔望，供清茶，进香行礼。每逢时节，如除夕、元旦、上元、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及三代忌日，均供菜果茶酒，以昭诚敬。以上均按夏历行事。此等家常祭礼，古人所谓荐新时享，虽或居丧亦所不废，见于《朱子家礼》，益阳胡清甫《弟子箴言·明礼教》篇言之甚详，兹特附录于后，以资参考。此议。

照录益阳胡氏《弟子箴言·明礼教》三条：

一、程子曰：某尝修大礼，大略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月朔必荐新，时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弥忌日迁主，祭于正寝（犹正堂也）。凡事死之道，当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此等事数件，虽幼者可使渐知礼义。司马温公曰：“国家时祭

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

二、朔旦家庙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类，皆名俗节。大祭每位用四味，请出木主，俗节止二味，酒止一上，此朱子之说，缘情定礼，申其爱敬之诚而已。韩魏公尝行之于俗节，荐以时食，则谓之节祠云。

三、居丧于四时，正祭则不敢举，而俗节荐享，则以墨衰行之。盖正祭三献受胙，非居丧所可行，而俗节则惟普同一献，不读祝、不受胙也。此朱子之说，谓居丧者虽不行祠庙之正祭，而俗节荐享亦有所不敢忽焉。〔己卯（1939年）五〕。

查，中国数千年礼教，素重宗法，最严血统，故《尧典》首书亲族，以为明德之征。近日欧风东渐，习俗日非，法律继承遗产，遂有养子之条，此等《庄子》所谓以利合，不以天属，善良者迫穷祸害相弃，不肖者实为淫盗之媒，苟重家规，不宜有此。

吾族家规，除甥舅过继外，向不准异姓子入谱。恽慎公宣统年修谱，特定副谱，凡抱养者得入之，所以济人事之穷，可谓仁至义尽矣。今特详细规定：嗣后支下子孙有不得已而抱养异向子女，自幼宜严教养之方，尊卑长幼必令谨守规矩，毋得娇纵，养成恶习。其身份待遇，仅限于本房及他房之同居者，至隔房、异居之辈是否承认，各听其便，不必强从。俟长大成人，性情谨飭，应请大众公议，同意方准入副谱，歿后，仍遵支祠定例，只从衬祀，入小垄；倘或行为不端，有玷家声，拒之视同路人可也，以上规定。私生子，不特异姓，即外遇所生非妻非妾，名分不正、血统不明者，概从此论。事关家规，允宜遵守。此议。

〔壬午（1942年）六〕。

各项教养章程缘起稿六则

窃思今日世界，权利竞争，有实力、实用者尚岌岌不保，殊

非专尚词章、考据之时局。子弟质为中材，粗通文理，或鲁钝难期深造，或财力不足者，除入专门学堂以年限挨得文凭外，若不亟筹应世之具，剋日成功，将来年长累重，在家有皇皇无依之象，对外有泛泛求人之苦。反复筹思，路之最宽者，无如秘书、司帐两途，内而台省，外而文武各机关，皆有用公牍、尺牍之必要；次则小楷、簿记、算法无论何公司皆可需用。论其术甚约，精之可以为卿相，次之可牢得一席之地。比见朋友稍习文牍者，皆无十分饥寒之苦，较之讲词赋、诗文、金石等术非精深不能成名者远矣。次则能小楷、算法，入商业为练习生，苟勤慎安分，专精其职，小之可以噉饭有地，大之可以为经理、为当手。足见操此三术者，其路甚宽，其成功尚无甚难。特人以其小而不屑为，或年过而不能为，以致应世无具，宦家子弟吃此亏者甚多。

前拟精舍文课中，有公牍、尺牍，学课中，有商学、算学，即是此意。兹复定蒙养班、文牍班课程，以为造就中材子弟之法。大体不过如此，细则临时再酌可也。〔丙寅（1926年）一〕。

查，今日子弟无科举程式之束缚，正好俟十五岁以前专读有用之书，为将来涉世地步。乃近日功课，非失之陋即失之杂，本祠有鉴于此，特编定《周孝友堂家塾幼学课程标准》，专就目力、脑力所及，探其本原，繁其纲领，约而不陋，博而不杂，要使学生读之，可以明事理，可以端心术，他年决不至遗倾覆之优矣。

〔辛未（1931年）二〕。

古人诗云：“贫坚志士节，道长高人情。”孔子在陈绝粮，亦云：“君子固穷。”盖贫者，士之常，要在能安贫耳。故古人有带经而锄者，有赁舂者，有傭书者，皆能以名垂后世。而世家子弟往往有本，可温饱，乃习于骄奢，不知俭约，因而致贫者。其始也，既蒙养性成，蹉跎岁月；其继也，则卑鄙无聊，乞怜道路，

亦可叹矣。本堂支下子孙蕃衍，生计日蹙，将来难保无饥寒交迫，其荒唐无赖者固不足惜，而有安分守己、命途多乖、谋生无路者，似宜有以收恤之，兹特定孝友堂济贫口粮规则焉。〔戊寅（1938年）三〕。

读书有三种性：一、念性；二、记性；三、悟性。小孩幼稚，先长念性，次长记性，最后始长悟性，虽资质各有强弱，而大抵先后次第。其气血之增长如此，故教小孩读书先用念性，此时须择终身不可离之书使其读之，虽当时不知义味，而幼年所读可以终身不忘，是使其终身得受用。此等书必择宗旨纯正，义理精要者，以为先人为主，则将来读他种书方有准绳。若徒取词肤义浅之书读之，当时虽觉易解，而时过即弃，将来再读稍高尚之书，势必格格不入，此所以古圣重养正之功也。今世当道不明此理，故学堂遍天下，而风俗日偷，人心日坏，病根即在于此。世家子弟多出败类，亦由家长只知趋时而不知崇古，视古书为迂阔，慕时髦教科为巧径，孰知小孩无义理以端其趋向，则智识愈开邪僻愈甚，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昔之败子，不过骄奢淫逸而已，今则至于仇视父母、戕贼生命，其无廉耻等于狗彘，其横暴同于虎狼，而犹昂然于人世，自以为时俊，可叹也矣。

吾家承先公遗泽，子弟尚无败类，而已不免有轨外行动，违反礼教者，若不及早厘定家教，恐习染日深，前徽日邈，将有不堪问者矣。兹特选定幼学应读之书，订为课程，所取皆极简单而精要、终身不可离者，愿吾子孙世守之，勿谓老生迂腐之谈而弁髦之，则家运或稍维持弗坠乎，是所深企者也。〔己卯（1939年）四〕。

窃思维持家风，必以教育为根本。查孝友堂支祠关于教育事项，以前所拟各种章程，以恣慎精舍为最完备，如果实行，可

造就体用兼优人才；其次则蒙养班、文牍班，亦可成一技之长，不失为读书子弟，惜因时势不便，财力不足，皆未开办。今本支子弟年岁日长，有迳入外界学堂者，深恐根底不深，易染习气，兹特议定家塾章程並分年课程，使七岁至十五岁以前培其根底，然后入学堂，庶不致为潮流所摇惑，得保家风。此项章程简而易行，只在值年之负责与各房父兄之善诱。其根深者其叶茂，此理定不诬也。〔己卯（1939年）五〕。

查，家运之兴衰，以教育之隆污为枢纽。吾家子弟，从前多半在家塾，先有根底大致不差；近来塾课渐少，入学堂太早，已渐抛荒汉文、性理，其秀者仅得成技术人才，其劣者则恐难免为游惰之民，将来若不纠正补救，其结果必更有不堪设想者。

今日既不能自办学堂树之风声，只好籍奖学金为之维系，使知注重汉文、修身，且藉此可资考核，使端趋向。兹特拟订孝友堂天津支祠奖学金规则焉。〔辛巳（1941年）六〕。

师古堂家刻书目简评四十三则

窃中国数千年文化，以道德为主，历代圣贤载籍具在，士人读书要当知所拣择。恽慎公生平笃信程、朱，《负暄闲语》中谆谆以义理垂训。今世学校科学过繁，学生限于日力、精力，鹜其末而忽其本。学熙自庚午年^①起，就北平寓所附设书局，以师古堂名义延聘宿儒从事编辑、校刻，取古人最纯正之书，博观约取，量子弟日力、精力所能及，读之可以淑身，可以淑世者。迄甲戌年^②终，连先年在南方所刻，共计已成各书四十余种，兹特撰订书目简评，以备分给各房子弟次第课读。所须修薪刻印等费，统

① 1930年。

② 1934年。

系学熙个人独力担任，嗣后，每年仍量力进行，以绵先公教泽焉。（甲戌〔1934年〕）。

《周恇慎公全集》。先公道德、文章、政治三者兼备，全书十种。《奏稿》、《公牍》，崇论闳议，皆关国计民生；《文集》、《诗集》，清真稚正，诗用编年尤合诗史；《易理汇参》，晚年所著，精研义理，洞洽天人；《治水述要》，自唐虞以至晚清，集古今之大成，本生平之经验，语语着实，不涉空谈，洵河务绝无仅有之书；《河防杂著》，详于典制，搜辑完备，可资考证；《负暄闲语》，平正通达，布帛菽粟之谈，可与《颜氏家训》、《聪训斋语》并称；《年谱》，则公一生阅历，多载清季大事，可供史料。

《七经精义纂要》。是书取康熙、乾隆原纂《七经精义》“卷首”“纲领”“义例”“源流”等篇汇萃成帙。夫人读书而不读经，如疗饥而不以五谷。然读经而不得要领，则纷如乱丝，故读经第一步功夫，此书不可少。

《师古堂经传简本》。是书为学童便于幼学时期兼带读之，故力求其约，计《易》、《书》、《诗》、《礼记》、《左传》共合十三万三千余字，按中才日读百余字，不过三年可以读完，使由此再进读全书固佳，即加习新学，亦不至离经畔道。盖譬之农夫，此为谷种；譬之商贾，此为母财也。

《韩王二公遗事》。是书宋韩忠献公事为强至编次，王文正公事为其子素记录，皆他书所未载，而有关国家大政及二公立朝大节，研究政治者可资借镜。

《圣域述闻正续编》。是书正编，清黄本骥著，续编范迪襄著。中国五千年文化，尧舜而后，至孔子而集大成。历朝所以开太平者，莫不推尊孔子。其间，名臣、硕儒得列庙享，洵足维风化而弭乱萌。天不变道亦不变，继往开来此书是赖。

《正续经世文粹》。是书俞寿沧选。原本《经世文编》正编为贺长龄辑，续编为盛康辑，取有清一代章奏、公牍，分学术、治

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六类，卷帙浩繁，非宽以岁月不易卒读。今提要钩元，抉其精华，存其大体，浏览一过，于政治渊源思过半矣，洵为青年志士必读之书。

《闺范》。是书明吕坤著。卷一节录《四书》、《五经》及诸传记训女之嘉言；二、三、四卷备载贤女、贤妇、贤母之善行。原本前有图，后有评，兹刻略其图，取其文，欲读者知闺门为万化之原，憬然兴起，而挽末世之狂澜，为家庭造福即为社会造福也。

《弟子箴言》。是书清益阳胡达源著，分“奋志气”、“勤学问”、“正身心”、“慎言语”、“笃伦纪”、“睦族邻”、“亲君子”、“远小人”、“明礼教”、“辨义利”、“崇谦让”、“尚节俭”、“儆骄惰”、“戒奢侈”、“扩才识”、“裕经济”十六卷。撮举旧闻，引伸曲喻，词显意精，读之可以淑身，可以淑世，有志之士宜肄业及之。

《求志集》。是书陈鼎著，选录古今名人文字之有关治道者，皆洞明政体，直探本源之论，有心政治者手置一编，朝夕玩绎，可以增长识见，自然措施不同流俗矣。

《宋五子节要》。是书为先公节录。公生平笃守周、程、张、朱之学，晚年取正谊堂本，掇其精粹以饷后学，洵为圣学入门之书。

《古训粹编十二种》。是书计《身世金箴》、《近思录》、《吟呻语》、《庭训格言》、《聪训斋语》、《澄怀园语》、《荆园小语》、《进语》、《课子——随笔》、《求阙斋日记》、《菜根谭》、《阳明理学集》、《格言联璧》所选录，最精粹、最平正，语语切实，裨益身心，自青年以至白首，不可一日或离之书。

《圣哲微言》。是书仿曾湘乡《经史百家简编》例，分内、外两编，取儒、道、释三家之书，抉其精语自经子文章以及语录、内典，约之又约，每一语而可以终身用之不能尽。盖平日治心之功，此为扼要。至儒、道、释三家之同异，观其通而泯其迹可也。

《历代圣哲学粹》。是书分前、后编。前编为学说十八卷，姚永朴著，依朱子《小学》立教、明伦、敬身三类，为子目十五，辑古今圣贤纯粹之语，为学术正本清源之书。后编为学案二十六卷，李大防、陈朝爵著，自孔子以下至清季名人，凡得四十，各摘其生平、言行、著述，提要钩元，朗若列眉，读者如亲炙门墙。卷帙无多而中土数千年文化集其大成，有志之士所宜究心焉。

《迩言》。是书姚永朴著，分修身、正家、为国、涉世四类。每类先采经史子集，后附俚言，书仅二卷，而包罗宏富，语虽浅近，义实精确，洵为醒世之书。

《性理精言》。是书选宋儒《太极图说》、《定性书》、《好学论》、《四箴东铭》、《西铭》、《敬斋箴》、《心箴》、《人谱》，为研究性理精要之作，篇幅无多，学者读此，可为论孟阶梯。

《畜德录选》。是书席启图原著。选录分立志、为学、读书、省克、家制、孝友、勤俭、莅官、康济、忠诚、处世、厚德、度量、名节、智识、义命、劝戒、养生、闲适、女范、杂识，自周、秦迄元、明、清，嘉言懿行，博观约取，奉为圭臬，淑身淑世此为基础。

《读书乐趣约选》。是书伍涵芬原著。兹选取其最高尚、最醒豁者录之，可以启发性灵，增益兴趣，青年学子案头不可少之书。

《南华经解选读》。是书取宣颖注最显豁者选录十四篇，皆义镜高超、章法完整，循绎玩味，于养心、作文之道大有进益。

《阅微草堂笔记约选》。是书取纪晓岚原本，约取其义旨平正、有关世道人心者，为涉世明理之助，未可概以神怪目之也。

《女千字文》。是书清某女史作，佚其名。仿周兴嗣体例，申明女训，使女孩子于识字之始即知女子之轨范，有功世道非浅鲜也。

《浅近录》。是书清张鉴著，辑先哲嘉言懿行九百余条，分八

纲，百有六日，末附朱子年谱及移心说。事浅而理深，言近而旨远，所以启牖后学者最为切实，童蒙习之，可以终身行之，其此书乎。

《周中丞集》。是书仿宋刻精本，唐御史中丞周繇著，计诗二十四首、文一首，附录先哲求遗。公为咸通十哲之一，时人称为诗禅。诗为《全唐诗》所著录，文皆散佚，仅《全唐文》载赋一篇，窥豹一斑，得唐贤三昧矣。

《古文辞类纂约选》。是书就姚惜抱原书选约二百四十余篇，皆义旨纯正、词气充沛、最易领会、最可效法之作，为初学者所必读，宜家置一编。

《张文端诗文约选》。是书清张英著。文端，太平宰相二十年，胸襟与香山、放翁同旷达，生平最好山水花木，其诗文篇篇不离乎此，兹约选之，可为学者养性怡情之助。

《小学弦歌约选》。是书清李元度著，取古歌诗，分类为教十有六、为戒十有二，而终以广劝戒，原本九百三十余篇，兹去其义之冗复者与其句之佶屈者，约存二百七十九首，不足三分之一，童蒙读之，即可学诗，又可淑性，洵两益也。

《八家闲适诗选》。是书本曾湘乡之意，取陶渊明、白香山、韦苏州、杜工部、苏东坡、陆放翁六家诗，专录其义镜闲适者，以消名利好胜之心，益以朱文公、邵康节，合为八家。学者读之，师其襟怀，旷达冲淡，自然品行高洁，于持身涉世大有裨益，而为诗之道，亦超然出群矣。

《李菡漪女士全书》。是书为清顺德李晚芳著，计三种：一、《女学言行纂》，取周汉以来名儒、淑媛嘉言善行，使人读之可以尽子道、妇道、母道而家齐矣；二、《读史管见》，取龙门《史记》提要钩元，附以崇论闳议，其才、学、识三者过人远矣；三、《菡堂分田录》，为李氏贍族义举，阅之可以风世。

《师古堂丛刻初集》八种。

《易理汇参臆言》。是书原为《易理汇参》每篇按语，依经立义，字字衡量，而出于世运之治乱、天心之消长、人事之盛衰，深明其理，探本穷源，言之确凿。

《蜕私轩易说》。是书姚永朴著，博观诸家之注而约取之，六十四卦著其大义，理精而辞达，研究易学以此入门，思过半矣；

《书经衷论》。是书张英著，每篇标题逐条系说，多采旧文，参以新义，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一扫支离蔓衍之病，读《尚书》者不可少此。

《三经谊诂》。是书马其昶著，《孝经》、《大学》、《中庸》约采诸家注释，词简而义精，以为阐道术、觉斯民独儒为宗，儒以孔子为盛，孔子以此三书为切、为办、为遽，学者宜究心焉。

《孟子要略》。是书朱子所辑，久佚，刘棻云从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证》内搜集，曾文正校刊，以此读《孟子》，分类研究，事半功倍。

《中学正宗》。是书辑录先儒论说，以朱子为宗，继往圣开来学，书虽简而义实闳，士人欲端学术舍此无由。

《先正嘉言约钞》。是书姚永朴著，分“辨学”、“持身”、“正家”、“居官”四类，皆先正典型，读之可发人志气。

《镜古录》。是书俞寿沧著，起三皇迄明，取《纲目》中疑义为问答，词明义正，可增学识，为读史之筌钥。

《师古堂丛刻二集》八种。

《周易李注》。是书清李士钺著，大旨遵程朱，而于爻象讲解，字义更为明切，所引皆“系辞”、“说卦”、“互卦”、“重卦”，必使爻辞一字一句皆有来历，于承乘比应，无一爻不相关。其解释义理皆援经史为证，畅所欲言，可谓博学、近思阐发无疑矣。治易者得此入门，无扞格之病。

《鲁斋遗书约钞》。是书元许衡著，鲁斋生当中原文教剥复之际，笃守程朱，有体有用，其教泽足开元明以后数百年之太平。

兹刻约之又约，学者读一句即得一句之益，幸勿忽视。

《淑艾录》。是书清祝淦著，取张杨园先生备忘录，仿朱子《近思录》义例，抉其精要，分“道体”、“为学大要”、“致知”、“存养”、“克己”、“家道”、“出处义利”、“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十四类。杨园之学以为仁、为本、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得朱子之心学者读此书，庶不为波淫邪遁所惑。

《圣学入门书》。是书明陈瑚著。所列《小学》日程，分“入孝”、“出悌”、“谨行”、“信言”、“亲爱”、“文艺”六目。《大学》日程，分“格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平”六目。而于敬怠善过，详订日省之法，语极简要，有志圣学者可以此为准绳。

《人极衍义》。是书清罗泽南著。先生笃守濂洛关闽之旨，讲学衡湘，门多将相，可谓豪杰之士。兹篇阐明人所以继天地立极之意，探源立论，语极精粹，学者读此一册，胜读性理他书百卷矣。

《养正遗规》。是书清陈宏谋辑。张横渠先生言，教小儿先要安详恭敬。古者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尝见日本小学校尚有此教法，犹存古意，故其人才辈出。孰谓童蒙时纵之骄横狂傲，望其成人后有能束身立世者乎。此书所录《白鹿洞条规》、《童蒙须知》等十五篇，皆本安详恭敬之旨，是为教小儿最切要之书。

《教女遗规》。是书清陈宏谋辑。所录《女诫》等十一篇，语明而义精。中国自昔，男女本是平权，女正乎内、男正乎外，乃天地、阴阳、配偶、自然之道，亦一定不可易之理。今世学说，号称平权，而实则事事欲取男子之职而代之，且凌而驾之，故家庭之道苦，社会之风日漓。有掌珠之爱者，自幼时取此书而课之，吾卜其后福之无量也。

《唐诗矩》。是书清黄山著，专选唐人五言律诗，取其词意、格调可为准绳者详加注释，为学诗者开示门径，分初、盛、中、晚四卷。唐诗浩如烟海，此选约而精，最便初学。

随笔十一则

内而衣食居处，外而家庭社会，一切荣枯顺逆作平等观，稍有伎求便生烦恼。试思石火电光百年一瞬，何足计较，何用焦愁，与其枉费心力，不如落得潇洒，只谋一息之安，不作无涯之感。

人生万事皆从缘生，缘从业生，业由心造，故人一动念，善则善缘随之，恶则恶缘随之，不待事之发现，而善恶已伏之矣。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宋儒谓：天地间只“感应”二字是也。人能深明此理，则当虚其心以应万事，而无所用其烦恼矣。

念念去人欲，存天理，自无纷扰之病。

思无邪以养其内，毋不敬以养其外，即克己复礼之功。

《论语》云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得与失对，患得必患失。衰年气短情长，故每事粘滞不能摆脱。欧阳公所谓：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点然黑者为星星。

尝遇一僧，举止安闲，叩之，则曰，其师尝云：凡修行人必须有一件密行，不拘佛号、咒语、话头，由各人择定，密〔秘〕密行持，行止坐卧不间断，现今以至老死不变更。有此密行为主宰，此外世事则随缘应付可也。吾闻此语，因悟《孟子》“存心养性，天寿不贰”，《颜子》“拳拳服膺，终身不失”，皆此谓也。盖有此安身立命之处，而后置生死常变于度外，忧乐不能动其心，夷险不能易其行，一切学问方有着落，否则，终日皇皇，非昏沈即散乱，处逆处顺皆不自得矣。韩文公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夫

必先足乎己，而后可无待于外，不然心无主宰，鲜不为外物所牵，如牛罗之穿鼻络首，安有自得之趣哉！

《聪训斋语》，张文端读书养心之语，可谓精切，吾更进一解。薛敬轩云：读书贵知要。陈几亭云：善读书者不可泛读。非圣贤之书弗读，非切要之书弗读。漫读则劳，善读则乐。盖吾人读书所以收放心，必有安身立命之处，大体不外居、敬、穷、理四字。朱子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是也。积久，自然道心常存，人心退听矣。

事未行，准诸义；事已行，听诸命。

佛家谓，人寿终为腊月三十日，是总结帐之期。吾谓其结帐必有四柱，旧管者前生所作，新收者本生所作，开除者本生所受，实在者后生所受。其中加减乘除丝毫不爽，莫非以天理为权衡，非真有鬼神司之，而亦非无鬼神司之。盖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即吾心之灵明，而非外求也。

《菜根谭》有曰：“福善不在杳冥，即在食息起居处牖其衷；祸淫不在幽渺，即在动静语默间夺其魄。”可见人之精爽常通于天，天之威命即寓于人，天人岂相远哉。朱子云：“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盈天地间皆二气，即盈天地间皆鬼神也，故知人之所在即鬼神之所在。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此天、地、人相通之义，君子必慎其独，非为修福免祸计，而福善祸淫乃天理之自然，固不爽也。

明道先生云：“不学便老而衰。”夫老岂有不衰之理，然身可衰志不可衰也。守武公九十犹好学，故人称之。今岁戊寅，余年七十有四，头眩目昏，筋骸疲惫，可谓衰矣。然自思日不废餐，夜不废眠，又值世乱，而犹得安居，未遭流离困厄之苦，是天之待我者甚厚，岂可悠悠忽忽不自振作，负此光阴，因就精力所能胜者，订立恒课，日日行之无或间断，庶可消受此安闲岁月以终老也。（戊寅〔1938年〕）。

福建陈国辉纪实

杨汝岛 整理

编者按：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到过的“福建著匪”陈国辉，于1934年被十九路军在福州枪杀示众。他从1914年啸聚山林为匪，到1934年被枪杀毙命的二十年间，经过了从山中土匪到国民党少将旅长的历程，很典型地反映出民国时期匪与兵、兵与匪的关系。

福建省南安县档案馆在清理积存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这份材料，今选编公布，或许对于民国史及福建地方史研究不无参考价值。

一、陈国辉上山及起家

(1914~1916年)

民国成立以后，福建省即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人民遭受重重的压迫和剥削，农村经济破产，疮痍满目，民不聊生，于是强者铤而走险，啸聚山林，以掠夺抢劫为生，各地匪患滋生，树旗立号，称为民军，危害地方。民国初年，德化县有苏亿者，聚众数十，在山林揭竿而起，反抗官兵，闽南民军，由此诞生。民国二年，北洋军阀李厚基任福建省督军，在其横征暴敛之下，加以兵灾匪祸纷至沓来，人民生活更加困迫，于是继苏亿而起者，有如雨后春笋。一九一八年（民七年）以后，闽南各地民军旌旗林立，到处兵匪交加。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德化民军首领苏亿在省垣被捕杀害，其部属陈崇仪代之而起，率领其旧部数十人，由德化流窜至永春、南安交界地区，旋踞八都山为巢穴。八都地居偏僻，高山绵亘，地形崎岖，路途险阻，且位于南、永、仙、晋数县交界之处。陈崇仪遂占据此地为根据，四出活动，进行掳掠派款。一

九一四年，诗山古宅乡人吴瑞玉化名沈恨海，（系海外归侨，早年参加同盟会）时与泉州革命党人策划反袁运动，至诗山招募兵员，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入八都与陈崇仪联系，并协助整理部众，继再招兵购械，进行扩充实力，准备策应泉州革命党人的讨袁运动。自此南安八都和以后的凤巢遂成为远近闻名的民军发源地。

邻近的九都乡西头村，有名陈五者，即陈国辉，年已十八岁，家仅有老母，尚无妻室，虽正年青力壮，而失业游荡，闲散无事，遂跟伴投奔八都入伙。吴瑞玉时在八都，正乏侍从，视陈五年少机警，乃收为随身的勤务兵。因其做事尚勤谨，颇为吴所赏识。一九一五年，吴瑞玉率领陈崇仪所部，由八都进驻晋北下井乡，与泉州革命党人联络，伺机策应进攻泉州。后因泉州革命党人机密洩漏，被北洋军破获搜捕，并派严广威部由洪瀚进剿下井。下井战役，因众寡悬殊，且陈部未经训练，武器不良，不堪一战，惨败遁逃，吴瑞玉不幸阵亡，部队于是星散，陈崇仪率一部残兵逃窜惠北，不久亦被消灭。陈五在下井失败之后，仍逃回八都老巢，招集余众十数人，占据后窟村，独树一帜，改名陈镇国，时常出没于附近山区，操做绿林的生涯。陈镇国不久羽毛渐丰，逐渐扩大活动范围，时至远近乡村进行绑票、派款派粮等，藉此添购枪械弹药，继续发展实力。同时九都有名陈贺者，易名杨安帮（即陈维金之父），亦在后窟村自立一帜，招集十余人，同操绿林生意。斯时，双方力量均嫌单薄，欲远出活动，谋作大宗生意，但对付北洋军的守备部队，颇感困难，因两人系同宗之亲且利害相关，于是遂行合作。

陈镇国和陈贺合作后，首次出马袭击水江盐馆（永春东关附近），旗开得胜，缴获汉阳步枪十二杆和一些财物。继又袭击洪瀚盐馆，亦告成功，再劫获一部分武器，并将盐馆司爷掳至八都。其家人央人说项，愿出巨金赎命。陈、杨乐得令其赎回，而

取得巨款，结果议订缴交五千白银，然后释放。自此，陈镇国时有劫获，得以扩充实力。其后陈镇国又招致附近乡里与其联络，巧立名目谓“招乡联络”。凡被招联络的乡里，要出人出枪前往参加，如无枪无人前往参加，可以按定价交款代替。苟其受招乡里不接受联络，则令匪众骚扰掳掠。因此，无不畏惧而唯命是从。陈镇国以“招乡联络”的办法，诈取附近乡社钱财很多，又继续招兵买马，实力日益雄厚。其时人枪发展至百余之数，其势力乃由八都伸展至南、永、安三县交界一带地区。自此以后，陈镇国即远离老巢八都，时常率部众至眉山、高洋、钱塘、贞洋、镇抚等地活动。北洋军进巢，即流窜至凤巢或东田廿八都等地以避之，出没未定，行踪飘忽。

诗、陶、码等地为著名的侨乡，民国初期，侨汇颇盛，地方富裕，陈镇国下八都山后，即在侨区活动，采用各种方法，向侨乡勒索财款极多，实力日益扩展。自民军产生后，侨区时遭筹款派粮，又迭受绑票勒索，殷富侨户常接到民军某部的派款单，时称为“乌单”。侨户接得乌单后，不但不敢抗拒，亦不敢声张，只得秘密央人说情减轻，候议定数目，就要按约定日期把款交清。当时替人向匪说项的人，都系地方上的士绅、土劣之辈，称为“土匪公亲”，专替人与匪交接，从中渔利。被派乌单的侨户，苟不托人说项，或托公亲议定款数后不能如期交清者，立即被匪绑架。被绑之后，索取更加苛刻，不但要加罚款，还要遭受其他种种的敲诈，被派掳人的匪要“草鞋礼”，看守的要“看管礼”，在拘留期间要送“打缚礼”，否则要被刑打，在释放时还要送“开锁礼”。名目极多，难以胜计。因此，有的要弄得倾家荡产。最残酷者，被掳之后，如逆匪意，即被严刑酷打，甚至撕毁肉票。故在此时期，稍有资产的侨户，多数忍泪抛弃乡井，迁居厦门、泉州等地，以避匪害。

一九一六年，驻防泉州的北洋军团长马步云，迫于各方面的

要求，乃令营长李德胜率部坐镇诗、陶、码等地，进行剿匪，并办理清乡。陈镇国因时机所迫，为保存实力，表示愿出而受抚，遂由地方上的豪绅黄维攀、吴序金和诗山基督教会牧师林潜道等从中斡旋，办理受抚事项。受抚办妥后，陈即将较好的枪械隐藏，而把较差的枪械呈缴，并立具自新书，然后领取一张“守法良民法”，作为随身护符。陈镇国受招抚后，其他股匪亦大都出而受抚，有的则敛迹隐形，暂且相安一时。未几，民军又四处蠢动，骚扰地方。

一九一七年，同安县人陈民志。奉厦门国民党人的命令，至内地收编民军，组织武装力量，准备策应广东革命军北伐。不久入南安，在金陶大眉乡设立司令部，收编各地民军。时官桥塘上杨居（清末白旗会首领）被收编为营长，陈镇国亦被编为副营长，陈荣亮为参谋，陈大春为军需，李恒美和江汉民等为连长，全数约有二百余人。陈民志收编民军后，即大肆向诗、陶、码等侨乡摊派款项，作为饷粮军需。斯时陈镇国拥有的枪械较多，因此发展比较迅速，未几，自己单独编成一营。陈民志在眉山收编民军，被北洋军侦悉，即由泉州调队进剿。陈民志因所部系一时乌合之众，难以抵敌，遂退避于凤巢山。陈率部退至凤巢后，因部队取给困难，军心涣散，且营、连长亦各自为政，难以统驭，于是席卷所剩的派款逃往厦门。陈民志走后，陈镇国即率所部百余人流窜于南安、安溪两县交界的山区。自此，陈即占居山区活动，向侨乡掳掠派款。

二、陈国辉在北洋军、护法军、

靖国军纷争时期的经过

（1917—1921年）

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一九一八年被迫离粤赴沪。其时陈炯明被任为援闽粤军总司令，进驻福

建漳州，与北洋军对峙。时泉州和同安一带均为北洋军占据，援闽粤军欲牵制其后方，乃委赵光和邓本殷为司令，分派至安溪和永春，负责收编闽南军以为羽翼，准备进攻泉州。在这个时期，闽南的军民已由方声涛接洽，归靖国军编为两旅，暂由张贞负责指挥。靖国军原有第一和第二旅，均系滇军，而委杨持平为第三旅旅长，委张贞兼第四旅旅长，以许卓然为财政处长。第三旅辖有第五、第六两团，任黄远逸为第五团团长，杨汉烈为第六团团长，陈岳、翁筹、林板等为营长。第四旅辖有第七、第八两团，任黄孙坚为第八团团长，张贞自兼第七团团长，洪英、汪联、陈庆云等为营长。邓本殷奉陈炯明之命后，即至安溪设立司令部，以刘国富为副司令，时蒋介石亦在此当参谋长。援闽粤军于是在安溪进行收编民军，发展实力。不久因与靖国军发生利益冲突，邓本殷被杨持平所驱逐，即退走漳州。援闽粤军撤走后，安溪一带仍统归靖国军管辖。

援闽粤军派赵光赴永春后，赵即至永春州内设立司令部，而以王荣光为副司令，于是大肆收编南、永、德等县的民军，并滥行委任官职。当时被封的司令和大小官，难以计数，有无一兵一卒者，向邓求取一纸委任状，就可升起旗号，立营招兵，藉此而向地方大派粮饷。仅就芦内潘一乡而言，其时就有十三营半之称号。九都一隅，也有三司令和五营长之多，陈荣亮和杨安帮均被委为支队司令。时陈国辉被委为支队副司令兼营长之职。赵光在永春收编的民军，以陈国辉的部众较为精锐，武器亦较优良，深受副司令王荣光所赏识，欲将其收为心腹股肱，即介绍其外甥女黄汝娟配陈为妻。此时民军的势力伸张至泉州的西门外，北洋军住在南安溪美的部队，均被驱逐，撤入城内。同时靖国军张贞和许卓然的势力，亦由沿海发展至泉州的南门外，占有晋江和南安沿海的地区。赵光与王荣光合作未久，因权利冲突，发生破裂，王乃联合靖国军驱逐赵光，援闽粤军至此皆退回漳州。

援闽粤军在安溪、永春收编民军均未成功，时宋渊源适从广东返，负有在闽组织护法军的使命，即在官桥九溪召开民军首领会议，拟将靖国军和王荣光部合并改编为护法军，宋氏自任总司令，而以张贞和王荣光为副司令。护法军正式成立后，即在永春设立司令部，王荣光原有的队伍改编为六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尤赐福，第二支队司令徐森基，第三支队司令林青龙，第四支队司令陈荣亮（时陈国辉为该队副司令兼第一营营长），第五支队司令黄则举，第六支队司令吴威。靖国军的部队仍按原来的编制，没有变动，名虽合并为护法军，实则靖国军的名称并未改变。护法军和靖国军合并未久，双方在永春因事发生纠纷，互相争执，至于破裂，乃以兵械相见，双方遂起战事。靖国军与护法军开火后，护法军战斗力薄弱，不支败北。护法军战败后，宋、王出奔，所属的部队均由靖国军改编。于是靖国军辖有晋江和安、南、永、德等县，称为极盛时期。靖国军改编为护法军后，原有第四支队编为独立团，仍以陈荣亮为团长，陈国辉为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时已拥有四百余人，枪械齐全，实力颇为雄厚。

护法军失败后，宋渊源和王荣光出走漳州，向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乞援，请陈派兵讨剿靖国军。援闽粤军许崇智部奉令进击靖国军，由海道出发，至枫亭登陆，从仙游进攻永春、南安等地的靖国军。靖国军不敌溃败，部队于是星散，自此一蹶不起。

靖国军失败之后，宋渊源和王荣光东山再起，又回永春设立司令部，招收旧部，陈荣亮与陈国辉仍受编为第四支队，驻于诗山一带。王荣光后与北洋军妥协，李厚基委王为福建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后援闽粤军奉令回师广东，闽南各地民军又四处峰起，各自为政，互相火併。第四支队陈荣亮和陈国辉等与第五支队黄则举和黄秀成等，各在南安占据地盘，互争雄长，双方引起战事。陈、黄均为南安的大族，且两姓各分布甚广，封建宗族观念甚深。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因少数人权利冲突，各即联系同姓

多旅为其后援，鼓动宗族参加争斗，于是民军的争战与宗族的械斗混连一起。自此双方兵连祸结，互相焚烧杀戮，尤以罗溪和九都等地死伤损失最为严重。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自民八年（1919年）引起争端，牵连陈、黄两姓宗族卷入封建械斗，前后达十二年之久，尚未结束。这次的争斗，双方的损失不可胜计，被焚毁的房屋共达二百余座，死伤共达二百余人，其祸害至为惨烈。延至1930年，陈国辉任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之职，部队进驻泉州；南安全入其势力范围，黄氏宗族自知不敌，遂言归于好，乃推举黄翰奕出任陈国辉的参谋，黄深亦由彭棠编为连长，无形中消弥此次惨酷的争斗。

民九年（1920年）秋，北洋军旅长贾云翔驻防泉州，民军洪英和汪联等部均为收编，并与安溪、永春等地民军言和，暂时相安，以便进行分化民军。时民军杨持平部驻于安溪，王荣光部驻于永春，同时庄文泉亦受编为闽军旅长，辖有黄孙坚、肖殿邦、陈岳等团，驻于溪美一带。这三部民军自霸一方，不相统属，互相猜异，时均在石碇设有办事处，藉与北洋军取得联络。其后，民军内部不和，互相颠覆，王荣光与黄孙坚被北洋军分化，密谋暗害杨持平，假借会议诱杨至石碇，而将其捕送北洋军请功，杨遂被害。北洋军把民军分化后，遂分两路大举进剿，一由臧致平的团长李芳苞负责清剿南安西溪和安溪一带的民军，另派团长王树林率高义赖乾和汪联等部进剿南安、永春一带民军。北洋军大举进剿后，各地民军不敢与敌，纷纷逃避，永春王荣光亦将部队遣散，出奔外地。陈荣亮和陈国辉部即由诗山退入九都和八都山，后汪联又偕北洋军进剿八都，陈被围困，即将部队分散，把武器隐埋，本身逃至鼓浪屿。陈国辉逃鼓不久，被工部局侦悉，派人缉捕，复逃回八都老剿，誓与北洋军周旋到底，不再逃入租界。陈国辉回至八都后，即纠集旧部，重整旗鼓，与北洋军对抗，并进袭洪濂、码头等地高义的驻军，但均未得手，仍退踞八

都。后高义和汪联又大举入八都清剿，陈国辉所带的部众逃散几尽，险遭丧命，乃带亲信十余人离开老巢，流窜于眉山和凤巢山等地。

三、陈国辉称雄南、永、安的时期

(1922—1925年)

一九二〇年，孙中山先生回粤就任非常大总统，出师北伐。一九二二年陈逆炯明叛变，许崇智所率的北伐军已前进至江西，遂奉令停止北伐，改为东路讨贼军，经福建回粤讨贼。斯时许卓然等亦奉到国民党的命令，在闽组织军队支援讨贼，乃召集闽南各地民军首领到凤巢山举行会议。召开会议时，永春王荣光、安溪杨汉烈、长泰叶定国的代表，和陈国辉等均出席参加，共商筹备组织福建自治军支援广东讨陈事项，由秦望山代表许卓然主持会议。会议决定推举许卓然为自治军总指挥，暂分为五路进行组织：第一路司令王荣光，第二路司令杨汉烈，第三路司令陈国辉，第四路司令叶定国，第五路司令秦望山。会后，各路司令即回各地进行组织。王荣光至永春后，即入德化招编民军。时林青龙已被北洋军收买，王至德化，被林捕送北洋军，不久被害。陈国辉奉令为第三路司令后，即由凤巢率余部数十人至诗山，招集旧部百余人，大力扩充队伍，大肆向地方筹款派粮，并拘捕各地富侨勒索巨金。于是财力充裕，添购大批枪械弹药，实力颇为雄厚，拥有五百余人。

东路讨贼军由江西入闽后，攻克福州，驱逐北洋军，统治福建为时十年的北洋军阀李厚基，被俘后逃脱。福建自治军遂正式成立，推举黄展云为总指挥，张贞任前敌指挥，以杨汉烈为第一路司令，许卓然为第二路司令，黄炳武为第三路司令。第二路以陈国辉为第一支队，陈荣亮为第二支队，秦望山为第三支队。未几，讨贼军继续南下泉州，经漳州回粤讨逆，留前敌总指挥何成

潜坐镇兴、泉、永等地。自治军未几奉令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第八军，由许崇智兼任军长，张贞任第八军前敌司令。许卓然时任为第八军泉州卫戍司令，下辖三个统领，陈国辉为第一统领，秦望山为第二统领，王振南为第三统领。陈国辉任第一统领时，已拥有四营的兵力：第一营营长黄国治，第二营营长叶世泉，第三营营长陈玉兴，第四营营长陈麒麟。时陈佩玉为第二营副营长，尚无实力，迨至黄国治死后才接任第一营营长。

未几，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何成濬奉令率领留守部队与第八军，以及厦门臧致平部出发东江，参加讨陈战役。自治军张贞、许卓然、陈荣亮和秦望山等皆随第八军开赴前方。自治军开赴前方时，陈国辉按兵不动，不肯出发，独据南安诗山，陈荣亮时已升任第八军第二旅旅长随军出发，于是自民七年以来，占为大本营的诗山至此为陈国辉独占，作其根据地。诗、陶、码等地系南安著名侨区，文化发达，不但物产富裕，而且人才素称荟萃。当地名绅吕俊星和戴世鸿等前均系陈荣亮的幕僚，自此则依附陈国辉，及其后的洪文德和叶祖仪等，亦皆为其所用矣。陈国辉在诗山，兵力扩充至千余之数，其势力遂由诗山伸长至永春，独霸一方，称雄于闽南。

东路讨贼军在东江讨陈的军事失利，第八军张贞、许卓然等亦一败涂地，陈炯明令洪兆麟部乘胜追击入福建。其后东路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叛依陈炯明，驻军漳州，收编李厚基旧部张毅为第一师师长，亦驻于漳州一带。时陈国辉的参谋长吕俊星亦至漳州接洽受编，陈被委为第四旅旅长，辖有第九、第十两团，第九团团团长系永春陈春光，第十团团团长由陈国辉自兼，此外又增加五个补充团，以王庆忠、潘温和、陈昆、吴晋源、王振南等为团长，每团仅有数百人而已。旅部成立一卫兵连，以彭棠为连长，陈鼎观任财政处长兼警卫营营长，陈维远任军需处长，亦拥有一连兵力。时全旅计约三千余人，分驻于南安和永春等地。

讨贼军在泉州之时，皖系徐树铮的师长王永泉即入据福州，当讨贼军离开泉州之后，王永泉遂令其弟王永舜旅进驻泉州。讨贼军失败以后，直系孙传芳令师长周荫人率军入闽，驱逐王永泉，并任周荫人为福建省省长。皖系王永泉失败后，旅长杨化昭退至同安，其后联合臧致平攻下漳州，绕道闽赣边境入浙，依附皖系卢永祥。一九二四年，周荫人令旅长孔昭同进驻泉州，并收编高义为新编第一师师长，安溪杨汉烈为第二师师长。时陈国辉仍占有诗山和永春一带地方，周荫人令高义率部进剿，陈不敌，率部退入安溪湖头附近，其第九团陈春光仍在永春。后高义进入安溪追剿，杨汉烈第三旅旅长陈铁卿谋联合安溪民军围歼陈部。但其团长李瑶梯和李孝长因前在永春时，曾受陈国辉维持给养之恩，不肯进攻陈部，并掩护陈部离开安溪，后由杨学良引其入漳平永福。

陈国辉率部到永福不久，张贞适由广东返闽，奉令在福建组织护党建国军，委陈国辉为第一师师长，叶定国为第二师师长，杨学良为第三师师长，联合大举进攻漳州和浦南一带。该地系北洋军张毅部驻防，张贞纠合民军进攻，均未能得手。未几，杨学良被陈铁卿和其部属杨标谋杀。一九二五年，陈国辉仍率部由漳平入安溪。时孔昭同欲利用陈进击杨、高等部，即派人与陈取得联络。陈于是乃联合杨学良的旧部占芳珍等，进攻安溪杨汉烈部，占据了安溪县城。其后杨汉烈的旅长陈铁卿曾谋联合永春陈春光部准备反攻安溪，因与城内豪绅谢济川密通信息洩漏，被国辉侦知，谢济川和陈春光均被捕枪决。杨汉烈和陈铁卿失败后，安溪遂入陈国辉之手，并由安溪进据诗山一带地区。自是，陈国辉的势力又日益扩充发展。

北洋军孔昭同部坐镇泉州之时，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法，利用杂牌军和民军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攻击，自相残杀，最后谋一举而消灭之。当泉属一带的民军仅陈独存时，陈国辉成为孔

唯一的心腹大患。孔即筹谋对陈之策，采用先柔后刚方法，派员劝陈接受改编，用省长周荫人的名义委以独立旅旅长之职。陈为求保存实力，接受改编。一九二六年旧历年终，陈部官兵皆纵情欢乐，陈又准备为其母祝寿。孔遂择此大好时机，于正月初一日调兵大举进剿，期以一鼓而围歼之。孔军主力于除夕之夜，由洪濂急行军，分金陶、码头两路猛扑诗山；又令海军陆战队同时由永春围击，并令杨汉烈由安溪进袭诗山的后路。陈部官兵在旧历年夜，正在大饮大赌，彻夜狂欢，毫未戒备，翌日拂晓，孔军骤至，有如迅雷不及掩耳。孔军入诗山后，陈部已星散，仅缴获所存的军需物资。此役陈部未受重大打击，实力无何损失。孔部占据诗山后，饱餐畅饮陈国辉备下的寿宴酒一顿，即留置一部驻守，大军仍撤回原防。陈国辉在孔军进击诗山之时，慌忙逃至贞洋，即令各部化整为零，分散各地，以待时机。其后，陈自率嫡系部队绕道逢华，经南无石入九都，即将队伍分散，将枪械埋藏，仅带数十人退据八都，以观动静。未几，孔军和汪联部又入八都大举清剿，陈退避于仙游界内的大山被汪围困，汪即纵火焚山。事恰遇天降大雨，陈始免遭难。后陈即突围出险，离开八都，率十余人逃至东田、廿八都一带山区。时其部属陈佩玉、陈昆等约有一百余人亦在山美附近出没，于是陈国辉即在此地流窜，直至大革命前夕。

四、陈国辉在北伐前后及龙岩被歼的经过

(1926—1930年)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何应钦率领东路北伐军挺进福建，声势浩大。宋渊源和吕渭生等奉命在闽收编民军支援北伐，在鼓浪屿笔架山宋氏住宅设立参谋团办事处，进行联络收编民军。此时陈国辉正为北洋军孔昭同所困，流窜于东田一带，因粮糈奇缺，部队已暂遣散，仅剩数十人而已。北伐军入闽

后，北洋军均闻风而逃，孔昭同亦率部北退。时陈国辉已与参谋团联络，奉命编为一团，南、永、德等地民军均由其收编，并令迅速成立，立即率领该团随北伐军前进。陈奉命后，即由东田率残部至诗山，设立团部，招兵买马，并向地方大派粮款，以维持军需。未几，旧部陈佩玉、彭棠、陈育才、吴晋源等皆相继率众来归，德化徐箴基和安溪占芳珍、龙再得等亦先后率部来编，全部合计一千余名。草草编成后，即奉命出发。陈部随北伐军出发后，由仙游经莆田而进入福州。东路北伐军总司令何应钦至福州时，将福建民军合编为新编第一军，委谭署卿为军长，陈国辉被编为该军第一独立团。第一独立团编为三营：以吴晋源为第一营营长，陈育才、彭棠和吴辉煌等为连长；以陈佩玉为第二营营长，邱崇、黄玉玺和李忠等为连长；以徐箴基为第三营营长，徐金泰、徐会春等为连长。陈部整编后，不足兵员，即以俘虏的北洋军补充，并开始训练。但民军的官兵，平素闲荡成性，均感拘束不自由，且不堪训练之苦，不久，吴晋源、占芳珍和龙再得等皆相继请假而归，本籍的士兵亦纷纷逃回。其后，陈即以王怀英接任第一营营长，并将补充营解散，把兵员补充各连的缺额又增编一特务连，以李忠为连长，暂驻福州市郊训练。

北伐军由福建入浙江后，新编第一军奉命留守福州整训待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七月省府令陈国辉率领第一独立团开赴龙岩驻防剿共。后陈铭枢率十一军入闽时，福州因派系之争，新编第一军以军纪废弛被控，十一军即将新编第一军驻福州的部队全部缴械，唯陈部调往龙岩，得以幸免。陈国辉虽然离开南安，但在诗山仍设有留守处，并令参谋长吕俊星留守主持后方事务，又将彭棠部留驻诗山。因此，南安始终控制在陈国辉之手。陈的爪牙依其势力皆包办南安的税捐。时吕俊星承办南安县的烟苗税，戴世鸿经办泉永德汽车公司，陈玉兴坐镇九都老巢，并承包盐运，陈国辉虽远在福州、龙岩，可是南安的民脂民

膏仍然源源流入其财库。

一九二七年八月，陈部开至龙岩，以傅柏萃为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农民会，发起抗租抗粮运动。陈将兵力分配各重要地区，镇压农民运动。陈部的兵力和防区的分配如下，第一营王怀英部驻防龙岩至宁洋一带，第二营陈佩玉部驻防漳平，第三营卢演坤部驻防白涂、龙门和砍市一带，第五营吴镇国部驻防金龙山，第一补充营彭棠部时留守诗山，其后才调龙岩，第二补充营系新成立，暂留漳州。未几，陈铭枢率十一军经漳州入粤，时海军陆战队拟联络十一军解决陈部。陈颇畏惧，严加戒备，以防不测，即将留漳的补充二营和特务连撤回。后十一军路经龙岩时，陈预先探悉，率部避于漳平一带，以观动静。海军陆战队虽派有大队人马随十一军至龙岩，要乘机解决陈部，但陈早有准备，无其奈何。待十一军去后，陈又回驻龙岩原防。

一九二七年冬，福建省政府改组，杨树庄任主席，方声涛任副主席，但杨不在省，由方氏代理主席。陈国辉驻防龙岩，深觉自己孤立无援，颇为自危。时参谋长吕俊星已在永德交界被德化民军尤赐福暗杀，已由洪文德继任参谋长。陈即令洪赴福州活动，寻找后台。洪至福州后，奔走于方氏之门，代陈向方表示愿为效命。方氏亦准备培养私人实力，为其政治资本，且陈亦为旧属，即加以扶植，而为其股肱。方任代主席不久，即由省府将陈部改编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以陈文德为参谋长，以庄凤鸾为参谋处长，以林启东为副官处长，以沈鹤天为军法处长，以陈维远为军需处长，以刘超然为军需主任，以陈燕宾为龙岩财政主任。全旅辖有八营的兵力，第一营营长陈育才，第二营营长陈佩玉，第三营营长卢演坤，补充第一营营长彭棠，补充第二营营长李雄，补充第三营营长苏永昇，补充第四营营长郑明智（后与第三营合并），补充第五营营长吴镇国，补充第六营营长林松杆。

一九二八年陈亲赴省晋谒方氏，面受剿共机宜。回龙岩后，

即加紧镇压革命，大肆拉拢当地豪绅为其爪牙，如林松轩、郑方审、蔡历焘、杜弛扬和翁剑鸣等均被收罗为工具；又收编当地土匪，编为补充第六营。陈利用当地爪牙为侦探，侦骑四出，大举进行搜捕地下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扣押在狱的政治犯达六十余人。陈为便利剿共的军事运输，建有主要公路三条：一由龙岩至永定，一由龙岩至漳平，一由龙岩至漳州。时王仲生为龙岩公路局局长，陈宏志为副局长，张友云为会计，张锡金为工程师，陈观涛任永定县建设局长。并在各地设立各种捐卡，对群众进行剥削，同时大兴建设，拆毁城垣，开辟公路，整理市容，并建筑公园，设立图书馆和运动场。但建设费和民工均由群众负担，为个人沽名钓誉耳。

此时红军已在闽西建立根据地，革命的火焰已遍地燃烧起来，永定附近农村掀起抗租抗粮的运动。一九二八年六月，陈亲率大军至永定剿共。陈离龙岩时，后方留陈育才营驻防漳平和宁洋，彭棠营驻守十八社，林松轩营驻守龙岩至砍市一带，特务连负责龙岩城防。同年十月间，龙岩地下党为解救狱中同志，乘陈率主力远离，后方兵力有限，即召集武装队伍二千余人进攻龙岩县城。工农武装队伍于上午十时开始围攻县城，激战数小时，因城中防守部队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颇强，未能得手。斯时农民武装队伍仅有少数步枪，而且准备不充分，匆促进攻，以致死伤数十人，不能取胜，遂于下午三时停止攻击，全部撤退。陈国辉在永定闻龙岩告急，旅即率部由永定回龙岩。陈至龙岩头，探悉农民革命武装队伍此次攻城的目的系欲劫出狱中被禁的政治犯，立令军法官将狱中的政治犯全部提出审讯，三日后即将其中较重者七人押至小西门外小山枪决；翌日又押出政治犯26人，在北门外枪决，其中有七人系用斩首酷刑。

一九二九年一月，徐景唐在东江叛变，张贞时任四十九师师长，驻军漳州，奉令率陈旅开粤讨徐。二月，陈国辉率主力部队

随张贞出发，留彭棠营驻守十八社，陈育才营驻守漳平，补充第三营和特务连驻防龙岩城内。斯年春末，闽西红军正规部队向东挺进，开始由大小池攻击龙门和白涂，彭棠乃率部抵抗，败退逃入龙岩城内，红军乘胜追击，占领城外的山地，并包围龙岩城。陈部死守城防，企图继续抵抗。次日上午，红军主力开始进攻城垣，敌军不支，纷纷逃窜。斯役敌军死伤50余人，被俘甚多，彭棠和李忠等逃出城后，率残部退入永福。红军此役计缴获枪械100余杆，击毙敌军及俘虏计一百余人。

红军攻占龙岩后，越七日即撤离城区，县城商会派代表至永福，请求彭棠率部队回守城防，维持地方秩序。次日，彭纠集各部约三百余人再回龙岩县城。翌夜，红军一部又配合该地农民武装队伍进攻包围县城。彭棠战败之后，已如弓中之鸟，不敢再事顽抗，迅即率部突围出城，逃往永福。彭棠至永福后，即龟守不敢再出，于是龙岩和永定等地均为红军占领。

陈国辉率部随张贞参加东江讨徐后，约经二月有余，战事暂告结束，闻龙岩、永定失陷，立即率部回师反攻。红军主力撤离，陈部不费大力而攻占永定、龙岩。陈收复永定、龙岩后，令补充第二营李雄和陈观涛等驻守永定、砍市一带，第一营驻守漳平，补充第一营驻守永福，第二营驻守龙岩城郊，第三营、补充第三营和第五营均驻守十八社一带。全部兵力约二千余人，陈至龙岩约旬日，即在城廂张灯结彩，举行庆功祝捷大会，日夜演戏，锣鼓喧天，夜间又火炬游街。红军选择陈部庆功会第三天晚上，主力分头由蒙潼洋用急行军出发，大举围歼陈部，在拂晓时各地同时进攻。当红军开始进击龙岩县城时，陈国辉正在水门公馆鼾睡之际，听到红军攻城的枪声，由梦中惊醒，急奔回旅部。时旅部已被红军占领，陈至半途即遭袭击，匆惶又跑回公馆，即换了便衣，乘天色未明，混出城外。后经南靖至漳州市。红军全获大胜：歼敌官兵数百人，俘敌官兵数百人，缴获迫击炮四门，

重机枪六挺，步枪一千余杆，其他如军需和粮款亦缴获甚多。战役结束之后，红军举行公审大会，把其中罪大恶极的李玉如（张贞的旅长派往参加庆功大会）、吴虎（补充第五营营长）、军法处长沈鹤天、副官林忠等十余人枪决示众。

陈国辉在龙岩漏网逃至漳州后，即在漳州设立收容所，收容逃散官兵二百余名。其他未参加此役的部队，如第一营王杰生部驻于漳平县，第四补充营彭棠驻于永福，第六补充营林松轩和特务连一部驻于同安，均未受损失，陈即令各部开至同安集中。陈国辉率第一混成旅残部在同安集中之后，旅接省府主席杨树庄的命令，令其率部反攻，收复失地，将功赎罪。陈时如漏网之鱼，惊魂未定，不敢再返龙岩，省府遂下令撤去陈国辉第一混成旅旅长职务，并通缉法办，又令海军陆战队教导团肖其宜进剿。

附件

1929年福建省政府通缉陈国辉等布告和闽南各县党部声讨陈匪的快邮代电：

（一）、福建省政府通缉陈国辉等之布告：

为布告事。查闽南著匪陈国辉及其重要羽党洪文德、陈烈臣、彭棠、林松轩、苏歪面、李瑶梯（即李刚）、李祖仪（即李雄），郑明智等九人……经省政府委员会八月七日临时会议议决，陈国辉等应即明令褫职，严缉惩办，一律查封财产，并呈请中央通令协缉，如有乡团及民众能将该匪首等击毙，或拘送者，分别给赏。陈国辉每人赏格一万元，其余赏格每人三千元。除呈请国民政府通令协缉并分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务须协力缉捕，格杀勿论……

（二）、闽南各县党部声讨陈匪国辉之快邮代电：

……著匪陈国辉前此叛服不常，蹂躏闽南各属民众，残杀龙岩党指委、党员，罪恶昭彰，民所共弃，业蒙国民政府、省政府下令剿办，并将陈匪及其重要党羽，列名通缉在案。八闽海内外

同胞，莫不闻风引企，满望大憨伏法，匪众歼除，地方复归宁静。乃陈匪毫未悔祸，乘省政府分兵剿共，啸集股匪，抵抗省军，复蹂躏安、南、永、德等县，残杀省指委林海、党执委李祖凤、党员刘耀东、林冰如、林一梅及青年民众四五十人，勒索民脂四五十万，奸淫掳勒、烧毁抢掠，灾情惨状，笔不胜书，除非陈匪爪牙，莫不曰罪恶贯盈，宜速诛灭。乃道路哄传，陈匪犖金派人四出运动，竟有某也将予收编，某也将为介绍之说。骇闻所播，群众椎心，果成事实，则是土匪殃民愈烈，军政要人愈予重视，国纪政令等于弁髦，党权民命等于草莽，将使世界不分是非，盗匪益无忌惮，八闽匪祸曷其有极。敝会受十七县同志之付托，誓为坚持正义到底，倘有甘拂民情，收编匪贼以为己用，惟有联结民众力量，剑及履及与之周旋，载舟覆舟，水非必懦。惟望政府顾存威信，执法如山。海内外同志同乡为桑梓利害计，急起而监督政府限期痛剿，俾陈匪收编之说无由实现，八闽匪祸从此有消辑之日……。

闽南各县党务指委会援助陈、谢惨案委员会叫

海军陆战队教导团肖其宣奉命进剿陈部后，该团即由省乘轮至厦门登陆，并向东安进剿。到达同安时，陈部由同安退入南安东田、廿八都山区。陈部抵达东田后，侦知溪美驻有海军陆战队一营，兵力单薄，有机可乘，遂出其不意，连夜大举围击，海军陆战队因防备疏忽，匆惶应战，且众寡不敌，大败退走泉州。陈部此役缴获海军陆战队枪械一百余杆，翌日即由溪美开至南厅附近休息，继又转移至大眉山区。时安溪县城系民军李昭言部驻守，仅有少数兵力，陈部又进占安溪县城，李昭言不敢与敌，率部退避城外。陈国辉至安溪后，因全部官兵千余人，取给困难，即令各部分散至各地活动，就地取给容易。于是彭棠部至山顶彭和八都等地，陈育才部至九都一带，吴晋源部至三十都附近，苏永昇部至晋江地区，郑明智部至码头等地。陈令各部分散后，自

率余部六百余人于次日转移至湖头，暂住该地整理休息。

陈部驻湖头休整约一个月，海军陆战队林寿国部即进抵安溪县城，准备进剿陈部。陈乃先行率部进击安溪县城，未能取胜，又退回湖头。时诗山等地亦已被海军陆战队占领，势在必争，陈遂率部进攻诗山，陆战队不敌退却，于是诗山仍入其手中。陈部占诗山后，又进取永春，该地陆战队又退入仙游，未几又增援反攻，收复永春，陈部乃退守诗山。陈部驻诗山不久，林寿国再指挥海军陆战队大举进剿，由洪濂和永春两路，南北夹击诗山，陈部不支，退入深安、高田一带山区，又采用对付北洋军的故伎，敌进我退，敌退我进，避强攻弱，避实击虚，与陆战队相持颇久。1929年八月间，驻泉州的海军陆战队奉命调往福州，在永春和南安的部队全数调至泉州接防，安、南、永等地均无驻军，于是陈国辉又得发展的机会，进占诗山，并令陈佩玉率部占领安溪，吴晋源占领英都、大宇一带，彭棠率部占领永春。斯年十一月下旬，陈的司令部即由诗山移设永春。陈至永春后，把部队重行整编，以陈育才为第一营营长，陈佩玉为第二营营长，彭棠为第三营营长，吴晋源为第四营营长，李雄、吴再春、林松轩等编为三个补充营。陈国辉占领安、南、永一带地区后，根基日趋稳固，实力逐渐扩展。时德化徐箴基已死，陈又令彭棠率部进驻德化，并收编其部众。不久，永春蓬湖林妙庆部、南安芦内潘明德部、惠安陈观涛部均归编为营。于是陈国辉的实力又大增加。斯时闽北因卢兴邦作乱，省府无暇顾及闽南，陈在安、南、永、德的地位，更加巩固，即在各县大修公路，和提倡兴办学校。斯时各县的公路四通八达，南安及其辖内的地区，乡乡皆创办小学，教育事业亦发展颇快。

1930年4月，北方阎冯联合反蒋，进行中原大会战。其时福建的政局骚动不安，闽北尤溪民军著名首领卢兴邦，竟然逮捕省政府民政厅长陈乃元和教育厅长程时奎等六人，省府在其武力协

逼之下，亦一筹莫展。省主席杨树庄时另有任用，蒋介石即任方声涛为代理主席。方氏就任福建省代理主席后，即取消陈国辉的通缉令，恢复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藉方氏之力，复任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少将旅长之职，即在永春成立旅司令部，并张灯结彩，举行就职典礼。陈复职后，部队再加整编，先成立第二团，以陈佩玉为团长，陈海波为第一营营长，林妙庆为第二营营长，潘明德为第三营营长；继再成立第三团，以彭棠为团长，彭德山为第一营营长，李雄为第二营营长，陈寿宣为第三营营长。第一混成旅先成立两团，第一团至泉州后，才在惠安成立，其他部队如陈观涛部编为工兵营，林松轩部编为独立营，德化陈少共、安溪林谦、郭留等部均暂编为补充营，郑明智部另编为巡缉大队。陈国辉有了方氏作后台，不但恢复职权，地位日益巩固，队伍亦大加扩充，实力颇为雄厚，并派参谋长洪文德为驻省代表，在福州设立办事处，与省府和方氏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0年夏间，安、南、永、德四县均划为第一混成旅的辖区，仅永春湖洋一带地区为该地民军刘子宽和黄河书占据，抗不受编，且夺取该地税收。陈国辉七月间，即令彭棠率第三团进剿。彭部进入湖洋后，刘、黄已退走，彭棠不分青黄皂白，纵兵洗劫，即见房就焚烧，当夏收季节，乡民恐被杀害，放弃家产和庄稼，含泪相率逃入深山，或避难他乡。群众遭受死亡和损失难以胜计。经过二十多天，彭率部撤回永春。一个月后，彭部如虎狼重来，群众惊魂未定，又相率逃命。此次彭部再入湖洋，焚杀更加厉害，并派队四处搜查，避入山间和躲在山洞的群众，一经发觉，均被惨杀。陈国辉此次令彭棠进剿刘子宽和黄河书，湖洋群众的损失和死伤，据不完全的统计，全乡损失的财物约千余万白银之数，被焚毁房屋约一百余座，商店货物不但抢光，又被焚数十间，耕牛和家禽家畜共损失数千头，各乡的家俱衣物以及农具的损失难以计数，前后死伤共一百余人，被逮捕监禁一百余人，

少女和幼童被抓住他多贩卖者数十人。

五、陈国辉极盛的时期

(1930—1932年)

1930年冬，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奉令进驻泉州城，设立司令部于东街府衙，陈国辉官至少将旅长之职，辖有南安、安溪、永春、德化、晋江、同安、惠安、仙游等八县的地盘，称为极盛时期。陈拥有八县的地盘，财政收入充裕，遂大加扩充队伍，并向国外购了大批枪炮弹药，以充实军备，军容亦整顿一新。全旅的兵力，计有四个步兵团，四个直属营和两个特种兵直属连，合计全旅官兵共有一万六千余人。兹将该旅的人事和驻地的情况概述于下：

甲、旅部的人事

1. 参谋长洪文德，曾在福州法政学校毕业，因与吕俊星有师生关系，引为陈所用，至吕俊星死后，洪即继任参谋长，不负军旅的职务，专任外交和对上级联系，经常驻福州办事处，因向方氏拉线有功，颇为陈所宠信，后因大烟瘾极深，昏庸无能，自觉难称其职，遂辞去参谋长职务，由余永尧继任。余系永春洋上人，出身保定军校，亦属庸碌之才。第一混成旅在永春另设南永德指挥部，以叶祖仪任参谋长，主持指挥部的事务。叶亦福州法政学校毕业，曾在地方包办捐税，后因洪文德常在外地活动，叶遂为陈所赏识，任为指挥部参谋长，仅任处理地方事务，无权指挥军事。

2. 参谋处长庄凤鸾，系福州人，亦保定军校出身，在龙岩时，由方氏介绍来该旅任参谋主任，才干平常。

3. 军需处长刘超然，系晋江市人。刘幼年时，陈曾率部驻河市，其母善交际，与陈颇为熟悉，往来颇密，其母令刘拜陈为义父，陈将其培养至中学毕业，极为宠爱，而任以军需处长的要

职，且兼泉永财政处长，包办八县的税捐。后陈欲栽培为其股肱，任以补充团长之职，其后由九都陈燕宾继任军需处长。

4. 副官处长林启东，福州人，亦保定军校出身。副官处主任邓臥天，闽西人。

5. 军法处长李杨鑑，安溪湖头人，曾在北大法政系毕业。

6. 军医处长陈育德，诗山鹏峰人，系陈国辉的老军医。军医处主任王璞，系浙江人。

乙、各部的人事和驻地

1. 第一团团团长陈育才，九都人，系绿林出身，为陈的嫡系部队，但目不识丁，庸碌无才。该团驻防惠安县，辖有施德成（又名施两）、陈维金和陈成舟等三营。

2. 第二团团团长陈佩玉，南安莲塘人，曾在中学肄业，任过小教。初随秦望山当排长和连长，其后为陈所用，历任副营长和营长等职，在陈旅的军官中，才干较强。该团辖有陈海波、林妙庆和潘明德第三营，驻于南安溪美至安溪一带。

3. 第三团团团长彭棠，晋北山顶彭人，系绿林出身，目不识字，个性凶恶粗野。初跟陈为护兵，由连排长升至团长，为陈得力的股肱。该团辖有彭德山、李雄和陈寿宣等三营，驻于永春和德化一带。

4. 补充团团团长刘超然，初任副团长，由陈自兼团长，因刘资望尚浅，欲任以团长恐众不服，其后刘才升任团长，在团长中其年纪最少，亦较有才识，但对于军事缺少经验，统驭部属较差。该团辖有代同山、章铭和刘萧等三营，驻于洪濂和河市，另一部驻石狮和安海等地。

5. 独立营营长林松轩，系龙岩的土匪，陈在龙岩时将其收编。该管辖有三连，驻于大罗溪和仙游等地。

6. 特务营营长李忠，南安大宇人，精通文学，较为机智，善于待人接物。该营辖有三连，担任司令部的警卫和泉州城防。

7.工兵营营长陈观涛，惠安县人，系绿林出身。该团辖有三连，驻于泉州郊区。

8.炮兵连连长黄天星，诗山人，系军校出身。该连有迫击炮和小炮八门，直属旅部，驻于泉州城内。

9.机枪连连长马得胜，北方人，系行伍出身。该连有重机枪八挺直属旅部，驻于泉州城内。

10.巡缉大队大队长郑明智，系九都人，亦绿林出身，为陈的得力骨干。该大队辖有三连，驻于诗淘码、罗溪和九都等地。该大队系泉州财政处的税警编制，亦归旅部直接指挥。

第一混成旅除以上部队外，又在诗山南师的校址创办有军官训练所，以第二团少校团附高峰调任该所教育长。高系四川人，亦军校出身。该所总队长雷镇钟，系湖南人，亦军校出身，为第三团少校团附调任。训练所成立军官队和军士队各一，召集各部的军官和军士轮训，同时亦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参加受训，培养为预备干部。

关于财政方面，陈在其辖内各县设立各种捐税繁多，其中以烟苗税为最巨宗，其次是货物税和营业税。省财政厅为保证泉、永各城的税赋收入，乃委刘超然兼任泉永财政处长，由陈燕宾主办财政处的税务，在八县所征收的税赋除按规定额缴交财政厅外，其余悉归陈所有。地方的税收，主要以东西溪的货物税和各县的营业税，收入颇为大宗。各县的行政费是由各县的钱粮附加收入开支。各地的建设费和教育费，均由各地自行筹派，香楮和屠宰税亦收为县的教育费。其他的苛捐杂税，名目众多，赌博有赌捐，妓院要交花捐，家家户户要纳所谓门牌捐，税额是以各户的财力为准，一般要数十元，多的要数百元，真是“生财有道”。当时烟苗税为陈国辉最巨的经济收入，在其管辖的八县皆强迫大种鸦片烟，每乡所征的烟苗税都在十万白银之数，八县所征收的税款以千万计，其庞大足以惊人。斯时泉州设有禁烟督察处，以郑

系竹为处长，各地又设立公膏局，用低价向群众收购烟膏，以高价售出外地，给各地的鸦片分管，从中获取暴利。各县的烟苗税由驻军负责催收，如有违抗者则格杀勿论，因此人人畏惧，任其榨取，不敢稍加抗拒。时惠安山腰群众因承担不起苛重的烟苗税，群起冒死反对，陈即令第一团陈维金部进行镇压，群众杀伤十余人，忍泪吞声，遭受摧残，无处申诉。

陈国辉榨取八县的民脂民膏，财库充满，遂在厦门开设益南银庄，以雷邹鲁主持银庄的业务。雷系南安码头坑内人，早年旅菲经商，其后回厦与同乡合开三春旅栈，善于钻营，有了雄厚的资本，乃在厦大肆经营房地产业和各种投机事业，获取巨大利润。陈国辉的财力日益充裕，即向国外购买军火，大加发展实力，曾向外国军火商购进军火数次，其中最大批者价值二百余万元，购入有炮四门、轻重机枪四十余挺、步枪千余杆。其时海军在厦设有海军航空处，陈文麟任处长，善于奉迎，曾为陈国辉计划创办航空，代向国外采购飞机一架，价值十余万元，在泉州、永春和安溪修建小型飞机场。自此陈国辉往来各地，均由陈文麟亲为驾驶飞机，至其临死之前，犹在仙游赶建机场。

陈国辉坐镇泉州时，在其辖区内的股匪都归收编，惟是泉州著匪高为国，尚拥有千人，仍盘踞在福山腰一带；另有惠安著匪汪汉民，亦拥有数百人，占据惠安田船一带地方，两者互通声气，抗不受陈收编。陈国辉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见高、汪抗拒收编，即亲率大军进剿，由泉州向福山腰和冯山岭进攻，并令陈佩玉部由河市包围后路，吴晋源部堵截四都去路。高部被攻后，即顽守清源山和双阳山，与陈部相持约一个月，其后渐不支，清源山和冯山岭相继被攻陷，高见老巢失守，遂乘夜与林应芝由河市潜逃仙游，再远走福州。高为国逃跑后，其部属皆投降或收编，陈部计缴获枪械约一千余杆。陈剿除高后，再率部进剿惠西汪汉民，汪自计不敌，遂将队伍遣散，自己逃往上海，余部

皆出受陈收编。省府和方氏大加表扬陈国辉剿匪有功，特晋升中将军衔，同时加封泉永警备司令之职。

陈国辉自1930年至1932年统治泉永八县，独揽军事、政治、经济的大权，各县县长必经其推荐，然后委任，如德化县长王信岳、安溪县长谢辑照和王寿松、南安县县长洪文德和叶祖仪、晋江县县长余辉照、永春县长陈维垣，以及其他县长等，均系其一手任用。斯时甚至八县司法的行使，亦皆要以其意志为转移，几成为小军阀割据的局面。陈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和博取个人的荣誉，在其所辖的地区同时也提倡兴办教育和建设公路，并利用各地的豪绅为其统治的工具，如泉州的陈昌虞、李幼岩、曾焕濬、谢杰英、蔡振祥、王仲声、陈幼三和李应时等均为其所用，分别办理商会、教育、建设以及税务等事。其时陈并敦请满清举人苏菱槎（又名镜潭）为其编修陈氏族谱，又聘请戴世凤编修南安县志，为其歌功颂德，显祖荣宗。在这个时期，泉永各县的教育事业颇为兴盛，交通事业亦大有发展，尤其是南安县比较发达，全县共有小学二百余所，中等学校也办有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等三所，此外又修建有诗山公园和诗山图书馆，并在南师校址开辟一公共体育场。1930年秋曾在此举行安、南、永三县运动会，并邀请厦门集美学校参加，该校体育教员陈延廷亦被聘主持运动会。南安的交通在这个时期也颇为发达，新修的公路达六百余里，和原有公路合计，全县共长八百二十四里。各乡皆有公路，汽车四通八达。当时修建的桥梁和涵洞，亦以百余计，其中工程较大的钢筋水泥桥，有洪濂大桥、九都渡潭桥，鹏溪桥、罗溪桥、诗山长潭桥、淡美桥和淘口桥等七座。其他如石井的轮船码头亦已动工建设，后因陈被捕而停建。关于泉永其他各县的教育和交通事业，在这个时期也同样有所发展，各县增设的新旧学校共达四百余所，中等学校在晋江办有国专学校，在安溪办有矿务学校。当时泉永的教育事业称为全省之冠，刊印有“泉永教育

专号”。至于交通方面，泉永其他各县共修建公路二千多里，建筑大小桥梁和涵洞共有数百座，泉州新桥即于此时修建。关于泉永当时的建设情况，亦编印有“福建永德安南四属工程汇刊”，记载甚详。陈国辉为博取名誉，印发“教育专号”和“工程汇刊”颇多，分赠国内外的机关和团体，以及各地名人。并在泉州创办“双江日报”，广为宣传。由此，陈在泉永举办教育和交通得到很高的声誉，时江苏的教育家熊翥高亦被聘来泉讲学和指导教育，上海哲学博士李石琴和省教育厅长程时奎等曾先后来泉视察教育，亦皆称赞不止。程时奎曾说道：“土匪懂得办教育，可以算是很不错”。

陈国辉在兴办教育和交通建设时，各地均成立有教育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负责筹派经费和民工，以及办理各地的交通和学校。各校亦成立有校董会，负责筹资建筑校舍和维持学校的经费。当时建设委员会的委员和校董会的负责人都系各地豪绅，多数假藉兴学和建设的名义，舞弊营私，损公利己。斯时各乡的教育经费除将公产和公款拨充外，不足之数再向该乡富户筹募一部，其余则按人口或田亩摊派。委员和校董则从中渔利，大发其财，对学校和建设仅敷衍从事，因此，所建的校舍质量低劣，不能耐久，未几多数倒塌。各地的公路亦系摊派民款民工建筑。群众负担繁重，引起群众对教育和建设发生反感，以致当时的学校和公路成为民怨之地。因此，各地的学校和公路都不得群众的爱护，至陈国辉死后，乡路大都破坏无存，学校亦多关门大吉。

六、陈国辉的下场

(1932~1933年)

陈国辉个性刚愎自用，专横独断，目光炯炯，望之可畏，人皆称为“贼目”，手段凶暴残酷。当北洋军统治泉州时代，陈国辉的第一营长黄国治，系诗山占奎村人，虽江湖出身，为人机智

能干，且善于待人接物，颇为当地人士所拥护。诗山系陈的根据地，其手下幕士和官兵多为诗山人，因此诗山得失，关系至巨。时黄国治颇得诗山人心，陈系九都人，且不得人心，陈国辉认为黄国治对其将来大为不利，时怀妒忌，思以除之，于是乃乘在石碇与孔昭同部作战时，在战场上亲自用手枪把黄暗杀，而推说是战死，蒙蔽其事。事后，陈在诗山特为举行隆盛的殡礼，扶棺痛哭流泪，藉以掩人耳目，不知者均言陈重仁义，爱惜部属，其居心可云奸险之至。陈国辉幼未读书，智识有限，眼光狭隘，缺少远见，凡事常以先人为主，不加深思，详察是非，其后且骄矜自大，屡固执成见，不纳人之建议。陈的特长之处，即记忆力甚强，对其部属的姓名，一经认识，即能牢记。关于人员、武器、军需、弹药以及财物等的数字，皆能一一背诵，瞭如指掌。陈虽目不识丁，但听谈古典成语，亦能久记不忘，临其登台演说之时，犹能头头是道，亦娓娓动听，俨然黉门中人。陈对其宗亲部属，纵容袒护，任其恃势凌人。当其得势之时，其族亲和部属皆仗势作恶多端，群众听到“九都人”，先惧怕三分。

陈国辉统治南安前后共达十六年，自其八都下山后，即从诗、淘、码等侨区掳掠勒索起家，历次失败之后，亦再榨取此侨区的膏血，得以重图恢复。因此，把此视为禁脔，不肯他人染指，不论部队调至何处，仍派有得力的心腹坐镇。在陈国辉长期统治下，诗山侨区不但民脂民膏被吸净尽，而且草菅人命，生命毫无保障，被其杀戮，时有所闻。甚至侨眷常遭侮辱强占，如陈国辉本身的四个正式太太中，就有三个是强占侨眷，其二太侯罕、三太叶秀莲和四太蔡瑞堂，均系先奸而后强娶。海外华侨其时虽欲投资建设祖国家乡，无如荆棘满途，其有归者，如坐针毡，寝不安眠，饱受惊惶，辄遭敲榨勒索，一生血汗，常付之流水，迫使热爱祖国的侨胞，许多全家避难迁移南洋各地，挥泪离开可爱的家乡。侨乡遭受陈国辉的蹂躏荼毒，海外华侨莫不切齿

痛恨，但处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亦无可奈何。1931年，诗山溪东乡旅居马来亚的华侨捐资修建该乡的诗溪小学，时该乡有林知绵、林受绵、林向高等三人操纵闾里，人皆称为“三毒”，华侨捐建学校之款被其舞弊侵吞。该乡有马来亚侨领林理绍适归里探亲，欲向其清理建校账目，“三毒”深为仇恨，即贿赂叶祖仪加以谋害。叶竟以“破坏教育，藉机勒索”的罪名加诬林理绍，即在泉州将其逮捕，亦不加以审讯，立予枪决，引起海外华侨十分愤怒，纷纷函电向中央和省府控诉。同年洪文德任南安县长之时，丰州归侨武煌，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在海外颇有声望。洪欲敲竹杠，无故令其警备队队长吴鸣海将颜拘捕勒索，颜花了约二万白银，才获释放，后避居鼓浪屿。南洋各地侨团深为颜和被害华侨不平，曾联合向中央公诉陈国辉的罪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各级军政，互相包庇，朋比为奸，海外华侨虽屡次控诉，均如石沉大海。海外华侨视此腐败政治、愤懑不堪，无处伸洩，乃在南洋报刊揭发吐气。斯时菲律宾岷里拉的华报，曾仿“李密陈情表”刊载一篇讽刺的文章：“……国辉无老方，无以至今日，老方无国辉，无以终余年，方陈两人，相依为命，朋比为奸……”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淞沪，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博得全国人民拥护，声誉甚隆。沪战结束后，该军奉调福建，消息传出后，海外华侨和福建群众莫不欣幸万分，认为该军有抗日的隆誉，如入主闽政，必能符合人民的愿望。于是海外和各方控诉陈国辉的函电，有如雪片纷飞。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九路军入闽，蒋光鼐任福建省主席，蔡廷楷兼任绥靖公署主任。时该军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和独裁统治不满，蒋、蔡接得各方控诉陈国辉的函电纷至沓来，为争取民心 and 海外华侨，即决定速办陈国辉，于是拟订计划和步骤，十九路军先令毛维寿师开泉州接防，并令第一混成旅全部集中仙游待命。

陈国辉接到十九路军的命令后踌躇难决，乃召集高级幕僚和主要部长举行会议，研究对策，共商大计。会中彭棠和少数人员主张不接受命令，加以抗拒，苟被迫应战，至不得已时，可以退守永、德内地山区，与之相持，以观形势，候机再作良图。但这项建议为参谋长余承尧和大多数人员所反对，而主张应服从十九路军的命令，其理由是该军在淞沪抗日，负有隆盛的声誉，颇得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而且该军英勇善战，难以匹敌，苟抗命而战，不但自取其败，并会遭受各方舆论的谴责。陈国辉认为后者主张理由较为充分，并望能附该军的骥尾，较有前途，于是决定遵从十九路军的命令而行动。决策既定，陈即令该旅驻泉州和惠安一带的部队候十九路军到达接防时，应开仙游集中，同时旅部亦迁移永春，并将储存在泉的军需械弹以及私人财物，悉数运至九都，以防万一。时在端午节，毛维寿师乘轮由秀涂登陆，进入泉州，陈亦偕群众举行热烈的欢迎。七月，陈旅大部撤离泉州，陈国辉本人亦回九都，亲自处理运回的械弹和物资，并将私人的大宗金银和鸦片烟土等妥为收藏。十九路军进驻泉州、惠安之后，毛维寿又亲至诗山和九都拜访陈国辉，以安其心。未几，毛维寿要陈部驻永春、德化和安溪的队伍调至仙游集中，而把防地移交。其部属多反对放弃永德、等地，但陈本人始终听从指挥。八月，即令陈佩玉率第二团至仙游集中，又令彭棠率第三团至湖洋待命，于是十九路军张薄旅顺利进驻安、永、德三县的地方。

第一混成旅于八月全数在仙游集中后，陈国辉本人尚在九都逗留。九月初旬，省府命陈和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维远同赴福州举行会议。陈于同年旧历九月初十日至仙游，迟迟未行。蒋、蔡又用方声涛的名义电催起程。陈在仙游又赶辟飞机场，以备乘机赴省。旧历九月十五日，由陈文麟驾机直飞福州。陈到达福州下机后，十九路军总部已派人暗中监视。是夜陈宿于南台大旅社，尚

不知祸已临头，犹嫖妓取乐。翌早，林知渊邀请陈同乘单车赴省政府晋谒蒋、蔡，陈在会客室候调见，由林先入内报告，但林约一小时才出，又迳自离开。未几，省府卫队突入会客室，将陈逮捕，气得陈顿足震怒，耳聩眼红，入狱时，神志亦已昏迷。

十九路军逮捕陈国辉入狱后，过了三天，驻泉部队即派兵一营入九都搜缴陈所埋藏的枪械和物资，同时由诗山派队赴南师缴收军官训练所的枪械。陈的长子朝阳，斯时亦在军官队受训，即赶至仙游旅部报讯。第一混成旅官兵其时尚不知陈被扣的情况，至朝阳来报军官队被缴械时，才知陈在福州必凶多吉少，速即通知各团团长和独立营营长举行会议，讨论对策。在会议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未有决策，仅先举陈佩玉代理旅长职务，并派人往厦请洪文德赴福州斡旋，设法营救。在会议中讨论对策时，有的认为欲挽救陈出险，必须采取先发制人，部队应迅速行动，先下手解决第三混成旅陈桐驻仙的部队，再劫持基督教会的美籍教士为人质，藉以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用外人对十九路军施加压力，学山东临城的做法；其次全力攻取永春和德化，凭藉险要，固守与抗；同时以郑明智部至南安各地破坏交通，以陈观涛营至惠安一带活动，截断十九路军的增援部队，并骚扰其后方，配合主力攻占永德。在军事行动的同时，应采取对外的策略，派员联络闽北的卢兴邦和漳州的张贞共同反对十九路军，取得一致行动，再行通电方声涛在省主持公道，要挟蒋、蔡释放陈国辉。上述采取紧急措施的建议，会中无有敢作决定，议论不一，有的认为如部队劫取外籍教士，采取行动，不但对陈无益，反使其罪上加罪，有“投鼠忌器”之虑。由于各执其是，踌躇不决，且群龙无首，内部不洽，致束手无策，坐以待斃。

陈国辉被押七日后，十九路军各方布置就绪，即由泉州调动一旅兵力，经惠安向仙游进击陈旅，同时派永春和德化的部队，由后方围剿。十九路军入仙游时，陈部不敢对抗，全部退至德化

凤警山，于是该军遂进围凤警。陈旅全部被围困后，十九路军即开始攻击，陈部缺少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官兵均无斗志，惊惶失措，勉强应战，稍轻交锋，即已纷乱，争相奔逃，死伤颇多，大部被俘缴械，其余溃败四窜，各找生路。补充团大部被歼，刘超然残部逃入德化，又被当地民军张雄南截击缴械，仅以身免。第一团和第三团被围歼后，大部损失，亦各率残兵败将冲出凤警，逃入湖洋，沿途又被当地民军刘子宽和涂友情等拦截缴械，陈育才和彭棠仅带少数残部逃入八都和山预。第二团冲出凤警后，尚有三百余人，由陈佩玉率领逃至桂洋时，亦被十九路军和民军堵击，部队星散，仅剩十余人经安溪逃回南安。至此，称雄闽南的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全部就歼，一败涂地。

陈国辉被捕入牢之后，其家属和部下虽奔走营救，均无效果。其时方氏亦自身不能保，心有余而力不足，坐视其毙。陈被捕约三月，其所辖的第一混成旅已全部就歼，地方亦安宁无事，至此，蒋、蔡乃将其押赴福州东湖执行枪决示众，时为1934年1月，年三十五岁。

抗战初期武汉文艺刊物述略

阳 海 清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南京政府的西迁，武汉一时成为所谓抗战的中心。在这种情势下，散居各方的许多文化人士，包括一些知名作家、学者，纷纷云集武汉，一些文艺刊物也迁来武汉。特别是周恩来同志来到这里，创办《新华日报》，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联系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指导文艺运动，使得武汉成为全国文艺活动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春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武汉出版发行的报刊达200多种，其中纯文艺刊物18种，许多综合性刊物和专门性刊物也常常刊登文艺作品。现代文学史专家司马长风认为：“武汉时期只是个过渡时期。作家在那里做了一次大团聚大检阅，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确定了写作的方向，很快便因战局的发展、武汉的撤守，分向东南西北各奔前程了。在武汉所办的刊物，也只是在匆忙间抓起一把种籽，洒到各地之后才分别发芽长苗，开花结果。”尽管这些期刊尚属草创，刊期也不长，但它们毕竟是抗战文艺运动的滥觞，在新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抗战文艺运动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从刊登的文章和作品看，其内容大多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宣传抗战救国，报道战地情况，揭露敌人残暴，反映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生活，成为文章和作品的主题。而在表现形式上，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体现“作品入伍，文章下乡”的精神，通过文艺作品去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仇敌忾地抗

击日本侵略者，大多采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文艺样式；在篇幅上，限于写作条件，大多短小精悍，极少鸿篇巨制。尽管在抗日主题的挖掘上还不够深刻，在通俗形式的运用上也欠圆熟，但是将文艺与现实生活如此紧密地结合，有意识地将文艺作为宣传的武器，却是本时期文学刊物的一大突出特点。

本文拟就文艺刊物、报纸副刊和综合性（或专门性）期刊三种类型，各依创刊先后，就每种刊物的创刊终刊时间、中间变迁情况、编辑和出版发行人、宗旨、主要撰稿人和重要作品等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以为文化史研究之参考。

文艺刊物

（1）《文艺》

胡绍轩、魏韶葵主编（自第五卷三期起由胡一人负责）。轮底文艺社（后改名武汉文艺社）出版，杨锦昱为社长。先后由武昌新生命书局、汉口现代书局和良友公司、中华图书公司经营、发行。每月一期，年分二卷。1935年3月15日创刊，1937年9月¹5日出至五卷三期后，“为适应抗战时期之需要及省节物力起见”，暂时停刊，11月与《奔涛》半月刊社联合出版战时旬刊《文艺战线》；1938年5月改回原名，不数期又停刊；1947年再复刊，1948年4月出至六卷三期终刊，前后共出33期。它是武汉地区自大革命失败后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个文艺刊物，也是抗战前后武汉地区自身创办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文艺刊物。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控制。

该刊主要撰稿人有袁昌英、苏雪林、胡绍轩、蒋山青、邵冠华、文治平、丁韬、紫墟、魏韶葵、王道胜、甘运衡、罗隄岚、陈嗣音、赵景深、王云开、杨邨人、罗念生、袁丛美、赵清阁、马彦祥等，多为武汉地区的教授、学者和文艺青年。

1937年前各期发表的重要论文有丁韬《新文艺动向与青年作家》、陈嗣音《诗之题材论》、邵冠华《徐志摩论》、胡绍轩《戏剧的团圆论》和《中国话剧运动应趋之途径》、一怒《民族主义的文学略论》、赵景深《新诗的形式》、王云开《电影剧本作法概论》、苏雪林《论邵洵美的诗》和史紫枕《文艺的现实性》、《鲁迅论》、《文艺底路线》等；主要作品，小说有严振开的《誓言》、《砥柱》、《复活》、《病》、《四个人以往的一个人》，胡绍轩的《奸魂》、《讨保》等；剧本有严恭的《梅香姑娘》、马彦祥的《械斗》、胡绍轩的《汉奸导演》、胡春冰的《抗战的插曲》、成其志的《四个可怜的灵魂》、逸民的《归来！国魂》、王绍清的《战争的插曲》和袁丛美的电影剧本《暴风雨》等；邵冠华、丁韬、宋雪亭、锡金、获帆、王道胜、甘运衡、朱湘等发表了众多诗篇。二卷一期辟有“作者自述”特辑，胡怀琛、李金发、丁韬、顾仲彝、甘运衡、周楞伽、陶里、胡适存、严振开、邵冠华、王一心、王任叔、段可情、郑道明写了自传或创作经验。三卷二期为“非常时期文学的专号”；三卷四期为“本社第一次戏剧演出”专号。

该刊在1937年更进一步明确打出“民族文艺”的旗号，四卷一期辟为“民族文艺”专号，发表了袁昌英《现阶段所需要的文学》、苏雪林《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和由史紫枕等七十四人署名的所谓《武汉文艺作者共同宣言》，对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和普罗文艺运动，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加以贬斥、否定和攻击。

另一方面，在全民抗战的热潮里，这一年该刊也发表了更多一些的有关抗战的文章和作品，不管其主题挖掘的深度如何，也不管作者和编者是在哪个党派的立场，应该承认，它们都程度不同地起到了宣传抗战的作用。小说方面，发表了魏韶篆的《妮娜将军》，主题是除奸御侮；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为“抗战戏

剧专号”，其《献词》说：“我们从事戏剧运动的朋友们，应该拿出我们的力量，把救亡的意识宣传开去，把抗战的情绪团结拢来。”发表了胡绍轩的独幕剧《芦沟桥》、蒋山青的诗剧《芦沟晓月》、李朴园的三幕剧《烽火》和胡绍轩的群众歌诵剧《斗争》，同时登载了刘念渠的论文《现阶段的中国戏剧运动》和墨巴的《武汉剧运史话》等论著、评介、漫语、史料。五卷三期为“抗战诗歌特辑”，发表了冯乃超的《诗歌的宣言》、平林的《动员曲》、宋雪亭的《他们这一团》、蒋山青的《木更津航空队之幻灭》、伍禾的《骡马市大街》、陶云生的《给全国武装同志们》、甘运衡的《奋起歌》、王道胜的《芦沟桥上》和锡金的朗诵诗《胡阿毛》等。

(2) 《西北风》

西北风社编，实为史天行编辑。武汉华中图书公司发行。林语堂在上海出版的《人间世》于1935年底终刊后，史天行在武汉编辑同名刊物，出两期后，改名《西北风》。1936年5月1日创刊于汉口，1937年3月出至第16期终刊。系思想、人物、山水的散文半月刊。其撰稿人有郭沫若、许杰、苏雪林、李金发、叶鼎洛、陶西圣、傅彦长等名作家和学者。

(3) 《心血》

武昌心血文艺社编，约1936年底或1937年初创刊，1937年出至二卷三期终刊。第一卷为旬刊，第二卷改为半月刊。系几个文学青年合办的同人刊物。在二卷一期的“社语”中说：“谈到内容，终因为我们仅都是些饥饿的孩子，正找寻知识充粮食的当儿，自然，文字的技巧和意识总脱不掉稚气，不过我们有着雄壮的‘心’，沸腾的‘血’，始终是乘着‘促进民族复兴’的意旨，去打破艰辛与困难……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青年，有的是勇气，应该表现的，就是要有走到时代尖端的精神。”

主要撰稿人有陈家琰、陈家瑞、纪九惠、刘学晋、志酬、俊

之、谭明初、新民、王道、汪洋、影萍、秋萍、心鸣、周镇南、尚蜀贤、沉渔等。所登之作品均系一些短小的诗文，多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如谭明初的《防空演习》、心鸣的《黑夜的抗战》、影萍的《夜行军》等。

(4) 《青年文艺》

青年文艺社编辑、出版、发行。1936年11月创刊于武昌，1937年7月终刊，第一卷出六期，第二卷出两期，共出八期。发表的论文有吴绍文《文艺的标帜》、严吉《悼鲁迅》、杨诜《永远“埋在活人的心中”》；小说有秦霸《换防》、杨铄《在塞外》、矢锋《遣散》、李槃《浮尸》、腾军《释放》等；散文有程万《雨天之忆》、李槃《平津道上》；诗歌有萧枫《疯人之歌》、田时丰《忆故乡》等；戏剧有撞关女士之三幕剧《崩溃》等。

(5) 《夜航》

夜航文艺社编。1937年1月创刊于武汉。月刊，共出七期。撰稿人有郭沫若、黄炎培、巴金、许钦文、金满城、何剑薰、邵冠华、冯腾等。

(6) 《奔涛》

王亚民主编兼发行，魏韶葵编辑，武汉奔涛半月刊社出版，上海杂志公司和中国图书公司经售。1937年3月1日创刊，出完第九期后于同年11月与《文艺》合并，改出《文艺战线》旬刊。

这是武汉地区“七七”抗战爆发前存在的极少数量的文艺刊物之一。撰稿人有胡绍轩、苏雪林、魏韶葵、阮成璋、丁韬、赵景深、袁昌英、文治平、李青崖、吴其昌、朱全纪、马耘砂、严振开、万家达、刘念渠等。

(7) 《朝曦》

岳英、李子楣编，吴之帆发行，1937年4月创刊于汉口，旬

刊，仅见一期。撰稿者均非名人，但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作者们抗敌救亡的强烈愿望。

(8)《奔驰》

芳骥编辑。1937年5月10日创刊，终刊时闻不明。所见为创刊号，有毓瑾写的《卷首语》、秋萍《咆哮吧！长江！》、心鸣《夏》、芳骥《拚！为生存》、木天祥《海滨上的农民》等。其作者大都同在《心血》投稿。

(9)《光明》(战时号外)

洪深、沈起予主编。《光明》系继《太白》而办的半月刊。1936年6月创刊于上海，1937年8月停刊。同年九、十月间移至武汉，委托孙陵和杨朔主办的北雁出版社出版“战时号外”(周刊)若干期。诸家目录著录均不详。在1937年10月2日武汉版《大公报》查到“战时号外第23号要目”有：郑伯奇《另一种难民》(小小说)、郭沫若《只有靠着实验》(诗)、艾芜《救亡对口曲》、沈起予《前线归来记》、穆木天《全民族的生命展开》、金人《关于组织难民的基本问题》、尤兢《皇军的伟绩》、沈起予《今年用飞机大炮纪念九一八了》、郭沫若《归途》、臧克家《抗战的火苗》、郑伯奇《虹口地皮大王的死》(小小说)、杨朔《吴淞口外》、K·K《艺术家和游艺家联合起来》。其办刊宗旨与作者阵容由此可见一斑。

(10)《战斗画报》

宋一痕主编兼发行。郑用之、刘旭沧、张印泉、罗谷荪、叶浅予、特佛、翦伯赞、白波、瞿江、光未然为编辑。1937年9月创刊于汉口，同年11月停刊。周刊。第五期“编辑部告白”称：“本报采用外稿，凡合乎全面抗战原旨之图片文字漫画，均所欢迎。”胡风、徐步、洪深、冯乃超、王莹、丽尼、锡金、徐盈、张季纯、陈白尘、袁昌英等均曾为本刊撰稿。间登文学作品，如锡金《千人针》(朗诵诗)、罗烽《从人群的心里生长，永不从

人群的心里凋落》（诗）、杨朔《丑恶的屠杀—静海陷落后的一段速写》、白朗《光荣的流血》、罗烽《漫谈死的艺术》等。第七期为“第八路军抗战特辑”。

（11）《大家唱》

不定期出版的书籍型音乐刊物。曾昭正、李行夫合编。1937年9月创刊，大约出过四辑。选录过冼星海、贺绿汀、张寒晖、吕骥、麦新、张曙、沙梅、孙慎等人所作的抗日歌曲。本刊是当时歌咏队的教材，一印再印，影响甚大。

（12）《哨岗》

丽尼、聂绀弩、杨朔、陈荒煤、罗烽等编辑。1937年10月16日在汉口创刊，仅出一期，即遭查封、没收，售出的被追回。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以“本社”名义发表了《纪念鲁迅先生》一文；杨朔写的报告《虎门之战》，记叙了中国海军在虎门口外差点打沉一条日本兵船的情景；高兰的特写《记天照应》，记录了东北抗日义勇军首领天照应的英雄事迹；此外，有罗烽的诗《光明跃在东方》、丽尼和荒煤合写的剧本《七·二八之夜》、徐盈的小说《高粱秆》、杨盈的速写《双十日的火蛇》和绀弩的杂文《是与非》等。

（13）《七月》

胡风主编。1937年“八·一三”之后，上海的大型期刊纷纷停刊，为应急需，遂出版《战火文艺》旬刊，后改《七月》；同年10月移至武汉，改出半月刊，由汉口生活书店代售；撤到重庆后出月刊，1942年曾被国民党当局禁止，直至1945年改出《希望》。

本刊在武汉出版、发行期间，与当时聚集武汉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许多知名作家与青年作者建立了联系，他们通过各种文艺样式，首先是以报告、通讯、特写的形式，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国人民的生活面貌，成为本时

期的一块重要文艺园地。

主要撰稿人有曹白、萧军、邹荻帆、胡风、绉弩、端木蕻良、刘白羽、东平、田间、艾青、草明、萧红、辛人、陶雄、丁玲、魏猛克、蓬麦哲、鹿地亘、绿原、冀沅、罗烽、舒群、孙铤、塞克、谢挺宇等。

发表的报告、通讯、特写，有反映民众活动的，如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杨可中》和《在明天》、王春江的《河上别》、萧红的《一条铁路的完成》等；有描写抗日英雄的，如端木蕻良《记孙殿英》、东平《叶挺印象记》、东东《吴履逊和季子夫人》、史萍《田梨先生》、汝尚《魔掌下的两战士》、力群《张培松》等；有表现战场生活的，如东平的《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S·M的《咳嗽》、黄明的《雨雪中行进》等；有揭示敌占区或大后方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情绪和愿望的，如刘白羽的《逃出北平》（被占区域人民生活断片）、姚烽《从捕杀网里脱出》（北平通讯）、辛人《洛阳桥》（上海通讯）、陶雄《某城防空纪事》（地方特写）、草明《遭难者的葬礼》（广州通讯）、林间《同蒲煤站》（山西通讯）、葛琴《在江边》（浙江通讯）、吴组缃《差船》（旅行通信）等等。

散文、随感、回忆有曹白的《烽火杂记》、田间的《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上海》、萧军的《他们等待我去复仇》和《做买卖》、俞棘《失去了健康的悲哀》、曹白的《初春偶笔》、草明的《我是那样接近敌人的》、辛人的《弱者的强处》、萧红的《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

本刊也发表了众多的表达人民呼声的诗篇，如田间的《战争的抒情诗》、《晚会》，胡风的《敬礼》、《给怯懦者》，艾青的《北方》、《乞丐》、《北方诗草》、《他起来了》，蓬麦哲的《归来啊，北平！》，侯唯勤的《斗争就有胜利》，邹荻帆的《江边》等。

小说方面，除连载萧军的《第三代》外，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如柏山《一个义勇队员的前史》，黄既《严玉邦》，陶雄《040号机》、《大王与小鬼》，池田幸子《西崽的故事》等。

剧本则有塞克、端木蕻良、萧红、绉弩集体写作的三幕剧《突击》、洗群的《反正》和丁玲的《重逢》等。

创刊号辟有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绉弩、萧军、胡风、端木蕻良等撰文。

以胡风为代表，以《七月》为阵地，后来以自己的文学理论和实践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人称“七月派”。因此，作为早期在武汉所发表的文艺理论文章和所组织的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值得注意。重要的论文有胡风《战争时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和《关于创作的二三理解》、端木蕻良《寄在战争中成长的文艺火枪手们》和《文学的高度、深度和强度》、辛人的《谈公式化》、田间的《论我们时代的歌颂》、欧阳凡海《关于小说朗读》和雷韦、沙可夫、柯仲平《关于诗歌朗诵……实验和批判》等。

第七期发表了《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记录》，有艾青、东平、聂绉弩、田间、胡风、冯乃超、端木蕻良、萧红、王淑明、迺夷参加讨论。谈话的要点包括：（一）抗战后的文艺动态印象记；（二）关于新形式的产生问题；（三）作家与生活问题；（四）今后文艺工作方向的估计。

（14）《抗战戏剧》

田汉、马彦祥主编。华中图书公司出版发行。半月刊。第一卷出8期，所见最后一期是第二卷四、五期合刊，终刊时间不详。

这是在抗战初期影响最大的一份戏剧刊物，不少戏剧界名人为其撰稿，发表了众多的理论文章和剧本，对抗战戏剧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本刊登载的重要理论和评论文章有：编辑部写的短论《进一步严肃我们的阵线》和《抗战戏剧的另一使命》、《争取抗战演剧的自由》、《抗战戏剧大众化》；沈西苓《目前戏剧运动上几个待决的问题》，易庸《旧剧界赶紧起来为民族复兴而奋斗》、《怎样打破抗战戏剧的剧本荒》和《抗战中的〈灰色鸟〉》，欧阳予倩《起来！旧剧界的同志们》，田汉《武汉剧坛印象》、《关于阿Q正传的上演》、《戏剧艺术家的志节问题》和《展开戏剧的游击战》，马彦祥《我们的意见》、《关于抗战戏剧工作》和《一年来戏剧作战的检讨》，郑君里《抗战戏剧运动草案》，张庚《新的剧本创作》和《戏剧的新概念和旧概念》，洪深《在斗争中成长》，常任侠《演员与观众的联系》，凌鹤《抗战演剧之大众化的实践问题》，未明《国防戏剧的新任务》，陈权《把戏剧送到前线去》，赵魁《抗战救国与戏剧运动》，李春舫《战时戏剧形式的发展》以及王平陵《战时移动演剧》等。

同时，本刊还组织洪深、穆木天、阳翰笙、周彦、胡绳、史东山、光未然、陈波儿、欧阳红樱、徐步等著名文学家、剧作家和戏剧表演家以“抗日时期的戏剧运动”为题进行了讨论，在第一、二期开辟了特辑；尔后又曾召集“抗战戏剧座谈会”。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本刊发表的各类剧本多达四十余个，其中有阳翰笙的《塞上风云》，田汉的《芦沟桥》和《土桥之战》（歌剧）、《杀宫》（新歌剧），宋之的的《黄浦月》，第二队集体创作的《‘九一八’以来》，晏德的《孤军魂》，舒非的《民族公敌》（一幕剧），凌鹤的《保卫浦东》、《杀敌去》、《再上前线》和《火海中的孤军》，李增援的街头剧《盲哑恨》和《不要打孩子》，欧阳予倩的歌剧《梁红玉》，尤兢的《血洒晴空》和《我们打了冲锋》，沈西苓的《在烽火中》，集体创作的街头剧《三江好》，荒煤的《打鬼子去》，舒湮的《老谷不走了》，章泯的《钢表》，余上沅的《流亡者之歌》，王克勤的

《东北的一角》，陈白尘的《汉奸》，张客的《回头》，秋影的《女性的呐喊》，维持的《自卫》，陈明中的《血债》，集体创作的《再上前线》，话根的《同心合力打东洋》，严恭的《当伙子去》，赵明和吕复的《荣誉大队》，尹克灵的《生路》，老舍的《烈妇殉国》（京剧），姚少沧的《黄鱼汛》，颜一烟的《渡□河》，张国□的《输财救国》（京剧），洗群的《小三子》，欧阳山尊的《大路》，董每戡的《敌》，集体创作的《一条心》，保罗的《夺回广武街》，集体创作的《火》，丁伯骝的《胶东呼声》和亚凡的《杀回河北去》。

1938年新年特大号辟有“戏剧界抗敌协会特辑”，刊有《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宣言》和易庸的《全国性的戏剧组织的再建立》、秋涛的《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经过》等。

几乎每一期都有“通讯”专栏，反映各地剧运情况。其中有保罗《展开戏剧的游击战》、第二队写了《我们要和封建势力作斗争》以及《戏剧游击在南昌》、《救亡戏剧在贵阳》、《台山的救亡戏剧》和有关江西、甘肃、四川、陕西、湖北剧运消息的报道。

（15）《文艺战线》

胡绍轩编辑。武昌文艺战线社出版。1937年11月22日创刊，旬刊，第一卷出八期，次年3月出至二卷一期终刊，共出九期。本刊之前身为《文艺》月刊，1938年5月又改回原名。刊物之指导思想与主要撰稿人大致和《文艺》月刊相同，只是发表的文章和作品多是写与抗战有关的内容，且改为旬刊，出版周期短，更能适应时势。

主要的文章和作品，论文有胡绍轩的《街头剧另一作用的试验》、甘运衡的《抗战时期的诗歌中心任务》、胡考的《漫画与宣传》、马彦祥的《一个建议》；小说有严振开的《清算》、阮成璋的《最后的首饰》；通讯、报告有谢康乐的《送饭》、王云

阶的《给音乐界的朋友们》、紫墟的《布鞋运动》、席珍的《北战场的一角》和《火线上》；诗歌有谢康乐的《别了，桂林》和康健、王道胜、路易士、王家曾、邵冠华、陇雁、胡庶华等人的作品；街头剧有刘念渠的《救国公债》、赵清阁的《最后关头》。此外，还有郑延谷、刘元、熊务民等的歌曲、漫画。

(16) 《抗战漫画》

叶浅予主编。1937年12月创刊于武汉，1940年11月终刊。本刊是全国的唯一漫画刊物。在这里，作者们以生动的笔触暴露敌人的凶残面目，汉奸插尾乞怜的丑态；讴歌了抗战将士们的雄姿，报道了各地救亡运动的情况。图文并茂，常有名家配诗、撰文。执笔人有梁白波、胡考、陶今也、黄伟强、张竹、赖少其、魏而寿、陶谋基、高龙生、张罗平、罗烽、黄苗子、陈烟桥、叶浅予、鲁少飞、江栋良、宣文杰、赵望云、黄尧等。第八期特大号为“全美术界动员特辑”，发表的文章有田汉《全国美术家联合起来》、黄茅《展开绘画界的救亡运动》、倪貽德《洋画家的新转机》、俞平石《抗战和工艺美术》、张善予《国画家应有的责任》、赵望云《战时的国画》、洪雪村《今后木刻的题材》、胡考《关于漫画大众化》、丰子恺《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

(17) 《艺风》

汉口艺风社编辑、出版，周刊，1937年□月创刊，仅出创刊号。

(18) 《中国新诗》

蒋锡金、蒋有林编。1937年□月创刊，仅见一期。为逃避当时白色恐怖的摧残和迫害，系由编者集稿，寄至江苏宜兴排印，再运到上海发行。撰稿人有伍禾、甘运衡、叶平林、周道铨、路易上、锡金、黄昌文、宋雪亭等。

(19) 《诗座》

甘运衡、丁韬、宋雪亭、蒋锡金、王道胜主编。武汉文艺出

版社出版，华中图书公司经售。1937年□月创刊于武汉，仅出一期。共发表三十篇诗作，撰稿人有路易士、林庚、胡绍轩、丽尼、宋衡心、锡金、黄昌文、曹葆华、甘运衡、侯汝华、宋雪亭等。

(20) 《抗到底》

第一至九期由老向编辑，君文发行，华中图书公司总经售。通讯处设武昌千家街47号。半月刊。1938年1月1日创刊于武汉，武汉沦陷后迁渝出版，至1939年11月终刊。

本刊是在冯玉祥的支持和资助下编辑、出版的偏重文艺的综合性刊物。其特征是以通俗的形式宣传抗日，体裁多样，评论、诗歌、小说、剧本、报告、散文、曲艺、歌曲、图画、题辞、书信……一应俱全。

主要撰稿人有冯玉祥、老舍、老向、何容、冰莹、安娥、赵望云、徐中玉、徐旭生、孙晋武、李去非、宋斐如、思慕、张含清、穆木天等。冯玉祥、老舍撰稿尤多，几乎每期都有。除《民众训练问答》外，冯玉祥写有许多诗歌，如《可爱的伤兵》、《丁树本》、《四二九空战大捷》、《击沉敌舰》等。老舍以其如椽巨笔写出了众多体裁的文章和作品，包括论文《是的，抗到底！》、《事情要大家作》，京剧《新刺虎》和长篇小说《蛻》（连载）。

第三期为“抗日负伤将士作品专号”，刊登各战场负伤将士的作品：评论、记载、诗歌；珍贵的手迹插图廿余幅；字画、书信、照片。“各位执笔的战士，大都是肢残胸穿，创痛未已。我们想到这些战士们在病榻上执笔为文的艰苦情景，谁能不感激落泪！”

第五期为“抗日通俗文专号”。刊登的作品有：老向《抗日三字经》、老舍《新刺虎》（京剧）、穆木天《密山县日本强盗屠杀路工》（大鼓词）、冯玉祥《击沉敌舰》和《打麻将》（诗）

张文元《长江封锁线外》（木刻）、赵望云《竹城战》（画）、萧波《范筑先鲁西抗日》（大鼓词）、何容《扛起枪杆去当兵》（小调）、谢思《数来宝》、彭玲《逃难景》（麻城调）等。

本刊在文艺方面所发表的其它重要文章和作品还有：冰莹《忆太仓》、何容《长夜漫漫的北平》、《到伤兵医院去一次吧》、《记模范伤兵李德荣》、《怎样使文章下乡》，张含清《时代的烦闷》，老向《你是不是麻木的？》、《好样儿的游击队》、《反攻吧，中国！》、《义勇军的母亲》和通俗故事《李小姐计杀倭寇》，阜东《伤兵医院见闻记》、《伤兵慈母》，杨春生《从西战场归来》，李代《风·雪·西战场》、贾午《太行山中一隅的动静》，柯朋《阵行线上》，苏子涵《突击》、李去非《我是怎样去到陕公》，徐旭生《征兵》（剧本），陈铭枢《民族精神歌》，邓长耀《全面抗战》（大鼓词），傅承谟、萧雨生《走上沙场去》（歌曲），孙晋武《兵之礼赞》，安娥《孩子们的队伍》（诗），徐中玉《柿子》（随笔）、纪漪《中华勇敢站起来》（歌），徵庸《流亡曲》（故事诗），苏子涵《老人曾瑞祥》（小说），李淇源《泰安被炸记》以及赵望云的画《民间的战士》、《奇袭》、《抗战与春耕》等。

（21）《文艺月刊》

徐仲年、王平陵主编。1937年11月创刊于南京，中国文艺社出版。1938年1月迁汉口，由上海杂志公司（设汉口）发行，以“战时特刊”形式改为半月出一期。现在能查到的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为同年6月17日出版的第十二期，尔后撤到重庆继续出版，直至1941年11月终刊。

主要撰稿人有王平陵、沙雁、郑青士、老向、王家齐、秋涛、云荪、封禾子、方浩、丰子恺、陆志庠、甘运衡、赵清阁等等。主要作品和文章则有：郑青士的鼓书《八百壮士》、《二一八空中大战》和《南京浩劫》，沙雁的报告文学《要塞退出的时

候》，老舍的《王家镇》（平剧）、散文《充满硫磺气息的家乡》和短篇小说《追》。此外，剧本有刘念渠的《后方》、王家齐的《侵略者的毒焰》，小说有方浩的《九九号壮丁》、老向的《永远不死的丈夫》，速写有赵清阁的《汉阳行》，通讯有封禾子的《古城的波涛》、姚家垠的《粤汉途中》和陆印泉的《失陷后的安阳》，诗歌有草莱的《朝鲜人》、甘运衡的《抗战》、呆丁的《割麦》，散文有云荪的《亚细亚的暴风雨》、方浩的《生活在战斗中》，以及陆志庠、刘元的漫画和冼星海的歌曲《祖国的孩子》、《最后的胜利》等。

四月一日出版的第九期，辟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专辑”，收有“文协”的宣言、文告、发起旨趣、简章、入会誓词，以及草莱、吴漱予、王平陵、沙雁、沙浩写的文章。同期还有“国际座谈”专栏，杨公达、陈钟浩、胡秋原、方秋苇、江康黎、邵华、田汉、潘梓年、刘百闵参加座谈。

（22）《抗战电影》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唐纳主编，伊明、刘念渠负责具体编务。1938年3月31日在汉口创刊，仅出一期。内容大致包括：〈1〉探讨“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问题。发表了阳翰笙、史东山、刘念渠、王瑞麟、尹伯林、袁牧之、姚苏凤、金擎宇、袁丛美、费穆、应云卫、唐瑜的文章。〈2〉祝贺“影协”成立。辟有“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专辑”，介绍了筹备经过，刊登了大会宣言，报道了开会实况。〈3〉着重反映当时在汉摄制或放映的抗战电影片的情况，图文并茂。如史东山写了《关于〈保卫我们的土地〉》。此片由史东山编导，吴蔚云摄影，舒绣文、魏鹤龄主演，是在汉口拍摄的第一部抗日救亡故事片，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4〉发表了田汉写的电影故事《回前线去》。〈5〉刊登了其它一些理论或影评文章。如郑用之的《起来，银色的战士们》、适夷的《泪血洒开自由花》、罗

静予的《谈新闻纪录片》、杨弄明的《〈巴纳号〉及其它》，等等。〈6〉介绍全国各地的电影工作情况。如《上海摄片近况》、《青岛剧社》、《日人要检查中国电影》、《来自中国电影制片厂》、《国防电影在华南》（苏怡）等。

（23）《战歌》

音乐刊物。刘雪庵编辑。1938年2月创刊，仅出一期。

（24）《战地》

丁玲、舒群主编。战地社发行，汉口上海杂志公司总经售。半月刊。1938年3月20日创刊于汉口，同年6月5日出版第六期后终刊。

发表了一些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即以抗日为主题的文章和作品。在小说方面，有白朗的《清偿》、舒群的《婴儿》和《血的短曲之一》、赫公的《诗友》、李辉英的《福地》、丑方迹的《哑子》以及朱烈轲的《血债》。

在诗歌方面，有柳舒的《元夜曲》、倪平的《祝福》、成仿吾的《给毕业的同志们》、洪遵的《这是战争底第一个春天》和《我的笔我要磨亮你》、夏伯的《武装啊，上前线》、季琳的《美丽的山城》、倪受乾的《黄河之恋》、陶华的《五月》、耿星华的《回去，到滹沱河畔》、山本守（宗曲译）的《恋别》、侯唯勤的《蒙古牧歌》、臧克家的《武汉，我重见到你》、李雷的《祭》和彭桂萼的《野火》。

剧本则有陈渭《一个游击队员》、张客《游击队的开始》、凌鹤《夜之歌》、塞克《争取最后胜利》、夏野士《守住我们的家乡》和倪平《北平之夜》。

充分利用报告、通讯、速写形式向读者报道和揭示各地战斗和生活情况，是该刊一大特色。报告国际情况的有：之文《今日的东京》、王冷《中国人在比利时》、江记《世界唯一的红军》（苏联）、绳武《在瓦伦西亚咖啡馆》（西班牙）、伊甸《在里

昂《中国学生生活》（法国）、苏联爱伦堡《在特鲁埃尔前线》（西班牙）、李星可《中国使领馆》（欧洲）、伊甸《抗战中里昂华侨的剪影之一》（法国）；报告抗日根据地情况的有：元留《边区的国防文艺》和《新文学运动》（延安）、艾思奇《谈谈边区文化》、高阳《抗日艺术队伍在陕东前线》、杨恬《“抗大”的生活》；报告其他战场和大后方情况的有：杨朔《昨日的临汾》（山西）和《雪花飘在满洲》、蒲公英《国境的一角》（新疆）、立波《洪子店的劫火余烟》（河北）、克刚《征途的游击队》（河北）、高原《亡土的前日》、碧野《黑瘦了，受难的郑州》、李乔《征程》（云南）、凌青《杭州湾上》、践明《呼声》（云南）、柳林《在西线》、《橡皮人与“俄国大炮”》（山西）、王西彦《被毁灭了的台儿庄》、以群《台儿庄战场散记》、舒强《战后的台儿庄》、一夫《孤岛上的难民》（上海）、田涛《汜水的炮声》（河南）、春风《在南中国》（华南）、萧无《从北平到天津》。特写方面，除连载罗烽的长篇《满洲的囚徒》外，还有何家槐《一天》、蒋弼《只有一个王来胜》、高兰《看俘虏去》等短篇。

此外，该刊还发表歌曲、漫画、木刻。

（25）《弹花文艺》

赵清阁编。华中图书公司出版。半月刊。1938年3月创刊于汉口，武汉沦陷后撤至重庆，于1940年9月出至三卷八期后终刊。

据编者1981年在《新文学史资料》上写的回忆文章，“弹花”乃是取“抗日的子弹开出胜利之花”的意思。

在武汉出版的五期中，主要撰稿人有老舍、郭沫若、王平陵、老向、丁玲、赵清阁、穆木天、左明、冯玉祥、卢冀野、胡绍轩、路易士、应云卫、徐飞白、沙雁、欧阳山、草明、冰莹、吕骥、陆志庠、安娥、王莹、何容、孔罗荪、锡金、邵子南、金满

成、华林、谷剑尘、曹雪松、魏猛克等。

发表的重要文章和作品有：老舍《我们携起手来》、《话剧的表情》和《致女友××函》，王平陵《为抗战而写作》和《最后的敬礼》，郭沫若《女子是人类好的一半》，穆木天《调整文艺队伍》，左明《农村宣传剧的理论和实践》与剧本《王八旦才逃》，赵清阁《把枪尖瞄准了敌人》、《一起上前线》和《慰问一群可怜孩子》，胡绍轩《第七号人头》，老向《遗失之稿》和《日本叹十声》，沙雁《白袖圈》，冯玉祥《夜袭》和《抄后路》，华林《文艺家风格及其影响》，丁玲《略论改良平剧》，吕骥《军火船插曲》，路易士《家在江南》，应云卫《战斗的戏剧》，徐飞白《勇士段云清》，刁劲波《忆前线一夜》，晓风《触目两件痛心事》，王冥《徐州的劫运》，朱司晨《岛国浸沉在黑夜中》，崔焕阶《血泊中的罗王车站》，曹雪松《祖国进行曲》，谷剑尘《紫金山下》，卢冀野《北湖》，以及罗曼·罗兰的短剧《总有一天来到》，高尔基《伊克·布里珂夫》等。

(26) 《战斗画报》

宋一痕等编。1938年创刊，终刊时间及所刊期数不详。其作者多为中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员。曾得到冯玉祥的资助。

(27) 《抗战画刊》

赵望云主编，抗战画刊社印行，华中图书公司经售。1938年创刊于武昌，十日出刊一次；后迁重庆，并于1940年1月起改月刊，由华中图书公司编印。特约撰稿人有冯玉祥、老舍、梁鼎铭、梁中铭、特伟、张竹、张乐平、鲁夫、王式廓、鲁少飞、江敫、老向、何容、刘一行、叶浅予、吴组缜、赵逸云、沙雁。本刊以画为主，然有时系由作家写词、画家配画。如创刊号登有老舍大鼓词《打游击战》，俟子步等插画。第十期之《西洋景词画》，由老舍写词，张文元、赵望云、汪子美、高龙生插画；《某大排长》，由冯玉祥作诗，张文元木刻；《铁血男儿》，由

刘浪作词，龙生绘画。第十五期的《日本伤兵》，则由冯玉祥作诗，汪子美绘画。

(28) 《自由中国》

臧云远、孙陵主编。1938年4月1日创刊于汉口，自由中国社发行（发行人先为阎云溪，第三期起改为臧云远），新知书店经售，二十四开本，于同年6月20日出版第一卷第三号后停刊。1940年11月1日在桂林复刊，社长兼发行人韦永成，编辑人孙陵，自由中国社发行，创作出版社经售，出至新二卷二期停刊。尔后又复刊，出两期后终刊。

创刊时毛泽东、冯玉祥、郭沫若曾为其题辞。毛泽东的题辞是：“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郭沫若的题辞是：“要建设自由的中国，须得每一个中国人牺牲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贡献给祖国的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则每一个中国人也就得到自由了。”迨至编者孙陵堕落为国民党文化特务之后，刊物也就随之变质。

在武汉出版的前三期，发表了一些较好的论文，对抗战文艺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这些论文包括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和《略谈爱国主义》、田汉《关于写实主义》、何干之《从历史发展中看中国应走的方向》、潘梓年《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和《目前文化运动的基本概念》、北鸥《保卫祖国的文化》与《创作技术和通俗化》、郁达夫《战时的文艺作家》和《战时的小说》、老舍《谈通俗文艺》、郭沫若《抗战与文化》、李南桌《“意识”与“象形”》，以及艾思奇《哲学的现状和任务》等。同时，刊登了由茅盾等97人署名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趣旨》。并组织郭沫若、老舍、张申府、潘梓年、夏衍、吴奚如、郁达夫、臧云远、北鸥就“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为题进行讨论，汇为“特辑”刊登在第二期上。

发表的文艺作品小说有老舍的《浴奴》、罗烽《娑德嘉兄

弟》、刘白羽《在艰辛里生长》、孙陵《国境线上》、姚雪垠《白龙港》、李辉英《慌乱的城池》、天虚《王疤脸和小朱》、谢挺宇《黑牢红流》；报告、速写、散文有杨朔《西战场上》、铁弦《上海一苦斗着的孤岛》、碧野《战士的母亲》和《高原上》、王西彦《料车上的家庭》、臧克家《郑州在轰炸中》、黑丁《野祭》、田涛《突击》、李辉英《济南—齐河—官庄》、杨朔《木棉花》和《毛泽东特写》、湘潮《长征的故事》、丁玲《彭德怀速写》、北鸥《在敌人的后方》、冰莹《一个热烈的集会》、天虚《二十世纪的爬虫》、奚如《忆柳林镇》、白朗《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等；诗歌则有臧云远《中华民族在战斗着》、《麦海上的战云》和长诗《海灯》、臧克家《过武胜关》和章文龙的悬赏诗《元宵》等。

还辟有“文化消息”专栏，报道各地文化运动和因战争而分散到各地的作家们的情况，保存了一些有益的史料。

（29）《戏剧新闻》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会报。戏剧新闻编辑部编辑（吴漱子负责）、发行部发行。周刊，每逢星期日下午出版。1938年5月15日创刊于汉口，自第六期起移渝刊行，至1939年1月出第九期后终刊。

本刊内容以报道抗战戏剧创作和演出情况为主。主要撰稿人有洪深、罗荪、田汉、张道藩、光未然等。

刊物在全国各地聘请了特约通讯员若干人，专门撰写各地戏剧特写、戏剧通讯、剧团调查、剧人访问、戏剧消息。罗荪写了《我们在写〈台儿庄〉》、光未然写了《评友联剧团公演》、沙雁写了《看了〈鸽子姑娘〉》；董每戡、陈卓猷、齐鲁山、董新珉、白若白等分别撰文介绍了长沙、广州、沙市、温州、漯河等地的戏剧活动；侯枫的《我们是从炮火中锻炼出来的》和《抗战剧团在徐州》等文对剧团活动作了报道；艾绥《〈突击〉公演的

经过》、殷汛《〈凤凰城〉的演出》之类的文章则是就某一剧本的演出进行介绍。此外，每一期都辟有“戏剧列车”专栏，刊载简短的剧运消息。

(30) 《民族诗坛》

民族诗坛社编，具体由卢冀野负责。独立出版社出版。抗战开始后创刊于南京，在那里出版过三期。1938年5月移汉，出版两期。尔后迁渝继续出版，至1945年12月终刊。

本刊第一至三期专登旧体诗词。移汉后，同时发表新诗。

在汉出版的两期所发表的作品，主要有于右任、刘城禹、易君左、沈镛若、潘伯鹰、项学儒、汪精卫、江挈生、许世英、潘公展、曾小鲁、覃孝方写的旧体诗。

于右任、王陆一、江挈生、陈匪石、仇述菴、张庚山、陈逸云、赵尧生、贺敏生、王东培、龙榆生等填的词。

卢前（即卢冀野）、徐世潢、桑继芬等写的曲。

新诗则有老舍的《新青年》、蒋山青的《赵侗的母亲》和史岩、彭慧、林侠魂等人的作品。

此外，还刊有《民族诗坛组织章程草案》和“诗坛消息”等。

(31) 《新演剧》

章泯、葛一虹主编。1937年6月创刊于上海，半月刊，新演剧社发行，同年8月出至第五期停刊。1938年5月8日迁至汉口出新一卷第一期，由海燕出版社刊行，读书生活社总经售，同年6月14日出第三期后停刊。约在1940年6月又曾在重庆出过复刊号一期。

本刊为戏剧理论、创作刊物，发表剧本、戏剧理论、表导演技术以及剧运通讯等。

在汉口版三期中的重要作品和文章中，剧本有宋之的《上前线去》、章泯《纪念会》和《边声》（五幕连载）、任钧

《铁蹄下的女性》、金兢《亲兄弟》、高兰与丽尼的新歌剧《战临沂》、鲍雨《铁扫帚》、陈白尘《火焰》、陈谓《太阳旗下》等。

论文有杜山《戏剧工作者的歧途》和《论战时工农演剧社》、葛一虹《试论目前的剧本创作》和《现阶段演剧活动的两重意义》、章泯《新悲剧论》、葛丽沙译卢那卡夫斯基《论现实主义的剧本创作》、龚参《典型的性格与个体的性格》、舒非《训练新的演戏干部》等。

谈表、导演艺术和舞台技术者则有许之乔《战时导演人员的基本任务》（论文）和《排演前导演人的准备工作》，慕云《舞台的合作》（技术）、赵明《战时的舞台装置》（经验谈）、刘寿征《怎样念台词》和《怎样把动作配合上台辞》（技术）、乔汶基《怎样处理一个角色》、何连《论戏剧人物的表现》和《导演人与演员》等。

第三期刊登了关于“新歌剧改进诸问题”座谈会记录，老舍、朱双云、李一风、蒋青山、田汉、阳翰笙、傅一心、辛汉文、王梦生、吴天保等三十人参加了座谈会。

剧运报道有徐韬《我们怎样跑上街头》、记者《活跃的剧坛》、林伍《五月里的重庆演剧》、舒强《关于战地演剧》、吕复《战地演剧活动》、小童《最近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等。第一期上还有董每戡、冼星海写的《剧人战歌》。

此外，新演剧社还主编了一套《战时戏剧丛书》，于1938年5月前后出版发行。收入该丛书的著述有杜山《战时演剧的概论》、葛一虹《战时演剧之实际》、许之乔《战时演剧导演论》、舒非的独幕剧集《民族公敌》、罗烽的三幕剧《国旗飘扬》、章泯的独幕剧集《我们的战士》和《生活》等七种。

（32）《抗战文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报。由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编辑

(开始是适夷、锡金、蓬子合编；三人离开后由冯乃超、孔罗荪、叶以群接编。戈宝权参加“武汉特刊”之助编工作)，出版部发行。1938年5月4日创刊于汉口，武汉沦陷，自第二卷五期起迁渝出版，1946年5月4日出第十卷第六期后终刊。初为三日刊，第一卷第五期起改为周刊，第四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第六卷第一期起再改为月刊。均为十六开本。第一至三卷每卷出12期，第四至五卷各出6期，第六卷出4期，第七卷出6期，第八卷出4期，第九卷出6期，第十卷4、5期合刊编好后未能付印，实出3期，共为73期，实出71期。另有“武汉特刊”4期、“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艺术节纪念特刊1期。它是唯一贯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刊物，对于组织文艺队伍、推动抗战文艺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至上海，改称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出版《中国作家》月刊。

“文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本刊编委会的组成也遵循统战原则，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人士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三十三名编委是：茅盾、夏衍、田汉、冯乃超、阳翰笙、老舍、老向、胡风、适夷、罗荪、蒋锡金、成仿吾、叶绍钧、叶以群、郑振铎、郑伯奇、穆木天、郁达夫、朱光潜、朱自清、张天翼、钟天心、舒群、安娥、周文、吴组缃、姚蓬子、丰子恺、宋云彬、徐炳旭、陈西滢、王平陵、胡秋原。其中有些编委当时并不在武汉，亦未担负实际工作。发表的文艺作品计有小说八篇：老舍《人同此心》和《敌与友》、鲁彦《炮火下的孩子》、陈白尘《慰劳》、刘白羽《火》、丁行《抽签》、梅林《刘伟棠先生一家人》和舒群《血之短曲》；报告、通讯、特写、杂感60多篇：如以群《台庄一勇士》、郁达夫《平汉陇海津浦一带》和《日本的娼妇与文士》、鲁藜《在五一节兵工厂的晚会里》、碧野《“同志”和农民们》、田涛《某夜》、秋涛《最悲惨的一幕》、黑丁《饥饿》、何家槐《同情的援助》、胡秋原《为书复

仇》、李辉英《出发聊城的途中》、侍桁《生命的战斗》、张天虚《杀过单城集》、李桦《今日的郑州与开封》、紫墟《在伤兵医院》、徐盈《冲取联络线》、彭慧《后方的乡村》和《滇池岸上》、李乔《活捉铁乌龟》、史沫特莱《俘虏》、绿川英子《赵老太太会见记》、云壮《五十七条好汉》等；诗歌近10首：如锡金《疯妇人》、厂民《榴花》、鲁藜《想念家乡》、艾青《反侵略》、力扬《白面包与肉类是有毒的》、王亚平《麦穗黄的时候》、黄药眠《我怀恋着莫斯科》、任钧《姑娘我赞美你》等；剧本有7个：塞克《远征长崎》、封禾子《母性的典型》、陈谓《兄弟》、宋之的《出征》、锡金《他们在码头上》、凌鹤《到胜利之路》（街头剧）、徐旭生《军民合作》；通俗文艺则有平林《难童谣》、何容《战壕小调》、老向《江晓风舍身诱敌》（鼓词）、胡绍轩《盘里糕》（童谣）等。此外，还刊载了小品、木刻、漫画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33）《救亡漫画》

上海抗敌后援会、漫画界救亡协会主办，王敦庆编辑，丁聪等38人为编委，鲁少飞发行，生活书店代售。创刊于上海，自第七号（1938年7月10日）起发行汉口版。刊印情况不详。

（34）《五月》

诗歌丛刊。蒋锡金编。诗歌工作社出版。1938年6月创刊，仅见一辑。它是《时调》的姊妹刊，编撰队伍大体一致。创刊号发表的主要诗歌和文章有：穆木天《我们的诗歌工作》、铁弦译《普式庚—俄国文学语言的创造者》；瞿秋白译《茨冈》（普式庚作）、马耳（叶君健）译《吉卜赛人的提琴》（伍雷列斯基作）；力扬《五月》、帆依《五月》、定云才《红五月来了》、臧云远《刚开的五月花》、雷石榆《烈女秋霞》、克锋《敌机的轰炸》、穆木天《四月廿九日下午》、平林《正义被杀害了》、高咏清《守望》、锡金《江岸》、高兰《我的家在黑龙江》（长

篇朗诵诗)等。《茨冈》是瞿秋白未完成的译稿,系为悼念秋白遇害(经锡金精心整理)而发表的。其它还有王亚平、厂民(严辰)、孙望、袁勃、洪道、柳倩、彭澎等人的诗作和力群、李桦、马达、卢鸿基的木刻。

(35) 《诗时代》

诗刊。力扬等编,武汉诗时代社发行。1938年9月创刊,仅出一期。它是因战局紧张、诗歌丛刊《五月》无法继续出版,而由暂留武汉的几个湖南青年诗人筹资集稿出版的。除李雷的长篇叙事诗《诗人》外,还发表了力扬、孟超、李岫石、袁勃、覃子豪、罗烽等人的诗作。

(36) 《文艺周刊》

彭芳草编。1938年10月创刊,仅出一期。本刊主要发表短小文学作品和报道战时文化活动情况。

报纸文艺副刊

(1) 《大公报·战线》

陈纪滢主编。《大公报》于1937年9月18日由天津迁来武汉出版,其《战线》文艺副刊亦于同日出第一号。前段是一日一号,后段则间隔日期无定数。笔者查到的最后一号是1938年5月28出版的第151号,其后或有遗阙。

为本刊撰稿者有胡绳、锡金、徐步、冯乃超、杨朔、光未然、念兹、姚兢、茅盾、蓬麦哲、高兰、刘念渠、萧红、碧野、田间、魏东明、艾芜、穆木天、白朗、流金、李西流、张申府、子冈、叶圣陶、臧克家、李辉英等。

发表的重要论文有:冯乃超《为抗战而艺术》,瘦岑《救亡运动应当大众化》,光未然《目前的歌咏运动》,谌仲人《农民抗战歌谣的实践》,蕙冰《战时诗歌的理论和实践》,穆木天

《展开我们的诗歌阵线》、《大众化的诗歌与旧调子》和《抗战文艺中的讽刺》，鲁杰《论抗战中的歌咏运动》，胡绳《重提通俗化问题》，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杨村彬《抗战戏剧之演出方式》等。

本刊发表了众多的从各个侧面反映抗日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尤以报告文学、诗歌、速写、散文、杂文、戏剧、木刻为多，间也刊载小说、书评、文坛消息。比如：

诗歌方面，朗诵诗有锡金的《老家》，东方夜明的《月夜小唱》，高兰的《吊天照应》、《就在这一九三八》和《给姑娘们》，宇飞的《插（鞅）血结盟的一天—东北义勇军宣誓典礼》，彭慧《怀念被敌船载去的孩子们》等；报告诗有胡绍轩的《我有一个报告》；此外，则有蓝枫的《鲜血赞》，罗烽的《祖国的海岸》，高咏青的《永定河》，衷若霞的《芦沟桥》和《铁流》，江如之的《黄浦江》，高兰的《我们的天空》和《缝衣曲》，蓬麦哲的《你们，八百个》，刘荒的《歌壮士》，毅云的《歌八百神将》，映芬的《勇骨士》，田间的《胜利在笑着》，李剑萍的《送征夫》，臧克家的《从军去—别长安》、《伟大的交响》和《敌人陷在泥淖里》，光未然的《戏剧抗战》，冯玉祥的《山西二绅士》、《花木兰》、《游击战》，孙陵的《红巾·白马—记东北女义勇军赵一曼》等。

报告、通讯、特写、杂感、散文有：徐步《做一名哨兵》，杨朔《东沙岛》、《南海的烽烟》、《夜车》和《乡信》，念兹《到徐家棚去》，姚兢《救亡宣传车》，高塞《南京的天空上》，黄田《外滩观战记》，志安《西安的民众怒吼了》，筱泉《在通州反正》，子冈《在军医院》，史东山《我们向后方移动中》，萧军《应该入“拔舌地狱”？》，彭慧《炮火下的一家》，刘白羽《黎明》、《潼关》、《渡黄河》（即西北线之一、二、三），流金《离散之前》，萧红《八月之日记》，白朗《我迟疑地走下

扶梯》、《流亡曲》、《这群人们》和《一封不敢投寄的信》，雪立《在小红庙》，冰莹《笔和花》，张香山《俘虏教养记》，紫墟《被忽视的队伍》，欧阳凡海《闸北打了起来》，王余杞《岁杪有感》，碧野《道清线上》、《金星·北马·八千战士！》和《你，年青的战友！》，朱雯《飞将军》和《雪的原野》，王亚平《黑夜行军》，徐盈《蜀行杂笔》，姚雪垠《母子篇》，等等。

街头剧剧本有光未然《难民曲》和刘念渠《募捐的时候》。小说有孙陵的《从军》、罗烽的《重逢》和《一条军裤》。此外还有段干青、秦威、流露、石烽、力群等人的木刻。

(2) 《大公报·文艺》

萧乾主编。天津《大公报》的另一副刊，自迁武汉后《文艺》副刊每逢星期日出刊，笔者所见的汉口版《文艺》最早的是1937年10月3日出版的第372期，最晚的是1938年2月14日出版的第390期，凡19期，前后或有缺漏。其撰稿人和文章、作品依次为：巴金《给山川均先生》、凌叔华《汉阳伤兵医院访问记》、靳以《短筒—上海通讯》、祖武《改造读书人》、白朗《餽赠》、编者《答辞—关于本刊》、芦焚《光荣的死》、流金《平津道上一流亡的一页》、佛地《读〈改造读书人〉以后》、祖武《改造什么读书人？》、李蕤《我们这里—开封通讯》、吴世昌《古城的陷落》、李欣《这一回》、方令儒《古城的呻吟》、罗烽《明天，我回到故乡去》（诗）、东平《忆获鹿》、靳以《上海书筒》、碧野《夜行军—由行唐到滹沱河》、列躬射《毒药国》（浙江通讯）、白朗《不属于自己的慈悲》和黑丁《死的挣扎》。

(3) 《新华日报·团结》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于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报纸。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于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直至1947年

2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刊。从创刊号至3231号止，共连续出版了九年一个月又十八天。

自本报创刊之日起，即出版综合性副刊《团结》（后易名《新华副刊》），除前两个月逢星期天另行发刊《星期文艺》外，基本上保证每日刊行。

编者在《开场白》中说：“保障这次民族抗战胜利的基础条件是全民族的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内部能精诚团结，协力一心，集合四万万五千万人而成的国家会发生伟大的力量，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如何促进全民族的团结，如何打击亲口汉奸、托派匪徒的阻挠战事、破坏团结，是抗战的重要工作，是每一个战士所应最先努力的工作。”“由于这样的意义，产生于这抗战时期的我们这日报的副刊，就取名为《团结》……促进团结，拥护抗战是它的主要目的。”

据统计，《团结》副刊在汉期间发表了数十篇文艺论文和作品。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文章有：阿恸《关于利用旧形式问题》、黄一修《诗歌朗诵运动》和《诗歌朗诵在广州》、沙扬《抗战艺术发展的道路》、武石《把绘画带到农村去！》、田间《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木刻》、艾青《略论中国的木刻》、袁行庄《工人剧的创作和演出》、程漠《抗战戏剧现阶段应取的路向——一个建议》、洪深《第二期抗战中的戏剧运动》等，对初期抗战文艺运动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文艺作品方面：小说有蓝华、铁鸣、杨得志等集体创作的《炸桥》；诗歌有穆木天的讽刺诗《一定受了帝国主义的津贴了》、田间《中国底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辛石《六年》、张罗《你们五万个殉难者》、王萍《送壮丁入营》、鹅的通俗报告诗《日本“皇军”》、夏礼《高射炮手》、萧林《反侵略进行曲》、孙铤《我们的雪天》和《夜》、张向荣《游击队之歌》、金工《我们是钢铁的劳工》、适夷《胜利的歌——祝空军》和《胜

利的春天》、冯玉祥《马赛工人》和《当兵》、刘荒《五台游击区的射击手》、锡金《为高尔基复仇》、臧克家《血的春天》、戈原《莫误了这一念差》、方之中《我们是文化的桥梁——为汉口印刷界抗敌工作团而作》、忍《劝我的郎》和《钱行酒》、覃子豪《战争中歌人》、侯甸《反侵略进行曲》、曼晴《自卫队》、余修《延水》和《寄一》等。

散文、特写、通讯、报告有虞孙《沿门托钵》、《逃来逃去》和《一席话》，罗衣寒《从“反民主论”说起》，适夷《不是空话》，远基《壁报第一号》，水《“有知识”和“无知识”》，吕叟白《前线归来》，黄巍《到了灵汾》，茅盾《“战时如平时”解》，叶琦《第一次的战斗》，焘朗《几句对话和一页信》，左《永远的感情》，绮思《从一个车夫说起》，王坪《啼笑皆非》，鸿凯《悲愤的离别》，袁幸之《“此风不可长”》，郭弼昌《劳动的母亲》，姚苏元《我们与胡村老百姓》等。此外，有几期辟有“三言两语”专栏，发表了一些言简意赅的议论。

为配合抗战宣传的需要，本刊还发表了相当多的漫画、宣传画、木刻、歌曲、影评、书评等方面的作品和文章。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对抗战戏剧团体及其演出活动的报道和评介甚为详细，及时地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对于推动抗战戏剧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4) 《新华日报·星期文艺》

星期文艺社编。周刊。1938年1月16日创刊，属该报副刊《团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年2月20日出至第五期终刊，文艺稿件改在《团结》刊出。

在这五期中发表的理论和批评文章有：冯乃超《作家与生活》、罗荪《人体写生的实验》、茅盾《关于大众文艺》、黎嘉《诗人，你们往哪里去？》等。小说有罗苡的《新乐桥》。报告、特写、散文、杂感、通信有黄明《打老婆过日子的人》、符真

《大沽口外》、东平《两个青年的吵架》、曹白《魔火下的上海》、奚如《冷与热》、李辉英《开封的一夜》、丁玲《答三个未见面的女同志》、马耳《忆中原君》等。诗歌有柏山《除夕一并致M》。评论有适夷《摄影机的叫吼—看了抗战特辑第三集》和《泪血洒开自由花—介绍苏联影片〈血花〉》。此外，还有“文艺工作简讯”若干则。

(5) 《新中国日报·动力》

《新中国日报》于1938年6月15日在汉口创刊，同日起开辟副刊《动力》，每天出一期。终刊时间不详。从1938年7月所刊《动力》第17—46期看，其篇幅均在八分之一个版面以上。主要撰稿人有樱子、史翠螺、雪、山敦夫、平子、一惘、江帆、毓松、陈小蝶、诸棐、宋树人、徐澄宇等。

刊登的文艺论文不多，而以散文、特写、通讯、报告、杂感为主，如雪的《流亡草》（包括《武昌风景画》、《长沙之旅》等）、樱子的《戴棕色帽子的人》、一惘的《马背小谈》（包括《征婚的悲剧》、《人生何处不相逢》、《通信的苦闷》等）、振声的《沦陷中的大上海》、史翠螺的《从黄梅到合肥》《受难的合肥》和《寿县·凤台在记忆中》、萧然的《大众小故事》（包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父母》、《刹那的生命》等）、楚戈的《“江苏完了”吗？》、徐澄宇的《绳武篇》、江帆的《佟连长》和胡来的《黄陂杂写》等。

诗歌有江帆《别武汉》、祝实明《黄河的哭泣—纪念六九黄河决堤》、《祖国吟》和《永定河的战歌》、戈原《吼声》、吴吕才《献给流亡朋友》、周旋《另一个世界》、振村《流亡之歌》、诸棐《慌了的人们》、夏洪《寄纪法》等。

街头剧则有山敦夫的《遭遇》。

另外，还辟有“抗战轶闻录”专栏，刊登了屠《姬佛陀脱下袈裟》、卓尔《史美氏之狂言》、冰生《平津见闻》等。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在武汉出版、发行的报纸还有：早在抗战前就开办的由国民党中宣部掌握的《武汉日报》，由军委会政训处掌握的《扫荡报》，商办的《中西报》、《汉口新闻报》、《新民报》以及《华中日报》、《工商日报》、《汉报》、《新快报》等；抗战开始后新创办的有：由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前进日报》、由陈铭枢等人赞助的《时代日报》、由救国会系统创办的《大众报》，以及《尚理日报》、《武汉晚报》、《旬报》、《汉口消防报》、《西南导报》、《自强日报》、《救国晚报》，等等。这些报纸，有的办有文艺副刊，如《武汉日报》辟有《鸚鵡洲》、《武汉文艺》、《戏剧座》等，未辟副刊者亦间登载文艺作品。

综合性期刊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在汉出版发行的综合性或专业性期刊约近百种，它们多寡不一地刊登了文艺作品。兹将所见者、所知者简述于后：

(1) 《笔锋》

湖北笔者联合会编辑、发行。1936年4月创刊于武昌，旬刊，至10月出八期后停刊；自1937年1月1日起改出半月刊，卷期另起，9月出至二卷三期终刊。前后共出21期。

该刊为综合性刊物，间登文艺评论、创作。在文艺思想上鼓吹所谓民族文学，第五期发表了该刊举办的第一次文艺座谈会记录，以“怎样建设民族文学”为题展开了讨论，有王亚民、丁韬、史紫枕、万濮诚、紫墟、罗梦石、吴慕凤、费怒春、王道胜、曾雪斋、谈瀛、沈仪琨、严振开、胡绍轩等人参加。刊登的文学论文和作品，论文有胡绍轩《民族学文题材论》和《中国文艺之

态》；小说有涂润躬《除夕》、赵清阁《小玉》、田仇《出方酒》、石勒《复活》；剧本有严振开《战后》、赵权机《血痕》；散文、杂文有双石《生日》、岂弟《脱逃》和《送行归来》，以及紫枕的《黄昏》等。

(2) 《战斗》

罗荪编辑。武昌战斗旬刊社出版，生活书店等经售。1937年9月18日创刊，1938年5月出至二卷十一期终刊，共出23期。本刊是冲破国民党封锁而创办的第一个期刊，虽属综合性刊物，但给文艺提供了较多的篇幅，其撰稿人有彭慧、杨朔、萧军、萧红、白朗、罗烽、光未然、高兰、田间、紫墟、冯乃超、穆木天、铁弦、锡金、白桦、臧克家、鹿地亘、罗荪、封禾子等。

关于学文方面的论文有罗荪《利用旧形式的二三问题》和穆木天《关于利用旧形式的认识》，这是针对当时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而发表的意见；在1938年新年号上发表的光未然的《一年来的戏剧运动》，对由于抗战需要而蓬勃兴起的戏剧运动作了探讨和总结；楼适夷、叶浅予、曹聚仁、穆木天、马达等二十余人，以“从美术大众化谈到连环画”为题进行了讨论；二卷七期发表了铁弦译的《论大众歌曲》、第十一期发表了锡金《论我们的歌曲》，穆木天的《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封禾子的《一个当前的文化工作问题》，就大众化问题作了探讨。

创作方面，诗歌有田间的报告诗《闸北》、彭慧的《新年曲》、厂民的《老人与奴隶的儿子》、臧克家的《抗战到底》、锡金的长诗《阴谋的败北》和《我的家乡—宜兴》；通讯、报告和杂感有张知辛的《农村实景》、杨朔的《王海清》、惜梦的《龙兴轮上》、鲍雨的《轰炸下的徐州》、白桦的《救亡运动在前方》、马耳的《在日本警察署中》、梅子的《晋察冀战区巡视记》、昭园的《三月来的晋南风云》、刘荒的《佐伯和松井》、应泽的《浙南的云和》、袁勃的《一个小战士》、齐语的《在陕

北公学》、陈毅的《安庆已经不安庆了》、萧军的《从“重赏之下必有……”说起》、杜涛声的《太行山中》、戴富的《铁的队伍是怎样练成的》等；小说则有罗烽的《空军陆战队》。

第一卷第三期辟有“鲁迅先生周年祭特辑”，发表了萧军、萧红、古白、白朗、罗烽、高兰、冉兆曲、张慧等人的文章。

（3）《抗战》

汉口河山学社编辑、出版，华中图书公司发行。1937年10月创刊于汉口，1938年3月终刊。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间登文艺，如刊有马彦祥的独幕剧《火车中的上海》、向隅的歌曲《中华国魂》、叶公爽的《文化中心的武汉》、向培良的《新中国已经到临》、北河的前线通讯《血战正定》。

（4）《妇女生活》

沈兹九编。1935年创刊于上海，1937年10月迁汉出版。半月刊。间登文艺，如吴新稼的儿童独幕剧《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徐盈《丁玲在前线》、莫蓝《美国斯特朗女记者在汉口》、安娥《拉壮丁》、韦征《在包围中》（战地通讯）等。

（5）《战斗周报》

战斗周报社编辑。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创刊于武昌水陆街，终刊时间不详。综合性刊物。第十二期辟有“战争与艺术”专栏，收有梁鼎铭《战时艺术家的行动》、叶浅予《战时漫画家的工作》、郑君里《演剧手记》、杜适存《抗战的戏剧》。

（6）《救中国》

胡绳主编。救中国社出版，汉口生活书店经售。周刊。1937年10月创刊，1938年1月出第十四期后停刊；后又于同年在宜昌复刊，11月出至新九期终刊。

这是一份“专供士兵工农及一般下层稍识字的民众阅读的刊物”，“报告抗战的时事，讲述救国的道理”，也登文艺作品。

文艺方面的撰稿人有光未然、赵景深、杨朔、易庸、子冈、傅平、胡绳等。刊载的主要作品，小说有易庸《小汉奸》和《我们为了国家》、杨朔《三国志》、子冈《惠公老爹》；曲艺有赵景深《三勇士》（大鼓）、寿张政训处《新小放牛》；京戏剧本有佚名《守城龙》；诗歌有高兰《咱们去当兵》等。另外还有光未然《老百姓没有力量么？》、傅平《朱德将军》和《英烈传》、郭斯《当心拉袖子的家伙》、刘聘《一个伤兵同志的信》、柳湜《到伤兵医院去拜年》、汉夫《铁匠发明家》、张仲实《好男儿要当兵》等。

(7) 《新战线》

张扬主编。1937年11月创刊于武汉，终刊时间不详。综合性旬刊。有时也登文艺作品，如第二期即有沧玉写的剧本《笠原凯二之死》。

(8) 《奋斗》

奋斗周刊社编辑、发行，华中图书公司经售。1937年11月12日创刊于汉口，1938年6月终刊。这是一份综合性刊物，间登文艺作品。

刊载文艺方面的文章和作品有：祖澄《血洗中的大上海——闸北大场失陷记》（战地通讯）、方家达《上海二章》（小说）、张之湘《论非常时期的文学》、王延杰《‘雨天在城圈里’》（报告）、合俦《古舟》（诗）、甄里《抗战戏剧活动之检讨》、熊务民《困难时期的艺术》、静园《回园记》、东方红《火炬》（诗）、王澧泉《宣传队》（剧本）、胡绍轩《我们不做亡国奴》（诗）、杨斐《西行道上》（报告）、苏雪林《敌人惨杀我们同胞的心理》、展飞《难民泪》（街头宣传剧）、仲群《向作家们要求短篇小说》、唐四《慰劳酒》（小说）、黄宝实《乡下日记》、曹叔雅《在珞珈山》（流亡生活杂记）、邵庄《复仇》（诗）、蒋白芙《流亡线上》等。

(9) 《妇女前哨》

子冈、宋元主编。半月刊。1937年11月6日创刊于武汉，1938年1月6日停刊，共出6期。上海杂志公司汉口总店总经销。综合性妇女刊物，亦登文艺方面的作品和文章。

文艺方面的撰稿人有丁玲、徐步、彭慧、子冈、紫墟、萧红、柳湜、王莹、冰莹、丽莎、洪深等。其主要文章和作品有：彭慧《抗战期间的武汉妇女》、茅盾《平凡的话》、丁玲《七月的延安》（长诗）、紫墟《家属车》、子冈《给母亲们》和《她们遭殃了》（北平琐讯）、萧红《两种感想》、柳湜《中华女儿起来了》、王莹《战时移动演剧》、冰莹《战地血痕》、丽莎《赵大嫂》、洪深和朱双云合编《岳飞的母亲》（楚剧）等。

(10) 《民族战线》

孟宪章主编。1937年11月创刊于武昌，终刊时间不详。综合性刊物，间登文艺作品，如第十五、十七期即发表了冯玉祥诗《寇会议·寇首·党务》、《抗战史料杂咏：日本伤兵·反正·飞机与面酱·南口阵地的一个工兵》，以及刘玉篁《夜送征人》等。

(11) 《抗战》

司徒德编辑。旬刊。1937年7月创刊于南京，南京信社出版。同年12月20日第十期起移汉出版。终刊时间不详。综合性刊物，亦间刊载文艺作品，如第十三期即有冯玉祥的诗、老舍《答友人书》、马北拱《汉渝道上》。

(12) 《民意》

民意周刊编辑部编。1937年12月5日创刊于汉口，1938年9月出第36期后迁渝，1941年8月终刊。每逢星期三出版。

本刊以“指导战时青年的出路，发扬民族抗战的精神”为旗号，以“阐发民族独立运动正确的理论，研究第二期之国民革命的途径，分析国际现势与敌国情况，研究战时体制与实际问题”

为任务的综合性周刊。登载一定数量的文艺论文和作品，比如：

文艺论文有王平陵《在抗敌战线下的文艺家》、《从日本文学作品来观察》、《战时小说的创制》，李辰冬《论文艺之宣传力》，老舍《一年来的文艺》，李朴园《关于戏剧的一个试验》等。

小说有王平陵《我的母亲》、罗珊《头发与绣花鞋》、鲁彦《留守》、老舍《征人的哀怨》和沙雁《要塞退出的时候》等。

通讯有王冠青《用山民驱逐岛民》、光远《炮火声中忆济南》、吟秋《西林村的烽火》等。

诗歌有朱楔《登涂山望巴子国》、谭振民《哀南京罹难妇女》以及谢无量、唐铁、郑文礼等人的诗篇。

戏剧方面有王家齐的独幕剧本《四平街》和洪深《战时移动演剧队日记》等。

此外还有老舍的《一块猪肝》、卢冀野的《杨复明》、王平陵的《血祭天长节》、赵宗福的《忆芦沟桥》等文章和作品。

(13) 《民众》

叔荪、世骥主编。1937年12月创刊于汉口，终刊时间不详。华中图书公司发行。五日刊。系“供给民众正确的战时常识，研究当前重要的民众问题”的综合性刊物。间登文艺，如创刊号有穆木天《小学教师抗战工作与文艺运动》。

(14) 《大时代周刊》

孟十还主编。汉口大时代社发行，华中图书公司经营。1937年12月创刊，1938年6月出版第18期后终刊。本刊得到军委会政治部二厅支持。其内容包括：“①一周短评；②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理论；③抗战时期的国民训练；④抗战时期各种问题的研讨；⑤国际情形报道及分析；⑥抗战文艺（包括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戏曲，报告，杂感，印象记等）；⑦战地速写及通讯；⑧具有抗战意义之图画及木刻各门。”

本刊发表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文章有卢殊《抗战之歌咏》、解放《谈抗战文学》等。文艺作品：小说和故事有杨朔《铁的锻炼》、罗烽《绝命书》、谢挺宇《虚无僧》、朱雯《突击》和《一个英勇的老人》、刘梦秋的儿童故事《右手的食指》等；通讯、报告、散文、特写、杂感有新农《别了，大名》、于赓虞《进军曲》、易明《退出宣城》、蓬麦哲《抗日英雄何基澧》、靳以《沪战杂记》、老向《你是不是麻木的？》、老舍《不洩气真论》、秋白羽《夜间空袭》、刘西渭《对话三折》、朱自清《“大时代”》（长篇讲话）、谢挺宇《三个“不知道”》、臧克家《李宗仁将军》（人物素描）、塞夫《徐州的惨劫》、唐锡如《战区荒镇素描》、张十万《租屋》、魏东明《七里坪之行》、凌云《一个抗日将士的日记》、安娥《逃亡道上》、杨朔《大时代的风暴》、孙佑平《哀莫大于心死》、罗烽《没有遗嘱的人》、张天翼《战争的和反战争的》、臧克家《雪中聆训记》等；诗歌有孙陵《献礼》、冯玉祥《炸弹》、牧紫《哨兵之歌》、方敬《新的语言》、彭杜萼《投进大时代铁流中》、郭易光《游击队员之歌》和《哨兵之歌》、竹嘉仁《雪夜行军》等。通俗文艺作品则有老舍的大鼓书词《张忠定计》和《打小日本》、老向的唱本《刘汝珍大战广安门》等。

（15）《大侠魂》

安若定主编。1932年在南京创刊，原为两周刊，后改周刊。南京沦陷后移至武汉出刊，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继续出版。

本刊原系“以提倡读书风气，鼓吹尚武精神，发挥大侠魂真理，主持正义人道，扫除民族偷惰气质，贯彻救国救世人生观为宗旨”的综合性刊物。迁汉后改为：“以发扬三民主义理论，指导抗敌救亡路线，研究抗战实际工作，分析时事问题为宗旨。”内容则分“时评，论文，抗战文艺，漫画，照片，战地通讯等栏”，“文字以白话文为原则，并注重深刻浅显，生动有力等条

件。”“对于军队、警察、壮丁、义勇军、游击队、学生军等宣传文字特别欢迎。”

在文艺方面发表的文章和作品有：马步周《北战场抗战实写》、周永泉《被炸的前后》等。辟有“大侠魂诗坛”，由罗春台主编，发诗甚多，如之振《宝山歌》、费怒春《题梅花》、朱再庵《送同学罗君春台东游兼题其纪念册》（词）等等。

（16）《群众》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机关刊物。潘梓年编辑。群众周刊社出版。1937年12月11日创刊于汉口，出二卷（共50期）后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再迁上海，至1947年3月终刊（1947年曾发行香港版，卷期另起）。

在文艺上，除较多地刊登各地通讯外，间登其他体裁的文章和作品，如潘汉年的论文《保卫武汉文艺界应该做些什么？》，立波的《师生游击队》，胡考的木刻《保卫大武汉》等。

（17）《全民周刊》

李公朴、柳湜主编。汉口全民周刊社出版。1937年12月创刊，至1938年7月出第十三期后与《抵抗》合并为《全民抗战》。该刊以“建立抗战理论的指导，提高言论自由的风气”为宗旨，也刊登部分有关文艺的文章和作品，如冯乃超的论文《抗战中的作家与文运》、陈逸园的《抗日山歌》等。为庆贺徐特立六十寿辰，第十三期辟有特辑，除先一期发表《徐特立六十自传》外，本期又登了毛泽东、朱德、杨立三、郭化玉、谢觉哉以及中国文艺协会写的文章。

（18）《抗战》（后易名《抵抗》）

邹韬奋主编。1937年8月19日创刊于上海，三日刊，同年12月迁至武汉出版；次年7月7日，与李公朴、柳湜合编的《全民周刊》合并，出版《全民抗战》。间登文艺，如第32期载有杜重远写的通讯《到新疆去》，第51期载有冯玉祥《孩团》和曹聚仁

《李陵与苏武》。

(19) 《青年月刊》

原来在南京创刊并出版了四卷，1937年12月迁至武汉继续出版，“扩大篇幅，增加抗战内容，包括有民族精神的文艺诗词小说。”

(20) 《中苏文化·战时特刊》

中苏文化半月刊社编。原在南京，大约于1937年11月在汉口创办“战时特刊”，终刊时间不详，由华中图书公司总发行。综合性文化刊物，登载少量文艺作品，如所见有含沙的小说《南口战幕》、阳翰笙的电影剧本《八百壮士》、冯玉祥的诗歌《台儿庄》和《四二九空战大捷》、老向《大众化的抗战文化》、余文伯的战地通讯《运河风云》、鲁彦的《伤兵旅馆》等。

(21) 《中国的空军》

航空委员会政训处编，汉口上海杂志公司经售。创刊、终刊时间不详。间登文艺，如陶雄的空军写实小说《囚虏之音》、王莹的《悼念韩晏二勇士》、丰子恺的《神鹰东征琐话》和天纲翻译的空军中篇小说《十比零》等。

(22) 《大众报》

江凌主编。约在1938年1月创刊，始为七日刊，至5月改出三日刊，终刊时间不详。编者自称是“国内唯一的工农兵大众的报纸，国内仅有的大众亲自执笔的报纸。有字有画，有说有唱。”如创刊号上就开始登载老三写的长篇小说《李老爹沙场遇子》和陆洛、马达的国画故事《神勇的廖宝财》。

(23) 《前途》

前途旬刊社编。原为月刊，1933年1月创刊于上海，1938年1月（第六卷十期）起改旬刊，并迁武昌出版。在武昌出了十三期。第六卷二十三期起迁重庆。间或登点文艺，如燕雨生《过漳河》等。

(24) 《青年情报》

青年情报社编。1938年1月创刊于武昌，周刊，逢星期日出版，终刊时间不详。

辟有“正义公园”专栏，“发表激励与警惕青年之诗词、小品文艺、民族文选等特殊作品，以加强读者抗战情绪。”

(25) 《战时青年》

战时青年社编，何觉仲主编。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经售。半月刊。1938年1月创刊于汉口，自二卷一期起迁渝出版，至1940年9月停刊，接着又出新1至7期，于同年12月终刊。

这是中共中央继创办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后，又创办的以青年为对象的政治性综合刊物，以“贡献青年救国工作之方针，报道各地救亡运动之实况”为宗旨。亦间登文艺，在汉出版各期发表的文艺理论和作品有：须旅《谈写通讯》（经验谈）、胡天骞的报告《陕北的恋爱故事》、施谊、丁瑛《农民进行曲》、君斗的特写《鄂北之行》、洛思的速写《在故乡的前哨上》、沙上隼的报告《一支游击队》、张桢《在胜利的旗下》（徐州通讯）、施有民的特写《江南的傀儡戏》、萧尉的散文《黄河渡》等。

(26) 《血路》

陶百川主编。周刊。1938年1月创刊于汉口，华中图书公司总经售；后迁重庆出版，由大东书局发行，于1939年7月出至第64期终刊。这是一份综合性刊物，包括文摘、译述、创作。间登文艺，如何公超的街头剧《一颗人头》和《国防公债》，潘公展的诗等。

(27) 《战时妇女》

王汝琪主编。汉口星星出版社发行，新生图书公司经营。旬刊。约在1937年10月创刊，1938年1月终刊。综合性的妇女刊物，间登文艺作品，如敏夫、巍峙的《抗战进行曲》（歌曲）、白□的《一九三八礼讚》（诗）等。

(28) 《回教大众》

沙蕾主编。回教大众社出版，华中图书公司发行。半月刊。1938年1月创刊于武昌，6月出至第九期停刊；1939年在重庆复刊。偶尔刊登文艺，如第三期有沙蕾、茜濛的诗，第五期有锡金的叙事诗《唐官屯》。

(29) 《创导》

创导社编。武昌战斗画报社、汉口华中图书公司经营。半月刊。1937年5月创刊于南京，1938年1月（二卷五期）起迁汉，同年出至三卷二期终刊。间登文艺，如：二卷五期刊有王平陵的论文《战时作品的题材与技巧》、林适存的小说《逃亡》；二卷六期刊有钟期森《一九三七年中国文化动态》和淬名的报告文学《空战》；二卷七期刊有老舍《南来以前》和沙坪《新中国的铁流》；二卷八期刊有培良《轰炸的车站》和尹雪曼《沉默的伙伴》。此外还有钱晓云抗战三幕剧《当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30) 《妇女文化》

妇女文化月刊社编。1937年3月创刊于南京，出五期后于1938年（二卷一期）起迁汉，并改为半月刊，1939年出至二卷十五期终刊。正中书局杂志推广社发行。间登文艺，如兰因的独幕剧《怒吼的国魂》等。

(31) 《少年先锋》

茅盾、适夷、叶圣陶、宋云彬主编，汉口大路书店发行。半月刊。1938年2月创刊于汉口，同年8月出至第十二期终刊。

这是一份供给少年们抗战救亡知识的综合性刊物。以较多的篇幅刊登文艺作品，主要撰稿人有茅盾、适夷、张天翼、鹿地亘、叶圣陶、子冈、沙梅、冰莹、穆木天、戈宝权、老舍、叶籁士、田间、朱雯等。

刊登的小说有彬冰《偷渡》、子冈《小兵阿狗》、冰莹《两个小兵》、骆宾基《第四个孩子》、朱雯《永远记着的仇恨》

等；诗歌有田间的《孩子》和《小伴》、冯玉祥的《周德佑》和《空袭》等；剧本有李石华的《可怜虫》；歌曲有沙梅的《少年先锋队》《我们虽然年纪小》和《别说我们的拳头小》、叶圣陶的《少年先锋歌》、萧英的《飞将军》等；报告、通讯、散文、杂感、随笔有文范《孩子剧团访问记》、吴新稼《一个不应该恐怖的故事》、茅盾《“青年日”速写》和《记孩子剧团》、何澄《记“孩子日”》、曹聚仁《数月来的繁感》、钱君匋《流亡途中》、陈纪滢《记张连长》、超人《在战地服务中的小弟弟们》、老舍《儿童节给小朋友们的信》、立波《从一张布告说起》、叶圣陶《今年的儿童节》、安娥《从孩子剧团归来》、丰子恺《决心》、流金《给上延安去的朋友们》、刘薰宇《“为而不有”的精神》、罗洪《壮健的脚步》、时信《三位侦探家》、白雪《孩子兵》等。此外，张天翼还为少年儿童写了《帝国主义的故事》。

(32) 《奋勉》

汉口奋勉周刊社编辑、出版。1938年2月创刊，7月终刊。间登文艺，如第四、五期有梅林《国防线上》、第二十期有梅林的二幕剧《团结》。

(33) 《中山周刊》

中山学社编。原在南京出版，名《中兴月刊》；1938年2月15日移汉，改名《中山周刊》，7月终刊，共出21期；1938年11月起又改为《中山半月刊》，卷期另起。

该刊为综合性刊物，文艺方面的稿件所占比例不大。其中有苏雪林《学生与从军》、朱民威《青南道上》，以及《祖国天空有神鹰》等。

(34) 《东北周刊》

东北周刊社编。1937年11月创刊于南京，出三期后停刊；1938年2月14日在武汉复刊，卷期续前，由汉口华中图书公司经售。间登文艺，如一卷十一期上有同仇《战时文艺应注意的

几点》。

(35) 《新民族》

罗家伦主编。约在1938年2月创刊于汉口，华中图书公司发行。间登文艺，较多地发表了罗家伦写的诗，如长诗有《忆南京》、《伟大的孤城》、《再生》、《人间的悲剧》以及《临死的悲歌》、《春恨》、《偕亡》、《七七周年怀芦沟桥》、《大江东去曲》等。此外还有朱楔的《哀江南》、密超群的《采茶女的悲哀》和《忆杭州》、缪凤林长诗《嘉陵江畔》、马文珍的《淶口戍》等等。

(36) 《文化消息》

文化消息社编辑、发行。1938年3月2日创刊于汉口，终刊时间及出版期数不详。本刊以报道各地文化工作动态、交流文化工作经验、推动文化工作的开展为主旨，保存了当时文化界的一些史料。如创刊号即登有武伯岗撰《当前文化运动应走的方向》和《抗战期间的武汉文化界》，立青撰《西安文化界》，宗寒撰《长沙战时文化思想概要》和万勋撰《一月来的文化大事记实》等文章。

(37) 《国魂》

国魂旬刊社编。1938年3月创刊于武昌，第16期起迁至重庆，1941年出至第57期终刊。偶尔登载带文艺性的稿件，如沈萍《血仇》、张冲《西行杂记》等。

(38) 《教育通讯》

汉口教育通讯周刊社编辑、发行。每逢星期六出版。间登文艺作品，如1938年6月出版的第十一期即载有卢冀野的词二首。

(39) 《好男儿》

王家树编辑，刘兆祥发行。汉口好男儿旬刊社出版（社长陆京士）。1938年3月创刊，5月终刊。这是一份大众性的抗战读物，刊登一些通俗文艺作品，如斯人《七勇士》，汉萍《民族英

雄故事》、《文天祥慷慨就义》、《戚继光平倭寇》，张鸿飞“连环抗战诗画”《协力同心打东洋》等。

(40) 《抗战向导》

抗战向导社编，汉口战斗书报社经售。周刊。1938年4月创刊，7月终刊，共出14期。零星发表有关文艺的文章和作品，如第一期有《民族文化建设宣言》。

(41) 《复苏旬刊》

复苏旬刊社编。江苏省救济旅行失学失业青年委员会武汉分会发行。1938年4月创刊于汉口，终刊时间不详。上海杂志公司和良友图书公司经售。综合性刊物，间登文艺，如耶华《抗日英雄故事》、朱也农《台儿庄捷报》等。

(42) 《救护》

蒋百克主编。汉口救护社出版。半月刊。1938年4月创刊，8月终刊，共出11期。系介绍救护常识的刊物，间登文艺作品，如第一期有冯玉祥诗《负伤杀敌》，第二期有徐盈《一个典型的战士》，第五期有长篇文艺作品。

(43) 《今论衡》

今论衡社编。1938年4月15日创刊于武昌，半月刊，出至一卷五期后迁桂林，同年12月终刊。综合性刊物，亦登一点与文艺有关的稿件，如刘贻《外患纪略》、徐澄宇《歼倭曲》和《摩空颂》、方重《文学与建国》等。

(44) 《新闻记者》

是范长江等发起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机关刊物。1938年4月创刊于汉口。间登文艺作品，如第四期载有夏衍的《广州在轰炸中》等。

(45) 《朝鲜民族战线》

朝鲜民族战线社编。半月刊。1938年4月创刊于汉口，6月停刊，共出6期。汉口生活书店代售。编者说该刊“是朝鲜民族

解放运动的喉舌，是中韩民族联合抗日的灯塔”。综合性刊物。第五期为中韩民族抗日联合战线专号（特大号），文艺界有胡秋原、艾沙、穆木天、柳湜撰文。

（46）《抗战儿童》

抗战儿童社编。旬刊。1938年5月创刊于汉口，终刊时间不详。汉口儿童书局经售。

本刊为综合性儿童刊物，亦登文艺稿件，如第二期有抗战故事《小战斗员》和《小小兵》，集体创作的独幕剧《挂念祖国》，第四期有陶行知的诗歌《同学们别忘了》，于大明的剧本《上前线去》、陆维特的故事《战时破坏班的兄弟们》。

（47）《小战士》

周苏主编。汉口群力书店发行。1938年5月创刊于汉口。周刊，逢星期五出版。

本刊综合性的儿童读物。刊登了一定篇幅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故事有陆维特《五九的故事》、今吾《咱们慢慢地算帐吧》；诗歌有方明《我们打先锋》、吴蜀芳《抗战歌》、仰良工《寄小战士》、王人路《东洋矮子》、钢弦《天皇皇》、席与敏《我愿做个小英豪》、傅显忠《别》、任新根《亡国奴的苦》和余光仪的故事诗《轰炸》等；剧本有展飞《失地上的孩子们》、周苏的街头剧《卖报孩子》和方明、白英的《“敌人打退了！”》；歌曲有安娥的《难儿进行曲》。第三期还发表了一批中、小学生的作品。

（48）《新学识》

徐步编辑。本刊系与“社联”有关的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的综合半月刊。1937年2月创刊于上海，1938年5月移至武汉编印发行。

所见在汉出版诸期上刊登文艺方面稿件的情况是：第二卷六期上有荒煤写的剧本《打鬼子去》、吕骥的歌曲《我们需要战

争》；第七期上有尹子契《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和史沫莱特作、洛方译的朗诵剧《他们一定失败》；第九期上有张惜方《游击回忆录》，默涵、钱文桢、沈钧儒写的悼念钱亦石先生的诗文，舒群的一幕剧《谣言》，任白戈、吕骥的歌曲《战战战》；第十一期上有穆木天写的大鼓《江北铜匠王阿毛》；第十二期有张客写的独幕喜剧《武汉之春》。

(49) 《战地半月》

蒋弼主编。1938年5月创刊于汉口，6月终刊，共出四期。战地半月社出版，三户图书社经售。综合性刊物，但文艺所占比重甚大。主要撰稿人有冯玉祥、胡绳、丁行、臧克家、魏孟克、齐同、陈振武、张铮、适夷、胡风、以群、奚如、石阳、吴组缙、王西彦、丁玲、艾青、田间、碧野、张天翼、袁勃、东平、黑丁、蒋牧良等。

该刊注意士兵文艺工作，第三期发表了一组有关士兵文艺的论文，其中有适夷《怎样培养士兵中的文艺干部》、胡风《关于士兵创作》和吴组缙、奚如、石阳、魏孟克、丁行的文章。也曾刊登过一些士兵作品，如陈振武《台儿庄打仗的回忆》、张铮《我们在台儿庄怎么打的？》等。

其他方面的作品有袁勃的长诗《我们要生活在战斗里》、臧克家的《红血洗过的战场》；黑丁的报告《已死的与未死的》、李辉英的《陇海西行军》、东平的通讯《我们出发了》、魏孟克《意外的事》、蒋弼《天快亮了》、王西彦《关于突围的几点感想》、冰莹《任敌机轰炸之下》、丁玲的《三幕剧〈河内一郎〉后记》、齐同《文艺武器问题》、蒋牧良《谈打架》、艾青《不要让牠闯进来》、田间《我们在潼关》、碧野《在获鹿》、天虚《摸哨》、张天翼《中国没有法西斯蒂》、齐同《文人“帮凶”》和建菴的木刻《报仇去》等。同时，还有关于各地文艺运动情况的报道，如丁玲《我们抵陕后的公演》等。此外还有以群的《抗

战军队中的文化工作》等。

(50) 《反攻》

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编。半月刊。1938年5月创刊于武汉，同年出至第三卷，凡18期。汉口上海杂志公司总经售。自四卷一期起迁渝出版，至1945年5月出至第十七卷五期终刊。

该刊是研究东北及华北问题的综合性半月刊。刊登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如报告、通讯、诗歌、小说之类，撰稿人有曾克、罗烽、穆木天、碧野、白朗、陈梅等。其中报告有曾克的《一天的工作》和《出发》、陈梅的《捉鸡的故事》和《战地特写》、李辉英的《战地之晨》、苏江的《烽火中的大庆关》和黑丁的《震跳的原野》、蒋弼的《二等兵王成武》等；通讯和随笔有丘琴的《献旗前后》、李静之的《北行追记》、师田手的《同蒲路的烽火》和鹿地亘《我们是怎样离开上海的》等；诗歌有李杜的《征途杂咏》、高兰的朗诵诗《这不过是胜利的开端》和罗烽的《我们十万》等；小说有白朗的《帽子》、碧野的《血祭》等。此外，于炳然写了《纪念伟大的高尔基》、穆木天写了《东北文艺工作者总动员》。

(51) 《战时文化》

张申府主编。半月刊。1938年6月创刊于汉口，自第二卷起迁渝出版，1939年4月终刊。

其内容包括：“①讨论一般文化问题，②报告各地文化状况，③评介新刊图书杂志，④报道出版界的动静。”刊物对当时文化运动（包括文艺）作了一些记载，保留了一些史料，如第一卷二期柳湜的《二十一种小型报的述评》即为一例，也发表有关论文，如马哲民《精神动员与全国文艺界的团结》、柳湜《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等。

(52) 《再生》

孙斯鸣主编。再生周刊社发行。1938年7月创刊于汉口，终

刊时间不详。综合性刊物，间登文艺，如第二期刊有右家撰《铁蹄下》和冰莹撰《敌人的脑袋》（通信）。

（53）《全民抗战》

综合性刊物。韬奋、柳湜编辑。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韬奋、柳湜为编委会成员。韬奋发行，生活书店经售。三日刊。本刊系适应抗战需要，由在上海创刊之《抗战》（后易名《抵抗》）和在汉口创刊之《全民》合并而成，1938年7月7日在汉口出第1期，自第30期起改为五日刊并迁渝出版，第70期起改为周刊，1941年2月出至第157期因皖南事变发生，生活书店遭迫害而终刊。

主要撰稿人有韬奋、胡绳、史枚、于毅夫等。由于刊期短，时事性强，以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颇受读者欢迎，发行量高到30万份。

间登文艺作品。如第三期有艾青《为被难者控诉一七月十二日武昌遭空袭，省立医院受炸最惨，写此以寄哀痛》一诗和安适《斗争在鸠江》。

（54）《国民说论》

武昌国民说论社编。旬刊。1938年7月创刊于武昌，出三期后终刊。政论性刊物，间登文艺，如第2期有姚味辛《诗二首》、伍敬说《新英雄记》、孙铁斋《山腰夜袭》。

（55）《国光》

青年党刊物。左舜生编辑。1938年3月创刊于长沙，旬刊。自第七期起迁武昌出版，同年7月出至第十二期终刊。偶尔刊登文艺，如第八期有曾琦《答易君左》诗，左干臣的小说《回乡之梦》；第十期有曾琦《背水阵歌》、英子的小说《第三个》和毓松的诗；第十一期有毓松《哀江南》（诗）和祝实明《论非战文学》。

(56) 《政论》

政论旬刊社编。1938年创刊于武汉。间登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如第八期有何兹全《“纯民族主义”论》，第十期有胡秋原《再论“纯民族主义”》。

(57) 《经世战时特刊》

经世半月刊社编辑、发行。1937年10月创刊于汉口。间登文艺，如徐澄宇《戎马关山集》、《歼倭曲》和《论抗战与文学》，王荣棠《流亡录》，余家菊《闻台儿庄捷报》，陈家庆《感时事》，徐英和陈家庆《孤愤》等。

(58) 《华侨动员》

华侨动员编辑部编。综合性半月刊。1938年3月创刊于汉口。间登文艺，如第五期有章谦之《杀敌吟》。

(59) 《战时教育》

生活教育社编辑、出版，生活书店经售。1937年9月创刊于上海，初为旬刊，自4卷5期起改半月刊。曾迁武汉、重庆出版、发行。1945年5月出至9卷2期终刊。间登文艺，如1938年4月出版之第2卷6期有冯玉祥诗《五万人》、第2卷9期有洞若的诗歌《五月颂》。

(60) 《人人看》

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编，何容、老向主编。系得到冯玉祥支持的综合性通俗刊物，出数期即停刊。

(61) 《抗敌新闻》

王向予、陈北鸥主编。1938年8月创刊，主要刊登反映战地情况的通讯、论述，也发表诗歌、木刻。

(62) 《国民公论》

张仲实主编。1938年9月11日创刊。系批判性、建设性综合刊物。

(63) 《半月文摘》

陶涤亚编。发表过洪深的剧本《米》、阳翰笙的剧本《前夜》、《塞上风云》、《李秀成之死》等。

(64) 《战时文化》

张申府编。1938年创刊于武汉，发表过一些文艺理论文章。

(65) 《大众生活》

大众生活社编。刊载过周立波、白朗、曹聚仁、叶浅予、胡考、马达等人的散文、报告、文学、漫画、木刻等作品。

除以上所列外，这段时期在武汉出版、发行的综合性或专业性期刊还有：《反侵略》（反侵略周刊编委会编）、《难民杂志》（严洗尘编）、《西南导报》（西南导报社编）、《文萃—抗战旬刊》（文萃旬刊社编）、《战时乡村》（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编）、《五一节特刊》（东北工人抗敌总会编）、《风雨》（五日刊，范文澜、姚雪垠、王闾西编）、《战时教育》（国难教育社编）、《武汉青年》（武汉青年周刊社编）、《青年前线》（青年前线旬刊社编）、《中国儿童》（周苏君编）、《辛报》（辛报半月刊社编）、《抗敌新编》（抗敌新编半月刊社编）、《前导》（半月刊，前导书局编）、《国民参政论坛》（张真吾编）、《抗战大学》（统一出版社发行）、《一般周刊》（陈纪滢编）、《艺风周刊》（艺风周刊社编）、《荡寇》（荡寇旬刊社编）、《战时日本》（宋斐如主编）、《妇女文化》（战时妇女社编）、《祖国》（彭芳草编）、《文摘—战时旬刊》（孙寒冰编）、《游击队》（武汉大学编）、《农村工作》（中外出版社编）、《青年前线》（彭文凯编）、《奋斗》（奋斗月刊社编）、《抗战向导》（抗战向导半月刊社编）、《每周评论》（时代日报社编）、《铁血评论》（半月刊，聂克刚编）、《世界展望》（世界展望半月刊社编）、《拉丁化研究》（武昌大众文学社编）、《战友》（战友周刊社编）、《战

时妇女》、（于汝琪编）、《战时行动》（麦朝枢编）、《妇女前哨》（子冈、紫墟编）、《中国青年》（魏绍征编）、《呼声》（呼声半月刊社编）、《励进》（汉口银行业同人励进会编）、《狮吼》（狮子吼月刊社编）、《新青年》（新青年月刊社编）、《抗战军人》（抗战军人半月刊社编）……等。它们之中，有的亦间登文艺作品，不一一赘述。

北京大学之救国歌

恨！恨！恨！亚东大陆早沉沦，方圆数万里，沦为半殖民；国家无主权，人民无生命；碧眼蓝瞳外国人，任意肆虐淫。恨！恨！恨！

惨！惨！惨！五月三十之事件，捕戮我同胞，枪杀我学生，宛转刀下死，哀哉泪血声，印度、高丽亡国鉴，俨然已来临。惨！惨！惨！

问！问！问！我们可是中国人？人家是刀俎，我们是鱼肉；人家是君主，我们是囚奴。覆巢之下无完卵，萎靡何以徒自存。问！问！问！

干！干！干！快快收回我主权，还我租界地，保我治外权，取消恶条约，打破不平等，众志成城可移山，况此更非难。干！干！干！

《国闻周报》第二卷第廿二期

1925年6月14日

· 史料发凡 ·

搜集近代史资料发凡

祁 龙 威

对近代史资料进行搜集，前辈学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也在实践中学到了一些方法。概括起来，不外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查采访；二是藏书摸底。

调 查 采 访

(一) 实地采访

抗日战争中，史学前辈简又文曾在广西太平军首义地区，进行采访，所得史料甚夥，有文献，如《金田韦氏家谱》、《蒙时雍家书》；有金石，如翼王石达开庆远白龙洞题诗石刻；有大量古老传说。其后编成《金田之游》，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事开调查近代史料的先河。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部分师生，为采集《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走遍了清末江苏的十一府州之地，到处访寻当事人或其后裔，从而得到大量资料。例如，我们先在扬州，见到了钱伟卿老人。他曾经做过程德全家的西席教师。程德全是清朝最后一任江苏巡抚。武昌起义，上海响应，程德全随机应变，在苏州搞“和平光复”。钱伟卿回忆了此事的大略，并告知我们，程德全的长子世安尚在苏州。之后，我们经苏州市政协副主席汪东的介绍，找到了生活潦倒的程世安，喜出

望外地从他家看到了程德全留下的一大批档案。程世安虽出身纨绔子弟，但性情忠厚，慷慨地让我们抄录了程德全的电稿等尚未发表过的珍贵资料。又如，为了蒐集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史料，我们访问了在当时联军总司令部参赞军机的茅乃封。原来，我们从《近代史资料》得知，茅乃登、茅乃封兄弟，都是江浙联军的高级军官，解放后都在南京养老。国际著名的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就是茅乃登的儿子。但当我们访问他们时，茅乃登已物故。茅乃封尚矍铄，他须眉如画，手托水烟筒，绘声绘色地为我们讲述革命联军击败张勋所部辫子兵的经过。再如，为了蒐集“千人会”农民起义的史料，我同四个学生，走到常熟、无锡、江阴三县边区的王庄，深入起义发生的农村，调查访问，见到参加过起义的鱼景湖等老人，后将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写成《千人会起义调查记》。胡绳同志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时，曾征引了这篇调查报告。

（二）及时采访

向有关人采访近代史料，必须及时。否则有些老人便不易再见。六十年代初，为了笺释《张謇日记》，我得到了陈叔通、章士钊、溥仪、启功等老前辈的帮助，现在除启功同志尚健在外，其他都已辞世。陈叔通提供了关于张謇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到北京活动的实况。其时陈老也在北京。章士钊收藏其岳父吴保初遗下的资料甚夥。吴保初是淮军大将提督吴长庆之子，与谭嗣同、陈三立、张华奎等齐名，称“四公子”。张謇曾作吴长庆幕客，其后，在帝后党争中，与吴保初同属帝党。我笺释张謇在义和团运动时的日记，说明帝党密谋把光绪帝接到江南，即征引了吴保初的《北山楼集》等。末代皇帝溥仪介绍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郑孝胥日记》，又在劳动出版社看《载沣日记》。郑孝胥是大生纱厂的股东，与张謇同搞立宪公会，他的日记可与《张謇日记》

相参证。启功同志给我看了翁同龢和盛昱给他曾祖溥良的每一封信，我从而得到确证，张謇之所以出任崇明书院山长，是因翁同龢的关照，才得到江苏学政溥良的提携。其时，张謇正屡应会试不第，极不得志。以故翁同龢为谋一栖身之所。盛昱和溥良都是清宗室中倾向帝党的清流派。从这些信件，也可以窥见当时朝廷分派的迹象。

有的史料，往往失之交臂。我在青少年时，曾北面师事国学巨子吴江金松岑。金先生是辛亥革命老人，曾与章太炎、邹容等同在爱国学社抵掌谈革命。冯自由《革命逸史》有关于金天翮等釀金刊《革命军》的记载。（金先生名天翮，字松岑。）。金先生与我等讲论学术之暇，尝回忆爱国学社故事。其时金先生管庶务。一日，为起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太炎先生借庶务办公室伏案构思，金先生因事外出，即将太炎先生反锁在内，以防歹徒偷窃。约两小时后启门，见太炎先生正在挥毫，竟忘午餐云云。当时只当故事听过，未作记录，也未请问有关爱国学社的其他革命遗事。一九四六年先师逝世，柳亚子挽联有云：“弱冠记从游，革命风云黄歇浦。”黄歇浦，即黄浦江。联语即指爱国学社事。到此时，我始追悔，但已无及。一九六四年春，在北京，得山东大学王仲攀教授的带领，见到了李根源老前辈。在三十年代，李根源曾与章太炎、金松岑结为兄弟，号“岁寒三友”。王仲攀是章门高弟，我系金氏门人，以故李老见面极欢。我欲询以关于被曹锟驱逐出京后，大总统黎元洪偕李氏自北京至上海秘密约晤张謇等事，但因李老盛情命希泌世兄陪往市肆午饭，只得约日后再谈，不意不久李老逝世，对这重要史料，竟无从再行采访。

（三）跟踪采访

一九五二年，我在常州，从史致谔的后人处，见到他遗下一

批档案。史致谔字士良，清溧阳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历官江西广信等地知府。同治元年，由左宗棠奏荐为浙江宁绍台道。他勾结美英法侵略者，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浙东。同治三年，史致谔以“原品休致”，后终老常州。我所见到的是他与外国侵略者的往来信函和给曾国藩、左宗棠等的公牍。我又在常州市图书馆看到石印的《阳湖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这些都有史料价值。历史事件发生在浙东，但史料却随着当事人的转移而保存在常州，由此使我学会了跟踪采访。

就在常州，我购到了一册木刻本谢兰生《思忠录类选》，其中有鸦片战争史料。先是，从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得知谢兰生著《思忠录》，其书反映中英在浙江的战事。又知谢兰生字原庵，江苏武进人，曾任浙江县丞，亲历鸦片战争。于是我在常州向谢氏后人查访《思忠录》，不得。有一天偶然在街头旧书摊购到《思忠录类选》。原来谢氏先在浙江编《思忠录》，后归常州刻《思忠录类选》，以故于百年之后，在常州还能觅得后一种。齐思和教授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一九五四年初版以后，始知我有此书，托人向我借阅，并编入了《鸦片战争》再版本。

有的史料往往因故转移了收藏地点。一九五六年，我在扬州工作，得悉故乡常熟发现了《龚又村自怡日记》的誊清本，其中反映大量太平军在苏南活动的史料。但等我放假回常熟时，则该书已被人卖给了北京图书馆。是年冬，我奉调至北京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工作，居住西四颁赏胡同，距北京图书馆甚近，星期日和每晚都前往看书，几乎无间寒暑。我首先在善本室找到了《龚又村自怡日记》，发现龚又村不是冬烘学究，而是一个交游官绅，颇具政治头脑的人物。他又勤于写日记，所记并不限于苏南一隅亲历之事，他还摘录外地重要新闻，如关于英法联军侵华片断和清政府公布的《陈玉成“供词”》等。我主要依据了龚又村提供的

资料，撰成《太平天国后期的土地问题》（见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论文集》）和《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中的偏向》（见三联书店版《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二文，揭露在后期太平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在当时对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罗尔纲先生之所以知道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也因听了我的介绍。

（四）广泛采访

采访近代史料，并不局限于以上几种情形，应随时随地注意蒐集。一九五三年在常州时，我曾在旧货摊上购得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间的《汇报》三册，其中反映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各地农民群众反对清政府摊派庚子赔款斗争的史料甚多。其后，我又参考《广宗县志》等书，撰成《论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一文，发表于一九五六年《文史哲》。以往，人们仅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知有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但不知其始末。我文虽很不完善，但初次公布了起义的经过。事隔将三十年，以石田米子为团长的日本近代史学者访华团蒞扬访晤我时，犹问我发表此文时几岁了？可见此文在日本史学界留下了影响。但如果没有《汇报》等史料，我就无从下笔。

六十年代初，我在扬州旧书店偶然得殷兆镛《殷谱经侍郎自编年谱》。殷兆镛字补金，谱经其号，江苏吴江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其自编年谱二卷，由其后人于光绪间刊印，流传甚少。其中记录亲见亲闻的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火焚圆明园等真相。我购得此书时，正值齐思和教授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我即提供有关资料，以故编者在前言中提到我曾给予帮助。但此书于一九七八年出版时，齐先生已作古人。读后不胜感怆！

图书摸底

(一) 图书馆摸底

一九五四年，罗尔纲前辈指导南京市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在南京图书馆颐和路书库对太平天国史料进行摸底。从这年四月开始，到九月底完成。南京图书馆颐和路库藏图书共有七十多万册。他们对清道光后的史部、子部、集部、丛书、杂志、报纸、函牍、档案等，都一册一册地、一页一页地去翻阅。摸底的结果，计蒐集得有关太平天国资料的刻本、稿本和抄本九百三十一一种，方志七百三十种，合共一千六百六十一一种，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册。罗先生写了《南京图书馆太平天国史料摸底记》，此文留给我们以珍贵的经验。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曾在故乡常熟图书馆，对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资料进行摸底，得到了一批未刊的稿本和抄本。兹举两例：

《锡金团练始末记》一册，抄本。卷首有作者华翼纶自序。卷末朱笔题记：“据湘芙夫人所藏原稿校一过。”华翼纶，苏州府金匱县荡口镇人。太平军初起，华翼纶充当清总兵长瑞的幕客，随军在永安等地反对太平军。一八六〇年，太平军攻克苏常时，华翼纶以在籍革职知县组织团练顽抗。后伪降太平军，伺机“内应”。清代，无锡分无锡、金匱二县，故所记称《锡金团练始末记》。书中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状况，又透露了太平军内部英、忠两王不和等消息，颇有史料价值，但尚无利本。旋经我加注交《近代史资料·增刊》——《太平天国资料》发表。

《棣秋馆日记》两册，稿本，用宝文斋红格纸书写，常熟徐兆玮撰。徐字少逵，号虹隐，光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清王朝被推翻前夕，他从北京归乡。常熟光复，徐兆玮以绅士被举为民

政副长。所记辛亥革命史事颇详实，我节录一部分编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但徐氏日记所包含的史料，并不限于辛亥革命。

（二）博物馆、档案馆摸底

一九五九年，我在无锡市博物馆对辛亥革命史料进行摸底，在有关无锡的资料之外，意外地发现了章士钊为赵声刊行的革命宣传品——《保国歌》的原件。先是，我们仅从《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所辑录的章士钊《赵伯先事略》中得知章曾为赵声刊《保国歌》千份，由革命志士携往武汉新军中，秘密散发云云。《保国歌》揭露外国入侵，清政府卖国的滔天罪行，号召人民起而保国。文词慷慨，大类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但陈天华的著作早已风行于世，而赵声的《保国歌》却失传。我意外地见此珍物，即录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一九六二年，在南通市档案馆，我看到了《张謇日记》的后半部。先是，从张孝若所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我得知张謇有日记。但一直未见。仅节录《啬翁自订年谱》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但《年谱》实据《日记》压缩，有的已失真，且有疏误。尽管《日记》的前半部流落海外，一度未能与后半部合璧，然而《日记》的精华却在后半部，其中包括张謇从状元及第直至逝世的历史。其间经历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但是《张謇日记》高度概括，兼有故意隐晦之处，必须为作注脚。之后，在史学界同仁的帮助下，我广征资料，笺释了这半部日记，使读者从一个侧面看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

（三）私家藏书摸底

近代史资料大量散在私人处，要留心在蒐集。在五十年代，

我从常熟收藏家曹君菊生处，抄得陆筠《海角续编》。其中专门记载太平军在常熟史事，可供参考之处不少。我加注后交请邵循正教授编入《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由中华书局出版。到了八十年代，曹君已歿，我回常熟，会见初中时代的老同学沈传甲，他曾与曹启合设旧书铺，熟悉地方掌故，藏有陆筠的另一册笔记——《劫余杂录》（因从借抄，发现所记可补《海角续编》之缺，遂为公布于《扬州师院学报》，作为“太平天国史料拾遗。”

六十年代，我在北京得识中央文史馆的王益知先生，从他篋间看到不少近人信稿。这些未刊函件对我笺释《张謇日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如我在《帝党与戊戌变法》一文中所引的汪大燮《致蔭磻六兄妹倩书》，其中反映宫廷斗争的秘史，其价值不在《热河密札》下。（见巴蜀书社版《戊戌变法》三六〇页。）

（四）对大部头书摸底

举数书为例。

《翁同龢日记》是一部极有史料价值的近人日记。它始于咸丰八年，迄光绪卅年，包罗四十余年朝章国故。史学界以往只从某种辑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等资料，其实这仅是沧海之一粟。书中其他近代史料十分丰富。如我的《西捻军最后一战与戊戌维新的伏笔》一文（《历史教学》一九八四年第二期）所引的《翁同龢日记》中关于捻军的史料，即为它书所不载，也为聂崇歧等前辈所遗置的。

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也是大部头日记。它始于同治八年，迄民国五年，中间稍有断层。全书反映了将近半世纪的史事，其中牵涉最多的，乃是与作者直接相关的湘军反对太平军的战史。但前人编《太平天国》与《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等都未从中选辑有关内容。我在《读〈湘绮楼日记〉》一文中（《扬州师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一期）曾略举数例，以见大略。

近年由岳麓书社出版的《郭嵩焘日记》，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首尾三十七年，书中涉及湘军组合、洋务争议等，作者亲历的史料相当丰富。我曾征引其书写成《从〈湘军志〉毁版到〈湘军记〉撰成补证》（《书品》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但对其它方面的史料，尚未及摸底。

几点经验

（一）要虚心请人指点

藏书摸底，要得人指点。六十年代，为蒐集《〈张謇日记〉笺注》的有关资料，我跑到上海图书馆，得乡前辈瞿凤起指点，在该馆善本室看到张謇与徐乃昌和汪唐年的一批未刊信稿。瞿是大藏书家铁琴铜剑楼的后人，时在该馆工作，熟悉馆藏。又得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的指点，从中华书局编辑部见到张謇在甲午中日战争时致翁同龢的一批密信。吴是南通属县如皋人，关心乡邦文献。

（二）要作好充分准备

为蒐集某一方面的近代新史料，必先熟悉这一方面的已刊之书，否则面对一批文献，我们就辨别不清其中那些是新资料、那些不是新资料。例如，一九八六年夏，我的两位研究生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翻阅有关太平天国的清军机处存档，因在事前未对《清实录》、《东华录》、《筹办夷务始末》、《剿平粤匪方略》等先下工夫，所以面对一大堆奏章上谕，就只能全部抄录。其实，其中大量已刊入以上诸书。我们一定要象王重民前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蒐集《太平天国官书十种》那样，必先熟悉程演生在巴黎、俞大维在柏林、萧一山在伦敦以及国内蒋復璁在扬州已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然后才能判别剑桥所藏之中，有十种

是以上诸人所未见过的。

(三) 要仔细深入

在这方面，萧一山前辈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一九三二年，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蒐集太平天国文献，不仅翻遍“书目”，而且深入书库，检到“书目”漏载的癸好三年五月一日杨秀清、萧朝贵会衔诰谕，后编入《太平天国诏谕》。但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萧一山却极为疏忽，遗漏了一大批太平天国文献。先是，他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得知许地山曾在牛津抄过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于是萧氏前往牛津摄制了一份《资政新篇》的照片，但他不知牛津还藏有十三种太平天国颁行的书籍，而且包括不同的版本，有的还是其他馆藏所不见的。荣孟源前辈在《历史笔记》中提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的版刻问题时说，牛津藏本之一的癸丑之“丑”尚未改“好”。这就是向达发现的一册孤本。我国学者对牛津所藏太平天国文献的发掘工作，萧一山未仔细深入，以后由向达、王庆成继续进行。

* * *

我在少年时，受清人全祖望搜辑明末史事的影响，喜爱历史文献，每对其名作《梅花岭记》，流连讽诵，深感全氏去明未远，故能实地采访史可法殉难扬州等遗事，我们可仿效其所为，蒐集整理近代史料。但其时正值中日战争烽火连天，奔命不遑，无暇及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始能逐步实现少时愿望。倏忽四十余年，积累点滴经验，联缀成篇，发凡起例，目的供青年学子参考。至于专门研究近代史料之书，则已有荣孟源前辈遗著《史料和历史科学》在，学者可谛观焉。

· 史料研讯 ·

校本《贼情汇纂》补正

朱 树 谦

校本《贼情汇纂》见于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三种《太平天国》第三册中，是该书在建国后最流行的本子。校者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钞本《贼情汇纂》与益精舍石印本《贼情汇纂》互勘，订正了一些讹误，填补了一些脱漏，大大方便了读者，其劳绩应充分肯定。但笔者最近再取该书的北大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北大本），益山精舍石印本（以下简称益山本），以及北京图书馆藏《洪杨类纂史略》（以下简称北图本），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等与校本互勘，^①发现校本仍有不少错误及遗漏。现分类补正于下：

一、内容遗漏：

1 校本“原委官生衔名中”中只列有张德坚、谭光炳等十一人。而北大本为十四人，多“湖南湘潭县文童生张声壮、湖南长沙县文童生彭瀚、湖南候选训导李文鹤”^②等三人。

2 校本只有曾国藩原委四札，而北大本为五札，比校本多出一札。即“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右堂曾为札调事：照得大军克复武汉，水陆东征，惟营务日繁，在在需人差委。查有湖北候补县丞张德坚精明干练，洞悉贼情，堪以委用，合行札调。札到，该员即遵照束装驰赴大营听候差委毋委。此札。咸丰四年十月

^① 《洪杨类纂史略》的内容即《贼情汇纂》，仅变换名称而已。《太平天国野史》除著录了凌善清个人的见闻外，还抄录了《贼情汇纂》的全部内容，只不过改变了清方对太平军的一些蔑称，基本上保持了“汇纂”的原貌。

^② 见北大本，卷首。

初二日。”①

二、文字讹误：

1 “被擒情形肖长龄、方靖、张凯松说”。②“张凯松”应为“张凯嵩”。各本“采访姓氏”中均作张凯嵩，而此处作“张凯松”。

2 “籍贯状貌素行皆聶士登说。”③“聶士登”应为“聶士澄”之误，理由同前。

3 “初封伪内医，职同军师。壬子十一月升殿右四指挥，始独领一队。”④“职同军师”当为职同军帅之讹误。从下文“升殿右四指挥”可以证明。

4 “今考伪文案，集众说，于伪衔未系某军某地者，断自伪王至将军，附以流杂，为伪朝内官。虽将军以下，皆尝出据要地，抗拒官军，分扰郡县，然其大概，则在朝为本职，必得伪诏命而后出也。”⑤从本段文意看，“虽将军以下”，应改为“虽将军以上”才对。因为将军以上朝内官，上文已讲明。

5 “甲寅二月贼陷江宁省，因佐将乏人，又开武科……。”⑥“贼陷江宁省”五字为衍文，应予删除。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为癸丑二月，句中“甲寅二月”是指太平天国宣布开考武科的时间。

6 “典金靴，正赵士成，副张万名”。⑦“张万名”，盖山本与《太平天国野史》均作“张万有”。⑧此应两存。

7 “……现役使乡民情形田行达、贺启、潘鸿藻等说。”⑨“潘鸿藻”当为“潘文藻”之讹。诸本“采访姓氏”中均作“潘

① 见北大本、卷首。

② 《太平天国》三，P49。

③ 《太平天国》三，P59。

④ 同上，P71。

⑤ 同上，P106。

⑥⑦⑧ 《太平天国》三，P113，P149，P161

⑨ 见盖山本，P464，华文书局影印；《太平天国野史》P143

文藻”，而无潘鸿藻”其人。

8 “……以人测天，不容毫黍之谬。”①“毫黍之谬”，盖山本作“毫厘之谬”。②此应两存。

9 “错综勘订，编伪礼制为一门，分伪宫室以下为八则……。”③“八则”，盖山本作“七则”。此处当从盖山本。本卷内容为：“伪宫室、伪印、伪时宪、伪朝仪、伪服饰、伪仪卫舆马、伪称呼、饮食，“共八则，而伪宫室以下只有七则。

10 “……敬接十月三日颁来贵谕一件，敬知荷蒙天父天兄大显权能，天生鸿福，及我翼王威德，……。”④“天生鸿福”，《太平天国野史》作“天王鸿福”。⑤应从《野史》。

11 “中四军前营一卒长功勋加一等小弟覃瑞容敬禀后营师帅善人功勋加一等陈兄案下⑥：“小弟”二字，《太平天国野史》作“小卑职”。⑦此处应从《野史》。前文“伪本章”概说有云“韦、石二逆所禀则称小弟某某，不系伪衔，秦、胡二逆称卑爵，亦不系伪衔，侯至两司马则书伪衔，加小卑职三字于名上，……”⑧再，本书所录太平天国的有关各篇文书也都遵守这个规定。

12 “继之此则入乡民之罪曰：‘本军帅于军行相距数百里之先，郎偏张诰谕，令尔百姓富者出资、穷者效力，……诂尔愚民不知悔罪，执迷不悟，天兵压境，来投营者既属寥寥，进贡之人愈少，……本军帅特再出示，差某检点前来收贡，……。’”⑨文中两处“本军帅”均为“本军师”之讹误。一，以杨秀清、肖朝贵的名义发布的文告才能称诰谕。二，军帅也不可能“差某检点前来收贡”。

①③ 《太平天国》三P163.P168，

② 见盖山本，P504.

④⑥ 《太平天国》三，P163，P216.

⑤⑦ 《太平天国野史》P261，P265.

⑧⑨ 《太平天国》三，P202，P270.

13 “其时广州老贼暨妇女幼孩实有五万余人，……此后皆裹胁续添之新贼矣。”①“广州”应改作“广西”。太平军首义之人多籍隶广西，即所谓“老兄弟”者，清统治阶级污称为“老贼”。

14 “贼党将徇一州一邑，必先布奸细数千百人于境内城内，布散邪言，……。”②“数千百人”，盖山本作“数十百人”，北图本同盖山本③。此处应改“数千百人”为“数十百人。”

15 “此时难民垂绝复生，无有不涕泣感激，惟命是从乎”？④“无”字，盖山本作“世”字。⑤“无”字置于“有不……”之前，形成肯定语气，于句意不符。应从盖山本。

三、断句标点错误：

1 “所属衙系东殿，凡吏、户、礼、兵、刑、工部尚书，每部十二人，共七十二人，主受伪官稟奏封赏吏部钱谷，户部以下类推。”⑥“主分……”以下断句有误。应为：“主分受伪官稟奏，封赏吏部，钱谷户部，以下类推。”《太平天野史》此处作“主分受各官稟奏，封赏归吏部，钱谷归户部，以下类推。”⑦可参证。

2 “又头关提船将军一人，主收发擄获民船战舰，各门巡守。将军十八人，分守江宁省现开之九门。”⑧此处断句错误，致使文意费解。应为“……主收发擄获民船战舰。各门巡守将军十八人，……”卷三“职同将军伪官名目表”中有“各门巡守将军”一栏，可以证明。⑨

3 “此贼初起两司马黄旗也，长阔二尺五寸，其刊下伪太平

① 《太平天国》三，P290

②④ 《太平天国》三，P298，P301.

③ 见盖山本P859，北图本卷十一。

⑤ 见盖山本P868.

⑥⑧⑨ 《太平天国》三P102，P105，P89.

⑦ 《太平天野史》P82.

军目中有太平广西平南桂平贵县道卅上上黄旗等字样，……”^①标点错误。应为：“此贼初起两司马黄旗也，长阔二尺五寸。其刊于伪《天平军目》中有太平广西平南、桂平、贵县、道卅上上黄旗等字样。”

四、补所不当补者：

1 “万象汾，伪检点。曾犯江西，升冬官副丞相，回江宁。又犯三汉河、降总制。四年犯武宁，为官兵所败。本名范潮兰，五年在黄冈县投诚。钦差官文赏给花翎四品顶戴、带千人，屡次打仗甚为出力。”^②

“本名范潮兰”以下三十六字是原校勘者根据盩山本补充的，其它各本均无。这三十六字并不是《汇纂》原有内容，而是他人所加，不当补入。一，补入时间在《汇纂》成书之后，文中“钦差官文”字样，清廷以官文为钦差大臣时为一八五五年九月下旬，^③而《汇纂》成于本年七月。二、万象汾既然投清，并被赏给“花翎四品顶戴”，又“带千人”打仗，他就不再是“贼”，而是清朝武弁，不应仍列在“剧贼姓名”之中了。

2 黄玉昆“丙辰七月二十九日，援武昌，扎鲁家巷，为官兵所歼。”^④

这十九字也是原校勘者据盩山本补入。其它各本均无。不能视为《汇纂》原有内容。一，各本记事止于丙辰六年的，只此一条，而本年可记之事何止一条，如“洪杨内讧”，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相继死去。二、在诸本当中，北大本标明为“采编新原本”^⑤，可靠性最大，盩山本是传抄本，而此书在传抄过程中经他人作手脚的地方并非此一处，如北图本卷一，洪秀全条有云。“案天王生于天朝纪元前三十九年……此处点明四十三岁

① 《太平天国》三，P143。

② 《太平天国》三，P73。

③ 《清实录·文宗实录》卷一七八，页九九六。

④ 《太平天国》三，P52。

⑤ 见北大本卷首。

实太平天国四十三岁实太平天国四年甲寅满清咸丰四年时口吻也。”卷二，蒙得恩条注：“后封赞王。”林绍璋条注：“后封璋王作章王”等。

3 “余在上海夷馆中，夷人时乘火轮船至江宁城中，贼遗以铜钱，故上海夷人多有之。余曾见数十枚面曰太平天国，幕曰统理政教，肉好如制钱。铜质红色，制颇工，仿佛如越南圉太和景统诸钱式，与此大异。”①

此乃原校勘者据北大钞本补入者，其它诸本均无。从各方面看，这一段文字都不是《汇纂》原有的内容，而是出自后人之手。原校勘者对此不加考订，率尔补入，颇不妥。

第一，从行文方式上看：本段叙事采用第一人称，这是全书的唯一例外，与此书体例不符此其一；其二，如果这段文字出自张德坚等采编所诸人的后补，其行文应是先介绍在上海夷馆所见“伪币”的形制、铸文后注明资料来源，这样才符合他们原定的“凡例”。②

第二，从内容上看：所谓“面曰太平天國，幕曰统理政教”之铜钱，不可能是太平天国的钱币。因为不符合太平天国制度。太平天国起义后，改“國”为“国”，不可能仍在自己的钱币上使用“國”字。另一方面，太平天国从未称过自己为某某教，也不可在自己的钱币上铸“统理政教”四字。以张德坚等“深悉贼情”，当具有这种最基本的鉴别能力。

第三，从它在北大本上的存在形式看：这段文字是写在一个宽约二寸，长约八寸的纸条上，纸条附着在书页上。字迹潦草，与钞本全书正楷书写形成鲜明的反差。附着之页的正面空五格，背面七格全空。③可见，如果这段文字是张德坚等采编所诸人所

① 《太平天国》三，P279.

② 参看《太平天国》三，33页。

③ 北大钞本卷十。

为的话，那么他们本可以直接在空格上写，用不着用附条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也是全书的唯一例外。

1989.12.6

下期要目预告

满蒙风俗习惯 …………… 徐苏、彭荷成整理

天津都统衙门会议纪要选

…………… 刘海岩、郝克路 选编

述德笔记 …………… 毓 盈

最近川乱纪实 …………… 田俊山整理

谭延闿湘鄂战事电簿…………… 靳智整理

苏联外交文件选译（1932—1937）

…………… 李玉贞、杜华译

苏嘉铁路始末 …………… 陆海鸣

徐抚辰与《筹笔偶存》手稿

李 吉 奎

1980年，在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朱金甫、庄建平同志发表了《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一〈筹笔偶存〉述略》一文，介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一份名为《筹笔偶存》的手稿，认为它是记载山东人民反帝反洋教斗争，其中包括山东义和团运动情形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原始资料。文章指出，这份手稿是光绪二十五年五月至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期间山东巡抚衙门所经办的有关洋务交涉方面的官方文牍汇辑，其辑录者佚名；但同时又推测，这份手稿的辑录者，很可能就是当时山东抚署的文案委员。^①1983年，在《筹笔偶存》作为“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时候，朱、庄二同志在该书前面的介绍文章《〈筹笔偶存〉史料价值初探》中，对该手稿的辑录者重行考证，初步判定是光绪二十五年前后曾任山东抚署文案委员的徐辰抚。^②

由于《筹笔偶存》与它的姊妹篇《山东义和团案卷》（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是研究山东义和团的重要史料，因此查清《筹笔偶存》手稿的辑录者是有必要的。在这里，我想对朱、庄二同志的判断做点辨证。朱、庄二同志的论据是很充足的，但准确地说，这位辑录者是山东抚署主办洋务文案、候补道徐抚辰而不是徐辰抚。根据记载，徐抚辰曾经“谏阻离职，（使表）收回颁布

①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432，434页。

② 《筹笔偶存》，第5—6页。

屠杀外人檄谕，一跃为军机大臣。”^①对于这件不为人注意的大事，本文一并叙述。

徐抚辰，字绍五，湖北江夏县人。^②徐氏在山东任事甚久，当李秉衡巡抚山东时，值“甲午中日以干戈相见，防堵方严，候补巡检徐抚辰狡而贪，请赋从军，李矜其有胆识，贸贸然委统三营。及临前敌，则徐已掠饷银宵遁。李恐有干于己，匿其事，久而始发。”^③但是，这件事似乎并未影响徐氏的仕途，至迟到1899年，他已迁至四品衔“指分山东试用同知”。

根据刘禹生《世载堂杂忆》记载，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当世凯初奉廷寄，奖励拳匪焚教堂、仇外人之诏令，^④立即通行全省州县，遵旨办理。”抚署主办洋务文案者为徐抚辰，“向来关于牵涉洋人案件，均经彼乎，而发布此种遵行诏令，竟未寓目，并无所知。闻之大愕，立刻见表谏阻，谓此乱命，万不可从，否则国破家亡，我公何以自了？袁不听。徐退后，即刻摒挡出署，留书告别，益愠切申明利害。书中警句，传诵一时”；^⑤“原文甚长，袁阅之顿悟，急遣人追徐还，面向谢过。而檄文已发，乃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单，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

①②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第130，131页。

③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页五。

④ 这份廷寄似系指1900年6月20日通谕各省督抚，中外畔端已成，勿迟疑观望，应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一事。

⑤ 据刘禹生记述，“徐为吾同县人，其遗袁书，尚有钞存者”，其所记如下：“世界列强，英、俄、法、德、美、奥、义、日本八国也，今以中国战败之后，无兵、无械、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执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围使馆，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倒地，有此理乎？古人以一服八，传为谬说。今真以一国弱昧，而服八国明强，洋人能不联合兵队，以陷中国，决不坐视在中国之各国外人任团匪残杀而不问也。我公明知朝廷因戊戌政变，外人保护康、梁，反对大阿哥，触皇太后之怒，端亲王等乃以团匪进，不用枪炮，而用符咒，能制各国军械死命。大学士徐荫轩言，外国有你的格林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亦我公前日所闻也。我公能不遵行乱命，逐团匪于山东境界之外，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旋乾坤之忠心，如随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灭，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世载堂杂忆》）

人，而剿拳匪。和议告成，袁乃得盛名。后由北洋总督，而尚书，而宫保，而军机大臣，实皆由徐抚辰一人玉成之。”^①上述袁世凯在山东所以“不奉乱命”，乃赖徐抚辰一言之力，是徐抚辰的江夏同乡刘禹生从传闻所得。除了这则记载之外，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也有类似记载。刘书晚出（四、五十年代之间），吴书则初版于1928年，且吴永资料来源系取诸袁世凯幕府中旧人，故可靠性尤大。现将吴书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一时竟有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之诏令”，“闻项城初闻此诏，立即通行所属，遵旨办理。其时抚署主办洋务文案为候补道徐抚辰，湖北人，字绍五，向来牵涉洋人案件，均经彼手，而此事竟未及寓目，闻之大愕，立见项诚谏阻，谓此乱命万不可从。项城不听。徐退后即刻揜装出署，留书告别，益愷切申明利害。项城阅之顿悟，亟遣人召还，面向谢过，而檄文已发，乃以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因是竟得盛名。项城日后之半功伟业，赫赫为全国宗望者，实皆由徐玉成之。当时山左人民，获以安定，清室亦藉延十数年之命，而北方各省，皆得免遭重大惨劫。一言兴邦，造福诚非浅鲜。”吴氏又称：“此事项城幕中旧人，为予历历言之，当非臆造，顾同时竟绝罕知其底蕴者；而徐后亦遂默默无所表见，大功不赏，可惜尤可叹也。”^②比较刘、吴两书有关内容，可知两者意思相同，甚至文字亦相差不大，按成书先后，刘禹生所记当系受吴永口述记载的启发。我们由此似可得出如下结论：（一）候补道、山东抚署主办洋务文案的委员徐抚辰，是《筹笔偶存》手稿的辑录者；与此相关，《山东义和团案卷》批示（巡抚袁世凯所批）的草拟者，无疑也是徐抚辰。（二）徐抚辰由于在抚署主办洋务文案，对中外纠纷的交涉处理相当熟悉，因此他反对奉“乱命去”焚教

^① 《世载堂杂忆》，第131页。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 1985年版，第16—17页。

堂杀洋人。关于袁世凯奉诏在山东焚教堂、杀洋人，经徐抚辰谏阻的未遂之事，他书未见记载，但这是完全可信的。因为他是善于搞政治投机的官僚，他要讨好当朝权贵，以巩固其政治地位，便不能不接受廷寄旨意。但北京局势如此混乱，各国进兵形势日益严重，所以他又改变主意，接纳了徐抚辰的意见，追回发往各府道的上述诏书。对于袁世凯这个时期态度的变化，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三）刘禹生说，“袁对徐，后未重用，徐亦默默以终。是亦与曾国藩对章某，救负投水之功不录，同出一辙也。”又称，此事“在徐自为尽忠，在袁则惧徐将揭其弱点，转存疑忌，徐抚辰之得善终，犹其幸事也。”^①这种说法，与前引《庚子西狩丛谈》中吴永口述，意思正复相同。不过，袁世凯对于徐抚辰，后来还是肯定他属于“山东迭次剿匪出力各员”之列，援案奏保。在袁氏于1901年11月13日的一份奏折中，就有徐抚辰的名字：“山东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徐际鸿，山东候补直隶州知州程文葆，四品衔指分山东候补直隶州知州萧凤文，指分山东试用同知徐抚辰、段祺瑞，……均请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②由于徐氏原是山东官员，又留原省补用，当袁世凯调往直隶任职之后，即与袁氏无隶属关系，所以便不存在“功大不赏”的问题了。当然，在袁世凯的一切材料中，包括《容庵弟子论》在内不提徐抚辰建言一事，这是不难理解的。

徐抚辰的全部阅历不详。至于这部包括来文摘抄、代山东巡抚起草的文稿及记载个人行踪活动的“工作日记”性质的手稿如何保存下来并被存藏于档案馆中，则尤难了解其经过。《筹笔偶存》为我们今日研究山东义和团保存了重要资料，并对该手稿整理付梓，这大概是它的辑录者徐抚辰所始料不及的。

① 《世载堂杂忆》，第133，132页。

② 廖一中等整理，《汇保山东迭次剿匪出力各员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东瀛访书录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未刊《田中家文书》^①

娄 向 哲

田中义一与中国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至1904年他在日俄战争中担任满洲军参谋之时，但是其人开始被中国军政要人注意则是在1915年10月他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次长之后。田中义一在1918年、1923年两度出任原内阁、山本内阁的陆军大臣，1925年任立宪政友会总裁，并于1927年4月至1929年7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与其相关的“田中奏折”、“东方会议”以及“爆杀张作霖事件”皆为现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内容。

笔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翻检到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要人给田中义一的书翰，以及其它一些有关函稿。目睹这些六七十年前声名赫著人物的墨迹，令人感慨不已，因以写下这篇小稿，或可在某一侧面对那个时期的中日关系提供一些线索。

在这些函稿中，冯玉祥致田中信件引起笔者特殊兴趣^②。原稿仅有月、日而无年代，亦无邮印可查，但从原信中提及派遣代表邓恢宇赴日一事，比照其它信函及资料^①，可以确定，该信写于1925年的7月21日。此时田中义一为在野党立宪政友会总裁，准备取代宪政会组阁。由于是在野党党魁的身份，因此对中国“五卅”等事件发表过一些貌似公允之论，所以在冯玉祥致函之

① 《田中家文书》又称《田中义一文书》，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未刊件。

② 《田中义一文书》〔37〕393—397。

首，即称道田中“关怀敝国，为沪汉各案屡荷主持公道，伸以正义，提倡取消不平等各约，赞成撤废治外法权，收回领事裁判权，非独鄙人一人深为钦佩，敝国全国人民莫不感激不已”。冯玉祥自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起，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多了起来，又是聘用日本军事顾问和实业顾问^②，又是接受有日本参与的、由段祺瑞出面“赠予”的军款^③。此时（1925年），冯更是正式派代表赴日作各种接洽。为此，他在信中提及委派“敝军顾问邓恢宇为代表，前赴贵国敬候起居，并聆大局，尚祈赐予接洽，指示一切为荷”。冯在信中所述接洽的宗旨为“彼此本应早日实行亲善，互相携手，互相团结，方不至使凌我弱者生覬覦之心，致挑拨其间谍，乘此而得渔人之利。近二十年来欧西野心图扰我东亚和平，种种证据，不胜枚举，一鉴此世界种族之竞争及东亚之危险，苟不迅速设法补救于未然，将来必有难逃之恶果，故势不能不团结而谋，实行两国根本之亲善”。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推翻了与日本交恶的直系曹（锜）·吴（佩孚）北京政权，兹后他导演过一届内阁，其总理为冯的盟友、著名的亲日政客黄郛。这时的冯玉祥虽已自成系统，但毕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力量孤单。在此情势下，他开始考虑必需进行一些国际方面的活动，其中包括与日本联络。冯与日本交好的企图，终于在不久之后，为有日本支持的吴（佩孚）张（作霖）联合进攻之下破灭。自此，冯玉祥便断绝了对日本的幻想。

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继而控制北京政权数年。其时段所经手的接受“西原借款”，通过“对德宣战案”，签署

① 《田中义一文书》“竹内克己致田中函”〔6〕—130，及《宁垣一成日记》I（角田顺校，みすず书房1968年8月版）1925年8月20日日记均记载冯派邓恢宇赴日事，《日记》将“恢”错写为“荆”，当是日语“恢”、“荆”两字发音相似所致。见该书第487页。

② 《田中义一文书》“竹内克己致田中函”〔6〕—130。

③ 参见拙稿：《论第二次直奉战争》、《史林》1987—4。

“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等一系列事件，将北洋政权与日本的关系推向空前“密切”的程度，即出现北京政权向日本“一面倒”，成为日本政府工具的局面。直皖战后，段祺瑞失势避居天津，时时伺机复出。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时，出现了冯（玉祥）奉（张作霖）两大军阀同时涉足北京政局的情况，在其矛盾难以调和之际，作为缓冲，共同抬出了“北洋大老”段祺瑞。此时的段祺瑞，既不是握有政权的“段总理”，也不是拥有军权的“段督办”，只是一个无任何实力的空名“执政”。段当然不甘心于此，故思重操亲日旧业，欲藉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其号令诸侯，一统天下的野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25年5月28日，段致函田中，希冀得到这位日本政坛实力派的理解与支持。该函名为“秘密意见书”，^①为段政权的一揽子内外政策意见书，其中“对日本之希望”一款提出。一、希望日本对意见书前述之内外政策予以谅解，“并与以实际上之充分援助，以期达到东亚永久安宁之目的”。二、希望日本对以前之“中日悬案”，“放弃目前不利，出以公正宽大之牺牲态度，挽回中国国民之同情，而谋两国国家远大之共同利益。”三、中国政府将“西原借款”用之于“谋正当之理想”，希望日本当局及舆论不要误解其用途。四、期望临时垫款五千万元，“以充收束军事及达建设新政府之用”。并希望日本相助“继续周旋四万万善后大借款以充整理内外各债及全国统一善后之用”。五、“希望投资共营煤铁等矿业”。这一时期的段祺瑞由于已不具有昔时那种对政权的绝对支配力，因而对日本的态度也不能随心所欲，对各方态度要有所顾忌，为此他向田中提出希望日本放弃“中日悬案”种种要求，又由于日本舆论界对“西原借款”大量被用于扩充“参战军”，和一系列军政之用有所批评，段在信中专为此进行辩解。最后两项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希望从日本再次得到贷款以及希望日本对大借款采取

^① 《田中义一文书》〔37〕336—351。

通融态度，其希望日本“投资、共营”矿山企业，实是出卖资源，饮鸩止渴之伎俩，并非发展经济措施。这封信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北京政权对日方针以及段最后出山时对日态度。

在护国战争前，日本朝野特别是财界有相当一部分势力力主扶植西南老官僚、袁世凯的宿敌岑春煊，用其抗衡袁，并计划在打倒袁之后“由岑出来定大局”^①。岑在讨袁时，被推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并任代摄军务院抚军长职。但其并无任何实际贡献，战后却仍思恋栈，企图以此为资本，一争副总统之类的高官厚位，并为此举起反段（祺瑞）招牌。在此背景下，岑与日本实权人物频频联络，期为奥援。他在给时任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信中^②称，“前者彭君（系指彭程万一笔者注）东来荷承指示一切，甚为感谢，日前松井中佐转来尊电，至感……煊为正义人道……主张期望和平……惟今西南诸省既一致愿和而北京当局营私负气，犹复力持武力政策，忍置全国人民苦痛于不顾，此实可痛惜者也。段氏为人，煊对之本无不两立之宿嫌，惟此和武力政策实属太违公道，国人固共厌弃。煊……不得已而去南方，幸军民文武一致推戴，区区之愚，即欲藉南方之实力，以促成真正调和之机……张君翼鹏所购枪弹，务祈准予起云。此着非为内争持久之计，实为促进和平之唯一妙法也……”。但是在当时变化无常的形势之下，梁启超的进步党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以及蔡锷等军事领袖已不再对军务院一岑春煊感兴趣。而日本当局也开始了以经济渗透为先导的新的对华外交，寺内内阁更属意于日趋向日本一边倒的段祺瑞，因此当然不会再对岑有什么热烈的表示。随着7月（即岑致函田中的次月）军务院的撤消，岑春煊也就空抱着野心与幻想退出了政治舞台。

在前述岑春煊致田中函一周后（1916年7月3日），孙中山

① 同人物传记编纂会：《山本条太郎》第278页。同编纂会1942页8月版。

② 《田中义一文书》〔37〕320—326。

也有一函致田中^①。孙中山在信中提到，袁世凯毙命后，护国军“休兵息战，以昭信义于天下”。由于袁的继任者段祺瑞欲承袁衣钵，无视1913年的《临时约法》，遭到孙中山竭力反对，因而在信中有“政局浑沌，依然如旧”之语。在护国战争时，日本军方（主要是陆军军部）曾给予西南反袁势力军火援助，并鼓动含有反袁意义的“满蒙独立运动”。袁毙命后，由时任陆军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下令解散了这个运动的组织^②。故而孙中山在信中讲，“先生前此援助之力，虽造次颠沛，不能忘怀，但时局复迁，收效无几，事势所至，无可如何”。为了改变自己力量单薄的处境，孙中山委派戴季陶赴日，与田中等政要“商已往及将来诸要件”。由于这封信系孙中山介绍戴季陶去面谈的便函，故内容简洁。因此后一段时间，日本当局采取了与北方段祺瑞政权“提携”的方针，同时断绝了与南方孙中山势力的关系，使孙中山与日本当权者阶层的关系落入最低谷。孙中山争取田中义一支持的一番苦心自然亦付诸徒劳。

从田中家文书中还可以看到北洋后期重要军阀吴佩孚与日本关系的蛛丝马迹。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前，直系军阀集团首领吴佩孚与日本的关系一直不洽，一度还趋于敌对状态。但事过境迁，兵败南逃的吴佩孚出于急欲复出野心的需要，开始与日本进行联络。逃到武汉的“吴大师”还支撑着一个“行营”，俨如政府一般。1925年5月，吴派其高级幕僚张志潭为自己的代表，秘密赴日访问，与日本军政界要人商议“合作”可能及讨冯（玉祥）办法，日本乘机插手促成了吴佩孚与张作霖的合作。田中义一在汉口的情报人员鹫泽與于同年11月27日报告田中^③，他在拜访吴佩孚时，将日本希望吴张合作意图转达，并对吴讲，若

① 《田中义一文书》〔37〕333—335。

② 同传记研究会：《田中义一传记》上第639—641页。同传记编纂所1929年1月版。

③ 《田中义一文书》〔6〕129。

此合作成功，可以对各方均有利，日本愿为此从中斡旋，以支持吴张合作打击亲苏俄和国民党的冯玉祥。吴佩孚嘱其严守来往关系方面的秘密。在其后的一次与吴佩孚主要幕僚张志潭、孙润宇的会谈中，张志潭明确向鹫泽舆转达吴认为“贵下（指鹫泽舆）提出吴张提携的意见是可行的”。其后，张作霖的代表张景惠和吴佩孚的代表张志潭在汉口举行会议，“使合作成为固定”^①。1926年4月14日，吴佩孚又通过贵志弥次郎少将（日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向田中义一传言，自己持敌视国民党的态度，希望“日支亲善提携，收拾时局”等^②。从这些资料中不仅可以看到吴佩孚在穷途末路时与日本的一段往来，也可以确定日本确实插手吴张联合讨“赤”，进攻冯玉祥的勾当。以往有关著述对此多语焉不详，上述内容或可成为关于此事的信证。

国民党领导人李烈钧致田中义一的信函可以反映出孙中山晚年与田中的一些联系^③。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并意图将国民革命的影响扩展到北方。此时孙中山仍对日本朝野抱有莫大期望，希冀寺内时代以后的日本能够对南方革命派友好起来。为此，孙中山有意在北上途中，绕道日本，与日本朝野要人洽晤，以取得支持。行前，先派军事助手李烈钧赴日接洽，再决定有无此行之必要。李烈钧1924年9月29日到达日本长崎，11月10日离开门司出港归国，前往上海，与由穗来沪的孙中山合会。李在日期间曾会晤了包括田中义一（时任陆军大臣）在内的政界、军界、财界要人，探询他们对反直战争（其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尚在进行之中）的意向及对中国前景的态度^④。11月19日，李烈钧致函田中，告知孙中山“将于日内绕道

① 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上第570—571页。原书房1968年4月版

② 《田中义一文书》“贵志致田中函”〔31〕36—48。

③ 《田中义一文书》〔37〕423—427。

④ 日本外务省：《外交文书》大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太田警视总监致内、外、陆相。

门司……届时与贵国贤达畅晤一堂，于东亚前途甚有裨益，先生及贵国之关怀大局者倘能枉驾一叙……”云。信中还强调，“世界大势竟趋国民自决之途，黷武者败，恃力者亡……东亚前途发展而光大有待于两国人民之携手也”。据日本方面分析，李烈钧汇报的“与日朝野疏通结果”的情况，坚定了孙中山绕道日本的决心^①。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田中义一文书》（未刊）是研究近现代，尤其是中国北洋时期（约为日本大正时期）中日关系有价值的史料，它必将越来越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

笔者前述几函仅为该文书中一部分内容，兹将文书中北洋时期中国各方面要人写给田中义一的信函目录抄记如下（年、月、日未具者付阙如）：

- 王士珍 1918年2月15日。
- 靳云鹏 ()年()月()日。
- 靳云鹏 1926年1月30日。
- 靳云鹏 ()年5月30日。
- 徐树铮 1921年9月25日。
- 徐树铮 ()年()月()日。
- 岑春煊 1961年6月6日。
- 岑春煊 1961年6月25日。
- 齐燮元 ()年6月13日。
- 孙 文 1916年7月3日。
- 段祺瑞 1925年5月28日。
- 段祺瑞 1925年11月22日。
- 张作霖 1927年()月()日。
- 张作霖 1925年5月()日。
- 张作霖 ()年()月()日。

① 《东京朝日》大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 张作霖 1925年8月15日。
张作霖 ()年10月8日。
莫德惠 1927年()月()日。
冯玉祥 1925年7月20日。
熊炳琦 1918年1月6日。
杨宇霆 ()年()月()日。
杨宇霆 1927年()月()日。
李 纯 ()年6月18日。
李烈钧 1924年11月19日。

· 作者 · 读者 · 编者 ·

一个读者的企望

姚 继 灏

读最近出版的《近代史资料》第73辑第74辑，封面上都印有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的字样。一种学术性资料性的专门刊物，连续维持了三十五年（“文革”时期也停刊了十年）连续出版，主其事者，所耗的精力，所遇到的艰阻，读者是不太容易理解的。

记得《近代史资料》于1954年开始出版，至1965年共出版了三十五辑。“文革”时期停刊，到1978年下半年恢复出版，从第三十六辑起到目前已出到74辑。三十五年共出了74辑，差不多平均每年出版二辑，在出版的速度上和数量上是少得可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每一辑《近代史资料》平均发表10篇资料，那么74辑就有740篇资料，只要你翻一翻这些篇目，就会感到丰富多采，洋洋大观。可惜的是经过“文革”，在“文革”前出版的《近代史资料》共35辑，现在是已很难见到了，就是在图书馆借读，也很是困难。我建议近代史研究所把“文革”前出版的《近代史资料》35辑，以合订本的形式，重新印行出版，以满足读者的希望与要求。

目前在出版界呈现出的不景气情况下，要出版这合订本，问题和困难确实很多。甚至还会亏本，谈不到有多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从社会效益方面来看，历史科学要更多更细的占有资料。以往已经取得的成就，不能使之湮没无闻，更应要宏扬而流传。从这个角度来说，重印“文革”前的《近代史资料》近代史研究所

是责无旁贷的。

现在我对《近代史资料》提出几点企望。

(一) 经常发布一些出版信息, 能否多开一些发行渠道。

据我所知喜读《近代史资料》的读者, 为数还是不少的, 大家都感到出版讯息的不灵通, 不知将要出版第几辑, 何时能出版, 有些什么内容。

近年来出版的《近代史资料》基本上都有下一辑的“要目予告”。同时希望能在这“要目予告”下面, 也予告一下出版的大概日期, 在前面的目录栏内也排上一行“下辑的要目予告”在本辑内的页数, 便于醒目和翻阅。

《近代史资料》发行的渠道狭窄, 读者购买困难, 这是我深有体会的, 在新华书店就很难买到, 书店进书量很小, 去一问就说已售完了。

前几年我与《近代史资料》编辑部打上了交道, 经常在那里打听一下出版讯息和请教一些问题, 承编辑部同志热诚解答和帮助, 他们为了照顾老读者, 每一辑出版后都代邮寄到家里这样我对每一辑《近代史资料》出版后就有了确实的保障, 我对编辑部的各位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二) 希望《近代史资料》能扩大增加一些篇幅。

现在每一辑基本上是300页左右, 能否增加到400页, 内容就会更丰富些, 希望能保持每年能出足4辑。以编辑部目前的人力要增加扩大些篇幅, 工作量确是很艰巨, 也会出现和遇到不少的问题和困难。目前像《近代史资料》(再有《近代稗海》) 这样经过选择整理, 校勘的有系统的、有价值的出版物确实是太少了。有些文史类的综合性刊物, 不免内容庞杂, 大都是趣味性强而学术价值小, 其中也不时有些有价值的篇章, 但也有册帙分散, 事后随时翻阅查核不太方便, 我和许多历史爱好者都有欢迎增加些篇幅的奢望, 希望编辑部多挤出些牛奶来以滋养欢迎这本

刊物的读者。

(三) 希望《近代史资料》能供给一些史学界的讯息和陆续介绍一些类于《近代史资料》、《近代稗海》性质相似的建国四十年来已刊行的资料篇目介绍。

由于爱好的驱使，也产生了一种惯性，各种资料能知道得多，多益善，也想多知道的主要是关于近代史研究方面有那些成就，已经发表过那些著述将要发表那些著述。

建国四十年来，以往刊行过的资料，为数可能也不少，以往这些资料的一部分，或者是作为内部资料，外间不易知悉和流传，在目前的形势下，已没有限制的必要，这些都是史学界的成绩和结晶，现在加以介绍，发表一下篇目，我认为也有些必要：介绍时每一刊物最好有一简介，有编撰者姓名出版的年月，由那一出版社或那一机构出版的，读者如有需要到图书馆去查阅那就方便得多了。

如果《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认为这样的报导介绍可以试行一下的话，我再建议在发排时不要排在空白处，最后应该作为一种专辑，附录排在最后的扉页数上，继续在每一辑上发表一些集腋成裘，假以时日，或能结出硕果成为一种有用的资料。

以上三点是我企望于《近代史资料》者供参考。

由于我热爱《近代史资料》所以要说的话很多，但限止水平和认识，又不善于修辞，以之见解不明说理不清，零乱而又琐屑，废话太多，不过是爱之切而言之诚，就顾不见贴笑大方了，平庸之见，供参酌，祈斧正。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78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世史資料

近世史資料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李学通
封面设计：王增寅
版式设计：刘建光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78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76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500册
ISBN 7-5004-0870-6/K·105 定价：3.65元